



ISSN2097-5287
CN 37-1372/Z

德州学院

学报

2025 5
VOL.41 NO.5

- 山东省优秀期刊
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收录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数据库收录期刊

德州学院

学报

双月刊

1985年创刊

2025年第41卷第5期
(总第203期)

2025年10月出版



编委会主任：刘印房

编委会副主任：孙乃龙 唐延柯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家峰	马锡骞	王丽燕	王新芳
王鹤	冯琨	曲铭海	吕志轩
朱超	仲冲	刘印房	刘丽霞
刘艳芹	许士才	孙乃龙	杜亚丽
李春光	李春辉	李亭	李洪亮
杨振生	杨颖	张锦辉	陈伟
陈超	房敏	顾相伶	徐慧清
郭长友	唐延柯	董文会	曾强成

主编：刘印房

常务副主编：孙乃龙 唐延柯

副主编：李春辉 李亭 徐慧清

德州学院学报

(双月刊)

2025年第5期
第41卷(总第203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论中国共产党党性概念的五重意涵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杨兆青(1)

“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的逻辑建构 许忠祥(8)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

——《大众日报》的抗战宣传及其与读者的联动(1939—1945) 耿东旭(14)

地域文化研究·董仲舒研究

天人·伦理·权变：董仲舒礼治思想的三重维度 张晓丹(21)

董仲舒天人观念与汉儒“大我”意识的构建 刘子钰(26)

法学·社会学研究

涉外法治文化的基本概念、双重价值及其发展路径 管彦杰(33)

蓝碳交易监管法律机制研究 刘 彤(38)

传说、节庆与当代乡村生活的嬗变

——基于禹城市伦镇五村的田野调查 周 腾(44)

文学·艺术研究

苏轼动物诗词的死亡书写与生命意识.....	杨景春(51)
论明代小说中的“折子戏”.....	杨文琪 池程远(57)
明清诗歌视域中的德州运河区域多维图景探析	崔秀霞(64)
老舍小说《热包子》的双重叙事进程研究	赵 璐(70)
当代影视剧中新乡贤叙事的美学建构与地方表达	王 琳(75)
阶级冲突与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 ——哈代小说中的教育与婚恋问题的实质	魏凤蝶(82)
艺术能否定义及如何定义 ——丹托的艺术本体论建构	苑少波(88)

地域文化研究·苏禄王及中菲关系研究

德州地域文化译介和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以苏禄王博物馆为例	张锦辉 董 雪(93)
--	-------------

高校教学研究

核心素养视域下中小学教师关键能力：结构要素与特征	房 敏(97)
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可能、可为与可行	王戈弋(103)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Vol. 41 No.5

October 2025

MAIN CONTENTS

On the Five Meanings of the Concept of CPC's Party Spirit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YANG Zhaoqing (1)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l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XU Zhongxiang (8)

Heaven, Ethics, and Contingency: The Tripartite Dimensions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n Ritual

Governance ZHANG Xiaodan (21)

Dong Zhongshu's Concept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and the “Greater Self” Awareness among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Han Dynasty LIU Ziyu (26)

Folklore, Festival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Rural Life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in Five Villages, Luntown, Yucheng ZHOU Teng (44)

On the “Zhezi Opera” in Novels of the Ming Dynasty YANG Wenqi CHI Chengyuan (57)

An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Landscape of Dezhou Canal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g and

Qing Poetry CUI Xiuxia (64)

The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of Lao She's *Hot Steamed Bun* ZHAO Lu (70)

Class Conflict and the Awakening of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al and Marital Issues in Thomas Hardy's Novels WEI Fengdie (82)

Competenc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from the Core Literacies: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FANG Min (97)

论中国共产党党性概念的五重意涵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杨兆青

(德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通过对《人民日报》(1949—2024)582篇党性新闻报道的扎根分析,揭示中国共产党党性概念的五重意涵,即阶级性、政治性、人民性、革命性、求是性。阶级性是党性概念初始建构时的关键意涵,在改革开放后的党性话语表达中有所调整。政治性意在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使命、政治属性、价值目标等,是当代党性概念的首要意涵。人民性即中国共产党所秉承的人民至上原则,彰显出对西方政党资本至上原则的本质超越。革命性涵盖暴力革命、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超大规模先锋队政党性质决定的。求是性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法。阶级性、政治性、人民性、革命性、求是性五者有机结合,生成互融互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成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性;扎根理论;《人民日报》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5-0001-07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2016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万里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1]。“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在延续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原则的同时,还创造性地将其与中国国情有机结合。党性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对百年风云变幻,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特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轴心。

目前,学界针对党性概念内涵已取得丰硕成果。概括来说,大致分为三要素论、四要素论与五要素论。三要素论,有阶级性、科学性与实践性说^[2],实事求是、人民至上与对党忠诚说^[3],实事求是、组织观念与优良作风说^[4],人民性的统一、讲政治与坚持自我革命说^[5],人民性、先进性与纯洁性说^[6],以及精神层面、价值层面与实践层面说^[7],等等。就四要素论来说,魏磊认为

新时代党性概念包括坚强的政治定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及清醒的自律意识^[8]。就五要素论来说,王洪树、刘玲认为,党性涵盖理论性、阶级性、组织性、人民性和先锋引领性^[9]。

既有学术成果为党性概念的深入剖析奠定坚实理论基础,也尚存一定的研究空间。其一,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中,对党性概念的界定不是其研究主题,而是服务于其他研究目标的手段与方式。论述篇幅的有限性难免导致结论的片面性。其二,从概念体系来看,既有研究大都缺乏历史贯通性论证。尽管中国共产党党性概念随着时代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变迁表征,但其背后却蕴含着不变的精神内核,而这正是党性概念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三,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研究多拘泥于文本分析与历史分析,研究的科学性、全面性与客观性有待提升。

基于此,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中的党性报道为分析对象^①,运用Nvivo12对上述文本进行扎根研究,从理论层面纠正现有研究对党性概念的认

收稿日期:2025-08-16

基金项目:2025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安干部党性塑造的历史实践与经验启示研究(1949—1956)”(25CDJJ03);2025年度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研究”(2025DZZS010)。

作者简介:杨兆青(1987—),女,山东德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① 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被正式确立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保证研究的历史完整性与客观真实性,本文以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新闻报道为分析对象。

知偏差和界定缺失,厘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及与其他政党的显著差异,为完善党的建设理论夯实核心概念的根基;实践层面解决党的领导干部党性意识淡薄的问题,加强党性修养教育的边界范畴、重点重心,以提升党性修养的完整性、针对性与时效性,从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知。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是最能彰显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理念的全国性媒体。本文以《人民日报》(1949—2024)图文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源,以“党性”为关键词,对《人民日报》(1949—2024)图文数据库进行标题检索,共获取1949年10月1日至2024年4月30日^①的党性相关报道597篇,并以以下标准进行二次筛选:选取文字报道,排除图片新闻;选取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塑造党性、提升党性修养的相关文本,排除他国新闻报道,共筛选出契合本研究的有效文本582篇。

采用扎根理论法是因为扎根理论以政策文本、访谈记录为代表的的文字材料为处理对象,通过对文字材料逐级编码、逐级提炼出理论概念与过程机制的方式,从经验材料中创造出理论^[10]。因此,得出的研究结论相对客观、全面。扎根理论强调从经验材料中创造理论,而不是预设研究问题;文字的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核心要素,以此为基础逐级生成理论概念与主副范畴;明确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是交替进行的过程,即应将生成的概念与范畴及时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并指

导下一步的数据收集工作。

三、中国共产党党性概念多重意涵的范畴提炼

统计发现582篇新闻报道的总字数约为100.3万。为保证研究的相对客观性,本文对582篇新闻报道中涉及党性概念的关键段落进行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分析,以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性概念的多重意涵。

(一)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通过对已有文本逐一进行分析、比较,提炼生成概念、界定范畴,并确定二者隶属关系的过程。根据概念之间的近义、相关与隶属关系,将指涉较为接近的概念归拢为同一范畴。在研究过程中,围绕党性概念的核心意涵,对出现频次较高(三次以上)的概念予以整合。例如,“拥护共产主义”“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三个概念可以合并归纳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范畴。又如,“党的利益至上”“以党的革命利益为重”“遵从党的利益”“坚持一切从党的事业出发”等概念均可以整合为“维护党的利益”。最终,共得到有效概念449个,初始范畴169个。

(二)主轴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后形成的范畴是各自独立的,需要通过分析各范畴间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归纳总结生成主轴性编码。通过对169个初始范畴进行二次编码,获取14个主范畴(见表1)。

表1 主轴性编码

主范畴	初始范畴
B1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A25 阶级性的集中体现方式; A36 坚持无产阶级立场; A37 坚持无产阶级思想; A38 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 A62 践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A64 拥护无产阶级专政; A73 坚持阶级斗争
B2 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A84 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A35 贯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A42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A67 运用辩证唯物论; A92 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 A116 坚持“三个代表”思想; A119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133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A47 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A74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A66 将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A10 坚定政治信念
B3 提高政治本领	A14 加强政治锻炼; A18 重视政治教育; A128 增强政治鉴别力; A107 提高政治敏锐性; A100 提高政治判断力; A101 提高政治领悟力; A103 提高政治执行力; A104 提高政治站位; A55 提高政权观念; A122 提高政治履职能力; A123 提升宪法修养; A163 增强政治生活战斗性; A164 保持政治定力; A45 扛起政治责任; A130 增进政治认同; A131 坚定“四个自信”; A69 心怀“国之大者”; A70 对标对表; A10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 A50 增强整体观念; A52 以集体利益为重; A60 树立全局观点; A61 贯彻局部服从全局原则; A132 坚持胸怀天下
B4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A148 严格党内生活; A149 增强党内生活战斗性; A150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A151 推动党内生活创新; A152 加强党内生活实践锻炼

^① 笔者搜集新闻报道的最后时间为2024年4月30日。

续上表

B5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A13 维护党的利益；A3 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A9 响应党的号召；A15 执行党的命令；A16 遵守党的纪律；A17 完成党的任务；A80 自觉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A90 服从党的领导；A109 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A156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A65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A2 筑牢政治忠诚；A157 铁一般的信仰；A158 铁一般的信念；A94 坚持民主集中制
B6 严明政治纪律	A168 突出政治纪律；A56 突出政治规矩；A53 反对宗派主义；A54 反对山头主义；A44 克服派性；A49 抵制小团体主义；A48 批判自由主义
B7 维护人民利益	A1 保卫人民生命安全；A6 为人民财产利益负责；A26 党性与群众性的统一；A7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A21 代表人民利益；A27 表达群众的呼声；A91 实现人民共同富裕；A118 提高执政为民水平；A165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A167 永葆全心为民的公仆情怀；A134 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A138 坚持人民至上；A83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A154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A98 推进高质量发展
B8 依靠人民群众	A12 依靠全体职工；A59 听取群众意见；A71 开门整风；A110 善于运用群众观念；A111 虚心向群众学习；A112 支持舆论监督
B9 密切联系群众	A20 密切联系群众；A82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A146 树立正确的群众观；A147 改进和创新群众工作方法；A7 坚持群众路线
B10 发扬斗争精神	A19 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A39 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A102 发扬奉献精神；A117 树立责任意识；A120 增强使命意识；A124 加强生活作风建设；A129 增强忧患意识；A161 传承红色基因；A58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A153 加强道德修养；A160 铁一般的担当；A114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A125 树立正确的权力地位观、利益观；A46 与“以我为核心”作斗争；A5 增强斗争精神；A155 抵制形式主义；A89 抵制官僚主义；A139 克服享乐主义；A136 克服思想懈怠；A87 克服独立主义；A140 克服拜金主义；A86 克服英雄主义；A30 改变领导干部的官气；A88 抵制奢靡之风；A137 克服能力不足的危险；A169 坚持自我革命；A41 突出问题导向；A77 针向破题；A51 破私立公
B11 强化正风肃纪	A159 铁一般的纪律；A32 保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A76 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A79 加强纪律检查工作；A34 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A87 开展整风运动；A22 与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A31 遵守党章；A141 全面从严治党；A142 “两个清单”；A143 “四种形态”；A144 紧抓领导干部“关键少数”；A145 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
B12 保持清正廉洁	A93 廉洁奉公；A99 杜绝以权谋私；A105 公道正派；A106 拒腐防变；A135 严守清正廉洁；A11 铁面无私；A95 秉公办事；A121 反腐倡廉
B13 坚持实事求是	A78 坚持实事求是；A81 坚持科学性；A23 把握工作规律；A24 唯实求真；A28 精准施策促发展；A43 狠抓落地见效；A126 求真务实；A63 克服主观主义；A68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A72 忠于客观实际；A85 坚持主观与客观相一致；A108 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A113 坚持从实践出发；A40 在实践中去磨练、去锤炼、去检验；A33 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B14 坚持守正创新	A162 坚持守正创新；A96 坚持改革与创新精神；A115 弘扬与时俱进；A127 坚持继承光荣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相统一；A8 解决实际问题；A29 把问题整改贯穿始终；A97 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模式；A57 深入调查研究

(三)选择性编码

所谓选择性编码，即在确定初始范畴和主范畴关联的基础上凝练核心范畴，并据此构建全面的理论框架。具体工作包括：一是凝练出能够统领全部范畴的核心范畴；二是用生成的范畴解释所有文本；三是将核心范畴与其他成果纳入典型模型，并用全部文本加以验证。本文在反复比较分析初始范畴和主范畴的基础上，提炼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性概念的五大核心范畴，即“阶级性”“政治性”“人民性”“革命性”“求是性”（见表2）。

四、中国共产党党性概念五重意涵的理论阐释

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性概念多重意涵这一研究

主题，本文经过对582篇新闻报道的三级编码，提炼出“阶级性”“政治性”“人民性”“革命性”“求是性”五大核心范畴。

(一)阶级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共产党的党性首先是阶级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中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11][27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关于党性能够反映政党及其成员阶级属性的基本观点^[12]。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13][367]}，明确阐述

表 2 选择性编码

编号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具体含义
1	阶级性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党性的彻底表现与出发点
2	政治性	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提高政治本领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严明政治纪律	坚持党性要求共产党员以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行动指南 共产党员应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增强党性要求共产党员提高政治敏锐性、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与政治执行力 为共产党员增强党性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 政治纪律是共产党员坚守党性的政治红线
3	人民性	维护人民利益 依靠人民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	共产党员增强党性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 共产党员增强党性效果如何需要人民群众的评判 共产党员增强党性的方式是密切联系群众
4	革命性	发扬斗争精神 强化正风肃纪 保持清正廉洁	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 从思想上固本培元，增强共产党员拒腐防变能力 坚守共产党员政治本色，坚持反腐败这一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5	求是性	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守正创新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人民群众的客观问题 增强党性要求共产党员不迷失方向，把握、引领时代

党性的阶级立场。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应当具备坚定的党的立场，也就是党性^{[14][498]}。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时代背景下，阶级性的言说重心与阐述方式围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得到进一步丰富发展。党更多地是从阶级属性的角度定义党性内涵，“阶级”或者“阶级性”成为与“党性”联袂出场的高频词汇，“阶级性”自然成为这一时期党性概念的关键意涵。

中国共产党对党性概念的建构始于阶级性，改革开放后随着党性内涵不断丰富，阶级性话语亦有所变化。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锻造党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始终代表无产阶级接受洗礼与考验。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个别党员“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天下已经太平了”^[15]的思想论调，严厉重申要“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本领”^[16]，强调要在增强党性过程中抵制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贪污腐化的工作恶习。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性概念中的“阶级性”表达有所调整。

(二) 政治性

党性意涵中的政治性是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展开的，意在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使命、政治属性、价值目标、组织原则等本质规定^①。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政治建设置于核心位置，党的二十大更是将其界定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因此，“政治性”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性概念的重要意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若中国共

产党在政治建设层面稍有懈怠，那么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便会根基不牢，甚至引发地动山摇的灾难性后果^[17]。在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性概念多重意涵”的三级编码过程中，提炼出“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本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5个主范畴，占比35.7%，涉及63个初始范畴，占比37.3%。由此可见，不论是主范畴，还是初始范畴，“政治性”在五个核心范畴中均占据最高比例。

“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为共产党员增强党性奠定思想基础，是坚定政治信仰的重要表现。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践行各时期历史使命的行动指南。“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彰显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共产党员增强党性的基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便曾产生“硬说有了党的领导，便没有新闻自由”的言论，中国共产党予以坚决反击，重申“没有党的领导，就没党性，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18]。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具体内涵得到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即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员党性的底线标准。“提高政治本领”要求共产党员切实提高政治敏锐性、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与政治执行力，这是复杂形势与严峻斗争

^① 关于“政治”概念的具体内涵，朱光磊、王智睿认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语境下的“政治”生成“两概念一用法”三种形式：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专业阐释；以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广泛使用；作为形容词的观念建构。参见朱光磊，王智睿：《中国“政治”概念的专业阐释与社会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考验下对党员党性的更高要求。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西藏时强调共产党员要“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用党性原则修身律己，切实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引领群众”^[19]。因此，共产党员增强党性便要善于从党的建设、国家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服务大局上见行见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调为共产党员增强党性形塑良好政治生态，这对共产党员增强党性同样至关重要。在心情舒畅、氛围活泼的政治环境下，共产党员的党性才能通过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会以及党内生活的实践锻炼得到进一步增强。“严明政治纪律”关乎党的力量和权威，是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政治红线。政治纪律是党最重要、最根本的纪律，是共产党员锻炼党性的关键标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反对在党内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严守政治纪律不是空喊口号，必须落实到共产党员实际工作的时时处处。唯有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纪律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才能真正地检验出党性。

（三）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20]^[98]中国共产党党性秉承人民至上的价值原则，彰显出对西方政党资本至上原则的本质超越。一是中国共产党增强党性的根本目的是“一切为了人民”。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坚决捍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到改革开放后努力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再到十八大之后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举措在鲜活时代背景下，聚焦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这一中心议题，演绎出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党性增强路径。二是中国共产党增强党性的关键路径是“一切依靠人民”。对政党党性的阐释，追根究底是一种价值判断。中国共产党建党百余年历程中，其党性原则遵循怎样的价值取向？发展程度如何？对于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将评判标尺置于人民群众手中。例如，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整风运动所秉承的“开门整风”原则，就是把党员干部的问题摆在群众眼前，“让工人群众进行帮助，监督他们改正错误”^[21]。三是中国共产党增强党性的落脚点是“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增强党性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不是囿于少数人的部分富裕，也不是限于单一层面的物质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丰盈。

“人民性”之所以能够成为党性概念的关键意涵，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是人民立场。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论证权力合法性的关键路径。对于政党来说，通过暴力革命、民主选举等途径成功获取政治权力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何有效提高民众对该政党的认同与配合（即权力合法性）才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提出人类理性假设，“如果他们相信人们是理性的，统治者就会尊重老百姓辨别真伪的能力。因此，即使人们不是完全理性的，让统治者畏惧人们可能的理性和反对失误的能力也是好的”^[22]^[12-13]。中国共产党在论证权力合法性过程中，没有止步于人类理性假设，而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立场上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重在维护局部利益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是为整体人民群众谋幸福。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方方面面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能够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23]^[54]，而国家利益在本质上与全社会利益是高度契合的，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国家、人民群众三者利益的高度统一性。也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得到政治权利客体——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

（四）革命性

彻底的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诉求，不论其身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长期执政的和平时期，都不能弱化。统计显示“革命”一词在582篇党性新闻报道中共出现2164次，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革命性”构成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关键意涵。那么，究竟何为“革命性”？萨托利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中指出，“如果革命是与反革命和复辟相对立，所提到的则是长远的历史趋势；如果革命是与秩序和法制相对立，我们指的是生活的概念，或至少是价值信仰；如果革命的作风是和保守的或温和的作风相对，我们指的是行为的策略或行为风格”^[24]^[319-320]。据此逻辑来看，“革命性”的内涵取决于该词出现的具体场域。纵观“革命”一词在党性新闻报道中的2164次出场便会发现，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指向也不尽相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的指向主要是暴力革命。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时代背景下，“革命”的指向则转变为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

“革命性”何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性概念的重要意涵？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超大规模先锋队政党性质决定的。一方面，先锋队性质本身就暗涵着革命性追求。所谓先锋队政党，即“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25]^[1]。先锋队性质不是共产党天然就有、

永远保有的,如何顺应时代始终具备先进性和纯洁性,构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先锋队之间”^[26]。中国共产党若要一以贯之地秉承先进性与纯洁性,就必然需要革命性的全方位加持。只有坚持革命性才能迅速识别思维惯性与行为惰性,及时摒弃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理性应对党员干部中的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问题,确保全党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另一方面,革命性能够弥合超大规模政党的内在张力。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先锋队,而且是超大规模的先锋队。对于超大规模政党来说,“并不认为是可以自我改变的,并且他们的结构对环境改变产生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敏感”^{[24][316]}。

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两大利器成功破解萨托利提出的双重困境。其一,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否定超大规模政党“并不认为是可以自我改变的”论断。与西方政党讳莫如深的态度不同,中国共产党直言不讳地申明,“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27][30]},并将反腐败斗争提升至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的新高度。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才能具备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成功穿越“并不认为是可以自我改变的”迷境。其二,中国共产党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社会革命精神,抵制“结构对环境改变产生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敏感”的惰性。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革命不仅变革经济基础,也推动上层建筑的革新,更时刻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捕捉国内外形势动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五)求是性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调:“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28][801]}这里所指的“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到评判党性的高度,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发展和贡献。改革开放前期,习仲勋在广东调研时再次重申:“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29]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我父亲讲过,‘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30]这是习近平首次以总书记身份作出“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价值判断,正式确立了党性与求是性的逻辑关联。

求是性何以能够成为“最大的党性”?其原因就在于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

根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27][75]}。毛泽东曾将实事求是鲜活地比喻为“有的放矢”,这个“的”,就是中国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利用科学方法切实找到现实中国的问题症结,并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开展实际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特别强调从提高干部解决经济工作中实际问题能力的角度增强党性^[31]。改革开放后,在发展经济、推进社会建设以及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等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提出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实质是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增强党性相挂钩^[32]。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履行抓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主体责任,坚持区分层次,突出问题导向,确保取得实际成效”^[33]。“两学一做”主题教育作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增强党性的重要举措,更是“突出问题导向”,也就是从党员干部日常工作中进行问题大梳理、难点大排查,以其是否能够打通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为标准评判党性,以此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结论

通过对《人民日报》582篇党性新闻报道的扎根研究,分析得出中国共产党党性概念包括阶级性、政治性、人民性、革命性、求是性五重意涵。在党性概念体系中,五重意涵的定位也不尽相同。其一,阶级性与政治性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党性理论的共通之处。具体来说,阶级性是政党得以生成的前提条件,回答的是“隶属于何阶级”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出发点。政治性是政党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印证的是“权力缘何正当”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主干线。其二,人民性、革命性、求是性是中国共产党显著区别于其他政党党性理论的特色之处。具体来说,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持续奋斗的受益主体,诠释的是“为了谁、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落脚点。革命性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解决的是“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保鲜剂。求是性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阐述的是“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方法论”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检测阀。阶级性、政治性、人民性、革命性、求是性五者有机结合,生成互融互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建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 [2] 许全兴.实事求是:科学性与党性的统一:对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党性关系的一点反思 [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0(1).
- [3] 郑传芳,周晨露.增强党员意识是强党性的必然要求 [J].思想教育研究, 2024(4).
- [4] 丁俊萍,张昂.毛泽东党性教育思想的生成理路、丰富内涵及意义启示 [J].江西社会科学, 2023(11).
- [5] 徐莹,葛宁.习近平关于党性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3(5).
- [6] 周叶中,王梦森.论中国共产党党性是党内法规制度的灵魂 [J].法学杂志, 2022(6).
- [7] 马锦燕.关于党性和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思考 [J].学习论坛, 2018(1).
- [8] 魏磊.党员干部党性评价研究 [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
- [9] 王洪树,刘玲.中国共产党党性:历史生成与时代内涵 [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 [10] 吴肃然,李名荟.扎根理论的历史与逻辑 [J].社会学研究, 2020(2).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 13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 [12] 吴文珑.中国共产党党性观念的历史变迁 [J].教学与研究, 2023(8).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 [M].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6 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 [15] 安子文.接受教训,增强党性 [N].人民日报, 1957-09-11(7).
- [16] 增强党性修养 [N].人民日报, 1964-12-19(2).
- [17] 习近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J].求是, 2021(16).
- [18] 王漠.党的领导是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保证 [N].人民日报, 1958-01-04(7).
- [19] 本报评论部.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引导群众 [N].人民日报, 2021-07-28(007).
- [20]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北京:学习出版社, 2016.
- [21] 太原红卫纺织厂革委会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 不断增强无产阶级党性 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派性 [N].人民日报, 1969-08-18(3).
- [22] 罗斯金,科德,梅代罗斯,等.政治科学 [M].林震,王峰,闭恩高,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 [2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 [24]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 [M].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 [2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 10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 [26] 王里,魏旭.自我革命:百年大党解决自身独有难题的成功路径:基于先锋队理论的视角 [J].科学社会主义, 2023(5).
- [27]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 [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3.
- [28]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29] 吕晓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力量 [N].人民日报, 2016-06-02(4).
- [30] 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J].求是 2022(3).
- [31] 金志军.在经济工作中的布尔什维克党性 [N].人民日报, 1950-04-27(3).
- [32] 黄智敏,武培真.全国建立五个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实验区 [N].人民日报, 1984-06-19(2).
- [33] 姜洁,蒋雪婕,温素威,等.补精神之钙 铸党性之魂 [N].人民日报, 2017-03-07(014).

On the Five Meanings of the Concept of CPC's Party Spirit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YANG Zhaoqing

(School of Marxism,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root analysis of 582 party spirit news reports in *People's Daily* (1949–2024), this paper reveals the five meanings of the concept of the CPC's party spirit, namely, class nature, political nature, people's nature, revolutionary nature, and truth seeking nature. Class nature was a key implication in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party spirit, but gradually faded out of the perspective of party discours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tical nature means to emphasize the CPC's party mission, political attributes, value goals, etc., which is the primary meaning of the contemporary concept of party spirit. The people's nature is the principle of people supremacy upheld by the CPC, which shows the essence of transcending the principle of capital supremacy of western political parties. 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covers violent revolution, social revolution and self revolution,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the CPC as a super large vanguard party. Seeking truth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the CPC to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and is also the basic working method of the CPC.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lass, politics, populism, revolution, and truth-seeking creates a socialist party building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mutually integrated and interconnected.

Key words: CPC; Party spirit; grounded theory; *People's Daily*

“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的逻辑建构

许忠祥

(佳木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0)

摘要:以“两个结合”为视域,系统探究可发现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的逻辑建构具有非常深刻的机理。党的政治使命建构遵循“理论奠基—实践展开—文化认同”的三阶逻辑:在哲学根基维度,马克思主义通过“两个结合”实现从“外来理论”到“理论内核”的转化,以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合法性基础、实践认识论提供方法论支撑、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价值牵引;在纲领引领维度,依托“两个结合”推动纲领从“抽象理想”向“具体实践”演进,通过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实现目标分层,借助纲领迭代与制度化机制确保实践落地;在文化浸染维度,通过“两个结合”促成政治使命从“政党目标”到“民族共识”的升华,以中华文明基因塑造使命话语,构建文化合法性的认同基础,实现文明主体性觉醒和表达。

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逻辑建构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5-0008-06

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直接涉及“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的研究,但以“使命”为主题的相关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相关研究聚焦载体而非本体。多数研究以党刊、党媒、人民政协等政治传播平台或协商机构为对象,探讨其政治功能与使命担当,而非直接阐释政党自身的政治使命内核。二是偏向实践导向的宏观论述。现有文献多从党的“政治建设”“初心使命”“全面从严治党”等实践层面切入,强调使命的历史渊源或现实制度体现^[1],缺乏对政治使命的理论建构逻辑及其动态生成机制的系统分析。三是理论视角相对单一。部分研究虽涉及使命话语的历史演变,但多局限于党史或政治学传统范式,未能充分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的最新理论成果,更少与“两个结合”这一核心方法论形成深度的关联性分析。国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常受理论预设与意识形态影响,部分国外学者仍延续“权威主义”或“精英政治”的范式,将政党的使命话语简化为合法性建构工具,忽视其文化根基与人民性特质。另外,近年来虽有关注“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象征性意义的研究,但未能深入剖析其与中华文明特性的内在关联。

“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不仅为理解党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密钥,更为分析党的政治使命建构逻辑提供了核心框架。一方面,“两个结合”是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根本

路径,而政治使命作为政党理论的核心表达,必然嵌入这一结合过程。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原理如何与中国实践和优秀传统文化互动并重塑使命话语,可揭示使命建构的动态辩证逻辑,避免静态描述或机械还原。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常陷入“传统—现代”的二元逻辑建构框架,而“两个结合”视角能超越此类对立,将使命建构视为理论、历史与实践的动态演进过程。这既能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奠基,又能强调中华文明的价值赋能;既能注重阶段性使命纲领的历史连续性,又能凸显其回应时代问题的实践性。基于此,有必要以“两个结合”为视域系统剖析党的政治使命在理论、实践、文化三个维度的逻辑建构,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以及理解党的政治使命的传承和创新提供学理支撑。

一、使命之哲学根基:马克思主义对使命的理论奠基

作为政治使命逻辑建构的起点,马克思主义并非以僵化的“外来理论”形态直接作用于党政治使命的建构实践,而是通过“两个结合”的动态过程实现本土化转化,最终成为党政治使命的“理论内核”。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结合,将抽象的社会发展规律转化为界定使命合法性的理论准则,矛盾分析法与阶级

收稿日期:2025-06-29

作者简介:许忠祥(2001—),男,山东宁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

分析法则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的实践形态。实践认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交融，突破了纯粹哲学范畴，转化为指导政治使命推进的“方法论工具”。“自由人联合体”理想与中国“大同社会”目标相结合，使终极价值追求具象化为“共同富裕”等可感知的价值指引。通过这种“外来理论一本土结合一内核确立”的动态建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奠定了兼具理论彻底性与实践适应性的哲学根基。

（一）历史唯物主义为政治使命提供合法性基础

社会矛盾运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之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党界定政治使命、校准实践方向的“理论坐标”。马克思矛盾运动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动态演进的合法性基础，其本质是“第一个结合”在历史观层面的实践展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第一个结合的实践成果。毛泽东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2]3}这一革命首要问题，将政治使命从“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抽象口号，具体化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3]1316}的实践纲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一步彰显“第一个结合”的方法论价值。“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4]191}将政治使命从“革命夺权”转向“发展生产力”，遵循了“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5]489}的理论指引。改革开放初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设立经济特区等实践，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转化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中国方案。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第一个结合”在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上的时代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一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6]362}，是第一个结合在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上的时代深化。

阶级分析法与人民主体论的结合，进一步补充了“第一个结合”在政治使命合法性建构中的作用。“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465}之论断，与中国“民为邦本”的传统治理智慧相融合，形成了“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党的政治使命主体逻辑。新中国成立之初，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体，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必须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独立组织”^{[7]12}的要求，与中国工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结合，使党的政治使命获得广泛的阶级基础与社会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8]。这种理论与实际的当代结合，既坚守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性，又通过“人民主体论”将使命价值覆盖全体人民，构建起从无产阶级解放到人民幸福，再到民族复兴的传导链条。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使命合法性的建构，始终贯穿着“第一个结合”的逻辑：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国具体国情为“体”，通过“魂体结合”使政治使命既扎根于历史发展规律，又紧扣时代脉搏。

（二）实践认识论为政治使命提供方法论支撑

“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辩证循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要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等思想形成理论呼应。这种实践认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融合，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的动态推进提供了创新性支撑，是“第二个结合”在方法论层面的具体应用。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9]3}这一核心命题与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经世致用”强调学问必须服务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反对空谈玄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与这一文化基因深度融合，形成了“问题导向”的当代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10]161}，正是这种融合的集中表达。这种融合使“问题意识”超越了单纯的工具理性，既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矛盾的批判性审视，又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行动逻辑，为政治使命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双重方法论指引。在政治使命的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中，“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创新更为凸显。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而中华文明“中庸”思想中的辩证思维，则为这种认识与改造提供了柔性智慧。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执两用中”的治理智慧，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寻求到了动态平衡，既避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端，又防止政府过度干预。这正是“第二个结合”在经济领域的方法论创新，使党的政治使命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获得了更鲜活的实践形式。

从实践论对“知行关系”的哲学阐释，到新时代“问题导向”与“经世致用”的呼应，中国共产党在实践认识论的方法论创新中，始终贯穿着“第二个结合”的逻辑。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灵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使“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循环在保持理论彻底性的同时，兼具文化亲和力与实践有效性。

(三)共产主义理想为政治使命提供价值指引

共产主义理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其“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指向,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在各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目标之间,通过“两个结合”实现了价值内核的一致性与实践形态的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按需分配原则与“共同富裕”的价值契合。共产主义理想中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指向社会公平的终极形态,是对剥削制度的彻底超越与颠覆。中国共产党将这一终极价值转化为“共同富裕”的阶段性使命目标。从马克思主义本质看,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形态;从中国特色看,其路径设计融入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治理智慧。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发展实际的实践结合。共产主义理想所指向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包含物质丰富、精神富足、人与自然和谐等多重维度。中国将这些具体要求与国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极具使命感的现代化模式,突破了西方现代化“资本主导”的逻辑,回应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文明传统,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可以在非西方语境中找到具体实现形式。

“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呼应。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形成,即无产阶级解放之时也是全人类解放之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这一终极价值进行了当代诠释。这种跨越时代的理念传承使党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有的国际情怀,避免了“输出革命”的教条主义,通过文明对话的方式拓展了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实践场域。

总之,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的阶段性目标在价值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其必将成为政治使命调整和深化的根本指引,并在“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导下,构成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在价值维度的独特建构。

二、使命之纲领引领:阶段性纲领对使命的实践转化

党在各个时期所制定的目标纲领是政治使命从理论到实践转化的枢纽,其逻辑建构的核心路径体现为“两个结合”推动下纲领的动态演进。这一路径建构始于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

(一)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构筑起政治使命的时空蓝图

在“两个结合”视域下,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是党政治使命得以展开为多层次目标的现实抓手,最高纲领时刻指引方向,最低纲领则需要不断与时俱进,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在理论逻辑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为党政治使命的理论建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支撑。《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后者是前者的最终指向,前者是后者的阶段性展开。“两个结合”是这一逻辑的进一步深化,是政治使命现实展开的方法论基础。一方面,“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求立足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主要矛盾等特殊性,为最低纲领的制定提供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使“长远理想”与“阶段任务”在文化基因层面形成共鸣。

在历史实践中,“两个结合”推动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在动态平衡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本质上就是“两个结合”不断实现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辩证统一的实践史。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结合国情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低纲领,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也不同于直接实现共产主义的左倾冒进,而是立足实际为最高纲领的实现扫清障碍。历史清晰地证明,脱离“两个结合”,容易陷入“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只有通过“两个结合”,才能使最低纲领始终“不偏离最高纲领的方向”,最高纲领始终“不脱离最低纲领的支撑”。

“两个结合”既是统筹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钥匙,也是实现二者辩证统一的实践指南,使最高纲领的“理想性”与最低纲领的“现实性”形成动态平衡。只有持续深化“两个结合”,才能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最终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政治使命。

(二)纲领迭代深化了政治使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

中国共产党对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把握,本质上是运用“两个结合”将政治使命在纲领设计中制度化呈现。这一呈现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为“魂”,以中国国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体”。二者共同形成了“真理力量—实践需求—文化基因”的三维互动逻辑。这种辩证统一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具体的实践形态,始终贯穿并深化着政治使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理论与民族解放实践的结合,熔铸“救亡图存”的政治使命逻辑。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制定,是“两个结合”在纲领设计中首次

得到系统实践。民族解放的近代诉求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解放理论相融合，使“民族独立”成为连接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中介目标——既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终极理想，又承载着“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彰显了政治使命在纲领迭代中的深化。最低纲领紧扣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11][11]}的实际，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使命目标。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12][373]}的论断，将最低纲领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党的政治使命更为准确、明确。

新时代“两步走”战略作为现代化理论与文明基因的融合，为“全面复兴”这一最新政治使命铺就了现实道路。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到“双碳”目标的提出推动生态保护，从“一带一路”倡议践行和平发展理念，到“文化自信”的倡导激活传统文明活力，这些实践既是“两步走”战略的具体落地，也是“全面复兴”使命的生动注脚。它让“全面复兴”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转化为每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每一项民生政策、每一次科技突破、每一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亿万人民能清晰感知到复兴进程的脚步，也让这一使命拥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最坚实的实践支撑。

(三) 纲领实施机制保障了政治使命的制度化与政策化

纲领实施机制是连接“政治使命”与“现实落地”的关键纽带。通过构建稳定的组织架构、规范的运行程序、刚性的监督闭环，将抽象的政治使命转化为长期有效的制度规则，再拆解为可执行的政策举措，避免使命“虚化”和“碎片化”，确保其始终沿着既定方向推进。

纲领实施机制的首要作用，是通过清晰的组织架构与权责划分，将政治使命嵌入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使其从“理念倡导”转化为“组织共识”与“职责边界”。这种组织保障的核心，在于依托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执行体系。例如，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这一长期目标，国家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统筹协调，同时明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生态环境部等部门的权责分工。这种跨部门、分层级的组织机制使“双碳”目标这一政治使命找到了最直接的实现路径。如果说组织保障是“骨架”，那么程序规范机制则是“血肉”。它通过标准化的决策流程、精细化的任务拆解、法治化的规则约束，将宏观政治使命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政策，实现“使命政策化”的转化。其核心逻辑是避免使命在具体实现过程中出现“偏差”或“断层”。例如，为保障“全面依法治国”这一使命，国家制定、修订了一系列法律，将“依法治国”的使命转化为“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制度体系。此外，监督评估机制为政治使命“守方向”，增强制度化与政策化的实效。从监督维度看，可以防止制度空转与政策走样；从评估维度看，可以检验制度化与政策化的成效，并反向优化机制。

综上，纲领实施机制并非简单的“执行工具”，而是集“组织保障、程序规范、监督评估”于一体的“转换器”。它能够将政治使命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再把使命适时拆解为阶梯式的政策，最后依托监督评估并确保政策不悬空、结果不走样。

三、使命之文化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政治使命

文化浸润作为政治使命逻辑建构的重要补充环节，其核心是通过“两个结合”的持续推动，将政治使命从“政党目标”逐步内化为“民族共识”。这一建构过程始于中华文明基因对使命话语的深层塑造，如“民本思想”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大同理想”转化为“共同富裕”等，赋予政治使命以传统文化符号的表达形式。继而通过文化合法性的双向建构，巩固和扩大使命认同基础，体现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华文明的双向激活效用。最终，在中华文明主体觉醒中完成从“政党使命”到“民族共识”的质变，实现“政党主张—文化认同—民族共识”的动态升华。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对政治使命话语的深层塑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并非外在附着于政治使命话语的“文化装饰”，而是从价值内核与叙事形式两个方面为政治使命话语注入“文化根脉”。它让政治使命话语既承接历史文明的精神密码，又契合当代中国的治理需求，形成兼具“历史厚度”与“民心认同”的话语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基因从根源上决定了政治使命话语的“价值取向”。最典型的是民本基因对政治使命话语的塑造。中华民族自古便有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当代政治使命话语的核心立场。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使命宣告，再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战略定位，本质上都是民本基因的现代转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3]。这种使命转化构建起传统理想与现代实践之间的桥梁，为党的政治使命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务实进取”等基因,为政治使命话语搭建了“从历史到当下再到未来”的叙事逻辑,突出体现在对“分阶段实现使命”话语的塑造。中华文明历来有“积跬步以至千里”的务实思维,反对“急功近利”。这一基因塑造了政治使命话语中“分阶段、重实效”的叙事逻辑。从“三步走”战略到“两步走”战略,再到“十四五”规划与 2035 年远景目标的衔接,政治使命话语始终遵循着这一优秀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回答普遍关注的问题,注重解答学员思想上的疙瘩。”^[14]古代“治世”追求“长治久安”,当代则通过“阶段性目标”将“长期使命”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实践,让政治使命话语既有“远大愿景”,又有“现实路径”,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实践、轻空谈的文化特质。

(二)文化合法性建构对使命认同的奠基作用

文化合法性是政治使命获得社会认同的深层基础,“两个结合”对文化合法性的建构,本质是“真理力量”与“文化力量”对政治使命的双向赋能。“两个结合”通过双向互动的辩证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当代价值,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本土生命力,形成“真理激活传统”与“传统滋养真理”的闭环,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双重支撑。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创造性激活,使政治使命迸发出新式的生命力,体现在从传统价值到现代理论的升级。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政治使命的文明基因选择提供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批判工具,使其摆脱文明固态理解的局限。如“仁政”治理本质上是封建君主制下“重民以固君”的统治术,但党将“民”从被动接受治理的对象转化为主动创造历史的主体,使为“人民谋幸福”的政治使命彰显出崇高的价值追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滋养让政治使命有了“纳百川”的包容性,体现在从外来理论到文化自觉的认同建构。通过提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追求上的共通性,使共产主义理想获得民众可感知的本土文化表达,政治使命获得“真理性与文化性”的双重内涵。例如,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5]504} 的国际格局,可与中华文明“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家”情怀建立联系。这种表达使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理论摆脱了“西式”的叙事窠臼,获得了东方话语形态,增强了政治使命的文化辨识度。

(三)文明主体性觉醒对政治使命叙事的升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觉醒是“两个结合”推动

的文明主体重构,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破解西方现代性迷思,实现政治使命的叙事升华。这一升华过程既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归,也非对西方模式的机械模仿,而是“两个结合”在文明维度的必然产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文明发展规律的创造性把握。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政治使命突破西方范式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指出创造了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5]37}。这种批判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破题”逻辑。西方资本主义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形成了“资本主导—两极分化—文明冲突”的异化发展范式,“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6]70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则成为了政治使命的文化根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性,在于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激活与升华。“协和万邦”等文明密码,通过“第二个结合”被赋予新时代内涵,成为区别于西方政党效能的文化标识,实现了由传统智慧到当代实践,再到文明话语的贯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建构”的质变,深层动力正是“两个结合”的辩证互动。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现代性转化”的方法论,使其摆脱封建残余的桎梏,升华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则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本土化扎根”的文化土壤,使其从“外来理论”转化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文明话语。这种主体性建构让政治使命突破了“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叙事,打破了“民族—世界”的割裂思维。

结语

“两个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使命逻辑建构的根本方法论,以系统性思维塑造了“理论奠基—实践展开—文化认同”的有机整体。哲学维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论证、实践认识论的方法论指引、共产主义理想的价值牵引,回答了政治使命“为什么建构”的根本问题,确保了使命建构的科学性与方向性。纲领维度依托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实现目标分层,通过纲领迭代与制度化实施机制,解决了“如何建构”的实践路径问题,实现使命在不同历史阶段始终具备可操作性与连续性。文化维度则通过中华文明基因的话语塑造、文化合法性的认同建构、文明主体性的觉醒升华,回应了“为谁建构”的价值归宿问题,将政党目标熔铸为民族共识,为使命注入深厚的文化根基与精神凝聚力。这三个维度共同在“两个结合”的组

带中相互赋能。哲学根基为纲领实践提供理论指南；纲领实践为文化认同提供现实载体；文化认同则反过来沁润哲学理论，三者形成动态且平衡的互促系统。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展现了一种深植于文明传统、锚定于长远理想的独特模式。这种源于“两个结合”的使命建构，超越了西方国家“权力更替—政策调整”的简单循环，形成了融合历史合法性、实践有效性与文化主体性的稳定模式。这种独特的使命模式，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对“政党本质”的时代回应：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文明传统的传承者”和“长远理想的践行者”。这种模式不仅为中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更打破了“西方政党政治优越性”的迷思，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文明传统与历史国情的政党政治道路，提供了全新的参照。

参考文献：

- [1] 张荣臣,钱周伟.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创新发展 [J].新视野,2024(6).
- [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21-07-02(002).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0]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N].人民日报,2022-10-26(001).
- [14] 习近平: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工作原则 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党校工作 [EB/OL].(2015-12-12)[2024-06-15].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5/1212/c1024-27920523.html>.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l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XU Zhongxiang

(College of Marxism, Jiamusi University, Jiamusi Heilongjiang 154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a systematic exploration reveals that the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PC) political mission features a profound mechanis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mission follows a three-stage logic of “theoretical foundation,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 terms of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Marxism, through the “Two Combinations”, achiev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 “foreign theory” to a “theoretical core”. Specificall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of legitimacy, practical epistemology offers methodological support, and the communist ideal serves as the value guidance. In the dimension of programmatic guidance, relying on the “Two Combinations”, the Party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its programs from “abstract ideals” to “concrete practices”. It realizes the hierarchical division of goals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maximum program and the minimum program, and ensure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by means of program it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mechanisms. In the aspect of cultural immersion, through the “Two Combinations”, the Party facilitates the elevation of the political mission from a “party goal” to a “national consensus”. It shapes the mission discourse with the gen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structs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legitimacy, and achieves the awakening and expression of civilizational subjectivity.

Key words: “Two Combinations”; CPC political mission; logical construction

“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 ——《大众日报》的抗战宣传及其与读者的联动(1939—1945)

耿东旭

(河北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石家庄 052161)

摘要:1939年初,为加强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工作,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创办了《大众日报》。创刊后,报社秉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办报方针,持续优化报道内容,生动展现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实践与生产生活。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统筹部署下,报刊发行网络逐步健全完善,报纸发行范围逐渐拓展至部队、学校、乡村等基层单位,形成了贯通各阶层的传播体系。为增强宣传实效,《大众日报》创新传播方式,既鼓励个人阅读又组织读报组、识字班等集体学习活动。《大众日报》通过设立读者来信等专栏,引导群众理解党的抗战主张,激发军民参与革命实践的积极性,并与读者构建起双向互动的传播机制。这种良性互动不仅深化了群众对党的政策的认同,更使报纸成为凝聚抗日力量的重要纽带。

关键词:抗战时期;《大众日报》;内容;发行;读者

中图分类号:D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5-0014-07

党报是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的重要载体。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①抗战时期,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号召“全党办报”,山东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创办的《大众日报》,不仅成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还成为我国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该报自创刊后,就积极向党政军及各阶级民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众日报》创刊 80 周年曾作出重要批示:“80年来,大众日报不懈践行‘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办报宗旨,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广泛影响的党报。”^②目前学术界关于《大众日报》的研究多聚焦于内容变迁与历史作用^③,对党组织如何有效引导《大众日报》发挥桥梁作用,密切党群关系这一关键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已经出版的相关文献、报纸报道以及时人回忆等资料,从阅读史的视角管窥党报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希望对推进党报研究有所助益。

收稿日期:2025-05-09

作者简介:耿东旭(1994—),男,甘肃环县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抗战史。

①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②《习近平总书记今天就大众日报创刊 80 周年作出重要批示》,https://www.dzwww.com/2018/dzrbckbszn/dzrbbstt/201901/t20190102_18247078.htm。

③学术界对于《大众日报》的研究成果包括:姚广宽、周艳:《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大众日报改版历史研究》,《青年记者》2020年第4期;王智临、王建国:《抗战时期〈大众日报〉的统战宣传》,《青年记者》2020年第8期等。

一、从政治宣传到群众参与:《大众日报》的战时初转型

抗战时期,山东地区面临日伪“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摩擦的双重挤压,中共山东党组织迫切需要一份能够宣传党的主张、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山东人民参与抗日斗争的报纸^{[1][558]}。《大众日报》应运而生。

(一)初创时期政治宣传功能的初步实践

1939年1月,《大众日报》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其创刊宗旨:“加紧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军民真正打成一片”“改善政治机构,提高行政效率,保证政治机构的充分民主化”“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于这些原则,《大众日报》致力于“为大众服务”,并“尽量登载各方面有益于抗战的言论”,以确保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广泛传播到群众中去^[2]。在这一办报方针指导下,《大众日报》通过系统化、多层次的宣传报道,将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方针有效传递至基层群众。

1. 立足党的立场,通过系统解读国内外重大事件,

宣传党的抗战主张。特别是在1940年至1941年间，《大众日报》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进行了系统报道和解读，在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行径的同时，宣传了党坚持抗战到底的立场和主张；在重点宣传八路军“百团大战”等敌后作战成果的基础上，及时报道苏联卫国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国际反法西斯战况^{[3]26-27}。通过这些报道，《大众日报》向社会各界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有效增强了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号召力。

2. 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全国各地八路军、新四军紧密依靠群众、积极开展敌后作战的胜利消息，展现了军民团结抗战的生动图景。《大众日报》大量报道了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以及群众配合子弟兵袭扰敌军、站岗放哨、破坏交通、肃清汉奸等保家卫国的抗战行动。同时，《大众日报》深刻揭露了日寇残害我国同胞、掠夺国家资源的法西斯暴行，通过大量事实展现沦陷区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生活，有力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民族觉醒，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战必胜信念。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日报》还在敌人“扫荡”前及时预警，指导干部群众做好坚壁清野、防奸防谍等备战工作；在反“扫荡”期间持续报道我军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协同作战的胜利战况；在反“扫荡”结束后则总结经验教训，既表彰先进典型，又警示因麻痹大意造成的损失，为后续斗争提供有益借鉴^{[3]27-28}。这种全方位的宣传报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为动员全民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3. 既注重学习借鉴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先进经验，又紧密结合山东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通过大量生动事例，深刻阐述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根据地建设的具体宣传中，《大众日报》突出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来壮大人民武装力量。针对当时许多基层政权仍被国民党顽固派、封建势力把持的状况，《大众日报》大力宣传民主改革思想，主张建立由各抗日阶级、各党派和爱国人士共同参与的民主政权，推行合理的战时负担政策，适当改善工农生活，以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例如1940年前后，随着民主宪政运动的兴起，《大众日报》广泛报道了社会各界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各级临时参议会等政治改革的呼声^{[3]28}。这些宣传报道推动了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思想引领和舆论支持。

总之，《大众日报》自1939年创刊起就积极宣传党的抗战政策，既搭建了党政军民的沟通桥梁，又鼓舞了

军民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信念。

（二）群众办报方针的初步形成

作为抗战时期新创办的党报，《大众日报》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其办报实践也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曾任《大众日报》总编辑的朱民总结到，报纸编排形式“比较呆板，长篇大论的文章比较多，而真正扎实深入研究问题的报道比较少。在国际国内一些重大问题的宣传上，如关于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和对国民党的认识上，事先未经请示中央，就在报纸上擅自发表评论，犯有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政治错误”^{[3]32-33}。事实上，1942年以前的《大众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党报普遍存在党性原则不鲜明、群众性不足的双重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明确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4]126-127}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号召下，《大众日报》在此次改革中率先明确了自身的性质和读者定位：“全省性的报纸、分局的机关报”，是“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具体而言，社论和专论主要供县委阅读，分区委选读；一般文章和消息则面向分区委、党员和群众^{[5]17}。

《大众日报》将内容革新置于核心地位。报社领导要求报纸能够“接触实际、反映实际、指导实际，代表群众说话，反映群众生活，为群众谋利益、想办法，最终做到代表党指导各项工作”^{[5]18}。为实现这一目标，报社以记者和通讯员队伍为突破口，推动内容建设。一方面，报社大力锻造记者队伍。报社要求记者通过参与基点工作，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开展宣传报道。记者不仅借此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还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从而能够将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充分反映到报纸上。另一方面，报社大力发展通讯联络组织。1942年3月，报社成立通讯联络科，专门负责联系和管理各地通讯员，有计划地发展通讯员队伍，建立通讯报道网络。1943年1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下达指示，要求全省各地县委以上宣传部部长担任《大众日报》通讯员，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兵团、机关学校、文化团体负责同志为《大众日报》写稿，帮助健全通讯工作^{[6]383}。此外，报社还积极培养农民通讯员。例如，报社编辑黄秀珍在沂南县岸堤区农村发展了近200名农民通讯员，成立了以区为单位的农民通讯大队^{[7]343}。据秦风回忆，报社加强通讯工作后，逐步建立起庞大的通讯网络，通讯员数量超过1000人^{[8]307}。通过这些举措，《大众日报》构建起遍布山东抗日根据

地的通讯网络，确保了报道内容来自群众、服务群众，真正打通了党与群众之间的信息渠道。

《大众日报》还着力推进文风改革，突破“干部化”“机关化”的表达模式，提出“群众写”“写群众”口号。这使报纸语言更加贴近群众，连不识字的工农兵也能通过听读理解内容。例如，1945 年 7 月，《大众日报》连续在 1 日、5 日、7 日、9 日、11 日五期发表了邢洪兰等 20 多人的文章。这些文章篇幅较短，通常只有几百字，部分还存在错别字或漏字现象，其中八九篇甚至是由他人代笔，但生动呈现了群众生活。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文风转变，既打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报道模式，也切实贯彻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报方针。

《大众日报》的革新成效极为显著。1942 年 9 月 1 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对报纸内容改革进行了初步总结，指出报纸内容较之前更加充实，更加关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与广大群众的联系也更为紧密^[9]。具体而言，改造后的《大众日报》积极“传达党的指示，宣传党的政策，说出群众心里的话”，从而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尽管部分民众文化水平有限，无法完全读懂报纸内容，但通过区村干部读报，群众逐渐明白《大众日报》是谁的报纸、为谁说话、为谁服务，因此亲切地称其为“咱们的大报”^{[10][76]}。1943 年 1 月，《大众日报》创刊 4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给报社全体干部和职工的祝贺信中写道：“四年来，在你们的努力下，党报从一个内容粗糙、政治和编排技术都较为幼稚的报纸，成长为今天名副其实的党报，这是党的建设中的巨大收获。”^{[3][64]}可见，《大众日报》通过精准定位受众需求、优化内容结构，成功实现了自我调适，这为其有效扩大读者群体并提升自身传播效能奠定了基础。

二、送报到手：《大众日报》发行体系的艰难构建

在战时特殊环境下，《大众日报》面临着双重使命：既要确保报纸作为党的“喉舌”实现高效传播，又要发挥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而践行这一双重使命的关键在于突破敌人封锁，建立安全、高效的发行体系。通过艰苦探索，报社逐步构建起一套战时发行机制，为党的政策传播和群众动员提供了坚实的渠道保障。

(一)《大众日报》初创期发行网络的探索与困境

《大众日报》在创刊后，就开始构建发行体系。起初，报纸印好后，由交通员挑到发行部门，按各地需求打包捆扎，再分送至各地交通站和分销处，最终分发到各机关和读者手中^{[11][136]}。1940 年春，报社在沂南县岸

堤区柳河岔建立了交通总站，并以此为中心，开辟了“南干线”“北干线”和“东干线”三条主要发行干线。南干线从交通总站向南，经沂南的垛庄站、费县的固前村站、山阳站、徕庄铺站，越过滋临沂路和光山头站，到达临沂大炉交通三支站。从三支站开始，干线又分为两条：一条向西，经滕县徐庄站，穿过津浦铁路和微山湖，到达湖西单县，连接湖西区党委，进而通往冀南、太行区中共中央北方局，甚至可达陕北延安党中央；另一条向南，经郯城地区卞庄站，到涌泉四支站，再向南过陇海铁路到达苏北，连接苏皖特委，通往中共中央华东局。北干线从总站向北，经蒙阴桃墟站、坦埠站、旧寨站至沂北南麻站，再经新泰的土门站、太公峪站到达莱芜的常庄一支站。从一支站又分为两路：一路向西去泰安，过津浦铁路，连接泰西区党委，进而通往冀中区、太行区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甚至延安；另一路向北，过胶济铁路，连接清河区党委（渤海），再向东接胶东区党委^{[8][289-290]}。发行干线的设立令《大众日报》能够覆盖胶济铁路以南、津浦铁路以东的广大区域，定期与读者见面^{[1][560]}。

日伪军的频繁“扫荡”对《大众日报》的发行工作构成了严重威胁。当时报社驻地无论位于沂蒙山区还是滨海地区，都处于敌人的分割、封锁和包围之中。要把报纸从鲁中沂蒙山区送往滨海、鲁南、泰山等地区，或从滨海区送到鲁中、鲁南、泰山区，再转送其他地区，都需要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和大片敌占区^{[3][136]}。这种恶劣的交通条件不仅导致报纸投递时间大幅延长，还经常造成报纸丢失和积压。据李竹如反映：“临沭县的小学看到《大众日报》尚需一个月时间，而胶东、清河等地要看到报纸，时间就更难以估量了。这对整个革命工作造成了多大的损失！”^{[12][38]}他还提到，1941 年曾有交通员在某交通站看到大量积压的《大众日报》，竟被用作烧茶解渴^{[12][39]}。因此，如何快速且安全地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成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山东战邮体系提升了《大众日报》的发行效能

1941 年 7 月，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正式建立战时邮政机构^{[13][152]}，用以加强《大众日报》的发行工作。1942 年 1 月 1 日，报社交通站正式合并至邮局管理，报纸发行工作统归山东战邮负责^{[14][12]}。同年 9 月，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发布《关于发行与交通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邮局必须以最大努力保证报纸准确、迅速地送到读者手中，发挥其对抗战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并决定以《大众日报》发行工作的好坏作为检查邮局工作的主要标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也应全力协助邮局做好

发行工作^{[15][367]}。1943年3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决定将各级党委的交通科、各级报社的发行部和各级战时邮局合并，成立集邮政、交通、发行于一体的战时邮政机构^{[16][331]}。经过此次改革，至1944年8月，山东战邮已发展为12个专区局、83个县局、108个邮站、97

个信箱和631个代办所^{[17][86]}，开辟了17235华里的邮政线路，其中主要线路12条（详见表1），总长9257华里，穿越112条封锁线。到抗战结束时，山东战邮的专区局已发展到16个^{[17][88]}。

表1 1944年8月山东战邮交通干线统计表

干线名称	里数(华里)	理想用时(以天为准)	敌人封锁概况	备考(天) (原文如此，应是实际用时)
北局干线	1500	40天	15条公路，8条封锁沟，3条铁路，2条封锁墙，3条河流	70
冀鲁豫干线	1000	30天	9条公路，4条封锁沟，2条铁路，3条河流	40
湖西干线	670	14天	6条公路，4条封锁沟，2条铁路，3条河流	30
鲁南干线	320	4天	5条公路，2条河流	9
渤海干线	957	20天	4条公路，1条铁路，1条河流	45
泰运干线	930	10天	9条公路，1条河流	20
泰山干线	580	4天	8条公路	14
鲁中干线	220	1天2夜	2条公路	4
胶东干线	1000	20天	9条公路，1条铁路	60
华中干线	700	14天	1条公路，1条铁路	30
淮海干线	340	4~6天	1条铁路	9
苏中干线	1040	14天	3条公路，1条铁路	(原文阙如)
总计	9257		71条公路，16条封锁沟，13条铁路，12条河流，2条封锁墙	

注：资料来源于《两年来山东战邮工作概括总结及今后任务——赵志刚在山东战邮工作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4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43页。

山东战邮的成立和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大众日报》的发行效率，减少了报纸积压现象。1943年，时任社长陈沂指出，随着自身发行系统的建立，报纸的派发速度明显加快，在滨海地区，报纸出版所在地的读者隔日即可看到报纸，最远的村庄4天内也能看到；即使隔着一道封锁线，最早5天可以看到，而隔着两三道封锁线的地区，最多10天到半月也能收到报纸。由于山东战邮的高效运作，报纸积压现象大幅减少，即使在有封锁线的地区，最多也只积压三期^{[5][19]}。

山东战邮的拓展也显著扩大了《大众日报》的传播范围。1944年，山东战邮总局局长赵志刚在总结山东战邮工作时，对《大众日报》的发行范围进行了详细统计（详见表2），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大众日报》不仅在山东根据地广泛发行，还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送到远在三千多里之外的延安，使党中央和毛主席能够及时了解山东敌后军民的斗争情况，加强对山东工作的领导。在延安图书馆，《大众日报》一直是许多读者争相阅读的重要报纸之一。由于份数有限，一些报纸被翻阅破损，无法继续借阅。根据读者要求，中央图书馆除了原有的每期50份外，还要求《大众日报》增寄一些合订本。而在华北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大众日报》也拥有众多读者。

表2 1943年6月至1944年6月《大众日报》发行范围统计表

发行范围	发行数量(份)		
	1943年6月	1944年1月	1944年6月
滨海	3253	4831	5437
鲁中	5191	5823	5331
山东省各战略区	673	1350	1870
分布情况	胶东	45	65
	渤海	2	50
	机关	256	182
	华中局	200	160
华中地区	苏中	46	46
分布情况	淮海	476	1493
	盐阜	41	43
	冀鲁豫		15
其他地区	冀鲁边		10
分布情况	湖西	2	8
	冀南		10
	泰运		500

注：资料来源于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47页。

随着报社推销和发行机构的不断优化，《大众日报》的发行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详见表3）。发行量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群众能够接触到报纸并参与读报活动。这一变化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群众路

线提供了有力支持,显著扩大了党的影响力。

表 3 抗战时期《大众日报》发行量变化统计表

时间	发行数量(份)
1939 年 1 月 1 日	3000 多
1939 年 5—6 月	1000 多
1939 年 6 月 10 日—8 月 9 日	0
1939 年 8 月 10 日	1000 多
1940 年 1 月 1 日	4500
1940 年 9 月 20 日—1940 年 10 月 15 日	0
1940 年 12 月	8000
1941 年 11 月 14 日—1942 年 1 月 24 日	500 多
1942 年 10 月 1 日	8300
1943 年 6 月 1 日	10 106
1944 年 1 月 1 日	14 051
1944 年 6 月 1 日	14 961
1945 年 8 月 17 日	25 000

注:资料来源于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 12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47 页;林中、所梦九等:《大众日报大事记(1939—1985)》(上册),1988 年版,第 1、3 页;杨林染,孙伟杰:《革命战争年代的〈大众日报〉》,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 页;于岸青:《一张报纸的抗战——大众日报社史撷英》,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8、29、42 页。

三、集体阅读与编读互动:《大众日报》的信息动态循环机制

《大众日报》在办报实践中始终坚持“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这一方针,通过持续完善发行体系,逐步构建起“三位一体”的读者结构:人民群众通过报纸了解党的指示,学习时事政治,掌握革命道理;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从报纸学习上级指示和外地经验;而领导层则可以借此掌握各地工作情况、群众诉求和干部群众的创造与经验^{[3][53]}。

(一) 集体阅读是《大众日报》与读者互动的基础

抗战时期,物资匮乏且民众文化水平普遍受限是各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而读者与《大众日报》的互动又以掌握报纸内容为前提。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组织化的集体阅读机制,才能使党报发挥出更大的政治动员效能。创刊后不久,《大众日报》便发出呼吁:“为了提高读报兴趣,加强政治认识,发扬集体学习精神,请组织本报读者会。”^[18]成立读者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民众能够接触报纸,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读者的建议和批评,推动报纸工作的改进。1940 年 12 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明确要求“发动党员与政府及群众团体大量订阅《大众日报》,并由各级党的宣传部协助组织各地《大众日报》读者会,首先发动党员按期阅读,并讨论《大众日报》的社论、专论”^{[11][1]}。

在党的号召下,1939 年 3 月 27 日,小峪庄村成立了读者会,当地 27 名青年夜校的同志共同阅读讨论,并通过宣传壁报的方式,将消息传播到附近村庄^[19]。1943 年 1 月 3 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发表文章,号召全体党政军民经常阅读、研究和运用党报,并进一步组织读者会和读报小组,通过党报联系群众^[20]。到 1944 年,《大众日报》已在省级机关党政军各部门以及县、区、村基层单位广泛建立了读报小组^{[7][354]}。

除组建读报小组外,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还积极拓展多元化的集体阅报形式。广泛采用一人读报、多人听报的“口耳相传”模式宣传报纸内容。如范明枢参议长不仅坚持每日精读《大众日报》,更将读报发展为群体动员手段^{[21][85-86]}。在公共空间张贴方便群众进行阅读。这种信息传播模式被创造性运用于敌占区。据时人回忆,邮务人员常趁夜色潜入敌占区,在据点街巷、行军要道甚至高粱秸丛间张贴报纸,构建起无形的信息网络^{[11][11]}。

(二)《大众日报》与读者的良好互动

《大众日报》在实现信息下沉的同时,亦建立起自下而上的民意传导通道。这种双向互动机制使其在战争环境下仍保持动态调整能力。从系统建构维度观察,读者反馈被纳入制度化轨道。朱瑞在《大众日报》创刊 4 周年时特别强调“没有广大人民和广大读者的爱护,不断提供意见,则《大众日报》的进步将是不可能的”^[20]。当时,写信是读者最常用的表达方式。如 1939 年松寒等基层读者给报社写信:“我们四五个人在工余的时候,很想写点东西,尤其是关于现实的通讯,但是一提笔又不知道写些什么?请编者先生抽出一些时间,给我们个解答。”^[22]

对于搜集的群众意见,《大众日报》始终予以高度重视。早在发刊词中,其就明确表示“欢迎各方面善意的批评”^[2]。1939 年 2 月 3 日,报纸就在《批评与检讨》栏目中,刊登了许多群众意见,并承诺接受建议,展现出战时党报对群众反馈的积极回应态度^[23]。此后,《大众日报》设立了《信箱》专栏,推动编读互动进入制度化新阶段。该专栏创新采用“意见呈现+编辑回应”的双向互动模式,公开读者诉求并附注解释性文本。这一设计突破了传统单向传播模式,构建起战时特殊语境下的意见沟通机制:群众来信经筛选后进入党报话语体系,报社则通过回应实现政策解释与舆论引导,形成动态调整的传播实践。从发刊词的原则声明到《信箱》的机制化运作,完整呈现出《大众日报》在战时环境下将群众路线转化为媒介实践的系统性探索。

《大众日报》通过系统搜集和回应群众意见,在战

时环境中构建起一个兼具政治传播与社会动员功能的媒介平台。其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大众日报》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比如一名叫张平的读者在给报社的信中写道：“托匪是不是就是土匪？有人说托匪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派不是俄国革命时代的领袖之一吗？为什么共产党人又来打倒他？”报社对于其提问作出了回答：“托洛茨基派在俄国革命时代是出过力的人物，可是后来他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4] 报社通过解释这些词语，使广大读者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其二，对民众的战事认知进行引导，坚定民众的抗战信念。比如1939年2月，有读者提问：“平原游击战是否也有胜利的可能？”对此，《大众日报》回答道：虽然较为困难，但如果能广泛地组织民众，也是可以战胜敌人的^[25]。其三，搭建经验共享平台，分享各地抗日救亡经验。比如1940年7月25日，《大众日报》刊登了一位读者写的《怎样领导儿童团的工作》，向民众介绍了如何组建并领导儿童团^[26]。其四，建立社会监督网络，借助读者曝光汉奸资敌行为。比如1939年5月27日，《大众日报》登了莒县庄西村所观察到的汉奸资敌行为：“近日竟有一般无知之徒，甘为虎作伥，散布各地收买故旧铜铁运往青岛资敌，制造军火从中牟利……”^[27] 可见，《大众日报》构建的多重功能媒介平台使其成为战时动员的组织化工具。

实际上，《大众日报》与读者的互动，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让各方读者收获颇丰。首先，为党构建了“政策—实践”的反馈循环。比如鲁中行政公署主任马馥塘“经常根据《大众日报》布置工作，他最宝贵的东西，是从1940年直到现在（指1945年底——引者注）的完整无缺的大众日报”。每当下层工作产生缺陷时，他总是不胜感慨地说：“这事报上早有了，不看也不研究，又走了弯路！”^{[28][89]} 其次，促使一些开明绅士了解和支持党宣传的各项方针政策。如自1942年开始，山东革命根据地积极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大众日报》持续对此进行报道，1944年夏天，吕若骥在地主高某某的家中看到一叠《大众日报》，其中一篇《向地主士绅进一言》的社论不仅被画上了许多浓圈密点，还旁批了八个端端正正的字：字字良箴，句句珠玉。吕若骥在问到高某某自动减租减息的原因时，其回答称：“咱天天看报，还能不识大体吗？”^{[28][88-89]} 这就说明一些较为开明的地主在阅报后，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号召，支持党的政策。最后，《大众日报》的持续出版在基层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方面，在日军频繁“扫荡”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报纸仍坚持正常发行，这一事实本身就成为抗战韧性的象征。群众对此的反应是

“八路军在，共产党在，一定会胜利，决不能上敌人地当”^{[12][9]}。另一方面，民众通过阅读《大众日报》更深入地理解抗日民主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如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时，很多读者积极响应，并撰文揭露一些恶霸地主的不良行为。在这些信件中，读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一些恶霸地主的恶行，还对党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表示支持与赞扬。

结语

作为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在抗战时期的办报实践堪称党报联系群众的典范。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该报既准确传达了党的政策主张，又生动报道了军民抗战事迹，同时深刻揭露了日伪军的暴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众日报》通过建立高效的发行网络，突破敌人的封锁，及时安全地送达群众手中。而《大众日报》实施的读者反馈机制，构建起党和群众的双向互动传播模式。《大众日报》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报方针，既是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舆论支撑，更是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成功实践。《大众日报》在抗战时期的办报历程，不仅记录了党报动员群众、服务抗战的光辉历史，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在新闻宣传领域的强大生命力。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大众日报》以其鲜明的党性原则、坚定的人民立场和灵活的宣传策略，成功构筑起连接党和群众的精神纽带，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参考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 [2] 发刊词 [N]. 大众日报. 1939-01-01(01).
- [3] 朱民. 大众日报五十年(1939—1989)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21—1949)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0.
- [5] 大众日报社报史编纂委员会. 大众日报回忆录: 第三集 上册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6] 常连霆. 山东党的革命历史文献选编: 第5卷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 [7]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山东省志·报业志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8] 大众日报社报史编纂委员会. 大众日报回忆录: 第三集 下册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9] 纪念九一记者节，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 [N]. 大众日报,

- 1942-09-01(01).
- [10] 大众日报总编室. 大众日报四十年 [Z]. 内部印行, 1979.
- [11] 大众日报社史编纂委员会. 大众日报回忆录: 第一集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 [12] 于岸青. 一张报纸的抗战: 大众日报社史撷英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8.
- [13] 邮电部邮电史编辑室. 难忘的战斗岁月: 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 [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1982.
- [14] 林中, 所梦九. 《大众日报》大事记(1939—1985): 上 [M]. 济南: 山东大众日报社, 1988.
- [15] 常连霆. 山东党史资料文库: 第 9 卷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 [16] 山东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山东战邮回忆资料专辑: 第 1 集 [Z]. 内部印行, 1988.
- [17]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山东省志·邮电志: 上册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18] 请组织读者会 [N]. 大众日报, 1939-02-17(04).
- [19] 读者会来信 [N]. 大众日报, 1939-03-28(04).
- [20] 朱瑞《大众日报》四年来的奋斗 [N]. 大众日报, 1943-1-3(01).
- [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 第 10 辑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 [22] 我们所需要的通讯 [N]. 大众日报, 1940-01-26(04).
- [23] 批评与检讨 [N]. 大众日报, 1939-02-03(04).
- [24] 信箱 [N]. 大众日报, 1939-02-11(04).
- [25] 信箱 [N]. 大众日报, 1939-02-19(04).
- [26] 枫. 怎样领导儿童团的工作 [N]. 大众日报, 1940-07-25(04).
- [27] 读者信箱 [N]. 大众日报, 1939-05-27(04).
- [28] 祝宏. 抗日烽火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3.

The Party's Stance, the People's the Newspaper

—— The Counter-Japanese Aggression Propaganda of *Dazhong Daily* and the Interaction with Its Readers (1939–1945)

GENG Dongxu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GE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2161, China)

Abstract: In early 1939, in order to strengthen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efforts for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National Salvation, the Shandong Sub-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unded *Dazhong Daily*. After its launch, the newspaper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staying close to reality and the people”, continuously refined its coverage, and vividly portrayed the struggles,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daily life of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in the base areas. Under the coordinated planning of the Shandong Sub-bureau, the distribution network was gradually expanded and improved, extending the newspaper’s reach to grassroots units such as military troops, schools, and villages, thereby establishing a communication system that connected all social strata.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propaganda, *Dazhong Daily* innovated in dissemination methods by encouraging individual readership while also organizing collective learning activities such as reading groups and literacy classes. Through dedicated columns like “Letters from Readers”, the newspaper guided the public in understanding the Party’s resistance policies, inspired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revolutionary practices among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s, and established a two-way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with its readership. This virtuous cycle of interaction not only deepened the people’s recognition of the Party’s policies but also made the newspaper a vital bond in uniting anti-Japanese forces.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azhong Daily*; content; issuance; readers

天人·伦理·权变:董仲舒礼治思想的三重维度

张晓丹

(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董仲舒礼治思想在天人感应宇宙论框架中重构儒家礼治传统。他以“天人合一”为神圣根基,通过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秩序伦理化,赋予礼治超越性权威;以“三纲”“五常”构建政治伦理秩序,通过德主刑辅模式实现制度转化;以“经权之辨”保留变通空间,在维护礼治原则前提下,以“仁”为原则建立情境化道德抉择机制。三者辩证统一,既承续先秦儒家道德理想,又吸收阴阳家、法家思想要素,形成“神圣性奠基—现实性转化—权变性调适”的动态结构,为汉代政治转型提供兼具形上依据与实践智慧的治理方案。这种理论建构不仅标志着儒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经世致用的范式转型,更塑造了中国传统“伦理政治”的基本形态,其天人和谐理念与经权互补智慧对当代社会治理仍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董仲舒;礼治;天人;伦理;权变

中图分类号: B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5-0021-05

董仲舒礼治思想可以从宗教性、现实性与权变性三个维度展开系统性阐述:宗教维度以“天人合一”为依据,为礼治提供神圣合法性;现实维度以“三纲”架构与“五常”规范为核心,构建政治伦理秩序;权变维度以“经权之辨”为关键,赋予礼治实践以历史情境的适应性。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董仲舒回应汉代政治转型与社会治理需求的理论方案。

一、“循天之道”:宗教性

宗教作为一种有序的、神圣的意义系统与行为规范的集合,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特定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古代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郊社、宗庙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维系古代社会秩序和宗法家族体制的根本力量。”^[1]梁漱溟也认为“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2]^[98],“宗教必以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为其事”^[2]^[100],“宗教必以对于人的知识方面之超外背反立其根据”^[2]^[100],他强调了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安定作用。而中国古代政治,以“天”“命”“帝”“自然”为典型概念和终极依据,最终形成天人合一、天地合德的理想秩序。在此意义上,政治的合法性被赋予了超越

世俗的神圣性,被归纳到天人合一的框架内。自“绝地天通”事件以来,宗教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更加得到重视,上古政治逐渐过渡到在以天、帝为政治终极信仰的神权政治世界中,去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如周朝提出的“天命靡常”^[3]^[128],“皇天无亲,惟德是辅”^[4]^[813],“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510]等。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和墨家提出的“天志”,尽管对天人关系的原则和内容理解有所不同,但是其中所体现的理性精神却是相通的。这意味着,规范的自然性并非来自外部的“他者”,而是源于天的本性。

“儒教的大师董仲舒便是富于宗教心的方士。”^[5]的确如此,在董仲舒礼治思想中,天居于最高位置,天人感应说构成其宇宙论和本体论的核心观念。这种自然感应被称为“神意”,或者“天意”。首先,地从属于天。“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6]^[307-308]。其次,人从属于天。“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6]^[60],“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6]^[310]。再次,政治也从属于天。“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6]^[320]徐复观对此说道:“董氏所说的天,似乎回到古代宗教的人格神上面去了……他在更多的地方,以很大的比重,从天

收稿日期:2025-03-25

基金项目:重庆师范大学校级基金项目“董仲舒礼治思想研究”(23XWB048);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的人学审视研究”(2024NDQN013)。

作者简介:张晓丹(1990—),女,河北邢台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与秦汉儒学研究。

到人，只当作是一个大的‘有机体的构造’，是可以互相影响的。”^[7]在他看来，董子经常强调天的作用，是受宗教神的影响，而且认为天与人是相互对应的关系，天人一体。

关于天人感应，董仲舒认为人间规则的形成与维护取决于“天”的统辖。人君顺应天意就会得到天的保佑，反之，天会降灾异以示警告。若君不用德于民，就会有国破人亡的危险。“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案灾异以见天意。”^{[6]253-254}可见，天人感应论能够影响政治生活，使君主得以及时纠偏补过。祥瑞和灾异的存在和发生，是以人君是否施行德政为判断标准的。这一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在中央专制集权体制下渐趋合理，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

关于天是如何映照到政治领域的道德属性的，董仲舒展开了比较细致的论述。他认为天赋予阴阳之气以道德属性，把人类的社会现象与阴阳、五行、四时等自然现象统一起来。“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6]318-319}阳属于德，阴属于刑罚。刑罚与德教相反却又能顺于德教，这就是所谓的权变。天任德不任刑，意指君主在政治中以道德为准则，刑律禁令只是使人有所畏惧，起到辅助作用。因此，在天的领域，阳尊阴卑，对应到政治领域，就是德主刑辅。此外，五行也是有道德属性的，五行之间的比对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阴阳再分出五行，五行相克而相成。“比相生而间相胜。”^{[6]355}“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6]306}每个季节都有各自的作用，缺一不可。“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6]314}“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6]308}五行的气化过程即四时之气的变动过程，四时的运行方式为春夏秋冬。土兼有四季，金木水火不借着土，四方不能建立。由此可知，五行的主体是土气，所以人的行为，没有比信更可贵的，即土德。“故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6]323}这将五行附上了道德属性，阴阳五行的生克规律与人的自然生命过程和人际交往的秩序相一致，体现了董仲舒礼治思想的神秘性。综上，董仲舒提供的儒学宗教性显著，但本身不是宗教，而是神学^[8]。

董仲舒礼治思想的宗教性特质，根植于其天人同构的哲学体系。作为具有意志品格的神圣本体，“天”在董仲舒思想中呈现出“百神之大君”的至上神属性，这种将宇宙秩序伦理化的思维范式，使礼治实践获得超越性的终极依据。在其理论建构中，礼治不仅包含现世的人伦规范，更统摄着郊祀天地、社祭山川、庙享先祖的神圣维度，通过“事天如事父”的祭祀制度沟通

着天人两界。这种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双向互动机制，既表现为祥瑞现则彰天眷，灾异出则示天谴的宇宙反馈机制，又通过取仁于天而仁于人的伦理转化，将形而上的天道意志具象化为现实政治准则。

二、“应人作之”：现实性

董仲舒礼治思想的实践性品格集中体现于两个维度的应用：一是将天道哲学落实为制度性建构；二是将伦理规范转化为治理技术，构建起差序治理模式。既通过“《春秋》决狱”实现法律儒家化，又以“三纲”“五常”重构社会基本伦理，最终形成“德主刑辅”的治理范式，体现出其浓厚的现实性倾向。

(一) 强调社会教化

董仲舒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集中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层面，同时也表现出对民众的关怀。西汉政权要为自身合理性进行论证，不仅要着眼于礼义准则，“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6]18}，还应当从实践的层面予以阐释，通过事功彰显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革创新，以适应当时现实社会的需要。他提出“天意常在于利民”^{[6]433}，“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6]98}。通过保障民众基本的物质生活，消除社会祸患，给予民众安全感。同时，他还强调“社会秩序在逻辑上是先于个体道德的，个体道德的本源就是内化于个体本性之中的社会秩序，个体道德的实现所依靠的就是圣人以社会秩序为依据对个体所进行的教化”^[9]。董子强调社会教化的重要作用，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礼治”思想，这对于建构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范畴有着典型意义。

(二) 提出“五常之道”

“中国封建伦理的真实形态是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儒学的独尊、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伦理精神的封建化和抽象性的统一。”^[10]董仲舒从现实出发，提供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礼义准则。他提出“五常之道”，“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3]309}。“五常”这一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在董仲舒礼治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落实。

1. 关于“仁”，董仲舒曰：“何谓仁？仁者憎恒爱人，谨翕不争，好德敦伦。”^{[6]252}仁是自觉地爱护他人并遵守伦理道德，能主动调和心情，平和和美，从而达成正道。他还对“仁”与“义”进行了界定：“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6]244-245}仁就是能在道德的意义上爱他人，而义的作用在于“正我”，是针对

自我来说的，“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6]248}。君子用仁与义的原则来调节他人与自我的关系，依据道理端正自身，宽容他人。董仲舒还解释了“仁”与“智”的关联：“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6]252}两者紧密相连，仁爱之人凭智慧才能区分是非，智者有仁爱才能行善除恶。因此，董仲舒强调人要兼具德性和智慧，“必仁且智”。

2.“礼”作为社会规范的内容，不仅仅是道德规范体系的概称，还是普遍性的道德情感的载体。礼作为规范体系的核心内容，正是通过制定人的社会行为规范，确立起人们在社会生活的规范意识与认同意识，以此建立礼的体系，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的作用。董仲舒提出，“《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此《春秋》之所善也”^{[6]46}。又曰：“据义行法。”^{[6]361}这表明，他主张在施行礼乐教化的同时，也要以“义”为准则来执行礼的规定。在礼与情、欲的关系上，荀子的性恶论运用于政治领域，则为礼治主义：“人生而有欲……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11]董仲舒继承了荀子的这一观点，认为：“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礼。”^{[6]464}礼的作用之一就是节制情欲，即使情欲表达出来，也要符合礼义规范，不可随意放纵。礼是对人的情欲的合理性认识和有理性节制，最终使道德情感的表达分寸适中。“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6]464}这并非要强行改变人的本性，而是通过对人的本性进行改造和安抚来实现适中。

3.关于“智”，董仲舒说道：“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6]253}智是先说出来而后被验证是正确的。有智慧的人能预知事情的走向，并预测结果。其行为和言语均符合伦理规范，且其思考谋划还能受到行为的重复检验，因此将智作为人们认知和判断善恶的重要准则。

4.关于“信”，董仲舒强调它是五常之中非常重要的伦理规范，将信德比作五行之土，以大地之德喻指信。“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6]308}“为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见其短长，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犹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宜可得而财也。”^{[6]162}董仲舒认为臣子应该效法大地，如同大地能够完全呈现它的性情一样，自己也要尽心展示自身的优劣点。坚守诚信，是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之一。

董仲舒以阴阳学说的“阳主阴辅”原理重构五伦，将君臣、父子、夫妇三组双向关系改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单向纲常体系，并通过天道阴

阳论证其神圣性。至于五常，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阐释为仁义礼智信，构成调适三纲秩序的普遍道德原则。这一组概念在东汉《白虎通义》中完成体系化融合，三纲确立等级差序，五常提供道德弹性，共同塑造为帝制时期“伦理一政治”同构的治理范式。

三、“有经有权”：权变性

《礼记·礼器》曰：“礼，时为大”，意味着礼是随着时代境遇的变化而改变的。在董仲舒礼治思想中，“权”与“经”是相对的概念。“《春秋》有经礼，有变礼。”^{[6]72}在古代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以经义作为纲常的根据，而“经”是不变的。比如，在传统礼节中，婚礼时不能直呼父兄师友之名，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可以变通的；天子居丧三年才可以继位，但是个别情况下，居丧未满三年也可继位；通常情况下，妇女不允许出国境，但是在婴儿媳或奔父母之丧时可例外。这些破例的准则被称为权变的礼节。经变之说主要是指纲常的变通，而权变的礼节是天道的变化在人身上的体现，只要符合天道，变礼也是可行的。

“董仲舒将经、权置于天道运作系统中进行了严密的逻辑论证与关系建构，把阴阳、四时、五行协同推动的宇宙图式与执经、行权的道德要求糅合在一起，对公羊家经权观念进行天道化处理，突破孔孟单纯说教的叙事方式，形成了独特的经权诠释路径。”^[12]在董仲舒礼治思想中，天道的运行有常道，也有权变。“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是故天之道有伦、有经、有权。”^{[6]331-332}天道的运行，周而复始。阴阳之气的运行，会出现相应的调配，表现为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阴气的运行常处于虚位，而不居于实位，到了冬季停留在空虚之位，这样太阴之气才能真正地发生作用。万物生成变化，既遵循常道，也遵循权变。天道如此，有常有变，具体到政治领域也是如此。下面用四个典型事例来阐述权变观念。

(一) 权以载仁

楚庄王围攻宋国都城，久攻不下，派公子司马子反去窥探敌情。宋国大夫华元坦承，城中已断粮，民众易子而食，破开尸骨当柴烧火做饭。子反也承认楚军只剩七天的粮草，如果吃完这些粮草还攻不下宋城，便准备撤军回国。最后，双方和谈，楚国撤军。司马子反违反了国君的命令，但是《春秋》却对其做出明确的赞赏。

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闻也。”^{[6]50-51}

董仲舒认为，子反有恻隐之心，只有心怀仁德的人才会怜悯邻国，同情百姓，因此《春秋》对其仁德褒奖有加。然而，“臣有恶，擅名美”^{[6]51}，即臣子不能抢夺君主的美名，可见这个问题并不能简单地从“名分”角度判断。董子接着说：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6]51-53}

《春秋》的原则既恒定又变通。礼节具有一种道德约束力，以“仁”为本，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规范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假如宋国饿到人吃人，就完全失去了仁德，礼节也就无从谈起。虽然董仲舒强调“君为臣纲”，但是人心具有普遍的道德属性，这在具体行仁过程中得以体现，比恪守常规下的君臣之道更重要。因此，需要将“常礼”与“仁”进行区分后再做出恰当的选择，显然，“仁”更具有优先性。周桂钿认为董子的评价是合理的，因为他“把仁爱的原则看得高于君和政。只要确实符合仁爱原则，专政、轻君，都无不可。不但不应贬抑，而且还要赞扬”^[13]。“仁”是人道中的最高原则，高于君臣之道。因此，在合理的情况下，礼可以进行权变，这从侧面削弱了君臣之间的绝对关系。“因此《春秋繁露》支持的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君臣关系。”^[14]

(二) 道德优先

鲁成公二年(前 589)春季，齐师伐鲁，夏四月又攻打卫国，相继取得胜利。随后晋、鲁两国联合曹、魏攻打齐国，齐国战败。危急关头，齐顷公车右逢丑父“与公易位”助其脱险；而郑国执政祭仲通过“立庶子”的政治妥协，牺牲程序正义换取国家存续。他们两人都是以违反正道的方式来保护他们的君主，但祭仲受到赞扬，而逢丑父却遭到指责。

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6]57}

原因在于：主动放弃君位而让位于兄弟是值得称赞的，被俘后而逃生则被视为耻辱。对义行的赞扬源于对道德准则的恪守，而是否可以称为权变，则需根据动机和结果进行综合判定，看变通之后是否仍符合礼义最高原则——仁，而不只是以事件表面的成功与否来判断。逢丑父虽然通过欺骗解救了齐顷公，但却羞辱了齐国的宗庙，这不能算作权变。也就是说，上天赋予人以道德属性，臣子应当注意不辱没宗庙、社稷，而不只是保全君主的肉体生命，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崇高境界。同时，人的行为的道德属性高于行为本身，即人的精神生命高于肉体生命。

(三) 守经行权

讨论君主继承的原则和例外的情况。宋襄公有意让位于其庶兄公子目夷，但目夷没有接受。晋献公嘱托大夫荀息辅助骊姬之子奚齐，献公去世后，大臣们欲废奚齐，荀息拒绝参与。卫灵公欲立其少子曼姑，曼姑多次拒绝，并提议立蒯聩之子辄嗣位。

难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为之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待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载乎义？”^{[6]79}

公子目夷不即位和祭仲不得已同意立宋人之子，都是为了国家社稷。荀息为奚齐而死和曼姑反对立辄之父继位，都是尊崇先君的命令。虽然行为相反，但遵循的原则却是相同的，因此这些行为都是值得赞扬的。《春秋公羊传·春王正月》曰：“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嫡长子继位是君位继承的基本原则，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了保证君权的延续，其他身份的人也可以继位，在“可以然之域”即可，这代表着同姓贵族在符合权变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继承王位的。因此，荀息和石曼姑的行为被认为是有道义的。若大夫有僭越的行为，违背君臣之义，《春秋》会记载；但若君主立不当立之人则不记，这表明《春秋》认可君主有立世子的权力，反映了其维护人君政治权力的倾向和态度。

(四) 礼义为极

在《春秋繁露·玉英》中还提及了纪侯的事例，齐国复仇，纪侯率领全国民众，上下一心为国而死，因此《春秋》称之为“大去”。

难者曰：“有国家者，人欲立之，固尽不听。国灭，君死之，正也，何贤乎纪侯？……以为之讳，见其贤之也；以其贤之也，见其中仁义也。”^{[6]81-82}

董仲舒之所以赞扬纪侯，是因为他符合《春秋》赴义而死的礼义原则，而且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以上关于经权的多个例子表明，董仲舒的礼治思想充满着辩证思维。虽然他在某种程度上强调“君为臣纲”，但是权变色彩也时刻贯穿他的思想，君臣关系并非绝对的上对下，而是由“道”决定的。不仅仅在政治领域，在家庭领域，董子的权变色彩也比较浓厚，处理父子、夫妇、兄弟关系时也没有走向绝对的对立。综上所述，董仲舒并不将肉体生存视为最高目标，而是以礼义为核心价值，追求生命在道德意义上的提升和完善。

结语

董仲舒的礼治思想以天人同构为哲学根基，构建了“神圣性奠基—现实性转化—权变性调适”的治理体

系。他通过天道与人伦的互证,将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转化为伦理政治秩序,既为汉代“大一统”政权提供了“天命”的合法性论证,又以“三纲”“五常”的差序结构重塑社会规范,并通过经权之辨在礼治框架中融入变通机制。这种思想范式打破了先秦儒学道德“应然”与政治“实然”的割裂,使儒学从理想主义的伦理学说转型为兼具形上依据与制度设计的伦理哲学。

董仲舒的理论建构中暗含着三重张力:天道神圣制约与君主专制现实逻辑的冲突,“三纲”等级固化对“五常”道德普遍性的消解,权变机制与礼法边界模糊性的矛盾。这些张力揭示了其思想在维护等级秩序时的历史局限。然而,正是这些张力推动着后世儒学对天人关系、理气之辨的深化,并为宋明理学“天理”“人欲”之辨提供了问题意识的源头。在当代社会治理语境下,董仲舒思想中“天人和谐”的生态智慧、“经权互补”的实践智慧,以及“德法合治”的制度设计,仍为构建现代文明秩序提供了传统治理经验的参照。

参考文献:

- [1] 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 [M].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59.
-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3]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三策 [M].陈蒲清,校注.长沙:岳麓书社,1997.
- [4] 王先谦,撰.尚书孔传参正 [M].何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813.
- [5] 胡适.中国思想史 [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422.
- [6]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 [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 [7]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45.
- [8] 谢遐龄.董仲舒给儒家的定位:宗教还是神学 [J].衡水学院学报,2019(3).
- [9] 张俊峰.董仲舒社会理想的内涵与特点:兼论董仲舒与《礼记·礼运》社会理想的异同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3).
- [10]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94—295.
- [11] 张觉.荀子译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64.
- [12] 唐艳.董仲舒:“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公羊家经权哲学如何完成天道化改造 [J].哲学分析,2022(5).
- [13] 周桂钿.董学探微 [M].2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77.
- [14] 周灏,卫立冬.《春秋繁露》中的“权变”观念及其元伦理学分析 [J].衡水学院学报,2021(3).

Heaven, Ethics, and Contingency: The Tripartite Dimensions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n Ritual Governance

ZHANG Xiaodan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 governing by rites reconstructs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of governing by rit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smolog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aven and man. He takes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s the sacred foundation, ethicalizes the natural order through the theory of Yinyang and Wuxing (阴阳五行), and endows the governance of rites with transcendent authority. 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order is constructed with “Sangang” (三纲) and “Wuchang” (五常), and the system transforma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model of virtue as the main and punishment as the auxiliary. Reserving room for flexibility based on the “distinguish of Jing and Quan” (经权之辨), and establishing a contextualized moral choice mechanism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n” (仁) under the premise of maintaining the principle of ritual governance. The three are dialectically unified. They not only inherit the moral ideals of the Pre-Qin Confucianism but also absorb the ideological elements of the Yinyang School and the Legalist School, forming a dynamic structure of “the foundation of sacredn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ality, the adjustment of power and nature”, providing a governance plan that combines both formal basis and practical wisdom for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T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not only m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from moral idealism to a paradigm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but also shapes the basic 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al politics”. Its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and the wisdom of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Jing and Quan (经权互补智慧) still have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rule by rites; heaven and man; ethics; contingency

董仲舒天人观念与汉儒“大我”意识的构建

刘子钰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董仲舒的天人思想体系, 不独为汉帝国的统治提供政治哲学基础, 也对汉儒的精神世界完成了开拓与更新。“大我”是社会心理学领域对传统中国集体性自我意识的集中概括, 董仲舒天人观念则是构建汉代知识分子“大我”意识的关键环节。在物质自我方面, “人副天数”“通身国”等观念将人的生理基础类比于宏观的宇宙图式, 使人的物质存在成为“天人同构”的神圣本体; 在社会自我方面, 董仲舒力图将个体儒者融入并服务于一个超越性的“天—君—民”宇宙—社会秩序中, 将自我同时与天道、君权紧密绑定; 心理自我方面, 董仲舒以“人我”释“仁义”, 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仁义观, 确立了“人我”关系与天人关系纵横交汇而成的立体化“大我”系统。

关键词:董仲舒; 天人观念; 汉代儒家; 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 B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5-0026-07

“大我”是社会心理学领域对传统中国集体性自我意识的集中概括^[1], 是生成于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以社会秩序、道德伦理、历史责任等群体性价值为个体认识、评价、调整、规训自我的主观意识呈现。限于实证分析的学科限制,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往往疏于文献考证, 难以深入具体的历史语境探究“大我”意识形成的文化渊源与演变过程, 但可为文史哲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理论视角。

传统中国的“大我”意识根植于远古先民的文明实践, 酝酿于先秦诸子的哲学探索, 但真正定型则要等到秦汉, 特别是西汉武帝朝这一特殊的社会改制期。董仲舒立足《春秋》公羊学提出的天人神学体系是此时观念革新的关键, “由其公羊春秋学对《春秋》的解释, 发生了一大转折……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全面的转折, 在思想史的意义特为重大”^{[2][268]}。董仲舒作为汉代思想体系与思维模式的塑造者, 儒家学说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的开启者, 其创造的全面而系统的天人政治哲学, 对汉儒乃至后世知识分子“大我”意识的构建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 学界对于董仲舒天人观念与“大我”意识之间的密切联系与作用机制, 仍缺少系统的关注。本文将立足董氏著述, 兼及相关史料, 分别从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心理自我三个维度切入, 探究董氏学说参与汉儒“大我”意识构建的内在逻辑。

一、物质自我: “天人同构”的神圣本体

物质自我, 或曰生理自我, 是指个体对自己躯体、形体、健康状况等生理物质属性的认识^{[3][93-94]}。人类对自我的感知, 首先在于对身体躯壳的基本把握, 由物质自我引起的思考, 即人的身体观, 是形成更高层次自我意识的基础。在先秦时期, 诸子学说大都有身体观的阐释, 而董仲舒的天人身体观, 主要是将重德轻身的儒家伦理身体观与积精贵气的黄老养生身体观相综合, 并引入阴阳五行理论, 构建起一套新的统合天人、包含宇宙的神圣本体论, 形成“天人同构”的“大我”身体观。

儒家自孔子始, 就将身体视作道德的载体与外化, 并不注重其客观物质性, 身体的存在与活动需要服从于内在的道德力量。《论语》所曰“吾日三省吾身”^{[4][4]}, 《大学》所曰“仁者以财发身, 不仁者以身发财”^[5], 皆基于此。孟子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身体是内在的“仁义礼智”由内向外充盈、显发的载体与表征: “君子所性, 仁义礼智根于心, 其生色也晔然, 见于面, 盍于背, 施于四体, 四体不言而喻。”^{[6][362]}认为人的“心”(即道德本体)是肢体存在与活动的根源, 身体并非独立的生理存在, 而是内在“仁义礼智”的外在延伸。因此, 儒家认为现实中身体的价值需要置于具体的伦理关系中才能实现, 如《孝经》首篇即托名孔子曰: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7]维护自我身体的完整

收稿日期: 2025-06-02

作者简介: 刘子钰(2000—), 男, 山东青岛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方面的研究。

与健康,这一人类与生俱来的普遍天性,也要置于道德伦理之目的论中,才能取得合理性。“罕言利与命与仁”的先秦儒家由于偏重于人文教化与伦理实践,其身体观只停留在经验层面,依赖于个人的道德自觉,并未从根源上解决身体道德属性的立论之基,缺少形而上的理论构建。沿着儒家道德伦理身体观的路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进一步将人类身体的道德根源上推到“天”的高度,构建起“天人同构”“身体法天”的道德宇宙身体观,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失。《深察名号》曰:“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桩,与天道一也。”^{[8]261}《阴阳义》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8]302}董氏以天道之阴阳对应人身之善恶;以天道之取舍变化,对应人身之欲念流动。不仅强调身体的道德属性,更将“天”的道德意志赋予人类身体,完成天人之间的感应与互动,目的是赋予人类身体“与天同构”的神圣属性,进而为人身所肩负的道德责任寻找天道论的依据。

早期道家相较儒家,虽然更为关注身体的客体性,但目的却是忘却“有身”,达到“无身”的境界,如老子就提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9]29}庄子进一步阐发这一思想,主张“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10]259}。及至战国后期,黄老之学在扬弃老庄“无身”观的基础上,提出“达生”观。这种观念以涵养主体“精”“神”“气”为根本,强调“养生”,成为董仲舒构筑天人身体观的重要理论来源。《管子·内业》提出“精气”为生命根本,“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藏于胸中,谓之圣人”^{[11]1029-1036}。《心术》篇又曰:“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11]859}黄老道家已经开始探索身体与外物相交通的作用机制,意欲通过精气流动将身体与自然万物、人伦事理统合起来,已然出现物质上“大我”的雏形。汉初《淮南子》系统总结了这一体身体观,其曰:“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12]38},“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稟于地也”^{[12]251},将身体看作精气宇宙的一部分。而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更强调一种“人贵”论:“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8]314}将人的物质躯壳视为天道运行的产物,并且将人置于万物的核心,占据最为尊贵的地位。董氏通过“精气”的运作贯通天人,勾连内外,远远超出了黄老学的养生范畴,使形而下的物质自我具有了形而上的哲学高度,而带有明显的神学色彩。归根到底,董仲舒并非为养生延寿,而是吸收黄老“精气”学说,为其强调政治致用的身体观寻求哲学外衣。在《通国身》中,

董仲舒便将人的身体系统与国家政治结构进行深度类比,最终总结为:“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8]160}将人的身体与“天”贯通,最终指向国家政治秩序的构建,落实于汉儒立身庙堂的政治身份,以及上下相和、尊卑有序的社会理想。

如上所述,董仲舒的天人身体观分别对儒道两家思想有所继承与突破,但整体来看,董氏学说并非儒家伦理身体观与道家养生身体观的简单相加,而是融合成一种新的、以阴阳精气为脉络、以本体神圣化为旨归的“大我”身体观,进而为天人理论的系统开拓与自我意识的深层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董仲舒通过重构天人关系回应、超越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局限。先秦儒家以身体为道德实践的起点,实则将物质自我视为道德载体而鲜予关注;黄老视身体为精气运行的容器,实则通过超越性的自然本体论否定物质自我的存在价值。董仲舒天人身体观将两者调和,既保留儒家的伦理功能,又吸收黄老的自然哲学基础,最终在“天”的统摄下将人类身体建构为与宇宙、人伦、政治相统一的神圣系统。身体内部的精气流动与脏腑运作,可以同时映射到自然规律与政治秩序中,成功将“仁义礼智”的儒家核心价值与个体修身,乃至国家秩序、宇宙平衡密切联动。“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8]281}随着人类本体神圣性的确立,汉儒的物质自我也在自然世界与人伦秩序的普遍联系中,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获得了“其他万物所不具备的优越性”^[13]。从自我认知角度来说,董仲舒身体观将原本对身体的弱化和消融转化为对物质自我的肯定与扩充,不仅抬高了人身体的地位,也为人类的道德政治实践提供了不容置疑的天道神圣性,遂在生理层面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所独有之“大我”意识。

董仲舒构建天人身体观的主要目的,并未停留在本体神圣性的构建,其最终旨归在于阐释“天人感应”的合理性。《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对《淮南子·精神训》的身体观有明显的借鉴与化用,若将两者深入对比,或可窥得董氏之微旨:

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稟于地也……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力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12]251}

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天地之符,阴

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是故陈其有形以著其无形者，拘其可数以著其不可数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类相应，犹其形也以数相中也。^{[8]314-317}

《淮南子》将人体分为精神与形体两部分，认为精神生于天，形体生于地，将身体看作与宇宙交融一体的自然结构，天与人既无差别，更无对立，最终引发出“精神入其门，而骨骼反其根，我尚何存”的思考^{[12]249}。这种静漠养神的身体观是对老庄之“无身”与黄老之“养生”的兼容。从表面看，《人副天数》继承了这一观点，只是借用阴阳五行理论扩充了身体与宇宙之间联系的通路与范围。但细究其结论，“天数”已不再指向自然范畴，而是归结为人受“天命”的结果，最终引出天人之间“以类相应”的哲学思考。“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8]316}董仲舒对《淮南子》的化用只是参考其交合天人的哲学路径，却反面重构了身体与天关系的性质，天不再是自然存在，而被升华为具有道德品格的宇宙－社会体系；人的肢体也不再是融汇精气、同于自然的载体，而是与德行之天共享道德属性的伦理符号。紧随其后的《同类相动》篇承接此论，并完成了逻辑闭环：“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8]319}董氏认为“人副天数”不是为了融入天，而是要建立天人之间以“同类相感”为理论纽带的密切联系，从而建立以灾异、祥瑞等象征性征兆为上天意志符号的神学体系，肯定上天对人间政治能动的判断与回应。因此，董仲舒构建的身体观赋予人与天并立沟通的权力，此种权力源于人类“与天同构”的本体神圣性，在哲学层面大大提高了人类身体的地位。

“汉儒在专制政体下对身体政治性维度之发现，并由此构成儒家思想中一种相当重要的传统，即关于身体的政治想象。”^[14]政治致用固然是董仲舒天人身体观的最终结果，但在构建“天人同构”体系的过程中，董氏为儒家知识分子在迈入大一统王朝以后，如何妥善处理修身与治国关系的理论难题提供了方案，也完成了对人类物质自我的价值升华。这是对人类生理存在的认知飞跃，使汉儒对自我的物质存在产生了宗教般的珍视与敬畏，不再以狭小的个体眼光审视自我，而建立起贯通天人的神圣“大我”意识。在超越个体局限的物质“大我”的形成之后，与之相应的社会自我与心理自我的构建，便可借此为底层逻辑。

二、社会自我：宇宙－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自我意识需要置于一定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因此“社会自我”是人类完整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所谓社会自我，在宏观上反映了个体隶属某一时代、国家、民族、阶级的意识，微观上反映个体在群体中地位与名望，可谓自我意识的核心^{[3]94}。中国古代所形成的“大我”意识，主要体现为社会性自我的发达与强势。但是，这种过度强化的社会自我却受到许多学者的抨击，持论者往往聚焦于秦汉时期，甚至直指董仲舒的神学理论。张春明认为，汉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先秦的一大特点在于丧失了个体独立，“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君主的臣仆”，形成了错误、畸形的自我概念^[15]。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一是强调个体的独立自由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思想标准，不能照搬西方价值观念来否定中国人之“大我”意识的特殊性与合理性。二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虽然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专制文化的思想底色，但对于这种思想底色，我们需要重返历史语境，探寻其发展天人观念的主观动机，再以历史的眼光予以评判。若因传统专制社会之黑暗腐朽，而否定一切古代知识分子维护家国秩序的精神价值与历史贡献，无疑是片面的。

“君为阳，臣为阴”^{[8]310}，汉代儒家士大夫在君臣阴阳之道中处于“阴”位，是天子的佐辅、君权的附庸，同时也是代理皇帝统御万民的媒介，处于维系君民社会关系的重要位置。董仲舒认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8]28}原本纯属世俗社会的政治等级秩序，被延展至“天－君－民”三位一体的更为广阔的宇宙－社会大系统，停留在宗教领域的“天”也因之参与到政治伦理的构建中，而占据至尊地位。对于汉儒来说，董仲舒的天人社会观反映了他们开始思考新的社会伦理问题。一是天道信仰是士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内容，“天”的存在赋予士人“志于道”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是其社会自我的超越性价值来源。但对天道的解释，春秋以降百家各持己见，早期儒家对“天”的有意回避造成了天道本体论的真空与相关话语权的衰落，引发儒家思想的生存危机；二是秦汉时期，君主集权的空前强化加剧了君臣关系的紧张，在社会剧变中寻求儒士自尊与君主专制的共存之道，成为新的社会伦理问题。因此，汉儒对自我社会属性的关注重点在于如何同时处理与“天”及“君”之关系，这也是理解董仲舒构建社会层面“大我”意识的关键。

首先，自西周以来，“天”被视为世界的至高主宰，同时也是超越性的道德化身，兼具物质、自然、主宰、义理等多种属性^[16]。天道也成为传统士人立论的根基。

早期儒家所言之“天”，基本与“道”同义，是为道德的最高载体。《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6][350]}强调天道的内求性，认为君子可以通过“尽心知性”来体悟“天”，达到至善至美的人格境界。这种主张弱化了“天”的宗教属性，有助于引导士人更多地关注人伦秩序与内在修为。战国后期的荀子将“天”视作外在的自然范畴，否定其能动的道德意志，但仍然将“知天”看作人形成理想人格的标准：“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17][265]}主张明确天道与人伦的界限，天并不能左右人世祸福，但人却可以“制天命而用之”^{[17][274]}，使天道服务于人的理性，这种观点历来被视为进步的天人观。而董仲舒一反先秦儒家之常态，将“道德之天”“自然之天”转向“人格神之天”，强调“天”对人的外在受命：“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8][29]}，“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8][353]}。董仲舒对“人格神之天”的构建，重塑了汉代政治思想的哲学根基，重新强调了原始宗教中“天”作为至上神的意志与现实干预功能，使其成为人间秩序的判断者与制裁者。

自先秦以来，士人以体悟天道作为其立身手段，从这种道德哲学理念而论，天道意志的强化能够逼促儒士群体深度思考自我的身份与使命。当天道被上推到不容置疑的神学高度，乃至威压一切社会秩序的组织与运作时，儒者对自我社会属性的认识，也开始由道德实践者转型为天道的观察、阐释者：“天无所言，而意以物。物不与群物同时而生死者，必深察之……君子察物之异，以求天意，大可见矣。”^{[8][404-405]}天人互动的方式由主体道德心性的体悟，转移为观察祥瑞、灾异等征兆性符号，儒士群体凭借“体察”天意的知识与能力，成为天人交流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促成了汉儒维护天人秩序的自觉意识。随着天命意志通过干预人间而进入社会伦理体系，汉儒对自我社会身份的认识也得到了扩大与提升。

其次，“天-君-民”宇宙-社会秩序将君主神化为与“天”交感联系的唯一代表，《为人者天》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8][282]}古今批评者大多认为董仲舒助长了专制权力的膨胀，为以后的皇权社会滋生思想禁锢问题埋下了伏笔。但若从自我意识角度看，董仲舒的君权神话论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的主观臆想，亦是儒家知识群体重塑社会身份的必然选择。秦汉以前特别是战国纷争之际，“王道衰微”“游者主事”的社会风气，使得士人的社会化不必过于忧虑自我与君权的冲突。相反，社会阶级的开放流动为士人提供了广泛

的与统治者合作并实现自我的机会。凡雄才大略者，皆爱招揽士人，“贵为天子而不骄倨，富有天下而不骋夸”^[18]，给予士人充分的尊重与信任。士人也往往以“师”自居，待价而沽，交于诸侯，因此更注重掌握切实有效的学识与技能，进而在实践中实现自我理想。直至封国林立的汉初，仍具六国遗风，在“禁网疏阔，未知匡改”的社会格局中^{[19][3698]}，士人作为“道”的传承与弘扬者，凭借对“道”的阐释与改造，仍可游离于皇权之外而占得一席之地。但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日趋强化的皇权一步步将游士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

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天人哲学大系统”明显受到《吕氏春秋》世界观的影响^{[2][270]}，但相较后者轻君重士的思想倾向，董学对待君权的态度竟急转直下，不复先秦士人之自信持重，原因正在于时代性质的根本转变。经过景帝对诸侯国的武力平叛与武帝初年的制度铺垫，至武帝推行“推恩令”时，大一统体制基本定型。六国遗风荡然无存，游士群体也失去了在地方政权之间回环周旋的余地。社会剧变也意味着新秩序的勃然待发，百家学士皆面临艰难的时代抉择，即如何在与君主集权的共生中，谋得立身入仕之途。对儒士来说，自秦“焚书坑儒”至汉武改制，孔孟之学已有近百年之沉寂，当此之时，董学不得不将“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作为与君权共生的哲学妥协，将儒家思想从“迂阔难行”的道德说教，转化为大一统帝国的哲学支柱。《天地之行》曰：“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体孔窍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8][409-410]}君臣“心”“体”互依，各安其道，是为新的理想政治图景。董仲舒凭借“天人三策”获得武帝赞赏，并在对策中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9][2523]}，这一主张旨在争取皇权对儒学的接纳与尊崇，可视为儒士与皇帝之间默契的政治交易。

“天-君-民”三位一体的宇宙-社会秩序，平衡了天道与君权、道统与政统的价值冲突，兼顾了儒士作为道德承载者与政治参与者的双重身份，顺利推进儒家知识分子进入大一统国家体制后的身份体制化与自我社会化。在董仲舒天人观念中，儒士实为维护“天-君-臣”宇宙-社会秩序的重要维护者，具有深刻的社会“大我”意识，绝非被动麻木的人偶。在宇宙论层面，儒士以“天人感应”为信仰支撑，通过建构“灾异”“祥瑞”等话语体系，对皇权进行思想规训与行为制约。“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今灾害生，见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8][356]}当天人社会系统的构建理论被皇帝采纳以后，儒士成为上天意志的实际检测者与传达者，占据了阐述天道的优势地位。在现实政治层面，汉儒延续了士的社会话语权，他们借

助“天”的神圣性，通过步入仕途、主导教育、制定礼法等方式，将儒家伦理道德深刻植入汉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构建符合“天道”理想的人间秩序。

综上，沿着董仲舒构建的社会化新路径，汉代儒士得以超越世俗的官僚，显著区别于秦时文吏。他们以天道代言人、道德评价者的社会身份，使用“天道”和“民意”的话事工具，努力维系“天-君-民”宇宙-社会秩序的相对平衡，最终形成了同时与天道、君权紧密绑定的社会“大我”意识。因此，论者简单地将汉儒的自我意识定性为“心甘情愿的臣仆”，显然忽略了其身份与思想的现实性、多面性以及历史语境下的深层逻辑，未能揭示汉儒“大我”的真实面貌。

三、心理自我：天人视角的“仁义”观与人我关系的重新思考

心理自我是自我概念的第三个组成部分，特指个体对自身心理状态、特质、动机、价值观和情感体验等内在范畴的认知与评价。在心理学评价体系中，心理自我有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消极之分，直接影响着个体社会参与的程度^{[3]93-94}。相比于物质自我和社会自我，心理自我的形成来源于人的自我审视与反思，是对自我的生理状态、社会角色、他者评价等广泛外在联系的内化结果。因此，探究董仲舒天人观念对汉儒心理自我之影响，面临着一种实施性困难：心理自我是高度个性化的心灵范畴，不同个体必然存在独一无二的内在体验与自我评价，如何将个体化的心理构建过程与某种思想体系的介入相联系，是难以避免的逻辑阻碍。此外，即使同受董学影响的汉儒群体，其心理自我的呈现面貌依然复杂多元。皓首穷经之学儒，参政议事之官儒，教化地方之儒吏，乃至潜身山野之儒家隐士，其对自我心理状态的认知差异迥然。

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董仲舒天人观念中对汉儒产生普遍性心理影响的理论范畴，从中寻找塑造汉儒心理人格的关键线索。这需要立足早期儒家培养、规范君子主体性人格的核心道德要求，即对孔子提出的“仁”与孟子强调的“义”进行分析。孔子曰：“人而无仁，如礼何？人而无仁，如乐何？”^{[4]30}“仁”是先秦儒士安身立命的基本命题，也是礼乐等外在制度的价值内核，因此“仁”的功能在于通过士人心理层面严格的“克己复礼”，以实现道德教化与社会整合，是所有儒士必修的内心功课。孟子在承继孔子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义”纳入儒家人格体系，视其为“仁”的外显，以指导具体实践。因此，“仁义”为儒家知识分子心理自我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道德框架与价值导向。如

前两节所述，董仲舒天人观将个体生命置于“与天同构”的宏大叙事中，士人的自我认知不可避免地承载了神圣化的使命与压力。这种抽象的天人关联如何真正内化为汉儒日常的心理表现，进而塑造心理层面之“大我”，关键枢纽正在于董仲舒对儒家“仁义”观的更新与发展。

基于“天人同构”“人副天数”的哲学观念，董仲舒认为人的形体、情感、言行皆与天道呼应，个体生命是“天”的微观投射，这种认知使“顺应天道”内化为人的心理自觉，形成一种普遍性的心理预设。“仁义”作为儒士主体性修为的重要依据与理想标准，也因此获得了道德层面的神化。《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曰：“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地，取仁于天而仁也。”^{[8]291}“仁”原本是聚焦于个体修养与人伦实践的道德概念，被董仲舒升华为相通天意的神学意识形态，进而与天道“任德不任刑”的思想取向相配合。《身之养重于义》又曰：“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8]232}既然“心”为形体之主宰，而“义”是“心之养”的核心，那么追求“义”便成为维护心理自我完整性的必要前提，这是对孟子义利观的进一步哲学深化，肯定了精神修养对人类身体的内源性维护作用，确立了以义养心、以心统身的安身之道。总之，董仲舒所谓“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8]55}，在天命的洞悉烛照之下，使汉代儒士普遍形成了以“天人相通”的道德境界为主要目标的理想人格标准，其中“仁义”观念如同一条主线，贯穿于董仲舒以天人观念对汉儒自我意识塑造的整个过程中。

董仲舒的“仁义”观建立在思考人我关系的基础之上。《春秋繁露·仁义法》曰：“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8]219-220}以“人我”训“仁义”，即以个体自我与社会他者的内外双向性道德互动来解释“仁义”之内涵，属于董仲舒的理论独创。首先，所谓“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在心理层面为汉儒划定了自我与他者的心理界限，但这种界限的建立并不是将他人排除在自我的道德使命之外，恰恰相反，它要求个体突破狭隘的自我关注，将自我的道德实现建立在对他者的责任之上，大大扩充了自我的心理边界。相比先秦儒家“克己复礼”的传统解读，董仲舒之“爱人”意识不再强调以血缘亲疏为第一原则，而是泛爱众生^[20]，更具社会性与包容性。同理，“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从另一层面

论证了自我与他者的道德关系,更强调一种近乎苛刻的道德内求性。董仲舒以《春秋公羊传》中的楚灵王、齐桓公“伐有罪”的记载为例,认为他们以“义”为旗号惩治有罪之人,却不能称之为“义”,原因在于他们虽能“正人”,却不能“正我”^{[8][223]},即以不正之心行正人之举,亦不符合“义”对君子内心道德纯粹性的要求。总之,在董仲舒看来,“仁义”是“爱人”与“正我”内外双向性的统一,“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8][224]}。天命赋予人“仁”与“义”双向的道德品格,用以规范人我关系。“人”与“我”被视为同一道德系统的内外两面,从天道层面消解了人我冲突的底层逻辑,最终实现个体与群体在道德维度上的共生,与现代意义上强调个体与他者主客对立的“小我”意识迥然有别。

综上,董仲舒的“仁义”观作出了新的人我关系解读,使汉儒的心理自我在天人关系的驱使下,形成了以天道为基源、以人伦为脉络的双重价值维度。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家往往认为,传统中国人的“大我”基于对人我关系的递进式思考,即以“个己”为圆心,亲疏关系为半径组成大小不一的同心圆。“‘大我’中自身界限可能随修身阶段的不同,而逐渐由包括家庭成员而扩大到包括朋友,然后可能是同行同事,直至整个国家,乃至全人类。”^[21]这种自我意识模型显然受到《大学》中“修齐治平”渐进式人格修养路径的影响。其实,此类看法忽视了中国古代“天”的概念在“大我”意识构建中的关键作用。特别自董仲舒以后,“天”被塑造成宇宙秩序的终极根源,个体自我开始与“天命”“天道”紧密相联,“自我”不仅是世俗人际网络中的一个圆点,更作为“天”在人间的副本,被置于“天人”贯通的纵向维度中,构成人我关系与天人关系纵横交织的立体化“大我”系统。个体不仅要在家族、社群、国家秩序中定位自我,更要以“天”为终极参照,在体认天道中获得超越性的自我认同,这使得传统“大我”概念兼具人伦性与宇宙性的双重内涵。

当然,随着“仁以爱人,义以正我”观念不断传播与强化,汉儒之“大我”心理定型以后,一定程度上也挤压了个体自由与内在情感的生存空间。天命道德的约束回避了对个体情感欲望的关注,消解了汉儒个性意识的存在价值。“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8][225]}个体对自我情感的压抑,容易导致心理自我的单向度化,潜伏着个性意识被消解后自我的缺位与矛盾。但整体来看,汉儒的心理自我在仁义规范与现实经验的冲突下,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规训,而是通过对“天道”与“人伦”的综合体认,达成一种灵活的平衡。例如,与董仲舒关系密切的司马迁,他发愤著《史记》,

将个人命运融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目标之中,可视为董仲舒天人观念影响下,汉儒“大我”意识的高度外显。司马迁非但没因“天人之际”的威压丧失自我,反而因“天”立志,表现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强烈功业意识^{[19][2733]},尽显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个性的张扬,堪称对董学心理规训的灵活反拨。总体来看,汉儒普遍超越个人荣辱,致力于承载仁义、统摄人伦、维护天道的高度自觉化的心理构建,体现出“大我”心理独树一帜的精神价值。

结论

董仲舒天人观念对汉儒自我意识的全面构建应当辩证视之。一方面,人在宏观层面被纳入“天”的笼罩之下,从言行举止到思想意志都受到近乎刚性的道德约束,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知识分子的自主意识;另一方面,人的伦理地位也在与“天”交感的过程中得到提升,甚至成为天人宇宙系统的核心。汉儒既以“受命于天”神圣属性审视自我,便可自觉参与到天道与君权的交感互动之中,且坦然承担起解释天道的话语权。这是董仲舒为解决儒家原生性的理想人格要求与无限扩张的专治皇权之激烈矛盾,揣摩堆砌而成的理论大厦,符合其时代需求与历史使命。深受董学影响的汉代知识分子,逐渐在物质、社会、心理多层面追求“天人合一”的自我重构中,实现了自我与群体,乃至与家国秩序、宇宙自然全方位的系统性意识贯通,是为形成中国传统社会“大我”意识的重要环节。当然,随着后世社会伦理结构的转化与变异,董仲舒构建的“大我”意识必然面临着持续性的实践矛盾与存在危机,如何在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历史潮流中保留自觉的群体责任,如何平衡“大我”的超越性与个体的自主性,都是思想史研究中需要持续回应的理论课题。

参考文献:

- [1] 汪凤炎.古代中国人心里的“我”及其启示[J].心理科学,2004(2):374-375.
- [2]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 [3] 全国13所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社会心理学[M].5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
- [4]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5]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603.
- [6]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7]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
- [8] 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 [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
- [9] 王弼,注.楼宇烈,校译.老子道德经注校释 [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0] 郭庆藩,撰.庄子集释 [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1] 黎翔凤,撰.管子校注 [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2] 刘安,著.陈广忠,译注.淮南子译注:上册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13] 曾力.莫贵于人:董仲舒天人之学中的人贵思想 [J].衡水学院学报,2023,25(6):46-55.
- [14] 聂春华.从“论心”到“显己”:由《春秋繁露》看汉儒对身体政治性之发现 [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3-37.
- [15] 张春明.中国古代文人自我概念剖析 [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75-78.
- [1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 [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35.
- [17] 方勇,李波,译注.荀子 [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8] 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 [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369.
- [19] 班固.汉书 [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0] 高一品.“天心”即“爱人”:论董仲舒的仁说 [J].衡水学院学报,2022,24(3):27-34,54.
- [21] 杨国枢,陆洛.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 [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68.

Dong Zhongshu's Concept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and the "Greater Self" Awareness among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Han Dynasty

LIU Ziy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100, China)

Abstract: Dong Zhongshu's idea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 not only provided a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the rule of the Han Empire but also expanded and updated the spiritual world of Confucian scholar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concept of the "Greater Self" represents a concentrated summ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ll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Dong Zhongshu's theories were pivotal in constructing the "Greater Self" consciousness among Han dynasty intellectuals. In terms of material self, notions such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heaven through numerical relations" and "using the body as a metaphor for the state" draw parallels between human physi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the macrocosmic universe, elevating human material existence to a sacred entity akin to heaven. Regarding social self, Dong Zhongshu sought to integrate the individual into and serve a transcendental cosmic-social order, tightly linking selfhood with both heaven and imperial authority. In the realm of psychological self, Dong Zhongshu expounded on the essence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through the interplay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developing pre-Qin Confucian notions of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establishing a three-dimensional "Greater Self" that encompasses both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heaven.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concept of heaven and humanity; Han Confucianism; self-awareness

涉外法治文化的基本概念、双重价值及其发展路径

管彦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涉外警务学院,北京 100038)

摘要:涉外法治文化是在涉外法治实践中形成的制度规范、价值理念、行为模式及物质表征的统一体,是法治文化与涉外法治深度融合的产物,具有知识整合与范式创新的意义。它既是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的内在动力,提供价值认同、理论创新与话语传播支撑;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传播中华法治文明、塑造法治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和贡献全球治理智慧的功能。可从三条发展路径建构涉外法治文化:完善涉外法治文化顶层设计,强化系统布局与战略协同;深化文明交流与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包容的法治文化生态;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夯实涉外法治文化发展根基。涉外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战略性工程,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注入新活力,为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法治与文化支撑。

关键词:涉外法治文化;双重价值;发展路径;国际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5-0033-05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临更复杂的国际规则博弈和国内治理挑战。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抉择。涉外法治建设不仅关乎制度建设,更是一项文化培育工程。培育一种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与现代国际法治精神相融通的涉外法治文化,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在系统界定涉外法治文化的内涵与结构的基础上,阐释其价值及现实意义,并探索其系统性的发展路径,旨在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我国国际法治话语权提供理论支撑与制度文化参照。

目前学术界对涉外法治文化的探讨仍处于初步阶段,呈现两种分散取向。其一,在涉外法治研究中零星触及文化维度,如指出涉外法治包含“传播这一重要文化手段与实践途径”^[1];其二,在法治文化研究中逐渐引入涉外视角,如提出应“有选择地吸收国外法治文化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精髓,并运用中国智慧将其转化”^[2]。这些前期研究虽具启发性,却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框架,甚至存在认为涉外法治“仅属操作层面,无须专论文化”的片面观点。事实上,涉外法治文化是一个亟须被深入开拓与理论化的重要领域。它并非涉外法治与法治文化的机械叠加,而是一种新的知识整合与范式创新,既有助于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软

实力提升,也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一、涉外法治文化的基本概念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标识,涵盖经济、政治乃至一切人类活动领域^[3]。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可以将涉外法治文化初步界定为:在长期涉外法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涵盖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生产能力与成果的总和,是特定群体在跨国法律实践中创造并共享的制度规范、价值理念、行为模式及物质表征(如国际条约文本、涉外司法设施等)的统一体。

涉外法治文化的知识体系源于涉外法治与法治文化两大母体,并始终对二者发挥着积极的更新与重构功能。认知、学习、实践与发展涉外法治的整个过程,本质上正是涉外法治文化产生的过程。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涉外法治文化不仅能够催生新的社会知识形态,更会逐步构建出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唯有涉外法治实践积淀出相应的文化,内化为群体自觉的意识和态度,才能获得持久生命力,最终实现其根本目标。我们应以联系发展的辩证态度对待涉外法治文化,以科学方法对其展开系统研究。

“法治文化”这一术语“其出现不过三十多年”^[4]。涉外法治文化更是一个新生事物。从历史维度看,涉

收稿日期:2025-05-26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双一流”课程建设项目“涉外法治概论”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管彦杰(1980—),男,山东青岛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涉外法治、法治文化、国际法方面的研究。

外法治文化的萌芽与涉外法治的发轫基本同步,尽管其作为一个完整概念长期未被明确揭示。鲍曼曾深刻指出:“法律秩序是由国家进行管理的,其进行管理时必然需要利用法律来确保超地方整合的现代性努力,这种努力与超地方的、民族性的文化防卫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选择性的。”^[5]这一论述揭示了法治发展进程中制度建设与文化防卫之间的张力。反观当前中国,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实践,对涉外法治的关注多集中于应对急迫挑战的具体规则与对策,而对其文化维度的“软实力”建设尚未予以系统重视。事有轻重缓急固然不错,但在涉外法治已取得长足进展的今天,若仍忽视其文化层面的长远建设,实为憾事。

从各国法治演进历程看,影响一国法治水平的因素多元复杂,但文化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然而,传统的法治文化主要孕育并适用于一国内部。当法治实践舞台扩展到全球,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同法律体系间的冲突、迥异的商业惯例与司法传统,以及更深层的价值观摩擦。这些挑战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冲突,迫切要求我们发展一种更具全球视野、包容精神和对话能力的专门文化——涉外法治文化。它是在国际舞台上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内在软实力。

二、涉外法治文化的双重价值

(一)涉外法治文化是推进社会主义涉外法治实践的动力

作为“动力”,涉外法治文化超越工具性范畴,为社会主义涉外法治建设注入多维度、系统性的内在驱动力,是其持续发展与效能提升的文化引擎。

1. 提供价值认同与信念塑造的精神动力。现代文明国家的法治建设不仅需要制度保障,更依赖于全社会对法治的真诚信仰和普遍认同。涉外法治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与系统化的法治教育,为涉外法治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文化氛围。它通过叙事、符号、教育等形式,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秉持公平正义、契约精神等涉外法治核心价值,内化为公民和组织的自觉意识,从而为涉外法治提供深厚的社会根基与持久的精神支撑。

2. 提供双向交流与知识创新的理论动力。涉外法治文化具有向内吸收与对外传播的双重功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定义为“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6],涉外法治文化正是这样一种不断演进的知识系统和文化形态。它既扎根中国法治实

践,吸收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如“以和为贵”“天下观”等智慧),又面向世界,以开放姿态借鉴国际法治文明成果(如规则透明度、程序正义等普遍性原则),通过批判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形成一种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创新性法治思维与表达体系,为应对日益复杂的跨国法律问题提供持续的知识供给与理论创新源泉。

3. 提供话语构建与形象提升的传播动力。涉外法治文化对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有重要作用。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法治存在形态和文化表现形式,涉外法治文化通过系统化的学术交流、法律外交、媒体传播、文化艺术作品等多种形式与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价值理念与实践智慧,主动设置议题,回应国际关切,有效纠正国际社会对中国法治的片段化、滞后性甚至偏见性认知,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规则变革提供坚实的正当性支撑与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从“被动回应”走向“主动引领”,真正实现“走向世界”。

(二)涉外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外法治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承载着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多重时代使命与战略功能。

1. 承载着中华法治文明的当代阐释与国际传播功能。文化是国家治理的深层密码。“从中国传统和西方社会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国家治理的共同规律,那就是:文化主治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规律。”^[7]梁漱溟先生亦精辟指出:“文化本从传递交通而有,于此而求‘自有’‘外来’之划分,殆不可能。”^{[3][36]}涉外法治文化既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如“礼法合一”“无讼”等思想资源),又积极吸收人类其他法治文明成果,是中华法治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形态、新表达。它通过系统化的学术输出、规则倡导、案例阐释和文艺呈现,承载着向世界清晰、准确、深刻地说明中国法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法治道路的理解与认同的战略职责,是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法治话语垄断的关键一环。

2. 承担着塑造国家法治形象的任务。文化强国的实现离不开可信、可敬、可爱的国家形象,而法治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外法治文化通过持续、系统、真诚的国际传播与交流,全面展现中国法治建设的客观面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对国际法治的贡献,塑造中国既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又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法治形象。正如中华民族“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3][36]}的精神特质所示,中国法治“不仅要对中

国人民负责，也要尊重和不侵害他国的正当利益，关切各国人民共同的利益”^[8]。涉外法治文化正是这一法治形象塑造最核心、最深厚的土壤。

3. 承载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任。文化强国必须以强大的文化竞争力为支撑，这种竞争力在法治领域体现为规则影响力、价值吸引力和制度信誉。涉外法治文化通过四个子系统的协同运作，系统提升国家在法治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其文化核心影响子系统确立价值导向，传播中国法治价值观；文化事业繁荣子系统建设涉外法治公共产品（如国际法律数据库、涉外法治研究报告等），促进知识公平获取；文化产业发展子系统创新法治文化产品与服务（如法律科技、涉外法律服务文化品牌），提升传播效率与市场影响力；文化运行保障子系统整合政策支持、人才培养与资源投入，提供持续支撑^[9]。这四个子系统共同使涉外法治文化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强国目标的有效载体和驱动机制。

4. 是向世界传递中国法治智慧、贡献全球治理方案的重要渠道。涉外法治文化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鉴的载体，彰显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天下情怀。它既自信地展示中国法治成就、提供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如在线纠纷解决、生态文明法治等），也谦逊地吸收世界法治精华；既解释中国法治实践，也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规则建构）。通过这一载体，中国得以更加自信、从容地参与乃至引领国际法治对话，为弥补全球治理赤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富含中国智慧的法治公共产品，实现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向贡献者、引领者的转变。

三、涉外法治文化的发展路径

涉外法治文化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基石。其发展绝非单一维度可成，需系统谋划、内外兼修才能根基永固。我们初步探索提出“顶层设计”“文化交流”和“人才培养”三大发展路径，以期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顶层设计是“导航系统”，从国家战略层面为涉外法治文化建设提供方向指引、系统布局和资源保障，解决“往哪走”和“如何统筹”的问题，是发展的总纲领和方向盘；文明交流是“传播引擎”，是在顶层设计规划的航道上，通过双向对话与合作为涉外法治文化注入活力、拓展影响，解决“如何被接受”和“如何互鉴”的问题，是发展的实践场和活力源；人才培养是“核心支撑”，它为前两大路径的落实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解决“谁来做”和“如何持续”的问题，是发展的支撑点和根本所在。

顶层设计引领交流与培养的方向，文明交流践行并反馈优化顶层设计，人才培养则为前两者的实现提供主体能力和长期动能。唯有三管齐下、协同推进，方能真正推动中国特色涉外法治文化的繁荣发展。

（一）完善涉外法治文化顶层设计，强化系统布局与战略协同

1. 加强涉外法治文化的战略规划与体系构建是当务之急。涉外法治文化绝非简单的法律翻译或对外宣传，而是国家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将其置于全面依法治国和文化强国战略的顶层框架中进行系统谋划。面对当前国际法治领域激烈的规则竞争和话语权争夺，我国亟须制定涉外法治文化发展的中长期专项规划，明确其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这一规划必须强化系统思维，推动涉外法治文化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自贸区（港）法治创新等深度融合，确保法治文化建设与国家整体外交布局同频共振，形成战略合力。

2. 健全涉外法治文化的协同机制与制度保障是关键支撑。涉外法治文化建设涉及外交、商务、司法、宣传、教育等多个部门，必须打破部门壁垒和资源分散的现状，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境内与境外协同联动的高效工作格局。国家层面应制定统筹协调的专门工作机制，加大法治文化建设的资源投入，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并完善其效果评估体系。顶层的制度设计不仅要保障充足的制度供给，更要着力激发涉外法治文化与涉外法治实践（如国际商事诉讼、仲裁、法律合作）的良性互动，使文化的软约束与制度的硬支撑相辅相成，共同夯实涉外法治文化的实践根基。

3. 提升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和全球治理能力是核心目标。一个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顶层设计，其根本在于确保涉外法治文化建设服务于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等利益。它通过系统塑造中国法治的国际形象、有效传播中国法治的核心理念（如共商共建共享）、持续提供国际法治公共产品（如规则方案），为国家赢得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奠定坚实基础。这意味着顶层设计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和前瞻性，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化传播层面，更在于通过涉外法治文化这一软实力工具，深度参与甚至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这无疑是其价值的最高体现。

（二）深化文明交流与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包容的法治文化生态

1. 主动参与全球法治对话是打破话语垄断的前

提。当前国际法治话语体系仍不平衡,因此,超越观念分歧、深化文明互鉴是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治文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在坚定文化自信、立足中国法治实践的基础上,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吸收世界各大法系、各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要求我们超越“移植—借鉴”的单一模式,转向“对话—互鉴”的双向模式。要重点依托“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论坛、中国—东盟法律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等现有平台,主动设置议题,发起对话,在交流中减少误解、增进信任,为中国涉外法治文化的国际传播扫清认知障碍。

2. 创新交流载体与形式是增强文化感染力的核心。涉外法治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有效的传播与接收,必须推动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法治文化交流格局。在学术层面,支持国内外院校与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共建实验室、合作办学,创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学术期刊。在实践层面,鼓励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拍中国法治实践纪录片、共建“一带一路”案例法律数据库、举办国际模拟法庭大赛(如聚焦中国法律)。这些项目能将抽象的中国法治理念转化为具象、可感、易于国际社会理解的叙事产品,极大提升涉外法治文化传播的亲和力与实效性。

3. 推动双向涵化与共同创新是构建新生态的目标。涉外法治文化建设的更高层次目标,是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和“跟随者”转变为“共同创造者”。通过持续深入的文明交流与国际合作,我们不仅要传播中国法治故事,更要推动中国法治智慧与全球法治需求的创造性结合。例如,将中国在数字经济、绿色金融、跨境电商等领域的治理经验,通过交流合作转化为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规则范本。这个过程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涵化,最终目的是与世界各国共同丰富和发展国际法治文化的内涵,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贡献中国方案,使中国的涉外法治文化真正成为开放包容的全球法治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夯实涉外法治文化发展根基

1. 将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纳入国家人才队伍建设总体布局。人才是一切战略和交流活动的最终执行者,是涉外法治文化建设最基础的要素。当前我国严重缺乏既通晓国际规则与外语,又深谙中国法治精髓、具备高超跨文化沟通与谈判能力的高端复合型人才,这直接导致我们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处理重大涉外法律事务时常面临“话语赤字”和“能力赤字”。必须从国家战略安全和国际竞争的高度,将涉外法治文化人才培养纳入国家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超前规划和重点投入,这是确保我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法律战

中赢得主动的战略支点。

2. 推动学科交叉与模式创新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核心。传统法学教育模式难以满足涉外法治文化人才的培养需求。必须创新体制机制,重点支持相关高校设立涉外法治文化交叉学科,设计融合法学、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学、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课程体系,强化案例教学和项目制学习。师资队伍上,大力引进和培育具有国际组织、跨国律所、涉外司法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扭转理论与实务脱节的局面。培养过程要强调“中西融通、内外兼修”,不仅让学生知其然(规则),更要知其所以然(规则背后的文化历史逻辑),并能够用国际通用语娴熟阐述中国法治的文化根基与实践逻辑。

3. 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是确保人才质量的保障。涉外法治文化人才的锤炼最终必须在实战中完成。必须打破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壁垒,推动相关政法部门、顶尖律所、媒体集团、国际组织与高校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和人才孵化平台。通过尝试建立常态化的联合培养、实习实训、海外见习、订单式培养等机制,让学生在最前沿的涉外法律实践和跨文化传播场景中学习成长。最终目标是形成一个供需对接、有机联动、持续进化的人才培养共同体为涉外法治文化的长期繁荣提供稳定、优质、可持续的人才供给,从根本上夯实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根基。

结语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性交汇,彼此深度交织、相互影响。在这一宏大背景下,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两大维度,积极推动涉外法治文化的发展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价值。涉外法治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不断深化的产物,也是法学理论持续创新与文化自觉相结合的成果。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激荡的张力之中,涉外法治文化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中国法治的传统根基与现代创新,使中国法治文化更富成效地走向世界、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涉外法治文化的繁荣发展,不仅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也能够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智慧源泉。展望未来,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对涉外法治文化内涵、发展规律与建设路径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更高质量法治建设提供持续的文化动能。

参考文献:

- [1] 韩永红.论我国涉外立法的转型 [J].东方法学,2023(3).
- [2] 黄雄义.坚定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自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文化渊源为视角 [J].湖北社会科学,2023(2).
-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4] 崔蕴华.新时期以来法治文化的研究视域与中国语境 [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2).
- [5] 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 [M].苏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51.
- [6] 克鲁克洪.文化与个人 [M].高佳,何红,何维凌,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6.
- [7] 鄢晓实.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再认识及其当代价值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226.
- [8] 张龑.涉外法治的概念与体系 [J].中国法学,2022(2).
- [9] 孟东方,王资博.中国文化竞争系统研究论纲 [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Basic Concepts, Dual Values,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Culture

GUAN Yanjie

(School of Foreign Police Affairs,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culture is a unified entity formed in the practice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encompassing institutional norms, value concepts,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material representations. It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rule of law culture and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holding significance f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paradigm innovation. It serves both as an internal driving force fo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providing support for value recogni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discourse dissemination and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building a strong cultural nation, undertaking the functions of disseminating Chinese legal civilization, shaping the image of the rule of law, enhancing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contributing wisdom to global governance.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culture can be approached through three paths: Improving its top-level design to strengthen systematic planning and strategic coordination; Deepening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build an open and inclus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rule of law culture; Refining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to solidify the foundation for its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culture is a strategic project that will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viding solid legal and cultural support for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culture; dual values; development path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蓝碳交易监管法律机制研究

刘 彤

(海南大学 法学院, 海口 570100)

摘要: 蓝碳交易正日益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战略中的关键环节, 其监管机制的构建与优化是引领市场发展的核心导航。当前国内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市场监管领域法律规范尚未完善, 蓝碳交易监管中主要存在监管主体职责不清、第三方核查机构建设存在短板以及交易机构内部监管不健全等问题, 应当明晰政府监管主体职责、打造规范化蓝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机构以及建立蓝碳交易平台自我监管制度, 以完善蓝碳交易监管法律机制。

关键词: 蓝碳交易; 市场监管; CCER; 蓝碳; 海洋碳汇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5-0038-06

实现“双碳”目标既需要减少碳排放, 也需要积极提升碳汇对温室气体的吸收能力。碳交易市场是将碳汇的生态服务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重要机制。蓝碳(海洋碳汇)因其长期固碳潜力与多重生态服务功能, 成为全球碳市场创新的前沿领域。我国蓝碳资源丰富, 推动其市场化开发, 并与林业碳汇形成协同效应, 对达成“双碳”目标意义重大。为此, 必须建立公平透明的监管机制, 以保障市场诚信、激励企业参与、确保“双碳”目标顺利推进。

一、蓝碳交易监管机制概说

(一) 蓝碳的概念

海洋生态系统通过物理泵、生物泵和碳酸盐泵三重机制吸收并封存了约 93% 的地球圈层二氧化碳。尽管海洋碳汇中的滨海维管植物(红树林、盐沼植物等)仅占陆地植物总量的 0.05%, 但其年碳固存量却与陆地植物相当^[1], 这种显著的碳封存效率使其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生态系统之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蓝碳: 健康海洋对碳的封存作用——快速反应评估报告》中这样定义蓝碳: 蓝碳系指由滨海及近海生态系统通过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捕获并长期储存的有机碳, 即蓝碳包括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等典型海岸带生态系统捕获和储存的碳, 以及藻类养殖碳汇、珊瑚礁碳沉积、潮间带微生物碳泵等多元固碳, 同时包含渔业养殖活动中生物沉积及人工干预形成的碳。

收稿日期: 2025-06-04

基金项目: 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海南省蓝碳交易监管机制设计: 以参与主体为视角”(Qhys2023-152)。

作者简介: 刘彤(2001—), 女, 山东德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方面的研究。

① CCER, 即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 是由中国境内的碳减排项目经政府批准备案后所产生的自愿减排量, 重点排放单位可使用符合要求的一定比例 CCER 来一同完成清缴履约, 交易完成后在国家登记簿中予以注销。2022 年 9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发布《海洋碳汇核算方法》(HY/T 0349-2022), 2023 年 1 月 1 日实施, 2023 年 11 月 13 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实施《海洋碳汇项目开发技术指南: 滨海盐沼(试行)》和《海洋碳汇项目开发技术指南: 海草床(试行)》。

蓝碳依其性质, 只有实现可衡量、标准化和规模化, 对蓝碳的固碳量进行科学准确的核算, 蓝碳才可能进入交易市场^[2]。蓝碳交易作为市场化生态价值实现机制, 通过产权界定与碳排放量化, 推动滨海生态系统碳汇功能资本化。将蓝碳纳入碳交易体系具有多重战略价值: 在气候治理层面为实现全球气候目标提供了缓冲空间, 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恢复与保护; 在市场方面则有助于构建海陆统筹的复合型交易体系, 提升碳市场的韧性与风险对冲能力。

(二) 蓝碳交易监管现状

我国已开展了丰富的蓝碳交易项目实践。一方面, 广东湛江、海南海口、山东威海等沿海地区开展了红树林造林项目交易、渔业碳汇贷和蓝碳拍卖交易等行动^[3]。另一方面福建等地区的司法机关也引入“认购碳汇”, 探索蓝碳领域司法实践创新。但实践中尚无针对蓝碳交易的法律法规, 相关工作也未纳入海洋碳汇甚至碳汇的内涵、话语体系、政策框架^[4]。

根据《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 我国碳市场由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构成。2023 年生态环境部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颁布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提供制度保障。2023 年实施的《海洋碳汇价值核算方法》及配套技术指南^[1]为蓝碳交易提供量化依据。但由于《管理办法》大多为原则性规定, 法律位阶低, 地方试点因

执行差异易产生监管缝隙,亟须从中央层面进行立法以明确权责配置。

蓝碳交易的监管主体呈现多层级、多部门协同的特征。中央政府通过生态环境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制定政策框架并监督全国性市场运行。第三方机构负责项目核算与认证,交易机构负责项目登记与市场秩序维护。参与蓝碳交易的主要为重点排放单位或其他自愿参与CCER交易的法人和其他组织,蓝碳交易项目须经项目审定、项目登记、材料审核、项目检测、减排量核算核查登记等流程,若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易出现信息断层。

国际层面已形成多样化的蓝碳交易机制探索实践。美国进行系统性科研评估,探索蓝碳信用机制可行性^①,日本则建立“蓝色信用计划”,实现了制度化认证与交易管理^②,通过透明化流程,如认证标准公示、费用结构公开等,确保项目的可信度。制度化设计与科研的有机结合,为我国构建兼具科学性与市场化的监管框架提供了可操作的参考方向。

二、蓝碳交易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

从监管主体的角度来看,蓝碳交易监管主要面临三大核心挑战。一是监管权责配置存在制度性模糊,因制度供给不足导致权威统一的监管指引缺位,《管理办法》等原则性规定未能转化为可操作规则;二是第三方核查机构认证标准滞后,缺乏明确规则指引导致其依赖相近领域CCER项目标准,抑制蓝碳项目市场活力;三是交易机构内部监管机制缺失,顶层设计缺位使其面临合规依据不足、责任边界不清的困境。制度供给不足既是监管权责模糊的根源,又通过规则缺位传导至第三方认证机构与交易机构,最终形成系统性监管漏洞。

(一)监管权责配置的制度性模糊

我国碳市场采用的是由生态环境部为主导,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能源局等共同参与的统一归口与分散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5]。依据《管理办法》形成国家督导、省级协同的双层监管架构。但现行法规监管权责法理模糊,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的权责边界尚未清晰界定,CCER项目全流程管理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缺乏体系化政策指引。

相比之下,林业碳汇已通过《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方案》确立林草部门主导的现代林权治理体系^③。而蓝碳治理呈现明显的制度碎片化特征,相关规范散见于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及部门法的零星条款,缺乏与《海洋环境保护法》核心生态保护目标及《管理办法》中的自愿减排交易规则的有机衔接。这种体系化建构的缺失与法理界定的模糊,导致基层部门信息壁垒、职能重叠,进而引发监管效能损耗。现行《海域使用管理法》《土地管理法》等涉及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的法律规范,因长期未进行适应性修订,已难以有效回应蓝碳交易项目的快速发展需求,需以制度为切入点明确其与碳汇交易规则的兼容性。

蓝碳开发利用的跨部门治理特征显著,既涉及渔业资源保护等传统海洋管理部门,又因陆海统筹治理趋势的强化,凸显生态环境部门在海洋环境保护中的职权权重,加剧了生态环境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在职责界分中的复杂性。蓝碳交易流程涉及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多个部门,若法律法规没有对监管主体权责进行划分,多主体监管会导致监管的混乱和无序^[6]。当前,对蓝碳交易项目开发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尚不明确,项目开发者更注重经济利益而忽略生态价值、注重地区生态改善而忽略整体生态效益^[3]。在法律层面明确蓝碳交易机制的监管目标、程序设定和责任承担,才能构建起兼顾生态价值与市场效率的蓝碳交易监管法律体系,最终达成法律体系的整体优化。

(二)第三方核查机构蓝碳认证存在短板

CCER项目在实际产生减排量后,需要第三方机构对减排量进行核证。第三方核查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与交易机构之外,以公正的非当事人身份,根据有关法律或标准进行碳减排量核查,是政府监管的有效补充。蓝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机构应当遵循《管理办法》第30条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等关于认证机构的规定,公正、独立和有效地从事审定与核查活动。第三方核查机构不仅接受交易主体的委托,提供碳减排量数据的监测服务并出具报告,更在实践中凭借其技术积累和实战经验,积极参与“双碳”相关标准的制定及气候变化应对方案编制等关键性工作。第三方核查机构为CCER项目的顺利实施与持续优化贡献专业的智慧,扮演着监管与促进的双重重要角色。目前蓝碳交易CCER领域第三方核查机构建设尚存在若干亟待完善之处。

① 参见 <https://coast.noaa.gov/states/fast-facts/blue-carbon.html>.

② 参见 <https://www.blueconomy.jp/credit/>

③ 2023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权属清晰、责权利统一、保护严格、流转有序、监管有效的集体林权制度,国家林草局负责协调推进该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措施。

1. 蓝碳项目资质认定标准缺位。在蓝碳交易项目审核认定环节,第三方核查机构的资质准入构成监管体系的基础环节。依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机构及人员参考条件》^①,此类机构需同时满足法人资格、固定办公场所等法定准入条件,并通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取得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审定与核证资质。但这一制度设计在蓝碳领域面临制度适配性难题。

2024 年 6 月 11 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具备 CCER 项目审定与减排量资质的核查机构共 5 家,包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和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这些机构被明确归类为服务于林业及其他项目类型的核查机构,其中林业碳汇项目的核查资质已获清晰界定,而“其他项目类型”的表述为蓝碳交易项目未来纳入 CCER 体系预留了空间。

CCER 项目核查需遵循生态环境部碳汇核算方法,完成文件评审、现场核验、报告编制等法定流程。从实践样态观察,除湛江红树林碳汇项目由具备 CCER 资质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完成审定核查外,现有其他交易的碳汇审定机构不具备相应的资质^[7]。制度缺位导致蓝碳交易领域第三方核查机构缺乏统一资质认定标准,不仅削弱核查工作的专业性与规范性,更可能滋生权力滥用、数据失真等合规风险。

2. 缺乏蓝碳交易项目审定指南。当前,我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的开发与登记,严格遵循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项目方法学框架。根据《管理办法》第 10 条规定,申请登记的项目必须“属于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项目方法学支持领域”,这一要求构成项目合规性的基础,也是第三方核查机构执行审定任务的核心依据。

在林业碳汇领域,标准化建设已取得显著进展。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证指南》(GB/T 41198—2021)确定了审定和核证林业碳汇项目的基本原则、程序、内容和方法等,为林业碳汇项目的标准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相比之下,海洋碳汇的标准体系尚处于构建与完善的初期阶段。尽管《海洋碳汇核算方法》的出台有效解决了蓝碳量化评估的技术难题,但关于项目评估的具体程序、准入条件的建立等环节,目前仍主要依赖于地方性的试点探索。在此情境下,明确界定第三方核查机构在蓝碳交易项目

审核过程中需要审查的材料清单,细化第三方核查机构的审核标准与流程显得尤为重要。

(三)交易机构内部监管不健全

蓝碳交易项目的核证减排量经过国家主管部门备案并签发后就可进入碳交易市场。交易主体首先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系统完成账户注册,随后由交易机构负责交易与结算服务。为建设健康有序的蓝碳交易市场,交易机构应建立规范化且透明的交易机制、规则及标准,为交易主体提供明确的指引与参考,进而推动蓝碳交易项目的广泛普及与深入实施。在蓝碳交易的实际应用中,现有案例大多为在交易机构场外进行的非标准化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同时也对交易机构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 缺少市场风险监管规则。在 CCER 交易实践中,相较于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对交易主体施加的严格限制,非重点排放单位的参与门槛显著降低。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法人、其他组织乃至自然人,仅需遵循既定程序开设账户即可参与交易。这种较低的门槛设计虽然有利于扩大市场参与度,但也意味着潜在的监管挑战。金融市场经验表明,更广泛的参与者基础可能增加市场操纵的风险,进而损害市场信心。

蓝碳交易项目的发展现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风险。蓝碳交易项目的注册、审核、监测等关键环节存在较多制度漏洞。这种不成熟性使得蓝碳交易市场相对于发展相对稳定、制度更健全的林业碳汇市场而言,对操纵等违规行为的抵御能力更弱,交易主体可能因感知到蓝碳交易更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而倾向于选择林业碳汇 CCER 项目。尽管北京绿色交易所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和结算规则(试行)》中规定了 5 种风险管理方式^②,但其本质上仍较多沿用传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监管框架。这种框架可能难以充分应对海洋碳汇市场在初期发展阶段所特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

为有效管控风险并提升蓝碳市场的活力与吸引力,亟须针对海洋碳汇项目的登记、流转、质押、抵销等核心交易环节,以及与之相关的蓝色金融产品,构建更具适应性和针对性的监管体系。

2. 信息透明度不足。在自愿碳市场,特别是蓝碳交易领域,信息的公开、及时与准确对于维护市场公信力、促进公平交易、引导资源有效配置至关重要。然而,当前海洋碳汇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存在显著不足,构

^① 参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附件 4。

^② 参见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关于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和结算规则(试行)〉的公告》附件 2:第五章 风险管理。

成了市场健康发展的潜在障碍。

2023年2月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一则《蓝碳拍卖公告》，象山旭文海藻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象山县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对西沪港渔业约2340.1吨的碳排放量进行拍卖，最终由浙江易锻精密有限公司竞得^[8]。但拍卖平台和竞得公司均未通过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交易机构公开碳交易信息。碳交易市场的透明度较低，交易主体顾及商业机密等，可能不愿公开碳排放配额或交易数据，交易机构应发挥协调作用，鼓励引导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积极披露碳排放相关事项。

3. 缺乏蓝碳交易资质授权。现有的蓝碳交易大多是线下交易，少数线上交易的交割平台（如海带、贝类、湿地）不具备CCER交易资质，且交易平台不规范，甚至未通过正式认证。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系统承认的碳交易所共有9个，此外还有地方设立的碳交易所或挂名在其他交易所下提供服务。我国碳交所数量过多，甚至地级市和县也开设交易所，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驱动，将其视为竞争工具^[9]。这一现象偏离了碳交易机构设立的初衷，即作为促进绿色经济、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公共服务平台。交易所数量的激增并未伴随交易质量和专业性的同步提升，特别是在蓝碳交易领域，缺乏专业、合规且具备相应资质的交易平台，可能制约该领域发展，导致交易效率与透明度的下降，影响碳市场的整体公信力及长期健康发展。

三、蓝碳交易监管法律机制完善路径

（一）明晰部门监管职责

蓝碳交易过程涉及多个部门，因此必须在法律层面明确各部门的监管范围与权责划分。例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管理办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制定起草蓝碳交易相关部门规章，拟定蓝碳技术规范和相关标准；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协调蓝碳交易与传统碳交易市场的统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相关机构资质认定办法等。蓝碳交易监管既要把握碳交易的一般性，充分运用现有的碳交易法规，解决性质相同的法律问题，又应针对蓝碳交易的特殊性，比如碳汇价值核算、业务范围等及时制定新的行业规范，为正在发展的蓝碳交易市场保驾护航。随着地方蓝碳交易实践的丰富，在不违背上位法原则的基础上，地方可结合自身特色进行立法创新，为中央立法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例如，2023年《福州市连江县海洋碳汇管理暂行办法》建设海洋碳汇体系，将海洋碳汇的监测、登记、流转、注销纳入地方立法，在《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

强对蓝碳交易的监管。同时，也应当积极借鉴国际经验。欧盟委员会于2003年通过了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指令2003/87/EC，并设置了中央管理机构，该机构运用自动记录系统保证碳排放权交易和行使的合法合规^[10]。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宜以生态环境部为核心，联合其他法律规定的CCER交易监管部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蓝碳交易管理平台，设定蓝碳交易市场准入门槛，推动信息共享，鼓励符合准入标准的主管机构自愿申报项目信息，引导社会各界参与监管。

（二）规范蓝碳交易第三方核查机制

1. 建立资格审查准入标准。缺乏蓝碳价值核算资格准入标准会影响第三方机构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可以参照现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机构及人员条件进行规范。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蓝碳开发需要制定并公布核查机构需求，组织专家评审会审核提交申请的第三方核查机构，综合考虑其核查业绩、经验和蓝碳价值核算技术能力。经审核并征得生态环境部同意后，决定是否批准机构进行蓝碳核查。

碳交易市场的法规体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立法模式^[11]。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在第三方核查机构的资质、核查工作流程的规范以及违法责任承担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补足空间。在蓝碳交易领域法制空白的背景下，立法机关应尽快在法律层面明确第三方核查机构的职责和权限，避免权责不对等和利益冲突，提高第三方机构的工作效率和质量。

2. 编制项目审定技术规范。2021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林业碳汇项目审定和核证指南》，为规范林业碳汇项目的管理，提供了术语、程序、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指导。考虑到海洋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蓝碳交易的核查难度更大，需要更专业、更精准的核查机构来保障交易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蓝碳交易领域同样需要制定统一的评估标准和认证程序，确保核查机构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和依据进行准确的蓝碳核查。可以沿用《林业项目审定和核证指南》的基本原则，由第三方核查机构根据这些原则对海洋碳汇项目进行审定和核证。例如，根据项目设计文件，分析土地或海域的适用性、开发主体的土地或海域权属、项目预期的经济效益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并生成报告。

（三）健全交易机构监制度

2022年2月，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获批设立，为各类碳金融产品提供资本市场基础支撑。通过蓝碳产品的市场化交易，推动我国的蓝碳方法学成为国际公认标准^[12]。为确保蓝碳交易的公正、公平和透

明,建立并遵循规范的交易流程和严格的审查标准显得尤为关键。这不仅有助于避免信息不对称和价格歧视等现象,更能保障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为了使交易机构有效履行监管职能,可采取以下策略。

1. 制定市场风险防控规则。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比,自愿减排市场参与自由度较高。为了防止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行为,防范市场风险,交易机构应审查交易主体的资质,确保其具备碳交易基础知识及管理能力。可以参考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制定交易主体自律监管指引,要求其内部治理、资金管理和信息披露等方面达到标准。同时,交易机构还应建立健全市场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定期对市场运行状况进行监测与分析,及时发现并评估潜在的市场风险。此外,交易机构应加强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交流蓝碳项目动态、风险信息及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监管政策,提高市场透明度,确保市场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2. 完善信息披露标准。《管理办法》中缺乏对交易机构的规范,交易机构可以参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的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虽然各碳交易机构开通了信息查阅门户,但实践中仍普遍存在信息更新滞后、内容不一致等问题。可以借鉴欧盟的《金融工具市场监管指令》,该指令对交易场所的信息披露要求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权益性金融工具信息披露义务,二是非权益性金融工具信息披露义务,三是提供交易数据的义务^[13]。为切实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效率,应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的审核、监督与追溯机制,强制公开交易价格、成交量、交易方等非涉密信息。

区块链技术为信息披露提供了创新路径。其固有的可追溯性、不可篡改性和分布式透明性,能够有效应对碳市场中存在的数据真实性存疑、更新不及时、信息孤岛等问题。在区块链技术条件下,企业的碳排放交易行为可以实时记录每个企业的交易数据,如碳配额、碳排放量、历史交易价格和数量等,均包含在区块中;当前的交易报价和数量等,则以分布式、公开透明的方式记录在各个节点上^[14]。这种技术赋能的透明度和数据可靠性,对于专业性强的蓝碳交易尤为重要。它能显著增强消费者和市场参与者信心,大幅降低交易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为保障蓝碳交易的公平、高效运行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

(四)构建监管配套保障机制

1. 建立交易主体授权制度。为规范蓝碳交易市场运行,需通过建立交易主体授权制度,强化准入管理。

交易主体分为全国 / 地方重点排放单位、项目业主及其他符合条件的法人或组织,其参与门槛可进行差异化设定。重点排放单位须限制蓝碳配额抵销上限,防止其忽视自身减排;项目业主应具备蓝碳生态系统的修复、管护专业资质和成功经验;其他自愿参与者则需满足“境内注册、无违规记录、无交易限制”等基本条件,通过资质审核后方可入市。信用与惩戒机制亦不可或缺,除虚假申报、伪造数据等行为外,若蓝碳交易项目区未产生应有的碳减排量甚至生态受到破坏,交易机构可依据《管理办法》建立信用记录制度,并与市场准入挂钩;对严重违规主体,依法取消交易资格并追责。

2.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监管工作需要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通过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计划,为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和发展机会,使其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提高核查工作的准确性。交易机构可与高校、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建立合作,共同开展蓝碳领域的研究项目,培育“蓝碳 + 金融”“蓝碳 + 法律”的复合型人才。

结语

蓝碳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面临监管权责模糊、第三方核查机构短板及交易机构内部监管不足等多维挑战。构建高效监管体系需以制度化为引领,明晰政府监管权责;以标准化为核心,规范第三方核查体系;以科技赋能为支撑,强化交易机构内控。通过制度、技术与市场的协同治理,保障蓝碳市场稳健运行,不仅会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更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具有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邓洁琳,周美恩. IIIGF 观点 | 聚焦海岸带蓝碳生态系统保护,助力我国蓝碳发展 [EB/OL]. (2021-11-05) [2024-01-30]. <https://iigf.cufe.edu.cn/info/1012/4247.htm>. 2021-11-05.
- [2] 朱晖,赵佳齐. 蓝碳交易认证及运行机制的挑战与应对 [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1(1): 61-68.
- [3] 魏震昊,孙国茂,姚中杰. 自愿减排机制下海洋碳汇交易的双重效益与影响因素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4, 34(4): 48-59.
- [4] 刘子飞,吉永晋,李飞,等. 国内外海洋碳汇发展动态及中国战略取向 [J/OL]. 海洋湖沼通报(中英文), 2025: 1-11. (2025-05-28) [2025-05-30].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HYFB20250526001&dbname=CJFD&dbcode=CJFQ>.
- [5] 邓海峰,尹瑞龙. 碳中和愿景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功能与

- 制度构造研究 [J]. 北方法学, 2022, 16(2): 5–15.
- [6] 姜安. “双碳”背景下我国林业碳汇制度的法律困境与完善建议 [J]. 中国林业产业, 2023(1): 86–91.
- [7] 董敬明, 刘子飞, 陈丽梅. 我国海洋碳汇交易政策、实践及展望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39(3): 519–527.
- [8] 白华兵, 岳彩峰. 全国首单蓝碳拍出每吨 106 元的高价, 海洋碳汇正在影响全球 [EB/OL]. (2023-03-01) [2024-01-25].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677676191168643.html>. 2023-03-01.
- [9] 张阳. 中国碳排放交易所的本土异化与规制纠偏 [J]. 环球法律评论, 2023, 45(2): 160–177.
- [10] 张丽欣, 王峰, 曾桉. 欧盟与美国碳市场第三方核查机制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J]. 质量与认证, 2019(2): 62–64.
- [11] 任洪涛.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数据质量监管的制度省思与法治完善 [J]. 广西社会科学, 2023(2): 11–19.
- [12] 杜斌. 海南自贸港林业碳汇市场交易机制研究: 以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国际化为出发点 [J]. 开发性金融研究, 2022(5): 26–33.
- [13] 樊东星, 张叶东. 欧盟碳交易监管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J]. 福建金融, 2023(1): 31–39.
- [14] ZHAO C, SUN J, GONG Y, et al. Research on the Blue Carbon Trading Market System under Blockchain Technology [J]. Energies, 2022, 15(9): 3134.

On the Legal Mechanisms of Blue Carbon Trading Regulation

LIU Tong

(School of Law,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100, China)

Abstract: Blue carbon trading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strategie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its regulatory framework serving as the core driver for market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lack of comprehensive legal norms in China's voluntar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market,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regulation of blue carbon trading primarily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unclear delineation of regulatory responsibilities among government entities, gap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party verification agencies, and insufficient internal oversight within trading institution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mental regulatory bodies, establish standardized third-party verification agencies for blue carbon trading, and develop self-regulatory mechanisms for blue carbon trading platforms. These measures aim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improving the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blue carbon trading.

Key words: blue carbon trading; market regulation; CCER; blue carbon; marine carbon sink

传说、节庆与当代乡村生活的嬗变 ——基于禹城市伦镇五村的田野调查

周 腾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济南 250100)

摘要:禹城市伦镇五村“三城叠压”遗址周边的地方传说通过虚实结合的叙事策略构建了历史记忆与空间象征的多维叙事,这套叙事既用以阐释空间变迁的合法性,又映射出资源分配的地方性焦虑。当代乡民的节庆体系呈现三级分类结构:一是以维系情感网络为核心的亲属团聚型节日,二是以强化家族共同体为核心的祭祖型节日,三是转向个体化实践的家户型节日,反映出人口流动背景下传统节俗的主动调谐。而乡村生活的嬗变受区位与交通的双重影响,古官道塑造的商贸文化传统与现代乡村空间重组,共同构成不同村落的文化表征模式。地方文化的传承需以标志性文化为引领,在整合多元文化资源时,更应重视民众在文化阐释与实践中的主体性创造。

关键词:地方传说;节庆观;乡村生活嬗变;禹城市伦镇;田野调查

中图分类号: K8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5-0044-07

禹城作为大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然而其核心文化遗存“三城叠压”遗址(即高国故城、禹息故城与高唐故城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土层叠压遗存)及其所承载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尚未得到充分发掘与系统性研究。该遗址位于禹城市西南约18公里的伦镇西北部,是理解区域历史文化层累与空间记忆的关键地理节点。伦镇东距济南市约40公里,东南与齐河县毗邻,总面积120平方公里,人口约4.2万。其历史可追溯至宋朝时所设安仁镇,金朝以后改称伦镇并沿用至今^{[1][45]}。在交通方面,308国道横贯镇北,济邯铁路纵跨镇东,引黄干渠贯穿镇西,济南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穿越其中。在空间分布上,除伦镇北街村位于镇政府驻地外,其余4个村落则环绕着“三城叠压”遗址呈菱形分布。该遗址东距燕寨子村约1.5公里,西至堂子街村约2.4公里,南邻城子坡村约1.8公里,北接小坡村约1公里。本文基于对伦镇境内紧密环绕“三城叠压”遗址分布的4个村落(燕寨子、城子坡、堂子街、小坡)及镇政府驻地北街村的深度田野调查,聚焦于遗址相关的传说系统与乡民日常生活实践的交织互动。

通过田野调查,我们不仅搜集了与“大禹治水”和“三城叠压”相关的传说,还获取了关于当地民众生活

方式、节日习俗以及其他地方性叙事的口述史资料。基于这些材料,本研究旨在探讨三个核心议题。一是地方传说的叙事结构及其功能如何体现乡民的生活逻辑;二是乡村节庆的分类体系如何体现乡民的生活观念及其自我调适;三是深入乡民的日常生活,探察当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及其细微差异。通过对上述议题的深入考察,本文不仅致力于更新禹城地方文化研究的微观实证成果,更力图阐明在快速社会转型背景下,地方文化的可持续传承需以标志性文化(如大禹文化、“三城叠压”遗产)为引领,整合多元资源。更重要的是,必须高度重视民众作为文化实践主体对地方文化的能动性阐释与创造性转化,这将是理解地方社会韧性及其文化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一、伦镇传说的叙事逻辑及其功能

据清嘉庆十三年(1808)《禹城县志》载:“祝阿县南三十里有废禹息故城。禹以息土填鸿水以为名山,义本取此。”^{[2][425]}《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唐天宝元年(742年)改禹城县,以县西南三十里有禹息故城,因而为名,在州(齐州)西北八十五里。”^{[3][280]}这与《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基本相同,该书还指出“古高唐城在

收稿日期:2025-02-08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重点科研项目“先秦时期艺术民俗学相关资料梳理”(24RXY001)。

作者简介:周腾(1998—),男,山东东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俗学研究。

县南五十里”^{[4]386-387}。此地唐朝以前称“祝阿”，唐朝以后始称“禹城”。所谓“三城叠压”即高国故城、禹息故城与高唐故城的遗址存在部分土层叠压分布的现象。1996年，德州市考古勘探队对土层和出土瓦砾、陶片进行分析，证实了“三城叠压”遗址的存在。昔日的故城遗址，如今仅剩一座南北长140余米，东西宽14米，高1米左右的土台。调查中发现，当地村民对这座古城并没有深刻的记忆。实际上，这不难理解——据乡民回忆，当地村落多形成于明清时期，村民多从山东诸城一带迁此立村。而“三城”中最早形成的高国故城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稍晚形成的高唐故城距今也有上千年。时过境迁，故城已经被历史的黄土湮没，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然而，这并不妨碍围绕这片神奇的土地产生的传说或故事在民众之间流传，并不断被赋予新的生命力。

(一) 传说的类型

传说通常围绕特定的人物、地点、事件或风物展开，根据这些故事元素，传说可以被划分为相应的类别。其中，人物传说包括“娘娘坟传说”“菩萨奶奶传说”等，地点传说涵盖“燕寨子与燕青”“鬼家湾”等，事件传说有“南蛮盗宝”等，风物传说则包括“高粱叶变金条”“黄豆变金豆”等。根据调查采集的传说文本，传说可分为“遗址中心型”与“遗址周边型”两大类(参见表1)。前者如“黑猪拱城”“兔惊撞城”“无狱废城”，以故城衰亡为主题，通过动物意象(野猪、野兔)隐喻权力更迭与历史断裂；后者如“显城传说”“南蛮盗宝”“金马驹饮水”等，将外来者(江南方士)与本地人(拾粪老人)置于“宝物争夺”的叙事框架中，折射资源分配的地方性焦虑。上述传说，有的独立成篇，有的则相互勾连反应，构成特定的传说集合。

表1 伦镇传说分类及功能分析

类型	典型案例	叙事核心	社会功能
遗址中心型	黑猪拱城	权力崩塌与历史断裂	解释空间变迁合法性
遗址周边型	南蛮盗宝	资源争夺与道德规训	强化地方身份认同

在“遗址中心型”传说中，“黑猪拱城”“兔惊撞城”与“无狱废城”三个故事共同揭示了高唐故城衰落这一历史事件。其中，“黑猪拱城”讲述的是建城之初野猪于夜间将白天新筑城墙拱倒的故事，“兔惊撞城”讲述的是一位落难皇帝惊吓到草丛中的野兔，野兔慌乱中撞毁城墙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中的“城倒”情节象征着高唐城的衰败命运。古人有时将“猪”视为“龙”的化身，而“龙”又是皇帝的象征，因此野猪可能隐喻着“流亡的皇帝”。“无狱废城”则讲述了高唐城建成后因城内“无髡地”而废弃的故事。此处的“髡地”即古代的监狱。

一地无狱讼常被视为海清河晏的映照，但无狱又未必是太平盛世。恰如堂子街村村民所言：“响马堂子街，土匪燕寨子。”(ZJC,男,1963年)足见历史上某一时期，当地并非安宁之地，缺乏关押罪犯的监狱，也暗示了当时该地区社会治安堪忧。同时，这也是当地民众解释高唐故城废弃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类传说通过“事件—空间—意义”的关联，将物理空间转变为文化记忆的承载者。通过分析故事情节可以断定，“金马驹饮水”和“南蛮子盗宝”这两个传说是在高唐故城衰落很久之后形成的。神迹现象和外来者盗取宝物的事件均暗喻故城周边曾是一块风水宝地。值得注意的是，“金马驹饮水”中的“大湾”(即燕寨子村西一处较大的坑塘)作为空间纪念物，既承载水利社会记忆(取土筑城)，又被诠释为风水的象征，是村民对自然景观的象征性挪用。据当地村民讲述，在高唐故城尚存之时，“大湾”曾为城中人汲水之地，也有人认为它是修筑城墙的取土之地。燕东村村民认为：

这个大湾都是后来人工挖的。它要是自然形成的，它会不是这个形状(方形)，一般自然形成的坑都是无规则的。你仔细想想，要真是自然形成的它不会冲成方形。过去，就是这一弯儿的人的无主地，村里边谁家盖房子都上那里使土去，就是按照无主地都使起来了。你要是上别人家的地里掘一锹土，人家也不愿意呀！(ZMX,男,1945年)

“遗址周边型”传说包括地名起源传说和风俗教化传说。以“燕寨子的起源传说”为例，当地村民讲道：

宋朝的时候高唐城就在这里。为什么叫燕寨子呢？那时候就说是水浒宋江领着一伙好汉打高唐的时候，燕青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好汉，反正还有其他好些头头(头目)。传说他领着一些人在这里安营扎寨。等打下高唐以后，就留下一些残兵子，就在这里住下了。因此，也就有了燕寨子。(ZMX,男,1945年)

燕寨子的村民将村落起源与《水浒传》中的故事串联起来，城子坡村的村民ZJZ提到了“五里三寨”，即燕寨子、宋寨子和焦寨子。宋寨子位于燕寨子正北方1公里处，焦寨子位于宋寨子正北方1.5公里处，这三个村庄自南向北依次排列。除燕寨子的起源传说与《水浒传》中的燕青有关联外，宋寨子和焦寨子的起源尚未发现与《水浒传》中的宋江和焦挺有直接联系。据地方史料记载，上述三个村落均形成于明清时期，以“寨子”命名多与古代军寨驻地有关，此类解释更为可信^{[5]236-240}。据村民ZMX回忆，大约六七十年前，村中确有少数燕姓村民，但如今村中已无此姓。因此，燕寨子的起源与燕青驻军的传说或为乡间的闲谈戏说，但村民将其作为村落

文化的一部分传承至今。

(二)传说的阐释

传说和民间故事往往兼具娱乐与教化双重功能,本次调查所采集的传说也不例外。其中,娱乐功能是村民可以直观感受到的,但其讲述明显依赖于特定的语境。村民 ZJZ 表示,20世纪 70 年代大生产时期,休息间隙大家常聚在一起,通过聊天和讲故事来消解疲惫。许多故事就是那时从村中长者那里听来的。非正式场合(如田间地头)更易激活村民的叙事记忆,村民倾向于将传说与当下的事件勾连起来。如果以比较正式的口吻与这些村民交流,他们通常表示对过去的传说记忆并不深刻。相较之下,教化功能并不像娱乐功能那样直接和强烈,而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渗透。恰如当地村民在讲述“南蛮盗宝”的故事时提到:

过去,俺这里原来有一个姓姜的人家,从那里
(高唐故城遗址附近)挖出一个钟来,那时候到济南
也不知道卖了几百块钱,可是他担不得这点财呀!
从济南回来以后就得了一场病,把钱也花得差不多
了,病也治好了。(ZJZ,男,1956年)

他讲述这则故事似乎是在告诫听众“勿取不义之财”。其实,“南蛮盗宝”的故事在当地并非孤本,“金马驹饮水”“黄豆变金豆”等传说均与此相关。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南认为,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6][26]}。如前所述,燕寨子村的“大湾”曾作为纪念物出现在“金马驹饮水”的传说中,而传说的结局则是南方“憨宝客”想盗走金马驹,却只伤其一腿,金马驹自此不复再现。“黄豆变金豆”传说则讲述了一位拾粪老人欲将故城遗址附近发现的一地大豆,聚扫成堆带回家中,无奈筐中有粪,只得返家取器具。他返回时大豆仅剩一把,且听到不远处有人对话:“雇此人收取金豆,送他一把,余下的咱们收走。”老人再看手中的大豆已变成金豆子,懊悔不已。“南蛮盗宝”事件传说与 1990 年代南方商人承包当地砖窑后“跑路”的事件形成互文,使这类传说成为历史经验的隐喻性表达。这种“虚实交织”的叙事策略,既规避了考证压力,又为地方性问题提供了文化解释路径。

“南蛮盗宝”传说看似是外来者的一次盗窃行为,实际上是当地人与外来者的一场“共谋”。在传说中,当地人被描绘成受害者,而“南蛮子”则成为不完全的获利者。“宝藏”的遗失对当地确实是一大损失,而“南蛮子”也并未获得完整的宝藏,如“偷马驹伤了马腿”“偷豆子丢了一把”“偷牛砸中了牛角”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传说本身,而在于其背后反映的当地人的生活逻辑,以及传说对当地村民产生的影响。

村民在讲述传说时往往掺杂着自己的理解。例如,村民在讲述“鬼家湾”传说时提到无主荒地及垃圾填埋场。恰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污秽是位置不当的东西^{[7][45]}。尽管村民对“鬼家湾”形成之前的历史比较模糊,但从“村郊”“无主荒地”“垃圾场”等词语中不难发现,在他们的观念中那是一个不洁、不祥之地。所谓的“鬼拽腿”自然是村民杜撰的,但恐惧感是真实的。在乡村,当玉米长得比人还高时,即便是成年男性村民,在进行打药、施肥、灌溉等农事活动时,有时也需要有人陪伴才敢进入玉米地。同样,“鬼家湾”的传说如同一面无形的警示牌,告诫附近村民,村郊的坑塘可能存在危险。过去,许多村庄经常发生孩童不慎落水溺亡的悲剧,家长往往把村中的坑塘、河流杜撰成一个神秘的危险之地,以此防止意外的发生。从另一个角度看,“鬼家湾”传说与在北街村采集到的“蝎子山”“月牙桥”“琵琶湾”“无梁大殿”等风物故事并无二致,只是后者融入了对自然景观的优雅想象,展现了当地村民丰富的创造力和风趣的生活美学。这些传说无疑为当地民众的生活增添了一抹色彩,为他们生活世界的某些景观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传说宛如从故城遗址中发掘出的陶器瓦罐,经历了时间的侵蚀、风化和磨损,几经流转,已难以辨认其原始色彩。如前所述,在“黑猪撞城”传说中,不同村民有不同的叙述文本,一说是黑猪中箭跑至今高唐县,箭落城建;一说是黑猪衔箭奔跑至此,丢箭建城;还有一说不知黑猪叼了何物跑到这里,口中之物掉落城建。无论是“背”,还是“叼”,无论是“箭镞”,还是其他物品,传说的核心要件始终如一,即黑猪与某物从故城到新城,从此故城没落,新城崛起。在缺乏文字记载的乡村,乡民很难对某一事件或现象进行精确考证。那些掺杂了当地民众生活经验和信仰实践的传说,无疑成为一种理想的选择。即便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传说的讲述者也无需对此负责,因为传说本身就宣告了虚构的本质。因此,可将“黑猪拱城”之类的传说视为当地乡民对“为何不在此地建高唐城,而选择在五十多里以西的地方建城”的自我阐释。

“高粱叶变金条”的传说同样存在多个版本。在采集文本时,我们发现关于这一传说的描述存在差异。一种说法是高粱叶,另一种则是豆概子(即长豆角,可能是指豆荚),其变化的逻辑与“黄豆变金豆”的故事极为相似。这一传说描述了一位年末返乡的外出者傍晚途经故城遗址附近的农田时,拾取的一片高粱叶(或豆概子、豆荚)回家后变成金条。我们知道,冬季的农田里不会出现高粱叶、豆概子或豆荚,但这些作物在当地确实比较常见。由于故事发生在傍晚,情节具有一定

的模糊性，因此有人推测这可能是一起盗墓事件，可以将其归入“南蛮盗宝”传说的范畴。然而，如果我们抛开这种非法活动的猜测，这则传说更多地反映了当地物产的丰富，遍地是宝。另外，如果我们关注“过年”和“外出者返乡”等关键词，可以将这个故事理解为外出打工者经过一年的辛勤工作，用汗水（高粱叶）换取了财富（金条），最终回家与家人团聚。因此，这则故事蕴涵着“勤劳致富”的道理。

综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对地方性传说的解读关键在于理解村民如何诠释这些传说，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对传说内容的证实与证伪；其次，传说的传播、重塑和演变与当地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村民讲述的传说通常设定在与他们认知相近的时间范围内，始终没有脱离他们的日常生活；再次，传说的产生和流传遵循着乡民的实用主义逻辑，并在此逻辑指导下发挥着显性或隐性的功能；最后，当地民众对传说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正如村民 WSF 所表达的：“既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因此，对地方性传说的深入理解和阐释，需要回归当地民众的生活及语境去探索和把握。

二、伦镇乡民的节庆分类与节庆观

岁时节日构成中国传统民间生活的核心。调查中也了解到当地许多岁时节日的习俗。本文的重点并非节俗的具体内容，而是更加关注当地民众对节日的界定和认知，由此来探析他们的节庆观，进而以此为窗口理解乡民的生活世界。

（一）节日的优先级与时间制度的演变

据清嘉庆十三年（1808）《禹城县志》记载，明清时期有 16 个节日列入当地民众的“节俗清单”中。

元旦昧爽，燃香烛，供牲果，礼天地神祇，拜祖先及尊长，已乃往亲友家交相拜贺；
上元张灯演剧为乐；
二月二日以豆箕灰作圈，名打囤，谓其宜五谷；
清明前二日为寒食，祭扫先茔添新土；
清明日插柳枝于门，小儿女作秋千戏；
四月八日，俗谓浴佛日，男女结队烧香；
端午日，食角黍，比户插艾叶，饮雄黄酒以避恶，合五色丝系儿女臂，制香囊相倾遗；
六月六日，取井水注瓮，谓其宜瓜菜；
七月七日，小儿女作乞巧会；
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祭祖先；
中秋，设月饼、瓜果，对月饮酒，谓之圆月；
重阳日，登高饮酒，作花糕相馈送；

十月一日，祭扫先茔，同众食；
十二月八日，以花米煮粥谓之腊八粥；
十二月二十三日，以果品、糕汤祀灶神；
除夕，饮椒酒、放爆竹，灯火彻夜。^{[2]446}

观察上述的节俗，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中既有延续，也有变异，甚至还有消亡。在调查中，当询问乡民有哪些节日仍在当地盛行时，几乎所有人都一致提到了中秋节和春节这两个节日。但对清明节、端午节和中元节等节日，村民的反应非常含混。村民 ZMX 对此有着自己独特的节日分类法。他将一年中的所有节日划分为 4 个层级：I 类、II 类、III 类和 IV 类（见表 2）。在当地民众的观念中，I 类节日仅有两个，即中秋节与春节，其特点为以“团圆”为核心，持续时间较长，仪式活动集中于亲属关系网络。

表 2 伦镇村民节日分类及功能演变

类别	代表性节日	核心功能	当代变迁特征
I 类	春节、中秋	亲属团聚	仪式简化，情感需求强化
II 类	清明、中元	家族祭祖	代际参与度下降
III类	冬至、腊八	家户祈福	饮食符号化，仪式弱化
IV类	现代纪念活动	缅怀纪念	无特定仪式或习俗

值得注意的是，春节并非一个三五天的短时节日，而是从除夕夜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这段时间都被视为春节的一部分。在时间维度上，旧时的元旦指的是正月初一，与现在大年初一拜年的习俗相似，而现在的元旦则指的是公历一月一日。因此，旧时的元旦可以与春节一同归入 I 类节日，而如今的元旦则被乡民归为 III 类节日。上元节即元宵节，过去有举办灯会和社戏的习俗，在交通不便的年代，村民走亲访友往往需要十天半月的时间，一直持续到元宵节前后，因此元宵节也被划入了 I 类节日。

二月二、清明节、端午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和十月一（下元节）被乡民归类为 II 类节日。除了二月二之外，这些节日都以“祭祖”为核心，强调宗族共同体的绵延。而二月二又被称为“龙抬头日”，其习俗大概有三。一是画囤，即用灶灰在庭院中画圆圈，象征存储粮食的囤仓，祈求五谷丰登，但随着燃气灶、电磁炉等厨具的推广以及禁止焚烧秸秆政策的施行，有些无灶灰可用的村民以麦粒或炉灰画囤，还有些村民不再沿袭此俗；二是理发，即在二月初二当日理发有“龙抬头”的吉祥寓意；三是吃“蝎子爪”（炒豆），一般有油炸和土炒两种做法，有驱除毒虫的寓意。如今，村民家中少有自制的“蝎子爪”，多到集镇商场采购炒制的大豆，也称作“燎（料）豆”。据乡民所述，过去的“蝎子爪”与“料豆”不同，“料豆”是专供骡马牲口等食用的，如今也变成了

一种时令食品。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在当地民众的观念中,清明节几近等同于寒食节。祭祖扫墓的习俗通常在寒食节进行,而非清明节时的郊游和荡秋千活动。尽管两者在时间上有所差异——寒食节通常在清明节前一两天,有时与清明节重叠,有时则在清明节之后(村民意识到了这些区别),但在实际的节日习俗活动中,村民并未刻意区分这两个节日。

依据当地民众的分类标准,夏至节(公历 6 月 20 至 22 日的某一天)、冬至节(公历 12 月 21 至 23 日的某一天)、腊八节(农历十二月初八)、北方小年(农历十二月廿三日)以及元旦被归入Ⅲ类节日中。这些节日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强调饮食,以家庭祭祀为核心。乡民常言“冬至饺子,夏至面”,意味着在冬至日要享用饺子,夏至日则要品尝凉面。腊八节时,人们会喝腊八粥,腌制腊八蒜,而北方小年和元旦同样以饺子为主食。如今,对许多乡民而言,这些节日的仪式感已不如往昔那般强烈。若仅从饮食角度来考量,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吃上一顿饺子并非易事,节庆中的饺子承载着一份感恩之情。而在物质丰裕的今天,吃饺子已不再具有强烈的仪式意义。对于那些进城的年轻人而言,祈盼丰收已不再是他们唯一的祈求,反而有了新的祈愿,仪式的过程也在悄然变化。因此,对于上述节日,有乡民选择坚持传统,有乡民在坚守时做了适当调整,而另一些乡民则不再将其视为重要的时间节点。

正如方志所载,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晒衣节(农历六月初六)、乞巧节或七夕节(农历七月初七)、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以及现今国家其他法定节日等,并未被当地村民的传统节日体系完全吸收。原因在于部分节日失去了文化传承的土壤,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一些节日不再是集体共庆的盛事,村民对此的重视程度不一,例如七夕节已演变为中国的“情人节”,主要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并融入了西方情人节的习俗,而传统习俗则被淡化。重阳节则成为针对老年人的节日,强调尊老敬老,主要由政府机构或慈善企业为村中长者提供福利,但并未对整个村庄产生广泛影响;其他法定节日,多是一些全国性纪念活动,并未形成特有的仪式和风俗,也未对村民的日常生活造成深刻影响。因此,村民 ZMX 说道:“如果允许,请将它们列入Ⅳ类节日。”

(二)乡民的节庆观与日常生活的调谐

这一分类体系本质上是村民应对人口流动的策略。随着青壮年的持续外出,集体仪式难以维系,因此通过缩小仪式规模(从宗族到家户)来保持节俗的延续,这反映了传统节庆向私人化转变的趋势。其中,将中秋节与春节归入Ⅰ类节日,可见“团圆”在当地民众生活中始终

占据核心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尽管堂子街村人口超过 1500 人,但长期居住在村中的村民仅五六百人,且大多数是中老年人。对于这些留在村中的老人来说,中秋节和春节成为了他们翘首以盼的节日。中秋节本就是一个以“团圆”为主题的节日,主要关注在世者与直系亲属之间的“小团圆”。春节时,在外工作一年的年轻人不仅会带着自己赚取的收入,满怀喜悦地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同时还要“请家堂”,将已故的先人请回家中,实现现世与彼世亲人的“大团圆”。因此,Ⅰ类节日的首要原则是“团圆”,活动范围限于直系亲属,或主要发生在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之内,进而扩展到其他在世亲友以及已故的先祖。

从Ⅰ类节日过渡到Ⅱ类节日是对“生者安康,逝者安息”理念的践行,在世者的团圆退而居其次,已过世的先人反而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和下元节等都是以“祭祖”为主题的节日,扫墓成为当地村民的主要节俗活动。参与活动的人员不再局限于小家庭,而是扩展到整个大家族,在外工作的年轻人不一定返乡,但每一家应有代表参加。当地祭祖扫墓的时间相对固定,一般选择在节日当天下午太阳落山前后,亲属或亲属代表到坟地烧纸、祷告、添土,有些地方还要在坟头压上香纸作为亲属扫墓的标识。

从Ⅱ类节日过渡到Ⅲ类节日,标志着民众逐渐回归到日常生活状态。在这些节日里,村民们无需刻意追求在世者的团聚,也不必特别照顾逝者,而是更多地关注自我需求的满足。所有的仪式活动都可以在家中轻松完成,如为家中供奉的诸神(包括财神、灶神、宅神等)焚香、烧纸、摆放供品等。供品通常包括点心、水果、鱼肉,有些村民还会准备几道家常小菜。这类节日以祭祀家户神灵和享受饮食为主要活动,在现代生活条件下,节日的饮食与日常饮食相差无几,活动可以轻松进行。因此,村民们对这类节日的重视程度已不如以往,节日过后很快就会恢复到平常的生活节奏。

三、伦镇乡村日常生活图景的嬗变

村民的日常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毫无差别的。除了饮食劳作,还有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书写着集体生活的故事。本文不再呈现村民的个人生活史,也不再详细地罗列村落生活的事迹,仅从时间维度上关注村民日常风俗中的变化,揭示村民对生活变迁的忧虑;从空间维度上对所调查的村落进行比较,从村际差异中寻找隐藏其中的共通性。

(一)村落内部的习俗变迁

乡村的风俗变化在当地的婚俗与丧俗中尤为显

著，乡民对此大多习以为常。以婚俗为例，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彩礼的增加。小坡村的村民 GZS（男，75岁）回忆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结婚时，一共花费几十块钱，仅为自己的妻子买了一支“英雄牌”钢笔和一本皮面笔记簿作为结婚礼物。他说，现在新婚夫妇的彩礼已经攀升至“六万六”或“八万八”，甚至更高。据燕东村和东城子坡村村民透露，在他们所在的村庄，彩礼已经涨到了10万元以上，最近一户新婚家庭的彩礼甚至高达18万元。除此之外，还有“一动一不动”的要求，即汽车和楼房，以及“五金”，包括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金吊坠。这种高额彩礼已是普遍现象。丧葬习俗的变迁在堂子街村尤为明显。过去，这里使用水泥制成的棺材，每副棺材的费用大约在两三千元。后来，用大理石制成的小型棺材。2023年9月开始施行新规，要求统一改用骨灰盒，价格仅为二三百元。调查期间，村中恰有一位老人去世。他的家人到村十字路口处举行上庙告丧的仪式，即“死者上灵床后，孝子要立即持香纸（或拿一块破席）到大门外（或村头、庙上）燃香烧纸叩头哭拜，意思是拜请天神将死者收到天上去”^{[8][12]}。尽管这一习俗有所简化，但仍在延续。历史上，村委大院前的十字路口处曾有一座菩萨庙，村中每有丧事，都会到庙前告丧。如今，那座庙虽已不复存在，但仍然存在于村民的信仰世界。因此，每当有丧事发生，人们仍会先到此处告丧，还有村民在此举行个人化祈祷仪式，如为小儿驱邪、还愿等。

对燕东村村民 ZMX 而言，近年来最为显著的风俗变化莫过于拜年方式。以往拜年活动从大年初一早晨起，持续至下午。在一天之内，他们能走访多达百户人家。凡是门前摆放拦门棍的家庭，都表明家中有家堂供奉，路过的人都会进去拜年。即便是不同姓氏，也会相互拜年。通常，人们进门后会先作揖，后在庭院或堂屋磕头行礼。拜年时迈步的先后顺序、作揖的方式都遵循一定的规矩。然而，现在村里的年轻人仅以点头、鞠躬和简短的寒暄来代替传统的拜年仪式，有一些村民仅在家族内部拜年，更有一些则在业缘或趣缘群体内进行。拜年的流程也在不断简化。村民 ZMX 担忧地表示，这将是对尊老爱老传统的背离，传统的孝道正面临挑战。他呼吁国家和政府部门重视孝道和孝文化，关注当代农村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并加强宣传和引导。

（二）村落之间的风俗别异

这几个村落的风俗习惯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燕寨子村和城子坡村的婚俗彩礼较之小坡村要高一些。堂子街村在举办丧礼时不再雇用唢呐班，其他村

仍保留了这一持续多年的习俗。在最近的丧葬改革中，堂子街村也表现出了积极的响应态度。

在丧事上大操大办，一点用没有。人死灯灭，死了就是死了。人家家里的老人去世了，再雇些吹喇叭的，弄个音响，哐啷哐啷的，这算什么？现在人们的思想觉悟也慢慢提高了，不搞以前那一套了。

（WSF，男，1942年）

小坡村村民 GZS 则认为，老人离世时应当“让他风光一番”，出殡当天邀请唢呐班来表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小坡村的村民还提到，不仅在丧事中会请唢呐班表演，某些喜事（如婚礼）也会邀请。燕寨子村的村民表示，除了吹唢呐，还要有唱歌、唱戏等。

在调查的5个村庄中，小坡村的人口规模最小，燕寨子村人口居中。两村的生计方式相似，“俺们村（燕寨子）没有什么厂子，都是靠种地为生，现在出去打工的多”（ZMX，男，1945年）。

相比于上述二村，堂子街村、城子坡村和北街村的条件显得较为优越，这三个村都有集市。在人口规模上，堂子街村略逊于城子坡村，但多于小坡村和燕寨子村。堂子街村与北街村地势较高，村民们认为，这是菩萨奶奶的庇佑所致。城子坡村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这一点从村容村貌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可见。此外，该村西南角还有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堂，可容纳一百多人同时进行礼拜。其经济优势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首先，人口多且土地资源丰富，如仅村主任一家承包的土地就超过了1000亩；其次，交通便利，集市发达；最后，外出经商者众多，据村民介绍，村中资产超过百万元者不在少数，他们经常为家乡建设捐款。

在调查中，上述三个村落均强调了区位和交通的重要性。例如，堂子街村村民反复提及，堂子街村东距伦镇约15里地（实际直线距离约为7公里），北距安仁镇约15里地（实际直线距离约为8公里）。村西南方向与杨圈村相隔约5里地（直线距离2.5公里），中间隔着用于农田灌溉的苇河。杨圈村旧时是当地知名的商贸中心，吸引了济南等地的商人前来交易。这些乡村集市的兴起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旧时官道的经过。

20世纪以前，山东的道路分为官道和大路两种。官道有两条，一条从北京通往广东，途径山东德县（今德州市）、高唐、茌平、东阿、东平、汶上、兗州、邹县（今邹城市）、滕县（今滕州市）；另一条从北京到福建，途径山东德城区、平原、禹城、济南、泰安、新泰、蒙阴、临沂等^{[9][624]}。当地民众提到的官道向东直达济南，向北途经高唐、恩城、夏津、武城等地。应是指从北京

通往福州的官路。这几个村庄均位于官道附近，产生了许多围绕官道的文化景观和地方传说。福州官道(古称“济南—禹城”段)的遗迹，塑造了独特的“官道文化圈”。沿线村落(如堂子街村)的集市传统、商贸传说(如济南商贾贩马)都与之紧密相关。这种历史交通的遗产效应揭示了文化形态的形成不仅源于内生性演进，也深受跨区域联系的深刻影响。

结语

本文试图揭示地方文化实践中存在的三重逻辑：一是在尊重标志性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将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分为“遗址中心型”和“遗址周边型”两类，民众以自己的方式阐释传说，而传说通过虚实交互的叙事构建着地方认同；二是当地民众对节日的分类遵循着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实践逻辑，同时体现了在当代人口流动背景下文化调适的现状；三是村落联合体内外的风俗流变和文化差异映射经济与历史的复合作用，以及乡民在面对生活变化时的忧虑。因此，期望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将大禹文化作为地方文化的标志，发挥其领导和示范作用，同时不应忽视其他宝贵的地方文化资源和形式，如将官

道文化、节庆习俗等串联起来，构建一个地方性的文化景观网络。此外，更应重视民众在地方文化传承、保护和推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参考文献：

- [1] 山东省禹城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禹城县志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5.
- [2]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工作委员会. 中国地方志集成: 山东府县志辑 10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3.
- [3] 李吉甫, 撰. 元和郡县图志 [M]. 贺次君,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4] 乐史, 撰. 太平寰宇记 [M]. 王文楚,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5] 山东省禹城市《乡村记忆》编纂委员会. 乡村记忆: 禹城村名的由来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6.
- [6] 柳田国南. 传说论 [M]. 连湘, 译. 紫晨, 校.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5.
- [7] 道格拉斯. 洁净与危险: 对污染和禁忌观念的分析 [M]. 黄剑波, 柳博贊, 卢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8] 政协禹城县委员会办公室. 禹城文史资料: 第四辑 [Z]. 内部资料: 1986.
- [9] 魏建, 唐志勇, 李伟, 著. 齐鲁文化通史: 近现代卷 [M]// 安作璋, 王志民. 齐鲁文化通史.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Folklore, Festival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Rural Life

——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in Five Villages, Luntown, Yucheng

ZHOU Teng

(Confuciu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in five villages, Luntown, Yucheng, it was discovered that local legends surrounding the “Three Cities Overlapped” site have constructed a multi-dimensional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spatial symbolism. Through a narrative strategy that combined the real with the imaginary, it not only explained the legitimacy of spatial changes but also reflected the localized anxiety over resource distribution. The contemporary rural festival system presented a three-tier classification structure: First, kinship reunion festivals centered on maintaining emotional networks; Second, ancestral festivals focused on strengthening family communities; Third, family-oriented festivals that shifted towards individualized practices, reflecting the adaptive tuning of traditional customs under the context of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ife was influenced by both 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with the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shaped by ancient official roads and the modern rural spatial reorganization, jointly forming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patterns of different villages. Finally,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needed to be led by iconic culture, integrating diverse cultural resources, and should also value the subjective creativity of the public i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e.

Key words: local legends; festival observation; rural life transformation; Luntown; field investigation

苏轼动物诗词的死亡书写与生命意识

杨景春

(四川工商学院 教育学院, 四川 眉山 620000)

摘要: 苏轼诗词里的动物意象丰富多样,甚至不乏对动物死亡形态的细腻刻画。死亡形式有因生命短暂而死、因贪图饵料而死、因暴躁易怒憋屈而死、因险情突发而死、因被捕猎而死、因劳累不会叫或祭祀而死、因环境变化而死等七种类型。这些死亡书写折射着强烈的生命意识,是一曲无可挽回的生命挽歌,是超越死亡的精神追求。动物命运与人类共情,动物与人生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共通之处。动物们的生与死,恰如人生的起伏跌宕,充满了无常与变故。这些死亡方式与意象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多样与复杂,更能激发我们对生态平衡、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 苏轼; 动物诗词; 死亡书写; 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5-0051-06

在文学领域,“死亡书写”如一道深邃而神秘的门户,引领读者窥视生命的终极奥秘。从古至今,数不清的哲人墨客不断探索着死亡的真谛,无论东方的孔子还是西方的莎士比亚,他们的笔下都流露出对生命的深刻反思。苏轼笔下不乏对动物死亡形态的细腻刻画。其 1700 首诗和 300 首词,出现“死”字 130 多次。苏轼通过这些意象,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多样与复杂,更激发了对生命本质和死亡哲学的深刻思考。

一、动物死亡形式归纳

动物死亡不仅是生命终结的表象,更是自然法则、生态平衡与人类活动深刻交织的反映。它们超越了简单的生命消逝,蕴含着对生命本质、宇宙秩序及存在意义的深层启示。

(一) 因生命短暂而死

“朝生暮死”常被用来形容某些昆虫短暂的生命周期。从生物学上说,昆虫生命之短暂尤为显著。其生命周期通常包括卵、幼虫、蛹及成虫等阶段,且多数种类成虫期最为短暂,需迅速完成繁殖任务。这种生命策略确保了种群快速繁衍,体现了昆虫在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高度适应。苏轼有两句诗“难与夏虫语,永无秋实悲”。此乃受庄子“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的启发。这两句诗出于《岁寒知松柏》,是苏轼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于汴京(今开封)所作的《和黄鲁

直》两首之一。黄鲁直即黄庭坚,题目出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生态圈如生物舞台,上演着万物生灵的精彩剧目。有的物种代代相传,寿命悠长,见证人类兴衰,历亿年风雨,而蜉蝣这种昆虫一般仅活数小时或一日,是朝生暮死之典范。蜉蝣属于蜉蝣目,其历史可追溯至遥远的石炭纪时代。它们身有羽翼,不饮不食,每年五月会大量出现。尽管成虫寿命之长者往往难以超过三日,却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与韧性。它们以繁衍后代作为核心使命,即便生命匆匆如白驹过隙。或许就因为如此,古往今来的诗人不断以蜉蝣这一意象来表达对生命的感悟。先秦古逸有“蜉蝣之羽,飞集于户”(《卜颂》),《国风·曹风》亦有吟咏。西汉有“蜉蝣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戴德《夏小正》),其后曹魏阮籍,西晋傅玄与陆机,东晋郭璞,唐代虞世南、骆宾王、武三思、储光羲、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有吟咏。宋代的王禹偁、梅尧臣也有类似表达,苏轼则有“阅世似蜉蝣”(《壬寅二月有诏令》)、“寄蜉蝣于天地”(《赤壁赋》)等名句。“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尽管生命短暂,蜉蝣等昆虫在生态系统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参与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体现了生命多样性的奇妙与伟大。“昆虫正相啮”(《和陶杂诗十五首》),它们的存在提醒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绽放光彩。

苏轼有“蚯蚓窍作苍蝇声”(《瓶笙并引》),苍蝇寿命一般一个月,但在温度较低的情况下,寿命可延长至两到三个月。苏轼又云“快若夏燎蚊”(《云龙山观烧

收稿日期: 2025-02-23

作者简介: 杨景春(1954—),男, 黑龙江望奎人,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诗学、三苏文化。

得云字)),雄蚊的寿命通常在 20 到 30 天左右,雌蚊在吸血后才能发育繁衍后代,但寿命也并不长。苏轼还提到“更许萤火争清寒”(《中秋见月和子由》),萤火虫是一种小型甲虫,属鞘翅目萤科,尾部发光,有 2000 种左右。其幼虫需经过 6 次蜕皮进入蛹阶段,生命周期通常为 1 年,部分种类可达两年。成虫寿命短暂,一般为 3 到 7 天。苏轼亦有“晚来蝴蝶入疏帘”(《留题》),夏天蝴蝶寿命一般较短,常在两周以内。雌蝶产卵后即死,雄蝶如果未经交配,可能存活 20 到 30 天,但交配后寿命会缩短至 2 到 3 天。

(二)因贪图饵料而死

嘉祐五年(1060)正月,苏轼作五律《鳊鱼》:“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这首诗可能源于他在某天清晨江边散步时,观察到鱼儿因贪吃诱饵而被捕捞,从而触发了他的感慨与回忆。鳊鱼出于汉江,为襄阳特产,又名“武昌鱼”,这个名字来源甚早,《三国志·吴书》中有记载:“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毛泽东也曾有诗云:“又食武昌鱼。”鳊鱼特点鲜明:腹大、背弓、鳞细、色青、味美。因其颈项短,又谓“缩项鳊”。苏轼从“缩头”二字分析,认为它不知“缩项”,“贪饵每遭烹”。即因“不解退缩知足而得全,反因贪饵而遭祸”。孟浩然的五律《岘潭作》云“美人聘金错,纤手脍红鲜”。这条鳊鱼被美人用金盘盛放,纤手细切。鳊鱼本水中自由物,瞬间变成了餐桌上的佳肴。有眼前的美味,故乡的“莼根何足传”?乡愁因美味而化解。这道佳肴是以鳊鱼的生命为代价的。鳊鱼的死,或因贪吃诱饵,或因命运捉弄,但无论如何,它的生命都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杜甫在《解闷十二首》里对孟浩然“尽堪传”的“清诗句句”高度评价,认为这些作品值得传颂。而那些德高望重的“耆旧”已写不出新的佳作,“漫钓槎头缩颈鳊”,只能随意垂钓那缩着脖子的缩头鳊。

对杜甫、孟浩然的诗句苏轼自然了然于心,他曾写道:“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苏轼《鳊鱼》一诗主要是对鳊鱼死因,亦即贪饵遇祸而洒同情之泪,“吾今又悲子,辍箭涕纵横”。遭烹由于贪饵,隐喻人事。纪昀评论说:“点缀警切。”^[1]齐宣王不忍看“将以衅钟”“无罪而就死地”(《齐桓晋文之事》)的牛也是这个道理。鱼儿上钩致死的原因,是人为的还是鱼儿自身的,《晋书·翟庄传》记载:翟庄早年唯以射猎垂钓为乐。待到年长之后,便不再从事狩猎活动。有人问他:“捕鱼和打猎同样是伤害生命的事情,但您只弃其一,这是为什么呢?”他回答说:“猎自我,钓自物,未能顿尽,故先节其甚者。”射猎是我主动,而钓鱼则是鱼儿因贪食上钩,我无法一下子完全停止这些行为,所以先节制那些更为严重的。翟庄认为鱼儿吞钩致死不是我

的过错,“时人以为名言”“晚节亦不复钩”^[2]。苏轼诗出现“鱼”字 210 多次。感悟鱼儿吞钩而死的还有一些,如“自从识钩饵,欲见更无因”(《鱼》)。这表明鱼儿识破人设的陷阱之后,便不会轻易上钩了。

(三)因暴躁、易怒、憋屈而死

在自然界中,不少动物因暴怒这一极端情绪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一现象揭示了情绪调节在生物生存策略中的关键作用。苏轼《河豚鱼说》讲到河豚“游于桥间而触其柱”“怒其柱之触己也”。这是河豚的第一个死因,过于冲动与暴怒,“不知罪己,妄肆其忿”。《河豚鱼说》揭示了自然界中一种微妙而富有哲理的现象。河豚鱼却不懂规避,因过于贴近桥墩而被撞。但河豚却愤怒地认为是桥墩故意触碰了自己,仿佛桥墩有了生命,故意与之为难。《河豚鱼说》启示人们,当问题出现时,要从自身找原因,不可习惯性地归咎于外界环境或他人,就如同河豚鱼“怒柱触己”一样,忽略了自我反省和改变的重要性。

第二个死因,“张颊植鳍,怒腹而浮于水”。可怕的是,河豚鱼觉得憋屈,把愤怒之情感演变为具体行动。河豚鱼又名生气鱼,白色肚子,体表布满斑纹,咬合力惊人,一旦遇险,就会吞下水或空气,让肚子膨胀类于圆球。结局是:“久之莫动。飞鸢过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这是暴躁、易怒性格导致的直接后果。这一死因深刻揭示了情绪失控、缺乏应对策略的危害性。苏轼通过河豚鱼的死亡书写,告诫人们要学会控制情绪,理智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河豚鱼说》寓意深远,它提醒我们,面对生活,应学会调整自我,灵活应对,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和指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真正智慧的鱼儿一样,在人生的河流中游刃有余,避免“至于磔腹而死”的悲剧。河豚鱼身体不少部位如肝脏、肾脏、皮肤、生殖腺甚至血液有剧毒,处理不好会致人致命。宋人孙奕有笔记著作《履斋示儿编》,记录了“苏轼拼死吃河豚”的佳话^[3]。

(四)因险情突发而死

险情突发而死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因险情突发而“真死”。如“鸟乐忘置罿,鱼乐忘钩饵”(《出都来陈》),鱼与鸟看似因乐忘险而濒临危境,实则暗含对生命自由与险境关系的深刻洞察。

第二种情形是“装死”。从动物学角度来看,动物装死是一种典型的防御机制,也被称为“死亡假相”或“紧张性静止”。这种行为在多种动物中都有,尤其是当它们面临捕食者的威胁时。这种行为是由动物的神经系统对危险刺激做出的本能反应。当捕食者的威胁逼近时,动物体内的应激激素会激增,导致它们进入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而装死则是这种紧张状态下的一

种极端表现形式，通过抑制运动来减少被捕食的可能性。苏轼有描写老鼠装死的《黠鼠赋》。关于这篇赋的写作时间，有说是他11岁在“三苏祠”遵父苏洵之命所作^[4]，也有说是他56岁时所写^[5]。

《黠鼠赋》分三段。第一段描写老鼠设假死之诡计逃脱。第二段分析老鼠“不死而死”的骗人与逃脱技巧，慨叹“役万物而君之”的人竟然被老鼠欺骗。第三段揭示中心，须专注且警觉，装死骗术非独鼠，人生处处须防欺诈。全文通过老鼠装死的小事，引发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诗经》有两篇以老鼠为题材的作品，《硕鼠》和《相鼠》，均为讥刺官吏之作，奠定了托喻刺世主题。后来以赋写鼠的文学作品不少，根据清朝陈元龙《历代赋汇》统计，共有13篇。其中，《黠鼠赋》最负盛名^[6]。这些赋大都承袭《诗经》传统，老鼠形象无非是奸邪狡诈、贪婪无度、为害世人等，苏轼却凭借老鼠狡猾装死这一细节，以独特的视角奠定了《黠鼠赋》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五)被猎捕而死

动物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本身便蕴含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楚人自古好弋猎”（《江上值雪》），苏轼诗词里狩猎的例子也不少。苏轼在密州创作了《祭常山回小猎》，诗中描绘了神采飞扬的骏马，追逐野兔、擦地急飞的凶猛苍鹰和壮观的围猎场面，表达了疆场立功为国效力的豪迈之情。

海南时期，苏轼创作了四言诗《和陶劝农六首》，反思现实，关注农业。诗中提到一些动物，广阔平原上“兽踪交缔”，而这些野兽随时可能丧生，“惊踪朝射，猛豨夜逐”，早晨人们会惊动并射击麋鹿；夜晚时分，则会追逐凶猛的野猪。苏轼诗词最能体现动物被过度猎捕而致死的，就是七言古诗“湖州道中作”的《画鱼歌》，作于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诗中出现鰐鲵、虾、蟹、鱼、鹈鹕五种动物，描绘了渔人过度捕捞的场景，隐含了对生态平衡的忧虑。“天寒水落鱼在泥”展现了鱼儿无处遁形的困境，而“短钩画水如耕犁”则形象地描绘了渔人无情捕捞的情景。特别是“一鱼中刃百鱼惊”，不仅描绘了鱼被捕的惊恐，也反映了因过度捕捞导致的生态混乱，“虾蟹奔忙误跳掷”。渔人“养鱼如养雏”的假象背后，是“搅水觅鱼嗟已疏”的现实，暗示了即便精心养护，也难以弥补因过度捕猎导致的资源枯竭。苏轼这首诗，以鱼为喻，警示世人过度索取终将导致自我毁灭，富含深刻的哲理与反思。何谓画鱼？苏辙《和子瞻画鱼歌》有说明：“吴人以长钉加杖头，以杖画水取鱼，谓之画鱼。”这是一种断子绝孙的猎获方式，不可能持续。动物因人类的贪欲而死，这不仅是生态平衡的破坏，更是人性中贪婪与自私的暴露。过度狩猎

或过度捕捞导致动物大量死亡，种群数量锐减，不仅否定了动物存在的价值，更挑战了人类道德底线。

(六)因劳累、不会叫或祭祀而死

因劳累而死的例子。七律《和子由渑池怀旧》写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当时苏轼初仕凤翔，苏辙送至郑州后返回京城赋《怀渑池寄子瞻兄》赠予苏轼，苏轼以此诗回应。苏辙曾言：“无方骓马但鸣嘶”，苏轼则说：“路长人困蹇驴嘶。”苏轼感怀往事，遂有此诗。他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即崤山，在渑池西），骑驴至渑池。”《新城道中》有“疲马”，《神宗皇帝挽词》中有“病马”，《和晁美叔老兄》中有“瘦马”，《奉和陈贤良》中有“驽马”。马疲乏劳累而死，反映了古代交通不便，人生不易，动物亦然。

因不会叫而死的例子。七绝《题过所画枯木竹石》，作于元符三年（1100）二月。“不须更说能鸣雁”，本自《庄子·散木》。夫子宿于山中，友人大喜，令家人杀一只雁款待最尊贵的客人。家人请示雁有两只，一只会叫的，另一只不会叫，杀哪只？主人说杀那只不会叫的。木因不材而得福，雁因不能鸣而被烹。

因祭祀而死的例子。“赖此牛酒盈”（《新滩》），此为过秭归新滩作。“不思牺牛龟，兼取熊掌鱼。”（《和陶始经曲阿》）“牺”专指牛。“牺牛”特指用于祭祀的纯色牛，此类牛必须严格挑选，并履行一定仪式方可用于祭祀。《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古人的观念是以纯色牛祭祀更能表达对神灵的敬意和诚信。宋朝海南人“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7]。因祭祀而死的例子，还有“犧牲菌鸡卜，我当一访之”（《和陶拟古九曲》其五），他们告诉我，冯冼家族有着独特的祭祀习俗，如用犧牛和菌鸡来占卜吉凶。合浦、海南地区出一种高背野牛，名之曰“犧牛”。祭祀的时候，用犧牛作牺牲称之为“犧牲”。《雷州八首》中还有“杀牛挝鼓祭，城郭为倾动”的描述。

(七)因环境变化“干”“枯”而死

因“干”而死的例子，如“羞看干死萤”（《送家安国教授归成都》）。《晋书·车胤传》记载：“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拣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杜甫有句“案头干死读书萤”，后以干死萤言读书人之窘困。因“枯”而死的例子，如《蜗牛》，出自《雍秀才画草虫八物》，这是一组五言绝句。“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蜗牛壳里那点湿润的液体，少得可怜，也就勉强够它自己舔舐湿润一下。“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它拼命地往上爬，却不懂得适可而止，结果最后力气用尽，只能无助地粘在墙壁上，慢慢枯死。

苏轼并不是一个偏爱死亡主题的作家，但其诗篇中却巧妙地融入了多样化的动物死亡形式。《乌贼鱼

说》描述乌贼鱼为逃避天敌,巧妙地释放出墨汁使海水变得浑浊,意图借此隐匿身形。然而,这一策略非但未使其如愿以偿地避开追捕,反而意外地吸引了海鹰的注意,最终被捕。故事讽刺了那些仅知采用掩盖手段以求短期苟安的短视行为,强调了因此而导致的悲剧。再如因自然衰老、疾病侵袭、竞争、意外灾害、遗传缺陷、战争与冲突而死,这些死亡形式不仅反映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也映射出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人类活动的影响。从自然法则下的平静老去,到疾病侵袭下的痛苦挣扎;从残酷的竞争淘汰,到人为因素下的无奈终结,它们或气势恢弘、或平凡卑微,共同编织出一幅幅关于生命、死亡与重生的壮丽画卷。

二、生命意识

在苏轼的笔下动物们的生与死,恰如人生的起伏跌宕,充满了无常与变故。苏轼通过描绘动物死亡的多样性,不仅展现了自然界的残酷与真实,而且更深刻地映射出人生的复杂与多变。

(一)无可挽回的生命挽歌

从科学层面剖析,动物生命的终结,是遗传信息在自然选择下的优胜劣汰,推动物种进化,维系生态系统的稳定与繁荣。哀悼之余,我们更应敬畏自然,珍视生命的每一次呼吸。苏轼半生漂泊,足迹遍布北宋版图。他写动物就是写自己。诗中的意象不仅是对自然的感悟,更隐喻了诗人自己漂泊无定的生活状态。如五言古诗《槐》,“高槐虽惊秋,晚蝉犹抱叶”,这首诗写于元丰二年(1079),正值“乌台诗案”期间,出自《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其二)。“晚蝉”在秋季出现并哀鸣一段时间后就会死亡,“破巢带空枝,疏影挂残月”。“破巢”与“空枝”不仅象征着生命的凋零与家园的丧失,也隐喻了苏轼在监狱受审期间,个人命运的波折与家庭的离散。“栖鸦寒不去,哀叫饥啄雪”,乌鸦成了御史台庭院中萧瑟景象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岂无两翅羽,伴我此愁绝”,乌鸦的哀叫,映射出苏轼在“乌台诗案”中遭受的苦难与孤寂。

“我衰篮中蛤,闭口护残汁。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岐亭五首》)在大自然的广阔舞台上,每一个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动物们的生活习性、生存挑战,乃至生命的终结,都映射着人类社会的某些缩影。“侣鱼虾而友麋鹿”,动物界的竞争与合作,如同人类社会中的奋斗与共赢,彼此映照,共同揭示着生命的真谛与宇宙的奥秘。七律《乔将行,烹鹅鹿出刀剑以饮客,以诗戏之》作于熙宁九年(1076)四月,密州。首联“破匣哀鸣出素虬,倦看鵩鶀

听呦呦”,描绘了一幅为宾客准备丰盛宴席的画面,直接展现动物被宰杀以待客的情景。颔联“明朝只恐兼烹鹤,此去还须却佩牛”,将鹤这一象征长寿与高雅的动物引入,与烹煮相联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这种对比不仅增强了诗的情感色彩,幽默之外,也巧妙地传达了诗人对未来的担忧以及对美好事物可能消逝的哀悼。鹤的死亡在这里成为了一个深刻的隐喻,象征着美好与纯洁在残酷现实中的消逝。再如《食雉》,雄壮的野鸡拖拽着长长的尾巴,在夕阳斜照下惊慌飞起。“空中纷格斗,彩羽落如花”,同人们喧闹着,不顾一切,将这些野鸡投进网中,谁还会为它们叹息呢?“百钱得一双,新味时所佳”,此诗通过描绘人们捕捉、烹饪野鸡的场景,以及野鸡从飞翔、争斗到被捕、烹食的命运变化,反映了生命的无常与自然的残酷。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生命消逝的感慨和对自然现象的哲思。其中,“谁知化为蜃,海上落飞鸦”,以奇幻的想象,表达了世事难料的主题。

(二)超越死亡的精神追求

苏轼超越死亡的精神追求主要体现在他对生死、人生和自然的理解和态度上。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古以来,生与死这一对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命题,始终萦绕在人类的思想殿堂中,被无数先贤哲人反复探讨。与被宵小陷害、被怀王疏远、客死汨罗的屈子一样,苏轼最终也是客死他乡。面对生命的无常与死亡的必然,苏轼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豁达与超脱。他并未因人生的起伏跌宕而沉沦,也未因死亡的阴影逼近而恐惧。相反,他以一颗平和而深邃的心,去感悟生命的真谛,去体会自然的韵律,从而在生死之间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精神出路。苏轼认为生命是某种东西瞬间的呈现,生命是永恒精神霎那之间产生的,随时可能毁坏。他的一生,是其真实本性的生动展现,每一个转折与起伏,都如同清泉般自然流淌,不加雕饰。然而,苏轼尽管深知生命如同浮萍,漂泊不定,且常伴随着痛苦与挑战,但他拒绝将人生简单地视为负担或无尽的苦难。在他看来,这样的理解过于狭隘,忽略了生命中那些美好、温馨与欢乐的瞬间。他坚信,人生虽短,但其中的每一刻都值得去珍惜、去体验、去享受与追寻。

苏轼认为,有生就有死,有形必有坏,“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墨妙亭记》)。在面对生死问题时,苏轼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态度。送钱穆父诗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遇赦北归,途径金山寺时,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自题金山画像》)认为自己一生忙碌,

一事无成，寂静无欲，心如止水，平生功业无非是黄州、惠州和儋州三个贬谪地。人生的风景大多在路上，欢笑、泪水、挫折乃至痛苦，都是宝贵的经历。贬居海南时，创作了《轼笔自书》，又名《在儋耳书》。初到荒岛，心情低落，“天水无际，凄然伤之”。不过作者是何等达观、超脱、智慧之人，巧妙地借助于“附于芥”、失魂落魄、“茫然不知所济”的蚂蚁自嘲自解，自我安慰，视点一变，境界全新。生死攸关“几不复与子相见”之际，哪知“方轨八达之路”就在俯仰之间。其实在“乌台诗案”死里逃生之后，苏轼的心态就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实现了自我超越与重建，迎来了精神上的重生。在此过程中，佛道思想给予了他莫大的慰藉，但他并未深陷其中。相反，他巧妙地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以此重塑自我，探寻并发现了真正的自我。他还借“鸡”等动物意象来表达自己的追求。如元丰二年（1079）7月给苏辙的绝笔诗：“魂惊汤火命如鸡”（《予以事系御史台狱》），身陷囹圄，濒临死境，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立足处、真正的目的与意义。到年底黄州时期，“城东不斗少年鸡”（《十二月二十八日》），意要诀别以往的自己，“庭雪到腰埋不死”（《塔前古桧》），则表达了对生命存在意义的精神追寻。

苏轼一生漂泊，暮年投荒，贬谪是其生活的主流，但他愈挫愈强。黄州4年，是其创作的黄金期，儋州四载，海南纪念千年。苏东坡对海南而言，不亚于孔子之于中国文化。清代《琼台记事录》：“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17][18]}贬谪促成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8]。

（三）动物命运与人类共情

共情(empathy)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亦称同感、同理心、同情等，经常出现在现代精神分析著作里。动物作为自然界的生灵，其生存状态与情感体验同样值得尊重与关注。人类与动物同一个家园，与地球生死相依。共情不仅是对动物命运的同情与理解，更是对人类自身道德境界的升华。它促使我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万物共生的重要性。通过共情动物，人类能够培养更加宽广的胸怀与深远的视野，共同构建和谐共生的美好世界。这种共情不仅是对动物的慈悲，更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关切。

治平元年（1064）冬天，苏轼在凤翔写了《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勤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这是一次由官方组织的大型烧芦苇活动。皇家苇塘烧荒，目的是促进来年芦苇生长，减少病虫肆虐，有利于新生芦苇。全诗共出现狐、兔、鹰、虎、蛇、马、鸦、麌、犬9种动物，多为实写。“风回焰卷毛尾热，欲出已被苍

鹰遮。”遗憾的是，这不是人与动物温馨和谐的共生之境，而是动物四散奔逃之凄惨情形。“霜乾火烈”“燎毛燔肉”“飞走无路”，一会功夫，诸多动物成了刀下之鬼，掌中之物，“鞍挂雉兔肩分麌”。由诸多动物之死，诗人又联想到古代君王好猎亡国之祸，以及忠臣词客魏绛、司马相如、扬雄劝谏之苦。从生态学角度看，可以适当进行一些有利于生态平衡的狩猎，但必须禁止扰乱生态平衡的狩猎。这首诗二者兼备，可以说，“苏轼已有维系生态平衡的思想，这是了不起的超前意识”^[9]。

类似表达对环境破坏和动物生存忧虑的作品还有不少，如绍圣元年（1094）南迁惠州途中在韶州写的《月华寺》。这首诗描绘了采矿活动对自然的严重破坏。月华寺三度焚毁，周边生态遭劫。此山因出宝而遭毁，地脉断绝，生态失衡。这一切，终将导致无数动物丧失家园，流离失所。“放生鱼鳖来”“荷花到处开”（《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会做东坡肉的苏轼却不忍杀生。他曾在文章里记录自己买鱼放生的事，程夫人不杀生，王闰之、王弗也有放生的举动。

动物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共情不仅是对它们的悲悯，更是人类道德的提升。关注自然生态，关注动物，是构建美好世界的必经之路。《五禽言》元丰三年（1080）4月作于黄州，描述了五种动物，分别寓意着不同的社会现实与人生境遇。其一“蕲州鬼”，身黑，嘴足俱白，声清急。其二“布谷鸟”（杜鹃），其“脱却破衲”的叫声被解读为农民凄苦生活的写照，寓意底层人民的艰辛与无奈。其三“快活鸟”，其鸣叫被解读为丰收后的喜悦与满足，寓意丰收与幸福。其四“蚕丝鸟”，“蚕丝一百箔”的叫声让人联想到勤劳的蚕农与丝绸生产的艰辛，寓意勤劳与奉献。其五“姑恶鸟”，其叫声被赋予了悲剧色彩，寓意家庭矛盾与不幸。尤其是“其一”说的“蕲州鬼”，“使君向蕲州，更唱蕲州鬼。”“我不识使君，宁知使君死”，“使君”原是对州郡地方官的尊称，此处指王禹偁。真宗时期，咸平四年，王禹偁由黄州知蕲州。上谢表曰：“宣室鬼神之对，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文，止期身后。”王禹偁一语成谶，至郡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苏轼自注：“王元之自黄移蕲州闻啼鸟，问其名，或对曰：此名‘蕲州鬼’，元之大恶之，果卒于蕲。”

结语

“随物赋形”是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应当像水一样，根据不同的环境和对象，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和风格。苏轼不仅以山水寓情，更以动物自况。他以蚂蚁喻人生之渺小与漂泊，于

困境中仍怀希望；以鸡鸣警醒世人，勿忘初心；以大雁南飞，述说离愁别绪；以惊弓之鸟鹊，叹生命之脆弱与坚韧。从“不鸣雁”到“干死萤”这些动物，不仅是自然之灵，更是苏轼心境之镜，映照其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之人生观。苏轼的“以物赋形”，不仅限于静物，更寓于动物之中，生动诠释了其文艺美学之精髓。

苏轼对动物死亡的描绘，蕴含着对死亡的哲学思考。这种宗教式的表达折射了苏轼悲天悯人的思想，亦为人性中美的存在。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冰冷裹挟的内心。苏轼通过动物死亡的形式，探讨了死亡的本质与意义。他以善和美作为突破口，为读者心灵注入一股从容而平缓的涓涓细流。中国古代贬谪史上，经历时间最长、地点最多，非苏轼莫属。在他看来，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而是生命旅程中的一部分。死亡既是生命的终结，也是新生命的起点。“独鹤有声知半夜，老蚕不食已三眠。”（《吴子野绝粒不睡》）苏轼通过描绘动物死亡后的景象，展现了死亡在生命循环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描绘不仅让人感受到死亡的残酷，更让人体会到死亡在生命循环中的美丽与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 苏轼全集校注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159.
- [2] 王文诰, 编注. 苏轼诗集: 第七册 [M]. 孔凡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78.
- [3] 孙奕, 撰. 履斋示儿编 [M]. 侯体健, 沈正兵,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50.
- [4] 周慧珍. 关于苏轼《黠鼠赋》的系年与题旨 [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4): 111–112.
- [5] 王文龙. 苏赋二题 [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 24(3): 1–5.
- [6] 刘泽. 鼠赋管见 [J]. 东方论坛, 2017(1): 15–21.
- [7] 王春煜, 耿建华, 邱达民, 编著. 东坡琼州诗文译注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1 : 26.
- [8] 林汉筠. 哭魂 [M].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 : 97.
- [9] 李赓扬. 苏轼生态伦理简论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 : 56.

The Death Writing and Life Consciousness in Su Shi's Animal Poetry

YANG Jingchun

(School of Education, Sichu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Meishan Sichuan 620000, China)

Abstract: The animal imagery in Su Shi's poetry is rich and diverse, and there are even delicate depictions of the forms of animal death. There are seven types of death: dying at dusk due to a short lifespan, dying from greed for bait, dying from irritability and suffocation, dying from sudden danger, dying from hunting or overfishing, dying from exhaustion and inability to scream or worship, and dying from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withering. These death writings reflect a strong sense of life consciousness, are an irreparable elegy for life, and a spiritual pursuit beyond death. The fate of animals is empathetic with humans, and there are subtle commonalities between animals and human life. The life and death of animals are like the ups and downs of life, full of impermanence and change. These images of death not only make readers feel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life, but also inspir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bout the essence of life.

Key words: Su Shi; animal poetry; death writing; consciousness of life

论明代小说中的“折子戏”

杨文琪¹, 池程远²

(1. 芜湖学院 人文教育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2.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 明代中后期, 随着昆腔传奇的成熟与市民文化的勃兴, “折子戏”作为一种新兴演出形态逐渐从全本戏中剥离, 并在小说文本中留下深刻印记。明代《金瓶梅词话》《梼杌闲评》等白话小说与《耳谈类增》《轮回醒世》等文言小说中的戏曲描写, 就包含了不少“折子戏”内容。明代文言小说多聚焦折子戏的仪式性功能, 如《耳谈类增》部分篇目借《金印记》选段讽喻世俗人情; 明代白话小说则侧重展现折子戏的娱乐属性, 如《金瓶梅词话》中“点戏”场景折射的观演互动。折子戏在小说中的多样化呈现, 既印证了其从祭祀仪式向商业演剧转型的历史轨迹, 亦揭示了晚明戏曲艺术“经典化”与“世俗化”并行的双重特征。这种文本互文现象, 为研究明代戏曲生态与叙事文学的互动提供了鲜活样本。

关键词: 明代; 文言小说; 白话小说; 折子戏

中图分类号: J8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5-0057-07

王安祈曾指出: “‘折子戏’是相对于‘全本戏’而言的。由于昆剧传奇剧幅甚长, 因此产生不演全本只摘片段的演出形式, ‘散出’在历经舞台锻炼后, 精益求精, 成为具表演特色与独立价值的‘折子戏’。”^[1]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刊印的中国古典戏曲与杂曲摘汇选刻本《风月(全家)锦囊》^[2]昭示着“折子戏”这种中国戏曲的特殊形式至迟在万历年间已经登上了戏曲演出的舞台, 而明代戏曲史料《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以下简称《迎神赛社》)^[3]的发现与展示则表明, 早在嘉靖年间, 具有极强表演属性的“折子戏”就已经成为娱人酬神的祭祀演出之重要组成部分。万历之后, 《乐府菁华》《八能奏锦》《吴歈萃雅》《月露音》等“折子戏”选本纷至沓来, 更昭示着这种戏曲演出形式在此时期的兴盛。而与“折子戏”流行相同步, 明代中后期的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也常见对“折子戏”的描写, 贯穿于小说叙事的方方面面。

“折子戏”其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才出现^[2]。对于本文论述而言, “折子戏”实际上是指具有现今“折子戏”意味的精选或经典散出。元杂剧分“折”并形成“四折一楔子”的惯例, 是经由明人修改并明晰的。钱南扬先生就指出: “盖宋金元时代, 戏剧还没有分出、折的习惯……凡是保持着本来面目的戏剧, 没有受到明人撺改的, 都是如此。”^[3] 曾永义先生则认为迨至万历年间, 一本杂剧分“四折”业已成为规律, 盖因万历所刊刻之剧本“没有不标明四折的”^[4]。对应地, 南戏分“出”也迟至嘉靖年间才在作为写本的剧本中明确标示出来。陈志勇认为宋元南戏的不分“出”至明中期传奇的分“出”, 传达的是剧本创作者、读者和演员戏剧观念的变化^[5]。因此, 在有明一代的笔记、杂著等文献记录中, “折子戏”都被其他称谓所指代, 甚至清代亦如此。如明嘉万年间潘允端就记“(万历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又小梨园串《伯喈》四折, 三更散”^[6]。冯梦桢

收稿日期: 2025-06-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小说中的文论话语整理及价值研究”(22BZW111)。

作者简介: 杨文琪(1989—), 女, 安徽合肥人, 讲师, 主要从事明清文学方面的研究。

① 关于《风月(全家)锦囊》选本的相关具体情况, 可参看孙崇涛:《风月锦囊考释》, 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 孙崇涛、黄仕忠笺校:《风月锦囊笺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此外, 王安祈指出,《风月锦囊》中除了全本收录之戏曲文本, 更有多达十九种“选粹之作”, 这些选粹散出应是舞台实况的反映, 也表明此书当为针对一般观众看戏时的需要而出版之作, 并非文人案头选编之书。

② 《迎神赛社》之价值在于, 它详细地记录了明中叶北方农村迎神赛社的礼仪和规则, 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活动、民俗活动和戏曲演出的关系。参见黄竹三:《我国戏曲史料的重大发现——山西潞城明代〈礼节传簿〉考述》, 收入《中华戏曲》(第3辑),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第149页。另, 从该文献第三部分所载内容来看, 其大部分属折子戏目, 达114种, 除部分本事不详的剧目外, 具体本事题材包括祈福吉祥仪式类12种, 历史题材类59种, 现实生活与婚恋伦理类26种。详参李慧:《〈礼节传簿〉: 考察明代折子戏演出之重要史料》,《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

记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月二十日的家班演戏，搬演《琵琶记》之经典出自：“晤朱之中，方病瘧，强起。徐生滋胄以家乐至，演《蔡中郎》数出，甚可观。”^{[7][17]}这里的“折”和“出”均是指代具有“折子戏”意味的散出。与此相对应的是，冯梦桢叙万历三十三年(1605)七月三十日下午，与诸亲戚为其子鵠儿病时“十保扶”偿愿，则“点《蔡中郎》，夜半而散”^{[7][18]}，演出时间之久，应当是整本演出。此外，孟称舜又以“杂剧”指代“折子戏”：“(小生)我白龙县，那有这些物件？唱的什么戏？(丑)唱的是《伯喈》《西厢》《金印》《荆钗》《白兔》《牡丹》《娇红》，色色完全。(小生)怎么做得许多？敢是唱些杂剧？”^[8]祁彪佳谓之“杂戏”：“演杂戏，尽优人之所长，子夜乃别。”^[9]清代《笔梦叙》中所记明隆庆年间进士钱岱所置私家昆班女乐：“附记演习院本：《跃鲤记》《琵琶记》《钗钏记》《西厢记》《双珠记》《牡丹亭》《红梨记》《浣纱记》《荆钗记》《玉簪记》。”上述十部戏本中，每次演出都精选一两出或三出剧目，开演时，王仙仙会将选定的戏折恭敬呈交侍御审阅，待其点头认可后，演员便登台演唱，侍御则伴着曲调专注聆听，若发现唱腔中有细微差错，便会立即召来两位女师进行校准修正^[10]。清初李渔则认为传统全本戏冗长，而折子戏又过于短小，当取折中之法，参照《元人百种》杂剧体例，适度延展为十至十二折的中型剧目，既可保留完整叙事架构，又适应晚明市民观剧的碎片化时间需求，实为戏曲商业化进程中的适应性改良策略^[11]。由以上所举数例可知，虽然在明末清初时期，“折子戏”已作为一种颇为流行的实践，但其也并未形成一种标准。陆萼庭先生就指出，折子戏从全本中拆出并被看作独立的艺术品受到社会瞩目，始于明末清初。然而，“那个时候，演戏必演全本的风尚，还是占着绝对优势，还是强有力地支配着整个剧坛”^{[12][19]}。即使在需要短时演出的整本戏搬演前的热身或搬演后的余温，也都有其他形式的替代，一如钱希言在《狯园》之《看戏鬼》中所写，众优伶为鬼演戏，整本《琵琶记》演出完毕后，还要“复饶《祝英台》《买胭脂》《跳猿》诸套数，终不散席”^[13]。以演唱“套数”来冲抵散席前的时间。作为实践的“折子戏”，在明末清初以前，只是剧本创作者、改编者、演出者和观众彼此之间的默契和延续。陆萼庭先生亦在复信王安祈时指出，“单出戏”是指能够独立

演出的片段，而“折子戏”则必带有“表演具代表性”之涵义^[14]。也就是说，戏曲选出的“经典性”和“代表性”也是其成为“折子戏”的重要因素。

一、明代文言小说中的“折子戏”之呈现

嘉万年间，文人王同轨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所作文言小说集《耳谈》(后增订为《耳谈类增》)中，记录了一则有趣的小故事：

吴中有僧，俗姓王，因兄登第，还俗已娶妇，而气遂骄纵，众鄙之。日，与同宴会，众谓优人曰：“王和尚颇作怪，汝能诮之否？”曰：“可。”因演苏子家招人起课算命，二人争课命钱。算命者曰：“汝小数命薄，能消受得几何钱？”起课者曰：“王和尚有成亲日，起课人无得运时。”满堂哄然，王逃席去。朗哉谈。^[15]

众人早已看不惯王和尚骄纵颐气的模样，便在堂会演戏时借机讥讽。由文叙“苏子家招人起课算命”剧情可知，刚好此时搬演苏轼的《金印记》传奇。剧中第七出《季子推命》与第三十七出《三叔得报》中，均有末白引用了“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16]一句。其谐音“王和尚有成亲日，起课人无得运时”刚好与王和尚的经历相仿，“无得运时”句又使王和尚受到了羞辱而无处发作，只好落荒而逃。《金印记》主要本《战国策》《史记·苏秦列传》等，以史为主纲，增枝添叶，共有四十二出，叙苏秦前途不顺，备受家人冷眼，后游说六国合纵而成，荣归故里。这样的长篇历史题材传奇剧作演出，在堂会宴席上演出整本是不现实的，借机讽刺席间人，久等至第七出、第三十七出亦极少见。因此，此处作为单出戏直接表演的可能性极大。结合“讥诮王和尚”的故事内核和“因演苏子家招人起课算命，二人争课命钱”之叙述，极有可能是通过提前谋划，利用“折子戏”短而精的表演，迅速完成既定目的。这句谐音嘲讽之语，也会随着堂会演出的“折子戏”迅速得到传播。

在《迎神赛社》第三部分中，以“胃土雉”^①为例，在这类冗长的仪式中，第四、五、六盏祭祀仪式因时间控制需要，已经明显具有“折子戏”的意味。如第四盏《贵妃醉酒》，编于明末，完成、付梓于清初，反映了明末流

^① “胃土雉”部分叙曰：“其宿女面人形，长角，兜青抹，黄衣窄袖，黑领白裙，右手执彩杖而坐。好食清鲁硬物。置下咸角策。〔高大石调〕，第三品，不行曲。此三星行一十四度。上居金牛宫；下临赵地。酉。队戏陈列于后。计开：前行说……第一盏，《万寿歌》曲，补空，《折花三台》；第二盏，靠乐歌唱，补空，《慢词》；第三盏，‘温习破’，补空，再撞再杀；第四盏，《贵妃醉酒》，补空，《玉莲投江》；第五盏，《张良卖剑》，补空，《相逢》；第六盏，《群送箫管》，补空，《太安寺设宴》；第七盏，合唱，收队。正队《尧王舜子登基》；院本《三人齐》；杂剧《姜威九伐中原》。”具见寒声、栗守田等：《〈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注释》，收入《中华戏曲》(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3页。

行的剧目^[17]。《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所载的青阳腔剧本《杨妃醉酒》证明,此《贵妃醉酒》篇幅不长、剧情简洁明晰、适合搬演,具有“折子戏”的意味。《玉莲投江》出自《荆钗记》,《张良卖剑》出自《千金记》,《相逢》可能为《幽闺记》之一出。《群送箫管》《太安寺设宴》皆为当时的“折子戏”。

由以上之例推知,万历三十五年(1607)宋懋澄的文言小说《九籥集》中,关于“折子戏”的叙述就更为可信:

酒初献,止乐,教坊官致辞毕,有优人戴判官面目而上,手持数笼,两绮服人从傍赞辞,判官持笼,照耀数番,提一寿星出,复纳其中,籙弄再三,若复有所出,竟杳然而下。二献,则上弦索调:唱“喜得功名遂”,乃吕圣功破窑记末出也……七献,奏细乐,止献,先彻榜首五卓,每彻一卓,则榜首之头渐露少许,由此思之,当优人演剧,榜首直埋头于果间耳。^[18]

此处作者写其偶然参加顺天府宴状元之公宴,恰好遇到“迎神赛社”之变体“七献”仪式。与《迎神赛社》所记录的繁琐程序相比,此处较为简略,仅有“七献”,但每一“献”的程序与内容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在“二献”时搬演了《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第二十九出(末出)《团圆封赠》,这与宴会主题“宴状元”相符。不论从时间、程序还是内容安排上来看,选择这一出作为“折子戏”都极为合理。这反映了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以及应用情境的不同,“供盏献艺”也会有所变化与革新。陆萼庭先生认为,“折子戏”从全本戏演出中脱离开来独立演出,即从“全本”走向“散出”,需要经过一番历史的演变^{[12][19]}。而《顺天府宴状元记》中所叙内容,则可视作“折子戏”的一种“苗头”。

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轮回醒世》中叙写了嘉靖时一个因演戏装扮而误杀妻的故事:

陶济,会川人也。妻陈氏,善音律,多丰韵,每欲逢场作耍。济因妻颇有逸兴,恐与人私,而提防甚紧。济他往,陈氏邀邻女作伴,教以曲,且为之扮演,自穿衣巾,扮蔡邕,邻女扮赵五娘,演长亭送别。要至更深,不觉体倦,未及灭灯,两人共枕,和衣而

寝。济即晚回家,推门而进,见房中银缸未灭,揭帐视之,见男女同枕,乃怒曰:“一向见彼体态风流,防其淫垢,不想今晚做出来也!”急持刀向冠巾者肋下刺入,而陈氏乱跳,邻女亦惊起。及陈氏仆地,济视之,乃(伊)(依)妻也,抱持痛哭,亦云晚矣。^[19]

作为《琵琶记》中的精彩剧情之一,“长亭送别”在万历年间的多部戏曲选集中均有收录,如《乐府玉树英》《乐府菁华》《大明春》《玉谷新簧》《摘锦奇音》等。陈氏教演“长亭送别”,其演本可能沿袭了元本《琵琶记》之“伯喈夫妻分别”,这体现了普通戏曲表演爱好者对“折子戏”的“经典性”和“代表性”的认可。此外,由于“离别之曲”符合人们“离愁书写”的审美需求和心理惯性,加之明中后期以来“主情”的文学思潮影响,该剧目得以广泛传播^[20],并最终形成“折子戏”,被收入各类折子戏选本和戏曲选本。

二、明代白话小说中的“折子戏”之呈现

在明代的白话小说中,关于“折子戏”的叙述多集中在万历年及以后。万历年间,孙高亮的白话长篇历史传记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中,已能看到带有“折子戏”意味的描写:

明日,石亨即设筵相诸王、于二公,二公亦各欣然而至。亨大开东阁,盛馔丰肴。食前方丈、优人、杂剧,迭相演戏,自午至申。石亨又令换席后堂,复邀二公进内款宴。仍命一班女乐,吹唱劝酒。^[21]

此处叙及石亨宴请王直、于谦,并有方丈、优人、杂剧搬演者,从午时到申时,在席前交替演戏。作者孙高亮,万历前后在世,虽然是书主要围绕于谦个人的命运和遭遇展开,但也融入并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经验。从席前演戏的描写来看,不同的演员在五个小时之内“迭相演戏”,也只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折数或出目。

对嘉靖、万历年间的戏曲活动叙述甚详、最为集中的白话小说当为《金瓶梅词话》。前人对相关戏曲史料已述备完善,兹不赘述。以下仅列出其中明确标示出搬演剧目、非清唱且以“折子戏”形态演出的内容,见表1。

表1 《金瓶梅词话》中的“折子戏”演出情况一览表

序号	回目	剧目及折目 / 出目	内容
1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拜娘认女 应伯爵打浑趁时	明《韩湘子升仙记》四折	教坊呈上揭帖,薛内相拣了四折《韩湘子升仙记》,又陈舞数回,十分齐整。薛内相心中大喜,唤左右拿两吊钱出来,赏赐乐工。 ^{[22]368-369} (1)西门庆令后边取女衣钗梳与他,教书童也妆扮起来。共三个旦、两个生,在席上先唱《香囊记》……饮酒中间,唱了一折下来……蔡状元又叫别的生旦过来,亦赏酒与他吃。因分付:“你唱个〔朝元歌〕‘花边柳边’。” ^{[22]430} (2)安进士令荀子孝:“你每可记的《玉环记》‘恩德浩无边’?” ^{[22]430}
2	第三十六回 翟谦寄书寻女子 西门庆结交蔡状元	(1)明邵璡《香囊记》之《途叙》 (2)明杨柔胜《玉环记》之《延赏赞皋》	

续上表

3	第五十八回 怀妒忌金莲打秋菊 乞腊肉磨镜叟诉冤	元《韩湘子引度升仙会》	下边乐工呈上揭帖，到刘、薛二内相席前，拣令一段“韩湘子度陈半街”《升仙会》杂剧。才唱得一折，只听喝道之声渐近，平安进来禀报：“守备周爷来了。” ^{[22]712-713}
4	第六十三回 亲朋祭奠开筵宴 西门庆观戏惑李瓶	明杨柔胜《玉环记》	下边戏子打动锣鼓，搬演的是“韦皋、玉萧女两世姻缘”《玉环记》……须臾，打动鼓板，扮末的上来，请问西门庆：“小的‘寄真容’的那一折唱罢？”西门庆道：“我不管你，只要热闹。” ^{[22]808-810}
5	第六十四回 玉箫跪央潘金莲 合卫官祭富室娘	(1)元永嘉书会才人《刘知远白兔记》 (2)元《韩退之雪拥蓝关记》	两位内相看了一回，拣了一段《刘智远红袍记》。唱了还未几折，心下不耐烦，一面叫上唱道情去，“唱个道情儿要到好”。于是打起渔鼓，两个并肩朝上，高声唱了一套“韩文公雪拥蓝关”故事下去。 ^{[22]817-818}
6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吴月娘听宣黄氏卷	明姚茂良《张巡许远双忠记》	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厨役割道汤饭，戏子呈递手本，蔡九知府拣了《双忠记》。演了两折，酒过数巡，宋御史令生、旦上来递酒。 ^{[22]988}
7	第七十六回 孟玉楼解愠吴月娘 西门庆斥逐温葵轩	明沈采《裴度香山还带记》	先是教坊间吊上队舞回数，都是官司新锦绣衣装，撮弄百戏，十分齐整。然后才是海盐子弟上来磕头，呈上关目揭帖。侯公分付搬演《裴晋公还带记》。唱了一折下来，又割锦缠羊。 ^{[22]1033}
8	第七十八回 西门庆两战林太太 吴月娘玩灯请蓝氏	明朱有燉《小天香半夜朝元记》	当下林太太上席，戏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记》。唱了两折下来，李桂姐、吴银儿、郑月儿、洪四儿四个唱的上去弹唱——吴大娘门外先起身去了——唱灯词“锦绣花灯半空挑”。 ^{[22]1095}

由表 1 所列，《金瓶梅词话》创作时期的“折子戏”演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演出的随机性强。仅从上述几例便可推知，嘉万年间涉及堂会演出“折子戏”时，往往要依照观演者的个人好恶，由其随机支配。如薛内相、蔡状元、安进士们均先从揭帖中依喜好选择戏码，再进一步选择具体出目，并且可以随意更换、中止演出。这实际上仍属于传统“观众点戏”当中的“当场点戏”。第二，演出的剧种类型较为分散。在剧种上，既有戏文，亦有杂剧。甚至薛、刘二内相听唱戏文不耐烦，还令停演，改换为唱道情。第三，演出的剧目主题类型较为集中。在散出搬演的剧目中，主要有婚恋爱情类的

戏和历史演绎类的戏。如果将小说中所有清唱的剧目囊括进来，这种分类则更加明显。第四，演唱的声腔主要是海盐腔。如西门庆为薛、刘二相安排近所流行的海盐子弟，反而被薛内相称为“蛮声哈刺”^{[22]817}。当时，只有清人刘廷玑提到“西江弋阳腔、海盐浙腔犹存古风，他处绝矣”^[23]，弋阳腔与海盐腔分庭抗礼。从小说中西门庆总用海盐班来看，海盐腔逐渐占据上风。

可见，嘉万时期“折子戏”这种演出形态尚处于探索阶段和模糊状态，会因不同的演剧情境产生不同的演出策略。到了天启、崇祯年间，白话小说中关于“折子戏”演出的描述越来越多，兹录于下，见表 2。

表2 天启、崇祯年间白话小说中的“折子戏”演出情况一览表

序号	小说名称	回目	剧目及折目 / 出目	内容
1	梼杌闲评	第三回 陈老店小魏偷情 飞盖园妖蛇托孕	(1)明高濂《玉簪记》之《听琴》 (2)明《霞笺记》之《追赶》 (3)明周朝俊《红梅记》之《问状》	一娘要奉承奶奶欢喜，遂道：“小的告罪了，先点一出《玉簪》上《听琴》罢。”他意中本是要写自己的心事燥燥脾，别人怎知他心事。又有个杨小娘，是王尚书的小夫人，道：“大娘，我也点出《霞笺·追赶》。”大娘笑道：“你来了这二年，没人赶你呀！我便点出《红梅》上《问状》，也是扬州的趣事。” ^[24]
2	石点头	第四卷 瞿凤奴情慾死盖	明《彤弓记》之《李巡打扇》	顾进士没奈何，只得下马，走过圣庙，心中老大不快。到了城外，戏子已到，正戏完了，又点找戏。顾同寅见单子上有本《彤弓记》，一时酒兴，又触起过祠基下马的气来，遂点了一出《李巡打扇》。 ^[24]
3	关帝历代显圣志传	绿鳌城斩且解贼围	(1)元南戏《刘知远白兔记》之《李三娘挑水》 (2)明陈洪绶《姜诗跃鲤记》之《安安送米》	这猢狲虽是畜类，善解人意，听了花子曲儿，便去开笼，取脸子戴上，扮一个李三娘挑水……正当戏耍之际，恰好孙三郎也撞过来。这猢狲又换了一出，安安送米，装模做样，引得众人齐笑。 ^[25]
4	鼓掌绝尘	月集·第三十九回 猛游僧 力擒二贼 贤府主看演千金	明沈采《千金记》之《仙人赠书 赠剑》《萧何月下追韩信》《拜 将登坛》	赶会的也相邀去庙中看搬戏，将将半，内演一出《关公斩貂蝉》。 ^[26] 只见那几个做会首的，与那个扮末的，执了戏帖，一齐同到关圣殿前，把阁逐本阁过，阁得是这一本《千金记》。众人见得关圣要演《千金》，大家缄口无言，遂不敢喧哗了。此时笙箫盈耳，鼓乐齐鸣，先做了《八仙庆寿》。庆毕，然后三通锣鼓，走出一个副末来，开了家门。第二出做出《仙人赠书赠剑》，直做到《萧何月下追韩信》《拜将登坛》，人人喝采，个个称扬。 ^[27]

续上表

5	弁而钗	情烈记·第二回 云天章物色英雄 文雅全情输知己	明梁辰鱼《浣纱记》之《效颦》	文生道:“兄为弟弃家至此,弟今搬演一出佐饮,何如?”云生道:“怎好相劳?”文生道:“何妨。”遂改妆,做西施病心,宛然一西子也。云生见他冶容艳色,雅致翩跹,也有几分动念,却不出露。 ^[28]
6	醋葫芦	第十回 伏新礼优觞祸酿弄虚脾继立事谐	无剧目	逡巡之间,戏已做散,席中男女,人人喝彩,个个称赞……成茂又恐院君激怒,只得走入戏房,对那扮外、扮小生的道:“先生,你请回了罢,我家院君有些怪你。”二人道:“怪我们甚的?”成茂道:“院君怪的是颜老官、韩太斗,不怪足下,你只是去了罢,白银一钱,聊代酒饭。”二人落得少了找戏,欣然而去。其余戏子,又找了几出杂剧。酒客散回不题。 ^[29]
		第十二回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	明徐复祚《一文钱》(《财痴》)第一折	云生近前一看,演的是《四大痴》传奇,正好卢至员外与妻子唱那《懒画眉》道:几时得奇珍异宝万斯箱,金玉煌煌映画堂……云生看得大眼直。看完了,天色已黑。 ^{[30][31-35]}
7	欢喜冤家	第续二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1)明《醉写赤壁赋》 (2)明沈自晋《翠屏山》	王进士道:“本末的不过内中几出有趣,倒不若拣几出杂剧一演,可好?”苏院道:“绝好。”王进士遂拣了几出苏东坡游赤壁的故事,一来取苏字与苏院姓同;二来取佛印禅师与东坡共乐,欲要了然明日到苏院衙中去,好生看待之意……苏院取过一看,拣了那《翠屏山》内海阁黎奸潘巧云的故事,与王进士拣的大不相合。 ^{[30][39]}

由上述列表内容可知,天启、崇祯这一时期,“折子戏”的演出更为频繁,也潜移默化地被这一时期小说创作者纳入叙事内容之中,因此关于“折子戏”演出的情况也得到了更多的呈现。在小说中,这一时期“折子戏”演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戏码的编制上,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标准,昭示着剧目散出的经典化已经初步完成。此外,伴随着这一时期戏曲选本的蜂出,戏班对“折子戏”的演出已经有了充分而主动的准备,观众也有了更多选择。第二,在演员的表演上,演员能够独立自主地对经典散出进行表达和阐释,如《弁而钗》中文生主动演出《浣纱记·效颦》。第三,在演出的程序上,“折子戏”仍主要属于“找戏”的范畴,整本戏的演出仍是完整戏曲演出的主要部分。

陆萼庭先生曾指出,明末时期,散出戏还是“新鲜的玩意儿”,适合时间不及的临时应酬。此外,由于全本戏曲的创作周期较长,跟不上演出的频次,只能从名剧中摘经取典,以几种单出的演出组成一台戏,以满足观众欣赏需要^{[12][201-202]}。但是,这显然低估了彼时戏曲受众对“折子戏”的主动接受和喜爱程度。例如,在《七曜平妖传》第十七回《明劫峰县》中,作者叙嵇光先一等人欲劫城,透露了天启年间民间文艺繁荣生长的土壤:“却好初七日该县前集,各人装扮停当,也有为商的,也有为客的,也有斯文的,也有公差的,也有挑柴的,也有做货郎的……也有说书的,也有唱词的,也有斗鸡的,也有走马的,也有打拳的……”^{[31][117-120]}在逢集之日,各类民间文艺从业者纷纷聚集街头,通过各种手段,招徕人们前来观看,裴道人与女儿裴月娥一等人便装作走马卖解、踩软索的,仅靠口里念评话,便聚集了一众人等,裴月娥“脱了海棠红罗披风

儿,窈窕窕窕,扭扭捏捏,含羞带俏,走在场中,你说何人不爱他!便就似要蹉软索的腔儿,就引了无数人来看……”^{[31][121]}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指明逢集就有人登台唱戏,但从其所描写“说书”“唱词”“口中念着评话儿”等就能引人驻足之类场面来看,“折子戏”作为大众喜爱的戏曲作品的精华形态,在民间不仅广泛传播,而且已经有了群众基础,业余演戏主要是以“折子戏”的形式进行。因此,“折子戏”在下一个阶段的繁荣是可以预见的。

三、作为戏曲传播的“折子戏”

明代中后期以降,由于“极端的中央集权统治对地方的严密控制日趋削弱、软化、松动”^[33],社会风气由严肃转向活泼,加之商品经济的兴起,人民群众对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求也是罕见的。于是戏曲艺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折子戏”也在这样的土壤中逐渐成长并最终在清代繁荣与壮大。明万历年以来,文人笔记、日记中均有大量记载“折子戏”相关史料的内容。例如,冯梦龙在万历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87—1605)记录的《快雪堂日记》,袁中道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记录的《游居柿录》,以及潘允端在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586—1601)记录并包括大量“折子戏”演出信息的《玉华堂日记》等。天启、崇祯年间,有张岱最晚于弘光二年(1646)完成的《陶庵梦忆》,以及祁彪佳崇祯四年至弘光元年(1631—1645)所记的《祁忠敏公日记》等。它们的特点在于详实地记录了个人参与或听闻的彼时戏曲演出实况,包括演员、搬演场合、

剧目等。相比前朝的《青楼集》，这些记录更加详尽。例如，潘之恒在《鸾啸小品》和《亘史》中还探讨了戏曲表演的经验，对金娘子和“醉张三”的表演均有详细描述。但是，这种实录性质的日记或笔记，一方面具有私密性和迟滞性，如《陶庵梦忆》在成书百余年后才首次刊行；另一方面所记内容较为简单且带有强烈的个人好恶色彩，如潘允端万历二十年（1592）所记：“（五月）初七日：（郡城）未，有吴郡子弟来靠，试串戏二三出，甚不佳，遣之。”^[34]有学者指出，“《（玉华堂）日记》记述简略，缺少对具体演出过程及艺人生平的阐述”^[35]，因此对“折子戏”的传播影响力有限。陈大康先生形容《金瓶梅词话》时曾言，作品以西门庆家族为核心，通过刻画其与官员、商人、僧侣、帮闲等各色人等的复杂往来，生动地再现了晚明社会的市井百态。妻妾争宠、权钱交易、宗教渗透等情节，不仅展现出传统伦理的瓦解与金钱势力的崛起，更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嘉靖至万历年间社会风气的剧变轨迹。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使读者得以透过一个豪商家庭的兴衰，窥见整个时代的浮世绘卷^[36]。

相比之下，明代中后期的白话小说，能够用鲜活的笔触写出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事件，较日记、笔记更有感染力，在“折子戏”的传播上，也就天然地具有优势。例如，明末清初白话小说《十二笑》第五笑之《溺爱子新丧邀串戏》中，叙写了一个被父母溺爱，又喜串戏，甚至父亲死了也要去演《西厢记》数出的赛宝儿：

习伯善得了其母口气，同着这班串戏朋友……
取出其新制衣妆，替宝儿立时脱换起来……奈宝儿自幼失教，毫不以为非，泰然登场，直做到《附荐》一出。^[37]

《附荐》一出应为《西厢记》之“折子戏”，源自《南西厢》第六出之《邂逅邀红》，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较流行的“折子戏”选本中均未见，而嘉靖重刊本《风月锦囊》中则有“五、夫人设斋·生求附荐”^[38]一出。小说充分吸收了戏曲材料的相关内容，通过将“戏曲活动作为生活材料汇入到小说的场景描述中”和将“戏曲曲词作为语言材料汇入到小说的话语表达中”^[39]两种手段，将演员的妆造服饰、剧目内容以及习伯善一伙串戏朋友的帮闲戾气、赛宝儿的优柔寡断与狠心不孝、看戏观众的揶揄嘲笑以平铺式描写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出来，描绘出一幅令人深思的复杂画卷。尤其是看戏人所说“真眼泪没有得出，假眼泪何处得来”一句，令《西厢记·附荐》这出“折子戏”的内容与赛宝儿人物形象在戏里、戏外融为一体，并随着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形象牢牢印刻在读者的脑海里，起到了文人笔记、日记所难以企及的传播效果。

明中后期以来，随着商贸往来的兴盛，各地逐渐形成了贯通南北的商业网络。城际间商货往来络绎不绝，商人、工匠等流动人口穿梭其间，不仅带来了各类商品，更让最新资讯、技术等得以快速传播。频繁的物资与人员流动，像一条无形纽带，将散落的中国大地紧密联结成一个具有活力的整体^[40]。万历年间，官员伍袁萃就曾表示，近来世道人心愈加险恶，吴中地区尤其严重。那些在官府和乡绅富豪中稍不得志之人，便遭旁人编造歌谣或创作传奇戏文诽谤与讥讽，还有人引用“四书”语句编织时务策论来作为攻击手段。更甚者，中央和省级官员的公文竟采纳这些诬陷之词写入弹劾奏章，难怪这股歪风邪气日益猖獗、无法遏制^[41]。这可能是明中后期以来小说、戏曲传播带有负面色彩的一种生动写照了。

参考文献：

- [1] 王安祈.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王安祈卷 [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84.
- [2] 戴申.折子戏的形成始末：上 [J]. 戏曲艺术, 2001(2): 29–36.
- [3] 钱南扬.戏文概论 [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53.
- [4] 吴国钦, 李静, 张筱梅, 等.元杂剧研究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300.
- [5] 陈志勇.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与戏曲史意义 [J]. 文艺理论研究, 2024, 44(3): 66–76.
- [6] 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11.
- [7] 冯梦桢, 撰.快雪堂日记 [M]. 丁小明, 点校.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 [8] 孟称舜, 著.孟称舜戏曲集 [M]. 王汉民, 周晓兰, 编集校点. 成都：巴蜀书社，2006：434.
- [9] 祁彪佳, 著.祁彪佳日记 [M]. 张天杰, 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407.
- [10] 佚名, 著.笔梦叙 [M]. 王文濡, 编.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11] 李渔, 著.闲情偶寄 [M]. 江巨荣, 卢寿荣, 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92.
- [12] 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 [13] 钱希言, 著.猿园 [M]. 朱保群, 点校.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405–406.
- [14] 王安祈.传统戏曲的现代表现 [M]. 台北：里仁书局，1996：50.
- [15] 王同轨, 撰.耳谈类增 [M]. 吕友仁, 孙顺霖, 校点. 郑州：中原古籍出版社，1994：305.
- [16] 佚名, 撰.金印记 [M]. 孙崇涛, 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8：12.
- [17] 陈多.剧史新说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87.
- [18] 宋懋澄, 撰.九籥集 [M]. 王利器, 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1–32.

- [19] 无名氏,撰.轮回醒世 [M].程毅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56.
- [20] 赵继红.《琵琶记》“离别之曲”的明清传播及范式意义 [J].中华戏曲,2019(1):133—143.
- [21] 孙高亮,著.于少保萃忠全传 [M].孙一珍,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41.
- [22] 兰陵笑笑生,著.金瓶梅词话 [M].陶慕宁,校注.宁宗一,审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23] 刘廷玑,撰.在园杂志 [M].张守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89.
- [24] 佚名.梼杌闲评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5—26.
- [25] 天然痴叟,著.石点头 [M].弦声,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81.
- [26] 穆氏,编辑.关帝历代显圣志传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06.
- [27] 金木散人,编著.鼓掌绝尘 [M].刘蕊,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470.
- [28] 醉西湖心月主人.弁而叙 [M].台北: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216.
- [29] 伏雌教主.醋葫芦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34—335.
- [30] 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31] 清隐道士,编次.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传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32]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55—256.
- [33] 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7.
- [34] 李慧.折子戏研究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81.
- [35] 赵景深.戏曲论丛:第1辑 [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149.
- [36]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415.
- [37] 墨憨斋主人.十二笑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43—244.
- [38] 孙崇涛,黄仕忠,笺校.风月锦囊笺校 [M].北京:中华书局,2000:351.
- [39] 徐大军.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史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32—334.
- [40] 王鸿泰.明清的资讯传播、社会想象与公众社会 [J].明代研究,2009(12):41—92.
- [41] 伍袁萃.林居漫录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4.

On the “Zhezi Opera” in Novels of the Ming Dynasty

YANG Wenqi¹, CHI Chengyuan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Wuhu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of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with the maturity of Kunqiang Chuanqi (昆腔传奇) and the flourishing of civic culture, “Zhezi Opera” (折子戏) as a new form of performance gradually separated from the entire play and left a profound imprint in the novel text. The depic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in vernacular novels such as *Jinpingmei Cihua* (金瓶梅词话) and *Taowu Xianping* (梼杌闲评)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s well as in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such as *Ertan Leizeng* (耳谈类增) and *Lunhui Xingshi* (轮回醒世), contain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Zhezi Opera” content.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of the Ming Dynasty often focused on the ceremonial function of opera pieces,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passages from *Jinyin Ji* (金印记) in *Ertan Leizeng* to satirize secular emotions; The vernacular novels of the Ming Dynasty focused on showcasing the entertainment attributes of excerpts, such as the interactive viewing and performance reflected in the “Dianxi” (点戏) scene in *Jinpingmei Cihua*. The diverse presentation of opera in novels not only confirm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sacrificial ceremonies to commercial performances, but also reveals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ic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of late Ming opera art. This intertextual phenomenon in texts provides a vivid sample for study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cology of Ming Dynasty opera and narrative literature.

Key words: Ming Dynasty;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vernacular novels; Zhezi Opera

明清诗歌视域中的德州运河区域多维图景探析

崔秀霞

(德州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 明清时期, 德州本域及南来北往的文人为德州运河区域写下了大量诗歌。诗歌内容涵盖了大运河德州区域的平原弯道水利景观和自然风貌图景, 漕运兴盛、商业繁荣的运河经贸文化图景, 追求“崇文尚学”“高洁自守”等儒家精神特质的文人生活图景, 以及德州农人虽有宁静、欢悦但充满忧虑、艰辛、苦难的生活图景等。由此, 德州运河区域在明清两代诗人的笔下呈现出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多维度立体空间图景。

关键词: 明清诗歌; 德州运河; 多维图景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5-0064-06

德州自古就是水系丰沛之地, 大禹所疏九河流经于此, 形成了水网密布、河渠纵横的自然风貌。至隋代运河的开通, 特别是明、清时期, 大运河承担起南粮北运的重任, 极大地促进了沿运河城镇的发展, 德州凭借区位优势发展成交通、军事要冲, 成为运河沿岸的著名商埠, 堪称水上通衢。南北文化在此碰撞交流, 造就了独特的北方水乡风貌及德州运河文化。南来北往的文人及当地文人写下了大量描绘德州运河的诗歌, 勾勒出丰富而立体的德州运河多维图景。本文将从德州运河的自然地理、经贸文化、文人生活及农人形象与生活四个维度切入, 探讨明清诗歌视域中运河书写所构建的多维度、立体性的空间图景。

一、明清诗歌中德州运河的地理、自然要素系统与图景呈现

地形、水文、气候等各种自然地理因素, 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的功能和发展。乾隆《德州志·序》中说:“德州地皆平壤, 无山而有水, 自唐迄明, 河之经流在此, 自元至今, 粮储之輶运由此, 水利最为要务。”^①德州是典型的黄河冲击平原, 无山而多水, 是一个因河而

生、因河而兴的城市。今德州境内的运河由卫运河与南运河组成, 卫运河在四女寺闸处形成了一河三分的形状, 南运河段的弯道甚多, 以弯代闸, 曲折盘桓, 呈现出“九曲十八弯”的龙形走势, 形成独特的平原弯道水利景观。明代万历五年(1577)进士顾绍芳《舟行即事》中说:“生憎卫河水, 十步九成弯。”^②

史志记载, 德州有禹之九河流经, 但在明清德州运河诗歌中“九河”多代指德州地域的水系, 不是确指某河。乾隆《德州志·序》中说:“独不想水性靡常, 一时有一时之故道。夫既曰故道, 则水不由此中行, 势必变为桑田, 年近则犹有河形, 年远则形迹全无, 岂有千百年后之桑田, 犹得确指为千百年前某水故道也?”说得理性且客观。明清时期的德州运河诗歌中“九河”等地理要素频频出现, 如:“纵横皆积水, 莫辨九河流”^③, “千乘旌旅分羽卫, 九河春色护楼船”^④, “片片云帆落槛中, 层楼高瞰九河通”^⑤, “三时快雨来千里, 一夕清风徧九河”^⑥, 等等。

德州地处鲁西北平原, 这样的北方城镇, 农田广阔, 一望无垠, 树木葱郁, 花鸟繁隽, 明清诗人特别是本地诗人留下大量的德州运河流域自然风光诗。此类诗歌的德州本土代表性诗人主要有程先贞、田雯、田需、

收稿日期: 2025-06-30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明清诗词中的德州运河‘画卷’”(2024DZZS019)。

作者简介: 崔秀霞(1973—), 女, 山东德州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地域文化研究。

① 德州志·序 [M].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

② 夏津县志: 第 3 册 [M]. 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本.

③ 曹贞吉, 撰. 雨后行德水道中 [M]//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133 册 朝天集.

④ 李攀龙, 撰. 赠李明府暂诣广川, 奉送景王之国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 第 110 册.

⑤ 德县志: 卷十五 艺文志 [M]. 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⑥ 程先贞, 撰. 海右陈人集 [M]//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25 册.

萧惟豫、谢重辉等人。诗人们自会攫取具有地方特征的自然意象要素来呈现当地的自然图景。明清德州自然风光诗歌中的意象既是德州运河的常见物象，同时也展现了德州作为北方水城的独特性。以德州春光诗为例，诗人们多选择具有地方特征的自然物象入诗，如高树类：杨柳、高榆、桑枝、梧桐等；果木类：红桃、紫李、杏林、榴花、梨树等；花草类：碧荷、蒹葭及北方平原春天多种多样的花草等；农作物类：麦、葵菽、菜花、瓜果等，另附加与此类自然物象相关的豆架、瓜棚；还有各种鸟儿在树枝花间相鸣，如：黄鹂、黄莺、燕子、斑鸠等。这些诗又多同时伴有流水、烟霞等自然之景，有水就有了灵动之气，有烟霞就多了朦胧之美。这样的诗句俯拾皆是：“长河春日涨春水，两岸红桃无数花。春分流水柴门外，满种垂杨十万株”^①，“绿柳藏村舍，红桃出短墙。蒙蒙天际雨，阵阵菜花香”^②，“寻春携得酒盈樽，路接桃花水接村”^③，“出郭幽寻步履闲，鸟声格磔水潺湲。路经白雪黄桑裏，人在红桃绿柳间”^④，“十里河堤柳色深，落花随水半浮沉。茫茫四野水，水鸟掠风帆”^⑤，等等。诗中此类自然物象繁复，相互叠加，多带有一种欣欣生意。诗人们在诗中极力渲染德州春季美景，呈现的大都是平原大地一片春光明媚的图景：依水成烟，杨柳风微，杏花小雨，桃李争艳，麦田菜花，众鸟争啼，鱼游清波。德州风调雨顺之年，只是麦、谷、豆、葵、瓜等各种农作物的欣欣生意，已是满眼风光，又加之农田乃至屋前檐后，遍栽杏、梨、桃、李等各种北方果木，春季成为德州最为惊艳的时节。诗人的意象是“自我”揭示，这些诗歌意象系统明显带有诗人们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痕迹，诗人们在这一类的诗歌中体现的无不是对德州的热爱，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惬意与欢欣。

麦可以说是德州由春至夏最主要的农作物之一，因此在德州诗歌中屡屡出现，如谢重辉《介石约往云庄看花不果行却寄》中说：“麦苗剗剗春画长，千村万落生春光。”^⑥“剗剗”二字极好，写出初春时节刚刚返青的麦苗碧绿油亮的特征，春天一到，触目所及，全是闪烁着光芒的麦苗，“春画长”的场景宏大而又充满希望，抓住了北方平原地区最具特征性的春景。另如：“南来见麦田多，芃露芊芊缘颤姿”^⑦，“青郊麦秀摇晴浪，所

幸占秋两省连”^⑧。明清德州诗歌中还屡屡提到“打麦”及“打麦”时的忙碌。如“种瓜课仆浇畦去，打麦登场拄杖来”^⑨，“饭牛刍草农多事，打麦摊场妇亦忙”^⑩。诗人笔下还写了收麦之时的欢乐，如谢重辉《观麦》中：“揽衣繙绤轻，流盼小麦熟。”^⑪冯挺槐《夏日书怀十首》中：“小麦盈箱唱满村，还来毛雨牧鸡豚。”^⑫

北方德州的冬季最为萧条，诗人们笔下满是冰雪与寒意，田需《冬日六首》：

十日轻云雪未晴，巡檐冻雀狎寒盟。澄缸腊酒冰纹裂，暖屋梅花笑靥生。^⑬

冬日连下大雪，诗人以幽默的笔触写麻雀也惧怕寒冷，背弃盟约，不再出现。酒缸中的腊酒结冰后又被冻裂，现出裂纹，好在屋中还是温暖的，梅花绽放如笑脸一般，别有一种韵味。德州冬季就是雪大风大天寒，如冯挺槐《东村四绝句》其三：“一夜大风三尺雪”；其四：“黄叶村中白板扉，雪花如掌扑人飞。”^⑭田同之《西圃四时咏》其四：“岁晚北风号，寒圃无静木。百卉感凋零，一室嗟瑟缩。”^⑮即使如此，诗人们总能在自然风光中找到诗意，如田同之《雪后即事》：

雪后情何剧，闲庭落景赊。曦光澹林表，溜响倦檐牙。

阴岭诗中句，残冰径外花。憑教笑寒乞，清韵落吾家。^⑯

诗中“阴岭诗中句”指唐代祖咏的《终南望余雪》一诗，王士禛在《渔洋诗话》中，把这首诗称为咏雪的“最佳”作。田同之此诗有声、有色、有远景、有近景、有诗典，虽不及祖咏之诗，确也写出德州冬景神韵。特别是“曦光澹林表，溜响倦檐牙”二句尤为凝练，雪后庭院中的曦光轻洒林梢，融雪从房檐滴落之声不停，正是德州冬季的典型景致，足以唤起读者记忆，产生共鸣。最后两句乃诗中情语，诗人于此寒意之中找到“真乐”，淡雅至极。

明清诗人笔下的这些诗歌，以德州运河区域独特的弯道、九河、杨柳、红桃、碧荷、蒹葭、麦田、冰雪等意象要素，向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大运河德州区域的平原弯道水利景观和因河而生的北方水乡自然风貌图景。

① 田雯，撰，古欢堂集·山姜诗选：卷三 [M]// 清代诗文集汇编：138 册 . 康熙乾隆间刻本 .

② 萧惟豫，撰，但吟草：卷五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49 册 . 康熙五十年(1711)刻本 .

③ 田霖，撰，鬲津草堂诗·鬲津堂绝句诗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 254 册 .

④ 田同之，撰，砚思堂诗文集·砚思集(卷四)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39 册 .

⑤ 宋弼，撰，山左明诗抄：卷二六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 412 册 .

⑥ 谢重辉，撰，杏村诗集·戊子诗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72 册 .

⑦ 爱新觉罗·弘历，撰，御制诗三集：卷九五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24 册 .

⑧ 爱新觉罗·弘历，撰，御制诗二集：卷二七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20 册 .

⑨ 田需，撰，水东草堂诗 [M]// 德州田氏丛书：第 13 册 . 康熙乾隆间刻本 .

⑩ 冯挺槐，撰，冯舍人遗诗：卷六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 252 册 .

二、明清诗词中德州运河的漕运经贸文化图景

明永乐九年(1411),州治移至卫城之内,自此四方商旅云集城内,德州由一个政治、军事城市,化身为一个漕运兴盛、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德州段运河递运南粮赴通州量达400万至600万石左右,成为南水北运的咽喉要地及漕粮转运和开展贸易的重地。明清时期的文人经过德州时,往往被其繁华景象所吸引。唐之淳有《德州》一诗:

德州俯要冲,地当舟车会。浮梁直郭门,亦以司启闭。

东南出齐鲁,西北达幽蓟。人民屋室稠,商贾语音异。

闻此古陵县,侧塞隈风气。置牧超等秩,自我圣明世。

戍兵三千人,将校十数辈。河山为之雄,城郭为之丽。

我来舣戎舰,登览不暇备。谯楼角声动,小卒催鼓枻。^①

唐之淳,明代浙江山阴人,建文二年(1400),得方孝孺荐举,为翰林侍读。《德州》一诗以白描手法对所见景观加以真实记录,聚集的舟车、发达的交通、稠密的屋居、各地的商贾、超等秩的官员设置、大量的将校戍兵、雄丽的城廓等都呈现在诗中,为我们认识此时期的德州历史面貌提供了依据。

据乾隆《德州志》记载:明永乐九年(1411)会通河告成,十三年(1415)于陵州仓故址建广积仓、置常丰仓;明宣德五年(1430),淮徐临德四处仓廒修成,卫军轮班递运南粮;雍正九年(1731)于州署东建仓120间,贮州常平谷及社谷,并收贮漕粮。故在德州城西的大运河中,运皇粮的漕船,进出京城的官船,来往于大江南北的客、货船等,都要在这里通过或停泊。这里白天帆樯密接,夜间灯火通明,小贩叫卖声和船工号子声不绝于耳。沿河的西关、北厂、米市和顺城街一带的商店、饭馆通宵达旦迎送来往的官员和商贾。明代文人程敏政《德州舟中》一诗中记录了当时德州码头的繁华程度,诗中说:“出逢漕舟来,入逢漕舟去。联樯密于指,我舟无著处。”^②形象描绘出德州段运河中漕船往来之频密,河道之拥挤,诗中还如实记录了当时运河里各船之间为抢夺泊位而争吵的混乱、繁忙场景,再现了当

时德州运河码头漕粮船挤、游人如织的漕运盛况。清李浃《长河偶记》中云:“历历牙樯插浦间,海门潮接九河湾。”^③另如“京路通千里,春河聚万艘”^④,“寒烟开万井,远水上千樯”^⑤等,也都是对运河上帆樯密织的描绘。

明弘治时,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路过德州,有《宿德州》一诗,诗中云:“今夜客中宿,德州城外船。山东余土俗,蓟北少风烟。军馈交相集,舟行不可前,时闻羸老语,菜熟是丰年。”^⑥反映了当时德州客商、运丁云集,商业发达的场景。冯挺櫆《陵州词》十首之其四:“柴市东头古道场,兢春儿女兢焚香。茶房酒肆芦棚下,高唱吴歛赛药王。”^⑦诗中写出了当时德州药王庙会的盛况。柴市街是当时德州粮柴交易集散地,位于柴市街东头的药王庙,背靠运河商埠,人流、物流在此相互交汇。农历四月廿八药王诞辰为德州重要的民俗节日,时值春末夏初,全城青年男女盛装赴会,竞相争艳。庙内人们纷纷焚香祈愿,庙外则是芦棚、茶房、酒铺林立,人声鼎沸,商贾云集,游人如织。最后一句写出德州因运河而南北文化交融的特征。在虔诚的香火与喧闹的市声中,德州“因河而兴”的蓬勃生命力呼之欲出。

三、明清诗词中德州文人生活图景及思想意蕴

明清两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至清顺康两朝,德州出现了灿若群星的文人与累世不衰的文化家族。其时比较著名的文人有卢世灌、程先贞、萧惟豫、田雯、冯廷櫆、田霖、谢重辉、田同之、卢道悦、李浃等,顺康时期的诗坛盟主王士禛标举“金台十子”,德州田雯、谢重辉居其二。此时期的德州还出现了卢氏、田氏、李氏、程氏、谢氏、萧氏等世代相承的文化家族。明清两代的德州文人中,既有致仕归乡的高官,也有终身隐居的隐士;既有遗民,也有仕于新朝之人,回望历史,他们像是屹立于文林中各自吟唱,又互相唱和,绘成那个时代独标一格的风采画卷。

明清时期的德州文人们,大都致力于德州的文治教化,如创建书院、研经写史、著文作诗等。这一时期的德州书院昌盛,除现任州县官吏外,致仕归乡的名臣是主要创建者、参与者,如邹颐贤、程绍、田绪宗分别创建南湖书院、崇仁书院、董颜书院,这三所书院皆奉董仲舒和董子读书台为渊源,带有深厚的“董子文化”

^① 唐之淳,撰.唐愚士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德县志:卷十五艺文志[M].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③ 宋弼,撰.山左明诗抄:卷二六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 412 册.

^④ 王世懋,撰.王奉常集:卷五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 133 册.

^⑤ 曹学诠,撰.石仓历代诗选:卷三百九十五 [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冯挺櫆,撰.冯舍人遗诗:卷六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 252 册.

烙印，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儒家文化特征，对振兴一方文教文风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雒颐贤有《送丁子观、杨子和、袁治卿暨儿慎赴南湖书院读书》^①一诗，此诗为一首典型的儒家劝学诗，劝勉学子在儒学衰微之际，应恪守本心、砥砺德行、珍惜时光以复兴圣贤之道。明清时期的德州文人有着研经写史的风气，其中最突出者是田雯和程先贞。田雯著《黔书》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程先贞博览群书，尤专注于史学，其对乡里一极大的贡献是参修《德州志》。康熙十二年（1673），程先贞以布衣的身份参修《德州志》，析疑订谬，使十卷《德州志》成为信史，后深得梁启超赞誉。书成后，他又据多年所辑编为《州乘》一书，分为《德州诗搜》《德州文搜》《德州先贤诗》三部分。程先贞对德州影响极大的另一事件是邀请顾炎武来德州讲学。顾炎武为著名启蒙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明末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可谓旷世大儒。康熙九年（1670）六月至九月，应程先贞、李涛之邀，于程先贞家讲《易》，历时三个多月。顾炎武生平清高不从流俗，平生唯一的这次讲学实是因与程先贞交情甚笃。这次讲《易》在当地引起了较大轰动，有多位文人慕名前来拜谒。程先贞有《立秋日王北山过访同听顾亭林讲易并贻所著槐轩集》一诗，诗中说：“三时快雨来千里，一夕清风遍九河。大易回开悬象奥，新书遥赠汗牛多。”^②记录了在顾炎武讲《易》期间，王北山过访同听顾亭林讲易并赠自著《槐轩集》一事，称赞顾炎武讲易经妙理，如一夜之间清风吹遍九河。著文作诗更是这一时期德州文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乾隆《德州志·艺文志附》记载钞录州城56人著有诗文集，宋弼《山左明诗钞》中有德州籍诗人37名，收录诗歌307首，可见明朝时德州的诗歌创作已呈现勃兴之势。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选德州籍诗人49人，为山左各地之首，可见诗人之盛，诗作之丰。正如田雯《止园十首与吕铁翁》诗中所说：“敲门无别事，酒客与诗筒。”^③

在创建学院、研经写史、著文作诗的同时，明清时期的德州文人们还过着幽栖避嚣、躬耕钓弋、幽寻赏花的生活。

程先贞在经历国变后，虽短暂出仕，但最终选择归乡，归隐后的乡居生活诗在其诗歌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其诗《偶过村中别业》勾勒了一幅安宁自足的田园画卷：

① 德县志：卷十五 艺文志 [M]. 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② 程先贞，撰. 海右陈人集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册.

③ 田雯，撰. 古欢堂集·山姜诗选：卷三 [M]// 清代诗文集汇编：138册. 康熙乾隆间刻本.

④ 程先贞，撰. 海右陈人集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册.

⑤ 萧惟豫，撰. 但吟草：卷五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9册. 康熙五十年（1711）刻本.

⑥ 谢重辉，撰. 杏村诗集·戊子诗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2册.

野外闲行意洒然，今年景物似丰年。沿溪鱼户多茅舍，负郭人家半种田。

柔橹回看三面水，遥村乱点数行烟。晚依别业消残暑，布被藜床月影偏。^④

丰年之时，百姓安居乐业，诗人水上行舟，看遍远村之景，归来后布被藜床，以消夏日残暑。这类诗歌不仅体现了程先贞对闲适生活方式的热爱，同时也是他入清之后的人生选择，他要追求更深层次上内心的安宁平静。萧惟豫盛年便绝意仕宦，避迹于城东南四十五里马颊河畔，傍河筑园，结草为庐，编槿为墙，命名为“云庄”。其《游颊河》中说：“延缘葭苇桨轻荡，细理丝缗饵漫投。曲啭歌喉人半醉，凉生水面暑全收”“若到忘机能物物，钓竿手把立蜻蜓”。^⑤记录了载酒肴、带歌童，与友人一起理楫登舟、泛舟颊河、把杆垂钓的场景，也反映了萧惟豫归隐后躬耕钓弋的清简生活。田雯《村中韩坡见访》中云：“有客骑驴款行扉，小园席地话依依。曾于雨后锄瓜否？才自庄西割麦归。”^③可见，锄草割麦也是田雯的日常劳作。因萧惟豫种瓜赠瓜又赠诗，田雯便欲效仿萧惟豫开田种瓜，其《种瓜行赠韩坡》中云：“明年我亦学老圃，犁锄自操身手僵。与君入山种瓜隐，徒骇水上歌沧浪。”^③随后田雯果真在马颊河畔建屋种瓜，名为“瓜隐园”，还写有《瓜隐园杂诗九首》。这些诗描写隐居生活的宁静自在、淳朴自然，传达出的心境忠厚平和、甘于淡泊，多有陶潜之风。谢重辉在京为官三十余年，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引疾归里后，隐居于城南杏村别墅，在德州乡郊度过余生。对于谢重辉而言，“拄杖寻幽”成为他归乡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村行》便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一首诗：

柱杖寻幽不计程，南村行过北村行。从容鸟语来空谷，断续溪流待灌缨。

造谒多依狂处士，相逢半是古先生。归途更喜邻翁伴，信口歌来无限情。^⑥

此诗可谓是其“拄杖寻幽”生活的一个速写。手拄竹杖，寻幽问壑，不计里程，过了南村便去北村。诗人眼中的乡村景致从容幽静，深谷之中偶传鸟语，溪流断断续续、清澈透明。“灌缨”的典故点出诗人的隐逸之志，诗人在寻幽中所遇之人不是“狂处士”就是“古先生”，归途之中还有邻家老翁信口咏歌相伴，他们带给诗人无限欣喜。如此明净之景与所喜之人正与诗人澄明宁静

的心态相应和。同样，“幽寻”也是其他德州文人主要生活内容之一。如田同之《出郭》：“出郭幽寻步履闲，鸟声格磔水潺湲。”^①卢道悦《三月三日萧太史招游云庄》：“消磨豪气久无痕，独有寻幽兴尚存。”^②李涛《秋日游黑龙潭》：“剩有寻幽兴，尘中不易逢。”^③

每至开花时节德州文人们便互相招饮，赏花作诗，于诗题中即可见一斑。如程先贞《上已集萧韩坡湄墅修禊》、卢道悦《萧侍读招同谢比部云庄看花》《萧韩坡太史招赏梨花》、田雯《五月二十六日，圣木、怡斋过访，偕雨来、子益两弟观荷分体四律》、查慎行《德州同年李文众招集，见可园二首》、高凤翰《三月九日，李圣木先生招饮见可园赏藤花》等。谢重辉作有《北园看花》九首，直把自己定为老年看花人，花开时节每日到北园赏花赏景，只因“等闲不肯留时节”，才会“寻花太剧狂”。德州作为诗人们生活与创作的主要场所，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一花一木、一鸟一虫、一云一水等都成为其诗中独具特色的审美意象，既展现了德州水乡的清幽与繁华并存之美，也细致刻画了自己的隐居生活，透露出一种淡泊宁静的隐逸之趣。

德州文人们或是致仕归隐，或是终生隐居，他们一面创建书院、研经写史、著文作诗，一面过着幽栖避嚣、躬耕田亩、幽寻赏花的生活，这种生活追求符合“崇文尚学”“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高洁自守”的儒家精神特质。

四、明清诗歌中德州农人形象与农人生活图景

历代诗人多深受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影响，忧系黎元，对百姓民生多有描绘，这一传统在明清时期德州农人形象与农人生活图景诗中得到延续。这些诗歌有的写农人的朴实、豪爽，有的写农人的农桑稼穑之事，更多的是写农家生活的艰辛，诗中屡现水灾、旱灾、蝗灾等灾荒，还涉及瘟疫、徭役、赋税等，此类诗歌多“缘事而发”，叙事兼抒情，主要代表性诗人多长年居于德州，如萧惟豫、程先贞、谢重辉、田霖、封大木等，他们虽为文人，但多躬耕陇亩，无论是对农事还是对农人的辛苦都了解颇多，这些诗人们的此类诗歌多来自亲身经历，读来感受犹深。

谢重辉《留宿田家》中写了一位从年少至白头一直生活在农村的田家老翁的日常生活，描绘出太平时期

北方乡村农人的典型形象。

田家老翁五亩宅，门前种桑尽百尺。白头未尝
一入城，青春但知事南陌。^④

此诗正合孟子所提出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仁政主张，蕴含着美好的政治理想。谢重辉《适野》中有一位农民至老还在读书：“回顾田舍人，农书老犹读。”^⑤难怪乎诗人发出“无怪沮溺辈，经年事耕牧”的感叹。诗中用典既符合德州水乡的特征，也指出田舍人犹如傍河而居的避世隐士。

程先贞在《东皋》一诗中刻画了一位身强体健、行为豪迈的农家少妇形象。“谁家少妇登屋瓦，身骑榆枝如骑马。榆钱采结裙腰下，蓬鬓红花插一把。”^⑥真是活画出北方少妇的典型形象，让人莞尔一笑。

德州农人的生活远非诗歌中所描绘的宁静、欢悦，他们的生活是忧虑、艰辛和苦难的交织。如谢重辉《观稼》中提到干旱给农人带来的忧虑。小暑时节才开始落点小雨，即使过了时节，田家仍辛勤耕种，诗中说“不种虑鲜食，种忧苗不振”^⑦。不种担忧没有食物，种了忧虑禾苗不长。这种担忧一直持续到秋天——即便是原来的广平低湿之地竟也能时时看见尘埃飞起。如此严重的干旱让农家何以卒岁？谢重辉另一首《观田家》也提到干旱的问题：“今年雨泽艰，昕夕忧生理。荏苒芒种过，赤地尚千里。丁壮扶鋤坐，相叹衡门里。”^⑧芒种已过，仍然赤地千里，田园荒芜，这种情况下，乡人仍习惯性地扶着铁鋤想去种田，然而在无情的旱灾面前他们能做的也只有互相叹息了。

除干旱外，水灾给人民带来更多更深重的苦难，如乾隆《德州志》（卷二）记嘉靖九年：“大水平地丈余，人多溺死。”有更多的诗歌悲吟这种苦难。萧惟豫在《癸未，东郡被水灾，大饥。流离之状，难以图画，随所见闻识以数语》组诗中记录了一次水灾，以及水灾引起的民众饥荒与流离失所。其诗中说：“六龙西驾望东巡，亿万金钱活饿人”“麦垅虽深三尺许，道傍僵卧忍饥民”“牵男抱女走荒村，突绝炊烟多闭门”^⑨。田雯也有《苦雨叹》一诗，诗中云：“咄咄天漏何术塞？商羊只足向人吠。丰隆奋地火欲流，羲和停夙辔不动。鼋鼈鼓鬚来堂坳，蛙黾鸣股上屋栋。”^⑩诗中使用了大量的神话典故，以及鱼类、蛙类出现在屋中来形容雨水之大。大雨过后会有多少个村庄荒芜，秋天将会饥荒遍野。诗人封大木有《负薪子

^① 田同之，撰。砚思堂诗文集·砚思集：卷四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39 册。

^② 卢见曾，编。国朝山左诗钞：卷五七 [M]. 清乾隆雅雨堂精写刻本。

^③ 谢重辉，撰。杏村诗集·戊子诗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72 册。

^④ 程先贞，撰。海右陈人集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5 册。

^⑤ 萧惟豫，撰。但吟草：卷五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49 册。康熙五十年(1711)刻本。

^⑥ 田雯，撰。古欢堂集·山姜诗选：卷三 [M]// 清代诗文集汇编：138 册。康熙乾隆间刻本。

诗》，^①诗中记录了大水之时万户无炊烟，老百姓无食无薪，乡人驾船采薪，船破人亡之事。诗中写水之大：“驾船缚茅苇，潦水如天长。登高未及里，攀枝上树巅。”写老百姓挨饿忍饥：“万户无炊烟，城中方苦饥。”诗中三次出现“万户无炊烟”，一是早晨该吃早饭时，城中没有炊烟，第二次是负薪者历尽艰险，攀上树巅之时，回望城中仍然没有炊烟升起，最后一次是在诗尾：“万户无炊烟，城中方苦饥。”诗意诗情曲折徘徊，读之让人悲叹不已。

除旱灾、水患外，还有蝗灾。程先贞《七月望归自东皋夜坐》一诗中曾提及蝗灾，禾黍半熟，本来一片丰收之景，但蝗灾过后，只剩残余，诗中说：“为怜灾害者，区区理蝗馀。匍匐不盈抱，俯首但长吁。”^②面对此种无情的灾难，人们也只能长叹。

彼时的德州农人在承受着多种自然灾害的同时，还要承受各种赋税、徭役。田霖在《乙巳》一诗中记录了雍正三年(1725)秋天的一场大水灾，诗中说：“催科已下高低令，无米难留旦夕身。可笑流离男共女，还来乞食向同人。”^③悲痛、无奈之情溢于字字句句之间，至今读来犹让人痛心。谢重辉《观田家》“田园日就荒，称贷累桑梓。人家无宿储，催科犹未已”^④。程先贞《送

河夫赴桃源筑堤》其一记述了黄河在桃源决口后征夫筑堤之事。诗中“饥寒不得耕，逃亡离父母。派夫齐鲁间，远行修决口。秋杪历春初，为时亦已久”^⑤等句，道出了当地乡民在饥寒交迫中还被迫长时间服役修筑堤坝的悲惨处境。

德州农人的生活图景诗中，既有农人热爱劳动的吟唱，更有着各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灾难呈现，还有对赋税、徭役的控诉，朴拙中有风华，山野中见真诚，凄婉处现庄重。

古九河与运河的开凿，使德州拥有了北方水乡的自然生态系统与“九曲十八弯”的平原弯道水利景观。明清时期，运河成为最主要的南北运输通道，德州这座沿运之城随之而成为漕运兴盛、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的重要城市之一。生活在州城及南来北往的文人们攫取运河的自然物化意象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写下大量的诗歌，既描绘德州运河自然地理图景、经贸文化图景，也记录了德州文人、农人的生活图景。德州运河区域在明清两代诗人的笔下，呈现出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多维度风采“画卷”。

An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Landscape of Dezhou Canal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g and Qing Poetry

CUI Xiuxi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Culture,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terati from Dezhou itself as well as those traveling north and south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poems about the Dezhou Canal area. The content of these poems covers various aspects: The water conservancy landscapes with plain bends and natural features of the Grand Canal in Dezhou; The pictures of canal trade and culture featuring prosperous grain transportation and booming commerce; The literary life scenes where people's pursuits were in line with Confucian spiritual traits such as “valuing culture and learning” and “maintaining integrity and purity”; The life scenes of Dezhou farmers, which, though containing tranquility and joy, were filled with worries, hardships, and sufferings. Thus, in the works of poet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Dezhou Canal area presents a multidimensional,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landscape integrating nature and humanity.

Key words: poet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ezhou Canal; multi-dimensional scenes

① 德县志：卷十五 艺文志 [M]. 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② 程先贞，撰. 海右陈人集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册.

③ 田霖，撰. 高津草堂诗·高津堂绝句诗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254册.

④ 谢重辉，撰. 杏村诗集·戊子诗 [M]//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2册.

老舍小说《热包子》的双重叙事进程研究

赵璐

(北京语言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老舍短篇小说《热包子》讲述了城市底层贫民小邱与妻子邱嫂的感情危机。从故事情节发展走向来看, 显性叙事进程中作者通过叙述者“我”的孩童视角试图呈现邱嫂出轨的情节, 然而叙述话语中却不自觉混杂了作者隐含的男性中心视角。在情节发展背后, 又存在一条隐蔽的表意轨道, 通过隐性叙事进程展现出满族底层贫民的命运。在明暗相映的双重叙事进程中, 《热包子》的人物形象由单一变得多面, 故事也在双重进程情节的相互对照与补充之间变得富有张力。

关键词: 老舍;《热包子》;双重叙事进程;性别话语;族群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5-0070-05

20世纪30年代, 老舍在山东任教期间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 先后创作了《断魂枪》《大悲寺外》《黑白李》等经典短篇小说, 这一时期可谓其“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代”^{[1][2]}。短篇小说《热包子》即创作于这一时期, 收录于老舍短篇小说集《赶集》。学界普遍认为《热包子》是老舍“写着玩的”^{[2][92]}作品。关纪新将其看作老舍到济南后由长篇小说向短篇小说过渡的试笔之作^{[3][269]}。凯茜关注《热包子》中两性情感关系的多义性^{[4][217]}。A.A. 安基波夫斯基认为老舍在《热包子》中着重揭示主人公小邱的高尚, 聚焦其对亲人和邻友的心灵理解与宽宥^{[5][110-111]}。陈红认为其展现了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温馨与辛酸^{[6][32]}。以上研究只是将《热包子》作为老舍短篇小说群落中的一部一带而过, 缺乏深入探究。

老舍自述这是一篇受制于篇幅而“故意写了那么短”^{[2][92]}的小文, 但沿文本细节深入探究, 老舍有意无意忽略或隐瞒的细节使《热包子》的叙事暴露了作者潜隐的性别意识与族群意识。深挖小说表层的显性叙事, 可以发现叙述者“我”的孩童视角叙事暴露了隐含作者男性中心意识下对女性的凝视, 和从男性视角出发对

女性懵懂自我意识的审视。跳出表层的叙事迷障, 又会发现“我”叙事的不可靠性, 进而挖掘出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 即展现民国期间满族底层贫民的悲惨命运。一显一隐两组叙事进程中, “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构成不同的表意轨道”^{[7][80]}, 《热包子》的双重叙事进程^①在性别话语与族群意识两条表意轨道上建构起双重叙事动力, 朝不同主题方向并列前行, 产生意义之间的对照、对抗与互补关系。

一、显性叙事进程: 性别话语与懵懂的生命意识

《热包子》在显性叙事层面的情节可以概述为以叙述者“我”的视角讲述了大杂院里一对年青小夫妻小邱和邱嫂温馨又辛酸的感情故事。小说开篇第一句“爱情自古时候就是好出轨的事”^{[8][8]}将叙事基调定位于男女之间的婚姻出轨。然而故事叙述人物“我”的限知视角造成了叙述的不可靠与叙事进程的断裂, 使显性叙事进程中的“出轨”这一看似简单的能指充满了复杂的意涵。“我”叙述的不可靠性暴露了在这一叙事进程中隐含作者男性中心意识驱动下对女性的无意识凝视。而叙事

收稿日期: 2025-04-21

作者简介: 赵璐(1987—), 女, 河北唐山人, 编辑,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老舍作品及传播、文学与出版等方面的研究。

①“双重叙事进程”(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这一叙事学概念由中国学者申丹首创, 意指叙事虚构作品中存在的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两种不同的叙事进程。申丹认为, 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情节的关注到当代学者对“叙事进程”(narrative progression)的探讨, 学术界一直聚焦于情节的发展, 但不少虚构叙事作品中, 情节发展的背后存在一股叙事暗流, 它们既不是情节的一个分支, 也不是情节深处的一个暗层, 而是自成一体, 构成另外一种叙事进程, 自始至终与情节发展并列前行。这两种叙事运动呈现出不同甚或相反的走向, 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和审美价值上均形成对照补充或对立颠覆的关系。申丹于2012年首次在国内提出“隐性进程”这一概念, 2013年在《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上发表《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进程》,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和界定了“隐性进程”, 在2021年申丹出版的《双重叙事进程研究》一书中对“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构成的“双重叙事进程”展开全面系统的理论探讨、模式建构和作品例析阐释。

话语的裂隙则指向邱嫂作为底层女性隐现的懵懂生命意识，并为隐性叙事进程的探寻提供了路径。

(一)不可靠叙述隐藏的凝视

在显性叙事进程中，小说以叙述者“我”的孩童视角叙述小邱与妻子邱嫂白天在众人面前快活、和气、有“小俩口味儿”^{[8]8} 的日常生活，也以臆测的口吻转述他人对小邱夫妻夜间打架的传闻。在“我”看来，两人“打架”的原因是街坊邻居时常怀觊觎之心与邱嫂攀谈。但所谓的“打架”，并未给小夫妻带来任何肉体的伤痕与情感关系上的波折，不禁令人疑惑小邱夫妇夜里是真的因夫妻关系不合而“打架”，还是隐含作者刻意经由“我”这样未经人事的孩童视角，隐晦地表现小邱夫妇深夜的亲密行为。邱嫂的美丽与洒脱成为女性魅力与诱惑的符号，而小邱的无能与窝囊使周围邻居大胆觊觎邱嫂的美貌，时常借故到小邱家“谈天”。夫妻俩“欢天喜地”接待街坊，但小邱却在街坊邻里走后的夜晚发泄被压抑的情感欲望。在这一叙事情节中，小邱与邱嫂温馨美好的小两口生活和邱嫂与其他男人的暧昧之间，构成一种似隐实显的叙事张力，而这种张力的产生恰源于叙述者限知视角的不可靠性。从“我”的角度看，小邱夫妻生活温馨，但邻居们对邱嫂的觊觎却暗示了两人看似和谐的婚姻充满危机，印证了叙述者“我”叙述的不可靠性。

在叙事的感知轴上，童年“我”对邱嫂的感受中，不自觉地掺杂了成年男性“我”对小邱嫂的凝视，依然呈现为不可靠叙述。邱嫂的美丽对孩童的“我”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我”窥视了她光洁的脊背、也始终记得她笑起来“露出世界上最白的一点牙”^{[8]9}。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牙齿”这一外貌特征常以转喻形式指代外貌，如“明眸皓齿”“唇红齿白”，喻指人年轻美丽。文中提到，为了见到小邱嫂的白牙，“我”会拿着花生蚕豆往她嘴里送，认为这“是我儿时生命里的一个最美的事”^{[8]9}，暗示处于性意识懵懂期的“我”对美丽大方的小邱嫂产生了不自觉的爱慕与期待。作者对外貌细节的描写也使隐藏在孩童的“我”背后的男性视角呼之欲出。叙述者“我”的成年视角小心翼翼地现身补充解释细节，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刻意强调“我那时候比现在天真的多多了”“我那时候常这么想”^{[8]8-9}，意在凸显“我”对小邱嫂的观感与想法是基于当时的孩童视角。这样刻意的抽离与解释呈现出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交织。孩童“我”对邱嫂的窥视与期待，实际上反映了成年“我”的男性欲望。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童年的“我”看到过邱嫂的光脊背，“有些中年人也说看到过”^{[8]9}。在中年男人们的

眼中，邱嫂的身体被动地“作为性的载体出现”^{[9]46}，展现出女性的性感魅力，“引发观看”并“在公共空间中经受目光的洗礼”^{[9]47}。孩童视角中的“我”对女性的凝视略带懵懂，与中年男人们充满欲望不加掩饰的凝视不同。尽管两者都是在公共空间内对女性的客体化凝视，但孩童“我”的凝视中，除了成年“我”的男性欲望，还包含了孩童对美丽女性的喜爱和爱慕。在孩童视角“我”的不可靠叙述中，隐藏的是对天使型女性形象的无意识凝视，而非中年男人们单纯欲望驱动下的刻意凝视。

(二)懵懂女性生命意识的萌发

在邱嫂出轨和离家出走的显性叙事进程中，依然有值得深挖的必要。在叙述者“我”的眼中，邱嫂具有女性最美好的品质：美丽、大方、温柔、贤淑、勤劳、能干。她的房间“永远那么干净永远那么暖和”^{[8]8}，而街坊们、卖油卖菜的小贩，甚至像“我”一样的孩童都喜欢她，“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像没有和她说不来的”^{[8]9}，展现出邱嫂温柔善良的性格和与邻里街坊融洽和谐的关系。邱嫂的美好品质投射出作家老舍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样态——美丽端庄、温柔善良、勤俭持家，拥有这些美好品质的女性形象也在老舍笔下反复出现，如《微神》中的“她”，《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月牙儿》中的“我”等。但邱嫂的形象不同于老舍笔下那些善良柔弱的女性角色，她展现出一种在老舍其他女性形象中少见的女性生命意识和欲望的流动与飞扬。

显性叙事进程中邱嫂以“洒脱”的形象引起读者注意，“洒脱”的不仅是其性格，更是以性魅力形式迸发的女性欲望。她的“洒脱”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自身懵懂的女性生命意识与欲望追求，而离家出走则是邱嫂自我意识的外显。邱嫂突然的离家出走造成了情节发展的断裂，透过这一情节发展的裂隙，单就离家出走这一行为来说，作为被传统伦理束缚的底层女性，有勇气做出这个决定已然使邱嫂的形象与老舍笔下受尽苦难却温柔善良、勤劳贤淑的天使型女性形象有了显著不同。《易经·系辞》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10]374}，《序卦传》亦言：“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10]450}。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制约下，女性因缺乏经济独立而不得不依附于男性生存，长期处于次要地位。婚姻的长久与稳固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期待。老舍颂扬的理想女性形象中，不论是《骆驼祥子》中卖身养家的小福子、《新时代的旧悲剧》中为尽孝做暗娼的小凤，还是《月牙儿》中接受了新式教育试图反抗命运却最终沦为娼妓的“我”，都因袭了历史赋予女性的心灵枷锁，负载着依附男性的心理与文化惯性，缺乏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人性解放与主体意识的建构上步履维艰。邱嫂离家出走

这一行为的意义,恰在于其个体生命意识与欲望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的突破。尽管这种突破并非源自“五四”时期女性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而是一种懵懂的个体生命意识与社会环境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这仍使她的形象在老舍笔下的女性人物谱系中显得与众不同。

二、隐性叙事进程: 满族身份与族群意识

邱嫂懵懂的女性生命意识与个体欲望追求在显性叙事进程的裂隙中得以呈现,而容纳其生命意识与欲望追求的社会情感结构与环境因素则成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也是由“显”入“隐”的路径。显性叙事进程中的男性凝视与邱嫂的性别突围,看似是个体层面的性别权力博弈,却暗含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因素。邱嫂何以如此坦然接受邻居男性凝视,又何以在性态度上表现出如此的“洒脱”? 小邱夫妇到底是何身份,以致邻里对其行为司空见惯毫不稀奇? 超越个体情感纠葛的表象,可以发现邱嫂的“洒脱”与小邱的“窝囊”背后,隐藏着被显性叙事遮蔽的族群生存困境。

申丹指出,有时作者“真正想表达的主题意义难以被社会正义和社会道德所接受,只能通过叙事暗流来隐秘地达到目的”^{[7][49]},因此将文内分析与文外考察相结合,方能揭示隐性进程中的社会冲突。将《热包子》的叙事还原到老舍创作时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中,可以发现,在一个出轨故事的显性进程背后,隐藏着一条反向发展的叙事暗流。在这条叙事进程中,另一隐含作者试图引导读者挖掘隐性情节和其中的族群意识。“隐含作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创作,当时的历史语境很可能会影响其创作的选择”^{[7][101]},回到老舍创作小说的 20 世纪 30 年代,不应忽视创作者老舍自身的满族身份对隐性进程中隐含作者态度的影响。

(一) 潜隐的满族底层平民身份

辛亥鼎革后,满族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动,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不得不在惨淡的生存与肮脏的名声这样双重煎熬之下挣扎度日”^{[11][39]}。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尽管老舍在创作中刻意避免与满族相关的书写,我们依然能发现不少满族文化及人物形象的痕迹。舒乙曾经提出“隐式满族文学”这一观点,认为“作者表面上没有指明作品主人公的族籍,但是从被描写人物的籍贯、职业、生活变迁、气质等角度上看,可以肯定他们是少数民族”。这类的文学作品被称为“隐式满族文学”^{[12][62]}。据此可以剥离出许多满族角色形象,如《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热包子》的小邱和《离婚》里的丁二爷。由老舍先生的族群意识入手,检视《热包子》的故事细节,可以发现与邱嫂出轨的显性叙事进程并

列的,是底层满族贫民小邱与邱嫂艰难求生的隐性叙事,展现出民国初期满族底层贫民的悲惨命运。

关于小邱与邱嫂的身份,作者在小说中并未直接披露,而是在书写小邱的外貌时,侧重描述小邱“不会老”和他“毛腾厮火”、站不住、坐不稳的行为特点。小邱呈现出不稳重的行事状态,除了年轻之外,还有一个细节暗示了其他原因:作为家中年轻力壮的男性,他本应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经济支柱,但小说中却没有提到他有任何赖以生存的活计,这暗示了没有谋生技能的小邱在底层生存的无奈,从而自然流露出焦躁的情绪。年轻、手脚麻利却不够稳重、没有职业,这些特点表明小邱很可能是失去了“铁杆庄稼”的旗人。清政府被推翻后,满族旗人,“失去了固有的谋生手段”^{[13][33]},“绝大多数都跌进城市贫民行列”^{[3][55]}。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对旗人的普遍歧视,许多旗人不得不改姓、谎称汉族来寻求生计,却仍然有不少人始终找不到活计。少年时代的老舍亲历了这一过程,见证了满族同胞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悲苦的生存境地。《茶馆》中的松二爷,《离婚》中的丁二爷,《我这一辈子》中的“我”,《猫城记》中的猫民,这一系列与小邱类似的形象无不渗透着满族平民泣血的悲哀与困厄。

邱嫂作为旗籍妇女的身份也在隐性叙事中得觅踪迹。不论是自我意识张扬的离家出走,还是日常生活中支使小邱外出采买,邱嫂始终处于支配性的地位,这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男女性别秩序中男性居于中心地位压抑女性主体的状态明显不同。而邱嫂的离家出走又归来“好像是为证实其从属地位”,实质上反映出的却是“她丈夫对她的依赖性”^{[4][217]}。这恰与满族女性的地位与观念相一致。满族女性在生产、生活、婚姻、家庭和社会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家庭中,“满族往往由女性持家,安排家庭中的大小事情”^{[14][67]}。不同于小邱的“毛腾厮火”,邱嫂对内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对外与街坊邻里关系融洽,尽管作者没有说明邱嫂与小邱的年龄,但从二者待人接物的老练程度上看,邱嫂的年龄应比小邱年长。在满族文化中,娶长妇是一种独特的婚俗,男子通常结婚较早,甚至在清朝初年,男子多在十岁前结婚,而“新娘常常比新郎的岁数大”^{[15][76-77]},其目的在于实现人口的繁衍和氏族血脉的传承,以巩固八旗制度的兵源。老舍在《骆驼祥子》中描写虎妞以三十七八岁的年龄与祥子结婚,《老张的哲学》中王德娶了比他大八岁的妻子,这些情节都真实地反映了满族的这一风俗。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理解作者对邱嫂远比小邱成熟稳重的书写,不难佐证邱嫂的满族家庭妇女身份。

而邱嫂对待两性态度之“洒脱”也可以从满族女性的性爱观念中找到答案。尽管满族入关建立清王朝后,

开始了“对儒家妇女观和伦理规范的尊崇和奉行”^{[16][14]},但在家庭内部,妇女的地位仍相对较高,自由度也较大。相应地,不同于儒家文化环境中对男女非婚性行为的禁忌态度,“满族贞节文化更多地遵从人的天性”^{[17][152]}。尽管其性爱关系受传统道德规范严格制约,但是“如果所有的风俗习惯都遵守了,那么,当事妇女的丈夫并不会震惊于妻子的不忠”^{①[15][168]}。老舍以隐性书写的方式展现了满族女性这种迥异于汉族女子的性观念,除了邱嫂与邻居中年男人们之间的暧昧关系,老舍笔下虎妞的婚前性关系与婚后性爱的主动特质、《微神》中“我”肉体自我放纵的“自傲”都是满族女性性观念较为开放的外显。

(二)被遮蔽的满族底层妇女生存悲剧

在隐性叙事进程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挖邱嫂隐藏在满族底层妇女身后的另一重身份——暗娼。邱嫂的形象兼具“秀美”与“魅惑”的双重特质。作者既赋予了她小福子(《骆驼祥子》)、“我”(《月牙儿》)、宋凤贞(《新时代的旧悲剧》)等美好女性的特质,也赋予了她夏太太(《骆驼祥子》)般的性吸引力。不可否认,不论哪一种特质,都指向了老舍女性形象谱系中一类典型的人物——娼妓。

老舍笔下的娼妓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独树一帜,“他从族人泣血的经历中,从社会见闻中,析离出几个形象鲜明的妓女形象”^{[18][6]}。老舍不吝笔墨,刻画了挣扎在社会底层、沦为娼妓的满族女性,以关爱的目光注视和怜悯底层族裔女性的不幸生涯。邱嫂的形象建构与这一类底层满族女性有着极强的相似性:底层贫民、旗籍妇女、秀美而诱人。面临年轻丈夫的窝囊和街坊中年男人的觊觎,甚至入室“攀谈”,邱嫂与小邱热情接待。小邱在邱嫂接待其他男人后,与邱嫂激烈交欢以发泄欲望获得心理补偿,这些行为均暗示了邱嫂“暗门子”的身份。邱嫂与小邱一起在家里接待街坊中年男人们并与其“攀谈”,可见作为丈夫的小邱并不介意妻子与其他男人交往,进一步暗示了邱嫂的暗娼身份。小邱依赖邱嫂做暗娼来维持生计,邻居对小邱“王八脖子”的蔑称和邱嫂对小邱态度中流露出的微妙不满与埋怨也佐证了这一点。

从这些因素入手,在显性叙事中,邱嫂出轨的故事

在隐性叙事中呈现出另一副面貌:落魄旗人小邱缺乏谋生技能,家庭经济来源依靠邱嫂做暗娼。至此,回顾显性进程中隐含作者对邱嫂既温柔顾家又洒脱诱惑的书写,方能理解为何“天使”与“妖女”两种形象特质能在邱嫂身上并存。她的懵懂女性自我意识,既有自身的主动性因素,也受到族群身份带来的社会歧视的影响。显性进程与隐性进程中展现出的邱嫂形象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使得这一角色由单一变得丰富。

在隐性叙事进程中,作者对邱嫂这一形象的情感态度也值得探究。学界对老舍作品中女性沦为娼妓的命运设置有过一定探讨。^②舒乙指出,《月牙儿》和《微神》两篇作品女主人公从“隐式满族文学”角度来看,都是满族底层女性沦为暗娼的叙事模式。此后,关于老舍笔下满族女性沦为娼妓这一叙事型范的研究已取得学界共识。老舍对娼妓形象的态度颇为复杂。作为满族人,他秉承了旗人“注重名与耻,讲面子、重自尊”^{[19][296]}的民族性格,不愿将本族的伤疤直白地剖析于众;但同时,他始终以荣辱与共的心理情感关注和怜悯这些因贫困而沦为娼妓的女性同胞,在作品中以或隐或现的形式展现她们的悲惨境遇。老舍对这些女性的形象设置往往以暗娼居多,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将老舍笔下的妓女与暗娼笼统地归为妓女形象。事实上,许多女性被迫成为暗娼,逐步陷入娼妓生涯的涡旋。《月牙儿》中,母女两代人敌不过“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20][273]}而沦为暗娼。小福子因被迫供养父亲和弟弟而沦为暗娼,最终堕入“白房子”成为妓女。宋凤贞为了奉养母亲被迫成为陈廉伯包养的暗娼,《微神》中的“她”为了奉养父亲而成为暗娼。对这一类暗娼形象,老舍给予了理解与同情,赞美其柔美的品性,悲悯其柔弱身躯承托的悲惨命运。暗娼命运的设置,实质上也有老舍本人族裔自尊心的影响。“旗人女子,从前多是颇有教养和极顾体面的,这时被逼到了死亡边缘,除去有的人自走了绝路,余下的某些人只好低头认命,跌落进卖淫业”^{③[266]}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所载《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报告:‘平内暗娼颇多,东北城一带尤甚……此项人口,以满族为多。’”^{④[266]}“体面”这一满族人最为看重的质素却在底层满族女性的悲惨命运中被剥夺,而老舍将被迫成为

^① 参见《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中史禄国的阐释,即根据满族人的风尚,一个年轻男子如果想向已婚妇女求爱(避开其丈夫),必须得到这位妇女的同意,而妇女通常不拒绝。男子如果礼节周到,则不会有太大问题。这种情况较多地出现在大家族中的房间之内,其他人会表现出不闻不问的态度。如果丈夫身有残疾,其妻子的情事甚至可以不同程度地公开表现。

^② 相关探讨参见陈泽曼、宋剑华:《老舍小说〈月牙儿〉的接受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9期;陈风苓:《老舍小说中的经济和道德关系——以妓女和商人群体为例》,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洪晴:《民国时期老舍的娼妓书写——以〈月牙儿〉为中心的社会学考察》,《台州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桂乙雯:《地狱与天堂的距离——浅析老舍笔下妓女形象》,《文学界(理论版)》,2012年第5期等论述。

暗娼的女性塑造成天使般善良的美好形象,这种爱“完全超越了传统道德观中的贞节观念”^{[21][4]},彰显出他对遭受这样命运的满族女性同胞“体面”的努力维护。

相比这些明确了暗娼身份的女性,《热包子》中邱嫂的暗娼形象建构更为隐蔽,只有从满族视角深入隐性叙事,才能揭示其暗娼特质。于吴燕曾归纳过老舍笔下暗娼形象的共同特质,即都是被逼为娼,具备纯洁善良、温柔等气质性格,具有传统女性的性格特征,结局多为死亡或消失^{[22][16]}。邱嫂的性格和情节发展与暗娼形象高度契合,但老舍对这一形象的塑造非常隐蔽。原因可能在于《热包子》创作年份较早,当时老舍刚刚开始短篇小说创作,以潜隐方式展现满族底层女性人物命运的写作手法尚不成熟,文本中的族群意识也在社会话语的压抑下只能通过隐性叙事呈现。在老舍后来创作的暗娼形象中,他以同情的态度为这些被折辱和损害的“小人物”鸣不平,“秉笔直书他们惨淡的命运和哀怨的心灵”^{[3][25]}。在塑造暗娼形象时,已不再如《热包子》一般隐蔽,而是着重描写她们的善良品性和忍耐生活苦难的一面。而老舍也从顾虑族群自尊的“小我”升华为探寻底层女性悲惨境遇的根源,展现其生存困境的“大我”。

不论在显性情节发展还是隐性叙事中,《热包子》中作者对邱嫂的情感态度都十分复杂,既有从男性欲望视角对女性的凝视,也有对邱嫂懵懂女性自主意识的理解。在隐性叙事中,这种感情融入了老舍复杂的满族情感,既因族裔自尊,不愿让邱嫂这样因生活所迫从事暗娼的满族底层女性暴露于故事情节之中;又希望借自己的笔将满族底层女性的悲惨命运彰显于众。这种矛盾而复杂的情感态度也反映了老舍自身敏感且复杂的民族心理。

结语

《热包子》中的隐性叙事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显性叙事中情节发展的迷雾始终影响着读者对小邱和邱嫂形象的理解。借助“隐式满族文学”的研究思路,深入挖掘出轨情感故事背后的人物身份和另一重叙事进程,可以发现,在显性叙事进程中温柔大方的邱嫂出轨的故事,在隐性叙事进程中则是一个邱嫂做暗娼的事实。这两种叙事进程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在并列运行中产生了特有的叙事张力。通过两者的对照与融合,方能对老舍这篇作品的主题意义有更为全面的理解。

另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通过作品分析出的隐性叙事进程,是老舍主动建构的,还是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其性别意识与族群意识自然流露形成的?宁一

中在与申丹讨论隐性进程的建构者时指出,“从申丹的修辞立场来看,作者一旦建构出隐性进程,它就诞生了,等待读者的挖掘”^{[23][154]}。因此,《热包子》隐性叙事进程,不论是老舍有意还是无意,都以线索、象征和潜流的形式被建构出来,等待读者发掘和阐释。

参考文献:

- [1] 孙洁.老舍和他的世纪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 2.
- [2] 老舍.老舍全集: 第 16 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192.
- [3] 关纪新.老舍评传 [M]. 增补本.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9.
- [4] 凯茜,著.马树德,译.试论老舍作品中的女性描写[C]//曾广灿.老舍与二十世纪:99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217.
- [5] 安基波夫斯基.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 [M]. 宋永毅,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110—111.
- [6] 陈红.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关于老舍小说《热包子》的阐释 [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3(3): 32—34, 43.
- [7] 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8] 老舍.热包子 [M]//老舍全集: 第 7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8—9.
- [9]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46—47.
- [10]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11] 关纪新.旗人老舍的文化解析 [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9: 39.
- [12] 舒乙.再谈老舍先生和满族文学 [J].满族研究, 1985(1).
- [13] 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 [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 33.
- [14] 文钟哲.从满族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看满族人民的妇女观 [J].满族研究, 1994(3).
- [15] 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 [M]. 高丙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 [16] 李晶.文化与自我:清代满族女性家庭地位特点的人类学阐释 [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04(6).
- [17] 曹金合.族群意识的抒写与民族文化的凸显:论老舍小说创作的满族文化情结 [J].东岳论丛, 2013(2).
- [18] 陈凤苓.老舍小说中的经济和道德关系:以妓女和商人群体为例 [D].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 2009: 6.
- [19] 刘大先.八旗心象:旗人文学、情感与社会(1840—1949)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296.
- [20] 老舍.月牙儿 [M]//老舍全集: 第 7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273.
- [21] 李玲.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 [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5(6).
- [22] 于吴燕.童年经验方程式:贫穷与文学叙述之老舍个案研究 [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61.

(下转第 81 页)

当代影视剧中新乡贤叙事的美学建构与地方表达

王琳

(安徽大学艺术学院, 合肥 230601)

摘要: 当代影视剧通过塑造乡村干部、返乡创业者、文化传承者等多样化的“新乡贤”角色, 将个体命运与乡村整体发展紧密交织, 以真挚的情感线索为纽带, 生动呈现出乡村变革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发展希望。新乡贤影像叙事不仅参与形塑乡村治理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更通过“情感共同体”的建构,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文化治理的新路径。这不仅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影像表达, 也为当代乡村振兴题材影视创作提供了理论参考。

关键词: 新乡贤; 乡贤叙事; 影视剧; 美学建构; 文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2025)05-0075-07

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 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成为反映乡村现实图景、传播优秀乡村文化、助力乡村建设的重要媒介载体。其中“新乡贤”作为乡村发展中的关键引领力量, 逐渐成为影视创作关注的焦点。“新乡贤”区别于传统乡贤, “他们不仅身兼传统乡贤的功能, 而且具有超越传统乡贤的现代意识与革命精神”^[1], 在乡村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且重要的引领作用。安徽作为农业大省, 拥有深厚的乡土文化底蕴与丰富的乡村发展实践经验, 其影视创作在展现乡村生活图景、塑造新乡贤形象方面独具地域特色。对安徽影视剧中新乡贤叙事的系统研究, 不仅能够深入了解安徽乡村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变迁与发展轨迹, 也能为当下乡村题材影视创作提供有益的安徽经验与启示, 进一步挖掘影视作品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

一、新乡贤形象的谱系建构

在安徽影视剧中, 新乡贤形象主要呈现政策践行者、创业开拓者和文化传承者三种类型, 分别对应了传统的“官乡贤”“富乡贤”“文乡贤”, 三者既各具特色又相互交融, 共同构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振兴叙事主体。他们以不同的身份和方式在乡村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既延续了传统乡贤的文化基因, 又注入了新时代的开拓精神与创新意识。这种新乡贤形象的塑造, 可

视为一种“影视形象谱系构建”, 如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所提到的“文化记忆的视觉档案”^{[2][12]}, 借助影像媒介将乡村的文化记忆与当代发展紧密相连, 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活力的乡村世界。

(一) 乡村政策践行者与引领者

在多部安徽影视剧中, 乡村干部被精心塑造为引领乡村发展的核心力量, 成为新乡贤群体中的典型代表。这类形象深刻体现了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不仅承担着政策宣传与落实的职能, 更以创新思维打破乡村发展桎梏, 带领村民探索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致富路径。他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深谙国家“三农”政策, 善于将宏观战略转化为符合本村实际的实施方案; 另一方面又扎根乡土文化, 通过重建村规民约、调解矛盾纠纷等方式强化乡村治理效能, 折射出新时代基层干部的奉献精神与责任担当。

电影《老喇叭新传》中的主人公郑文轩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乡村干部型新乡贤形象。身为老支书的他, 即便在退休后依然心系乡村发展, 以高度的责任感继续发挥余热。郑文轩巧妙利用顺口溜、快板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深入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工地车间, 积极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他就像乡村发展道路上的“引路人”, 不仅将最新的政策信息及时传递给村民, 更身体力行地带头践行政策, 用实际行动引导村民脱贫致富。在面对帮扶困难户“坐地炮”时, 郑文轩充分展现了基层干部的智慧与耐心。他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 而是凭借丰富的基层工作经

收稿日期: 2025-06-16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下安徽乡贤文化的影像建构与传播路径研究”(2023CX125)。

作者简介: 王琳(1988—), 女, 山西太原人, 讲师, 南京大学博士,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电影研究。

验,与“坐地炮”深入交流,了解其真实需求与顾虑,为其量身定制切实可行的致富方案。在郑文轩的耐心引导与帮助下,“坐地炮”不仅摆脱了贫困,更成为了村里的致富能手。这一情节生动展现了乡村干部型新乡贤的担当与智慧,他们扎根乡村,熟悉乡情,以坚定的信念和务实的行动推动着乡村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

电视剧《八月桂花开》中的驻村第一书记同样是乡村干部型新乡贤的典型。该剧剧中第一书记深入了解村情民意,整合当地资源,带领村民发展灵芝及茶产业,并积极开展网络直播销售,将当地特色农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这一形象深刻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干部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带领村民致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他们将国家政策与乡村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能力。电视剧《黄土高天》《永远的忠诚》中的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生产队长等也是此类形象,他们共同构成了乡村政策践行者的群像图谱,彰显了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中“政策转换器”与“实践开拓者”的双重身份。

(二)返乡的开拓者与先行者

随着乡村发展机遇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在外闯荡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创业,为乡村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先进理念。在安徽影视剧中,这类返乡创业者型新乡贤形象被赋予双重特质。他们是新技术的传播者,将互联网思维、现代农业技术引入乡村;又怀着对故土的深厚情感,成为乡土文化的守护者与创新者,在创业过程中注重传统技艺的现代化转型与乡村价值的重新发现。影视剧通过展现他们放弃城市高薪,重返乡村,克服资金短缺、观念冲突等重重困难的过程,既增强了戏剧张力,也艺术化地呈现了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

电视剧《花开石上》中的主人公尤勇敢是返乡创业者型新乡贤的杰出代表。作为三线子弟,尤勇敢从城市返回儿时成长地霍山县,与伙伴霍钢、女技术员郝胜男等一起,借助当地特有的资源霍山石斛进行创业。剧中详细展现了尤勇敢团队在石斛种植技术研发、产品深加工、品牌打造等方面的努力与创新。他们在大别山原始森林尝试“仿野生栽培”,搭建智能滴灌系统解决岩壁种植难题,联合科研团队将石斛多糖含量提升至 42%,并通过“基地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带动 1200 户村民参与种植,使霍山石斛从传统农产品升级为年产值 15 亿元的地理标志产品,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勇敢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返乡创业者通过现代技术与传统资源相结合,推动乡村产业的升级与转型的实践历程。

短剧《两山恋》以黄山黟县为背景,塑造了两位将青春奉献给乡村的大学生创业者形象。女主以徽州剪纸技艺为灵感设计山核桃包装,使农产品溢价 300%;

男主将百年徽派老宅改造成“非遗民宿”,通过短视频直播吸引城市游客。剧中“竹林养鸡 + 电商直播”“古村研学 + 手作体验”等情节,与安徽本土剧《花开石上》形成呼应,共同展现了返乡者以“现代技术激活传统文化”的振兴智慧。电视剧《幸福到万家》中的何幸福也是一位返乡创业者。她利用互联网思维和现代营销手段,推动了乡村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何幸福不仅成功解决了家乡农产品滞销的问题,还通过品牌化运营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带动了全村的经济发展。这些返乡创业者将城市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资源带回乡村,激活乡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作用,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推动者。

(三)乡村文化守护者与创新者

影视剧中文化传承者型新乡贤,以其独特的文化自觉与创新智慧,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纽带。这类形象通常具备双重特质。一是深耕地方文化精髓,是传统技艺的守护者;二是善于创造性转化,是文化创新的实践者。这种文化传承者型新乡贤的塑造,正是对项飙提到的“文化守成与创新之间的张力”^[3]的生动体现,他们在坚守传统文化根基的同时,积极探索创新路径,使乡村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电影《渼陂》中的梁平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这位放弃深圳高薪工作的返乡创业者,将现代管理理念与庐陵文化精髓有机融合。影片通过三个维度展现其文化创新实践。首先,他组织村民修复永慕堂等古建筑时,创新采用“以修代租”模式,既保护了文物又盘活了闲置资产;其次,他将梁氏家训“忠信笃敬”转化为村民公约,在调解纠纷时巧妙运用“吃祠堂酒”等传统方式化解矛盾;最后,开发“农耕体验 + 非遗工坊”旅游线路时,邀请老匠人现场展示徽州三雕技艺,使传统文化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这种“保护—传承—活化”的文化传承路径,使渼陂村从濒临消亡的空心村蜕变为年接待游客超 20 万人次的网红古村。

文化传承型乡贤形象在安徽影视作品中形成系列化呈现。电影《春风化雨》中,以全国优秀道德模范王直为原型的张运老人,退休后倾其所有创办留守儿童助教中心,将泾县宣纸制作技艺、查济古村风貌等地域文化元素融入教育实践,通过“一张纸的诞生”隐喻孩子成长,以“春风化雨”的教育理念守护乡村文化根脉,成为文化传承型乡贤的典型代表。电影《爱在乡村》则通过乡村教师汪晴、女村干部杨惠等女性群像,展现文化传承型乡贤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多元实践。汪晴将合肥本土民谣融入留守儿童课堂,杨惠组织村民编排反映乡村新貌的庐剧小品,返乡创业女大学生花桂花则把巢湖民歌元素植入农产品包装设计。黄梅戏电影

《鸭儿嫂》中的主人公张满秀在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展现出了文化传承者的特质。张满秀在养鸭摘掉贫困户帽子后，主动帮扶邻居小六子，致力于恢复大麻鸭品牌，实现了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结合，展现了新乡贤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的多元能力。这些形象共同构成了安徽影视中文化传承型乡贤“以文化人、以文兴村”的群像谱系，通过“传统技艺现代化转化”“地域文化产业化表达”等叙事路径，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可视化的实践样本。

二、新乡贤叙事的美学特征

在安徽影视剧的新乡贤叙事图谱中，个体命运与乡村发展的交织、情感线索的共鸣构建以及矛盾冲突的真实呈现，共同构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叙事体系。叙事视角上“以小见大”，将个体命运与乡村发展交织，既保证了作品的思想高度，又增强了故事的情感温度。叙事结构上“多线索并行”，将新乡贤的个人成长、事业发展与乡村的整体变革有机融合，形成相互映照、相互促进的叙事网络。叙事语言上化用方言土语，使作品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能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这些叙事特点既源于安徽深厚的乡土文化底蕴，也呼应着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通过多元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展现了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一）个体命运与乡村发展的深度交织

安徽影视剧中的新乡贤叙事，巧妙地将新乡贤的个体命运与乡村的整体发展紧密融合，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叙事脉络。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让观众在关注新乡贤个体命运起伏的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乡村发展的时代脉搏，凸显了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极大地强化了故事的感染力和现实意义。

电视剧《幸福到万家》的何幸福就是一位从普通的乡村女性成长为带领全村走向富裕的新乡贤。剧中何幸福所在的万家村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挑战。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推动了有机蔬菜种植项目的落地，不仅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还提升了村民的经济收入。同时，剧情真实展现了何幸福在创业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如村民的不理解、技术难题以及市场压力等，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剧中借何幸福的内心独白和行动，深刻表达了她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将个人事业与乡村发展紧密结合的信念。这种将个体成长与乡村发展紧密结合的叙事方式，让观众深刻体会到新乡贤与乡村发展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增强了故事的现实感和代入感。

纪录片《小岗纪事(第二季)》则从更宏观的视角

展现了个体命运与乡村发展的紧密交织。该片历经3年时间，跟踪记录了凤阳县小岗村2019—2021年的发展变化。剧中不仅展现了小岗村整体的发展规划与实践，还深入刻画了关正银等乡村干部和创业者的个体经历。观众可以看到关正银等新乡贤在推动土地流转、引进产业项目等过程中的努力与挑战，以及这些个体对小岗村整体发展的深远影响。这种叙事方式既展现了乡村发展的宏大图景，又深入挖掘了个体在其中的作用，使叙事更加立体、丰满。

（二）情感线索串联下的叙事共鸣

情感线索在安徽影视剧中的新乡贤叙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串联整个故事的关键纽带。这种情感叙事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更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理解乡村振兴的深层意义。创作者们通过细腻的情感刻画，展现新乡贤与村民之间的亲情、友情、乡情等丰富情感链接，将新乡贤的个人情感与集体记忆相融合，使乡村发展故事既有温度又有深度。

电影《清溪河》通过情感线索展现了新乡贤的奉献精神。影片讲述了富家女大学生欧阳希怡，毕业后不顾家人及男友的反对，毅然前往大别山革命老区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黄梅村支教的故事。在支教过程中，欧阳希怡不仅要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还要应对各种现实挑战。然而，她通过与留守儿童的互动，逐渐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剧中多次出现欧阳希怡与孩子们一起学习、生活的场景，这些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她对孩子们的关爱和付出。同时，欧阳希怡与村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也贯穿全剧，她不仅帮助孩子们解决学习上的困难，还为村民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种情感叙事不仅让观众感受到欧阳希怡的无私奉献，也增强了观众对新乡贤精神的认同感。

电影《风起秋浦河》同样通过情感线索串联起整个故事。影片以池州市石台县为叙事空间，依托诗仙李白《秋浦歌》的文化意境展开。影片采用双线叙事结构，展现了跨越60年的三代人的情感故事，深度挖掘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人性光辉与时代变革。片中返乡创业青年苏然面对家乡丰富的文旅资源，一心想打造特色旅游产业。但在初期，他遭遇了村民们的质疑与反对，村民们认为传统农耕才是根本，旅游开发会破坏生活的宁静。苏然没有气馁，他挨家挨户走访，从老人口中探寻秋浦河的古老传说，将这些故事融入旅游规划。当暴雨冲毁村里通往外界的唯一道路时，苏然第一时间组织年轻村民抢险，自己更是在泥水中奋战受伤。这一举动打动了村民，大家开始理解并支持他。苏然与村民之间从矛盾冲突到携手合作的情感转变，紧密交织着时代发展的需求与乡土传统的坚守，让观众看

到新乡贤在推动乡村发展进程中,如何以情感为纽带,化解新旧观念的碰撞,引领乡村迈向新征程。这种以情感线索串联的叙事方式,也令安徽影视剧中的新乡贤形象更加立体和生动。

(三)乡村变革矛盾冲突的真实呈现

安徽影视剧在新乡贤叙事中,敢于直面乡村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通过真实展现这些矛盾,使故事更具张力和现实批判性,同时也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思考。这种真实的呈现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乡村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展现了新乡贤在面对这些矛盾时的智慧与担当。

在一些反映乡村产业转型的影视作品中,新乡贤引进新的产业项目时,往往会面临传统观念的束缚、土地流转的纠纷、市场风险的冲击等诸多问题。电视剧《六尺巷新故事》生动展现了这些现实困境。剧中张义文在推动孔城镇发展无公害茶产业时,遭遇了多重阻力:老一辈村民固守“粮食保命”的传统观念,对改种茶叶充满疑虑;土地流转过程中,村民因担心失去祖业而拒绝签约;市场开拓阶段又面临品牌知名度不足的挑战。电视剧通过张义文率先拆除自家祖屋的震撼之举,以及他挨家挨户讲解产业规划、建立风险共担机制的务实做法,展现了新乡贤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领导智慧。电视剧《花开石上》同样如此,通过返乡创业者尤勇敢推动霍山石斛产业升级的叙事主线,深刻呈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对矛盾冲突的真实呈现和解决过程的细致描绘,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现实指导意义。

纪录片《仇岗卫士》则真实记录了环保乡贤张功利为保护村庄环境,与污染企业抗争的故事。剧中展现了张功利在面对化工厂污染自留地导致颗粒无收时的愤怒与无奈,以及他在自学法律、四处奔走维权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与挫折。同时,也展现了村民在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之间的矛盾心理,以及企业在环保与发展之间的挣扎。这种对现实矛盾的真实呈现,不仅让观众看到了新乡贤维权的艰辛,也引发了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安徽影视剧在新乡贤叙事中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通过这些影视作品,观众不仅能够感受到乡村产业转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还能看到新乡贤在面对这些矛盾时所展现出的智慧、勇气和担当。

三、新乡贤叙事的文化内涵与地域表达

(一)乡土文化的创新性现代转译

安徽影视剧中的新乡贤叙事不仅展现了新乡贤在

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通过创新性的现代转译,将丰富的乡土文化符号从传统伦理范畴转化为现代乡村治理的价值资源。而“文化转型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不仅仅是传统的延续,更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话与协商”^{[2][49]},因此乡土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不是单向的文化改造,而是多元主体的协商共建,最终实现了乡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价值重生。它不仅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还通过现代叙事手法和影像技术,赋予了这些文化新的生命力。

1. 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活化。安徽影视剧通过新乡贤形象的塑造,实现了对“徽商精神”“徽派建筑”“非遗技艺”等地域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这些文化符号不仅是乡村文化的象征,更是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所依赖的重要资源。这一过程体现了“文化嵌入”的治理逻辑,即传统文化符号通过新乡贤的本土化实践,从静态遗产转化为动态治理资源^[5]。在电视剧《六尺巷新故事》中,传统“徽商精神”的“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和义生财”被赋予了现代契约精神的内涵。剧中张义文在推动无公害茶产业发展时,将传统商德转化为“品牌信用体系”,建立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程可追溯机制。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概念替换,而是通过新乡贤的实践智慧,实现了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市场规则的有机融合。

徽派建筑以其独特的马头墙、精美的砖雕、木雕和石雕闻名于世,在影视叙事中同样经历了深刻的意义重构。电视剧《花开石上》将霍山传统民居的“四水归堂”空间格局,隐喻为新乡贤倡导的“资源汇聚”发展理念。剧中尤勇敢改造老宅创办合作社的情节,通过建筑空间的功能性转化,象征着封闭的宗族空间向开放的公共空间的转变。这种影像表达既保留了徽派建筑的美学特征,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非遗技艺的现代转译更为多元。安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黄梅戏、徽州木雕、剪纸等。电影《鸭儿嫂》中黄梅戏的运用颇具代表性。传统戏曲程式被解构重组:水袖动作转化为养殖劳作的身体语言,抒情唱段变为产品宣传的载体,戏台空间延伸至电商直播间。电视剧《花开石上》中,徽州木雕技艺被重新诠释。这种转化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通过新乡贤的媒介作用,让非遗技艺在现代语境中重获生命力。

2. 文化认同的代际协商。安徽影视剧借老一辈乡绅与新乡贤在宗族文化、乡规民约方面的观念碰撞,揭示了乡土文化于现代性冲击下的传承机制。这种代际协商不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韧性,也展现了新乡贤在推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如周晓虹在《传统与变迁》中强调,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长老权

威向知识权威的转移”^[6]。电影《永远的忠诚》中的土地流转争议，本质上反映了这种权威转换的阵痛。沈浩与村中长者在土地流转问题上的冲突，实质是两种治理理念的碰撞：一方坚持“祖宗之地不可易”的传统观念，另一方倡导“资源活化”的现代理念。剧中通过“红手印”这一符号，完成了传统民意表达方式与现代民主程序的嫁接。

在宗族文化方面，电视剧《六尺巷新故事》呈现了张氏宗祠从举行传统祭祀的场所，转变为村民议事、文化培训的多功能空间的过程。宗祠的这种空间功能拓展，象征着宗族文化从血缘认同向地缘共同体的演进。剧中也生动展现了文化认同的代际协商过程。乡规民约的现代转型同样值得关注。电视剧《幸福到万家》中，何幸福对村规中性别歧视条款的挑战，展现了新乡贤推动传统规范与现代法治接轨的努力。这种冲突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是通过协商对话，实现乡规民约的创造性转化。

3. 地域认同的影像建构。安徽影视剧通过新乡贤形象与地域文化元素的深度耦合，构建起“人—地—文化”的认同链条：一是空间维度，用方言、建筑等符号锚定“安徽乡村”的地理属性；二是时间维度，通过新乡贤对传统的转译，赋予地域文化现代生命力；三是社会维度，让地域认同成为凝聚村民、吸引外部资源的情感纽带。这种地域文化的构建不再是背景性存在，而成为新乡贤实践的意义载体，让地域文化真正参与到乡村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

地域认同影像建构的核心是让新乡贤成为地域文化的“转译者”——他们既熟悉方言、民俗等在地符号的文化密码，又具备将其转化为现代认同载体的能力。在电影《风起秋浦河》中，新乡贤苏然将李白诗句“秋浦锦驼鸟”转化为生态旅游的宣传语，用无人机航拍呈现“诗画秋浦”的地理景观，使传统诗词与现代影像共同构建起“诗意安徽”的地域想象。影片中大学生志愿者用方言短视频推广乡村旅游的行动，体现了新乡贤在搭建传统地域文化与青年认同之间所发挥的桥梁作用，这种“解码—转译—传播”^[7]的叙事逻辑，使地域认同不再是静态的文化标签，而成为由新乡贤推动的、动态的文化再生产过程。

新乡贤叙事中密集的方言、民俗等文化元素在建构地域认同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电影《大山之恋》中穿插的安庆方言对白，不仅增强了剧作的真实感，更成为文化认同的标记。剧中新乡贤与村民用方言交流的场景，象征着文化根脉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方言的使用并非封闭排他，而是通过字幕等辅助手段，实现了地域特色与普遍理解的平衡。民俗元素的叙事功能同样

突出。短剧《两山恋》中端午龙舟赛的情节设计颇具匠心：一方面，龙舟竞渡的传统形式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其内涵已从祈福仪式转化为乡村旅游的特色项目。这种转化不是对民俗的简单利用，而是通过新乡贤的重新诠释，将地域文化符号从封闭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开放的共享性资源。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影视化实践

安徽影视剧中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视化实践，不仅展现了新乡贤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通过具体案例，生动呈现了乡村振兴的多元路径和现实难题。新乡贤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创新治理模式、促进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乡村发展的时代进程，更通过艺术化的表达，构建了产业转型与治理创新的可视化样本，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兼具地域特色和普适意义的经验参照。

1. 产业发展的路径探索。安徽影视剧通过新乡贤叙事系统展现了数字经济赋能、文旅融合创新、三产协同发展等多元路径，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这些作品既呈现了产业发展的创新模式，也不回避转型过程中的现实困境，通过艺术化的表达，折射出乡村振兴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数字经济助力乡村产业升级。电视剧《花开石上》中“岩壁石斛种植”技术从村民质疑到规模化应用的过程，生动展现了数字经济在乡村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剧中新乡贤尤勇敢通过引入智能滴灌系统，成功解决了岩壁种植的难题，将霍山石斛升级为年产值 15 亿元的地理标志产品。类似案例也出现在电视剧《幸福到万家》中，何幸福创办的“幸福电商服务站”生动展现了数字经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升级。面对村民对电商的疑虑，何幸福通过建设村级电商服务站、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建立质量追溯体系等举措，解决了设施短板、人才匮乏、信任危机等数字下乡中的诸多问题。这种“技术示范+数字赋能”的模式，正是新乡贤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典型路径。

乡村文旅融合激发乡村新活力。微短剧《两山恋》通过返乡青年林悦的创业故事，展现了民宿经济对空心村的激活作用。剧中林悦在改造祖宅经营民宿时，面临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的多重矛盾。建筑改造中“修旧如旧”与功能优化的冲突、民俗表演商业化引发的真实性争议、游客需求与村民生活的协调难题。这些情节精准对应了当前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普遍困境。林悦的创新实践颇具启示意义：她采用“分级运营”模式，将精品院落与普惠客房相结合；组织村民成立“古村保护监督队”，让原住民参与管理决策；开发“非遗体验

工坊”，让游客深度参与徽墨制作、宣纸生产等传统工艺。这种“文化为魂、产业为体”的发展思路，使该村从人口外流的空心村蜕变为年接待游客超 10 万人次的网红打卡地。《鸭儿嫂》中张满秀打造的“麻鸭产业链 + 非遗体验”模式同样值得关注，她将传统养殖与黄梅戏表演、农家美食相结合，形成了“上午喂鸭子、中午看大戏、傍晚品鸭宴”的一日游线路，年综合收入突破 500 万元。

三产融合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微电影《茶乡新事》完整呈现了茶产业“种植—加工—文旅”全链条升级的生动实践。剧中陆远航推动的有机茶转型面临重重阻力：老茶农坚守传统种植方式，对有机标准心存疑虑；加工环节的现代化设备遭遇老师傅“没有炭火香”的否定；茶旅融合中的表演项目被批“花架子”。这些冲突真实反映了三产融合中的观念碰撞和技术断层。陆远航的解决方案体现了系统思维：在种植端引入“有机种植保险”降低转型风险；在加工环节保留传统工艺核心环节，同时引入标准化质量控制；在文旅融合中创新“沉浸式采茶体验”，让游客参与从采摘到炒制的全过程。特别是剧中“斗茶大会”的创意设计，将传统民俗与现代营销完美结合，既保留了文化仪式感，又打开了高端市场。这种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模式，使该村茶叶产值三年内增长 3 倍，带动 200 多户茶农增收。

2. 治理创新的经验呈现。乡村治理需要实现传统道德权威与现代法理权威的有机结合，而新乡贤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安徽影视剧中的新乡贤叙事展现了乡村振兴中的治理创新经验，揭示了传统资源现代转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法治德治融合的实践路径。新乡贤们凭借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力和现代治理理念，巧妙地将传统道德权威与现代法理权威相结合，通过协调各方利益、化解矛盾纠纷、引领乡村风尚，推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成为乡村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

安徽影视剧巧妙运用乡贤叙事视角，将地域文化基因转化为现代治理资源。《六尺巷新故事》以桐城派文化为底色，通过张义文这位新乡贤的调解实践，构建起“文脉治理”的新范式。剧中“三阶调解法”的运作极具徽文化特色：第一步“品茶说理”延续徽商“以茶会友”的传统；第二步“家训引证”调用《桐城家训》的经典训喻；第三步“立约明责”则转化为现代契约文书。这三步不仅助力新乡贤张义文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解决了村民之间的纠纷，还通过组织村民学习“六尺巷”典故，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这种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不仅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还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电视剧《老喇叭新传》则通过郑文轩的乡贤视角，全景式展现了皖北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生态。剧中通过“退休教师”“基层干部”“乡贤能人”“村民代表”构建了三维治理网络，形成“政策解读—利益协调—技术呈现”的治理闭环，实现了基层治理效能的最大化。新乡贤退休教师郑文轩作为“政策翻译官”，用老式广播召集村民，将乡村振兴文件转化为方言快板、顺口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村干部则主动担任“民情收集员”，负责思想动员及工作督促。乡贤企业家王秀莲充当“矛盾缓冲器”，在祠堂摆上茶点营造协商氛围，用商业思维调解利益纠纷。村民代表李娟等人则是“技术指导员”，帮助村民解决现实问题，使得政策真正落地。而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则通过何幸福的努力，展现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何幸福在面对不公正待遇时，勇敢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也尊重和利用乡规民约来解决村民之间的矛盾。这种法治德治融合的实践，不仅保护了村民的合法权益，还促进了乡村的和谐稳定。何幸福通过组织村民学习法律知识，提高了村民的法律意识，同时也通过乡规民约的调和，增强了村民的道德约束力。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安徽影视剧中新乡贤叙事的系统考察，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影视文化生产的创新路径。尽管存在对传统文化符号的使用流于表面，对女性乡贤、少数民族乡贤等群体呈现不足等局限，安徽影视剧中的新乡贤叙事仍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刻的社会洞察，构建了乡村振兴的“影像样本”。一是在角色塑造上构建了“政策执行者—产业创新者—文化转译者”新乡贤形象图谱，为全国乡村振兴题材创作提供了可复制的角色范式。二是在叙事策略上形成了“个体成长史”与“乡村发展史”的双线交织结构，实现了微观叙事与宏观叙事的有机统一，并以真挚的情感线索为纽带，生动呈现出乡村变革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发展希望。三是在文化表达上探索出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性转换机制，为地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示范样本。这些创新实践不仅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影像表达，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文化治理的新路径，展现了影视艺术参与社会变革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 [1] 王琳.解放区乡土文学中的乡贤叙事研究 [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2).
- [2] 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

- 份 [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3] 项飙. 跨越边界的社区: 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M]. 修订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89.
- [4] 范建华, 袁媛, 周丽. 嵌入型治理: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逻辑与实践路径 [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2).
- [5] 周晓虹. 传统与变迁: 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215.
- [6]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7] GEERTZ C. *Local Knowledge :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M]. New York : Basic Books, 1983.

Aesthetic Construction and Local Expression of the New Rural Elite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Film and Television

WANG Lin

(School of Ar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Contemporary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vividly present the conflicts and developmental prospects in rural transformation by shaping diverse new rural elite roles such as village cadres, returning entrepreneurs, and cultural inheritors. These narratives intricately intertwine individual destinies with overall rural development, using sincere emotional threads as the connecting link. The new rural elite visual narratives not only participate in shaping the local knowledge system of rural governance but also provide new pathways for cultural governanc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motional community”. This not only enriches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regional culture but also offer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contemporary rural revitalization-themed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ions.

Key words: new rural elite; rural elite narrative; film and television dramas; aesthetic construction; cultural governance

(上接第 74 页)

- [23] 宁一中, 段江丽. 超越亚里士多德诗学开创的研究传统: 申丹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述论 [J]. 湖南社会科学, 2023(2): 154.

The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of Lao She's *Hot Steamed Bun*

ZHAO L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Lao She's short story *Hot Steamed Bun* illustrates a story of the emotional crisis between Xiao Qiu, a common citizen from the lower class of the city, and his wif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line, the author tries to present Qiu's wife's infidelity through the child's perspective with the narrator “I” in the progression of the explicit narrative, but unconsciously mixes with the implicit author's male-centered perspective.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there exists a hidden ideological track, which shows the fate of the Manchu common citizens' lives in the form of a covert narrative progression. In the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 the characters of *Hot Steamed Bun* change from single to multiple, and the story also becomes full of tension between the mutual contrast and supplement in the dual progression.

Key words: Lao She; *Hot Steamed Bun*; dual narrative progress; gender discourse; ethnic consciousness

阶级冲突与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 ——哈代小说中的教育与婚恋问题的实质

魏凤蝶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教育与婚恋的关系问题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主题之一。哈代认为教育在促进威塞克斯受教育者阶级流动的同时,也会使其与乡村共同体逐渐分离;威塞克斯社会不同阶级间的婚恋表面弥合了双方的阶级差异,实则这种差异难以消除。哈代通过小说中人物教育理想与婚恋的双重失败,揭示了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严重对立及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 哈代; 婚恋; 教育; 阶级冲突; 工人阶级意识觉醒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5287 (2025) 05-0082-06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主要描写阶级差异所导致的婚恋问题。哈代的第一部小说《穷人与贵妇》因为过于关注阶级问题遭到出版公司的拒绝^{[1][6]},梅伦·威廉姆斯(Merryn Williams)认为“恋人之间的阶级差异和情绪表现成为哈代小说更加成熟后的一个主要的主题”^{[2][12]}。教育作为促进阶级流动的方式之一,在哈代的小说中成为影响婚恋的重要因素。本文拟探寻哈代如何以文学形式表现和回应19世纪英国严重的阶级矛盾对乡村共同体的冲击,并试图借此还原英国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过程。

一、乡村受教育者的婚恋:婚姻选择困境

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世纪的英格兰民众对精致且有教养的生活越来越向往。由于教育可以塑造个人适应更高阶层的行为和习惯,提供自我提升和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自然受到维多利亚时期规模和重要性都在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重视。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强调,应该“坚持不懈地培养关于美观、优雅和得体的意识,使人们越来越接近这一理想,而且使粗鄙的人也乐于接受”^{[3][13]}。阿诺德是哈代最为关注的当代思想家之一,其“追求完美”的文化观代表了当时主流社会的文化倾向,也引起了哈代的共鸣。哈代曾在笔记中完整摘录了阿诺德关于“粗鄙之气”和“文雅”的说

法^{[4][89]}。出生于英格兰西南部乡村的哈代通过学校教育和自我学习最终摆脱了“粗鄙之气”,文学修养不断提高。随着1874年《远离尘嚣》的发表,哈代已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文学青年之一,并与中产阶级出身的埃玛结为夫妻。然而,正如迈克尔·米尔盖特(Michael Millgate)所说,职业的中产阶级身份对哈代来说是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他不清楚如何将自己和妻子放入母亲所处的环境之中^{[5][163]}。1880年,哈代不再被阿诺德的观点打动^{[1][134]}。他认为文化虽增加了人的智性,但也造成人的“无根”状态,这也是成为作家的哈代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哈代在小说中塑造了通过学校教育而获得阶级跃升的女性,并突出了资产阶级文明对她们的价值观和婚姻观的影响。19世纪的英国教育不再是男性的专属权利,女性也获得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女子教育机构,如1848创办的女王学院,1850年成立的北伦敦女子高等学校^{[6][117]},等等。19世纪60年代末,英国制定了《捐款学校法》,明确提出女子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7][15]}。英国女性受教育的程度逐步提高。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中家庭背景稍好的女性,如范茜·戴、巴丝谢芭·埃弗登、格雷丝·麦尔布礼等均接受了学校教育。威塞克斯实际上属于“边沿乡村”,这类乡村处在“风俗与教育”之间,乡村世界在受过学校教育的现代人眼中,“风俗和记忆上是旧的”“感官上也是旧的”^{[8][270]}。于是,学成归来的乡村女

性在选择伴侣时，实际上是对不同生活方式乃至社会阶层的选择。

威塞克斯受过学校教育的女性所面临的婚姻问题被抽象为乡村环境中培养的自然天性与学校教育中形成的精致文雅的上流社会的观念和习惯之间的冲突。在《绿荫下》中，哈代开始了对教育、阶级与婚姻关系的探讨。范茜爱车户之子迪克·杜威，并答应了他的求婚，但也羡慕从城里来的年轻乡村牧师梅伯的优雅思想和生活，以及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也答应了他的求婚，有时又接受富有的农场主夏纳的殷勤。通过范茜选择丈夫的波折，哈代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教育之于人的品味和价值观的影响及其可能造成的乡土震荡。范茜受教育后回到乡村，以城市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也倾向于以体面、金钱和社会地位来选择伴侣。尽管最终她和迪克如期举行了婚礼，但两人之间的阶级差异仍然很明显，这体现在范茜劝说自己的父亲以及迪克的父亲不要再说土话。土气是农村社会的特色，范茜对土气的排斥本质上是对乡土文化的排斥，也反映了受教育者无形中的文化选择。这使得迪克认为范茜首先关心的是“她的头发和容貌，接下来是她的衣服和帽子；其次可能才轮到我本人”^{[9][158]}。小说最后的结尾意味深长：迪克永远不会知道范茜与牧师之间的秘密。这也是哈代对威塞克斯社会未来的担忧，即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还乡者与乡土自然文明之间的冲突一直潜藏，迪克和范茜的婚姻未来仍有很多问题等待着他们去解决。

《远离尘嚣》中受过教育的女主人公的婚恋问题仍然被置于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之中。巴丝谢芭刚出场时，在马路上照镜子自我欣赏，表明她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巴丝谢芭引以为傲的婚姻资本。当农民加布里埃尔·奥克向她求婚，并许诺结婚后会过上城市上流社会的生活时，巴丝谢芭在短暂心动后仍将其拒绝，对奥克说：“我受的教育比你高。”^{[10][34]}不过小说并未将奥克当作粗鲁的农民去描绘，而是更突出他通过经验和自我学习所获得的智慧。他的藏书有《青年至友》《野兽指南》《兽医外科》《失乐园》《天路历程》《鲁滨漂流记》《阿什字典》《沃金盖姆算数》^{[10][76-77]}，这些书“培养了奥克身上的闪光点，不仅使他与他的下层阶级的同龄人区别开来，而且与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受过教育的人区别开来”^{[11][192]}。可靠的专业技能使他具有阶级向上流动的可能，而他美好的品行是一个幸福家庭所必须的保障。随着体面的、带有城市光环的特罗伊中士——尽管他本是威塞克斯乡村中的一员，不过出场时已经不能算真正的乡下人了——被枪杀等重大变故的发生，奥克重新回到农场主的位置，与巴丝谢芭结为夫妻。不过他们的结

合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乡村社会成长起来的女资产者，在经历了婚姻的重大挫折后无奈又理性的选择——选择代表城市文明的特罗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只能选择能帮她守住财产的技术性农民。在这场选择理想丈夫的过程中，阶级的流动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与巴丝谢芭的农场事业联系在一起，揭示了威塞克斯受过教育的女性在婚姻选择上的艰难。

在《绿荫下》和《远离尘嚣》中，哈代虽对还乡的教育者挑战乡村婚恋秩序感到担忧，但仍自信能处理好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而《林地居民》则表现出哈代反文明以维护乡村稳定性的倾向，因为在威塞克斯乡民的教育与婚姻的冲突更为激烈。在小辛托克以婚姻关系来维护近亲关系是普遍的。由于亲戚关系以及对基尔斯·维恩特波恩的父亲的愧疚，林区商人乔治·麦尔布礼一直打算将女儿许配给维恩特波恩。为了使这份回馈更加珍贵，他将女儿格雷丝送到寄宿学校，并每年支付一百多英镑的学费。然而，这一举动却导致后来麦尔布礼在女儿的婚事上摇摆不定。梅根·沃德(Megan Ward)认为《林地居民》显示出教育培养既是自我实践又是自我的消除，是完全与自然分离的过程^{[12][868]}。格雷丝学成归来后，往日那些曾使她为之心动的“知识和兴趣已经从她身上消失”^{[13][52]}，她看到生活之外的其他价值。这种现代教育的直接后果是格雷丝开始“按照现代教育的标准重新建立新的道德和人生价值原则”^{[14][165]}。这一规则是反乡土的，乡土社会中的青年陷入到一种无法解决的婚恋悲剧中：既无法保持自然文明的宗法恋爱关系，又无法依据现代文明的法律摆脱一场糟糕婚姻。其结果是格雷丝虽然脱离了原来的阶级，但又无法在新的阶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文化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的批判，他认为自然与文化是一种辩证关系，都是人的属性，“成问题的是，我们被置于自然与文化的切点之间——极为关注精神分析的相切——的事实。文化不是我们的本性，但文化属于我们的本性，正是这使得我们的生活举步维艰”^{[15][114]}。当格雷丝哭着说“文化给我带来的只是种种的不便和烦恼……但愿您从来不曾送我到那些您一心指望的时髦的学校去。这一切都是它引起的”^{[13][297]}时，她用一种反文化的观点揭示了教育与她尴尬的社会地位的关系。格雷丝的痛苦在于接受了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教育，这使传统的力量对她不再适用，她自身也割裂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困境揭示了当时文化的强势霸权，而这种霸权主义是英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达到顶峰的产物。格雷丝的婚恋悲剧实际上也是19世纪英国乡村社会中接受了现代教育的女性所面临的普遍悲剧。

更为严重的是教育只是表面上弥合了小说中人物的阶级差距，事实上阶级偏见难以消除。《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的母亲迷信《命书大全》、讲土语、唱口传歌曲。苔丝上过小学，受一个伦敦毕业的女教师教导，在家里就说土话，在外面或者和有身份的人谈话则说标准英语。苔丝的母亲和苔丝“仿佛是詹姆士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杂凑在一起”^{[16][38]}。作为社会底层，苔丝的母亲认为命运按照上帝的安排，具有不可抗性。这种观点通过家庭的熏陶成为苔丝世界观的底色。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认为爱是一种真理的建构，意味着从差异的角度体验生活和世界^{[17][55]}。苔丝和安玑·克莱的恋爱成为她重构自我的一次机会。在恋爱中，苔丝学习克莱文雅的语言和激进的思想，通过他的视角看世界，这意味着她习得的知识正解构着自身阶级的主体性。然而当苔丝与亚雷再次相遇并以克莱的思想对抗亚雷时，亚雷的宗教狂热被瓦解，再一次陷入到色欲之中。苔丝的工人阶级意识尚未觉醒，也不具备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她利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而伤害了自身的完整性，陷入到无立场的尴尬之中。苔丝与克莱的不幸婚姻正是这种阶级复杂性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克莱的阶级意识在他的教育经历中早已经形成。尽管他后来选择了叛逆性的自我教育，“对于社会的习俗和礼节，开始显出非常不注意。他越来越把地位、财富这一类物质方面的优越不看在眼里”^{[16][17]}，并对自身的阶级属性产生了质疑。然而，克莱难以融入乡村，他对乡村的喜爱更多是出于对城市的厌恶，对自身阶级模糊的反叛意识，他将这些情感转化为对乡村自然环境的喜爱，并投射到乡村女孩苔丝身上。很明显，克莱对苔丝的爱恋揭示了一个叛逆的资产阶级男性如何因不自知的阶级偏见背离了真实的人性，造成了自己和他人的不幸。

在城市与乡村的徘徊正是哈代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哈代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如同格雷丝的家乡小辛托克、苔丝的家乡布雷谷那样偏僻、落后，那里的人们保留着古朴的风俗民情与文化传统。但是，“成年后的哈代不但离开了这种生活，他在思维方式、表情达意的方式上也与童年时代相去甚远，这是他多年在伦敦的生活经历与博览群书的必然结果”^{[18][67]}。他获得了旁观者的视角，与童年的生和人事有了一层隔膜，寄希望于自然的乡村来弥补城市生活的浮华与喧嚣，但又无法忽视工业革命中日益突出的阶级问题对个人和家庭幸福的影响。这种批判性在《绿荫下》和《远离尘嚣》中已有所显露，在《林地居民》中十分突出，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呈现出极端的对抗性，这意味着威塞克斯人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二、教育与婚恋的双重失败：阶级意识觉醒

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带来一种新的理念，即深信凭借个人努力可以实现任何理想。哈代小说中的男性期待教育能够打破社会阶级的壁垒，实现阶级跃迁。但哈代认识到无论是以教育来达到阶级提升还是以婚姻来达到阶级提升都只是一种幻想，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威塞克斯无处不在的悲剧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只为资产阶级服务，更多的人则被排除在外，没有晋升途径。教育和婚恋的双重失败，唤起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这从另一角度解释了19世纪英国工人运动产生的根源。

哈代小说中主人公的阶级意识觉醒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更为严重的婚姻悲剧。《还乡》中的姚伯在巴黎阅读过空想社会主义的书籍，看清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后回到家乡爱敦荒原，希望通过兴办教育让爱敦人拥有智慧。姚伯回到乡村的行为更像是自我反叛，也意味着他将陷入到自身的资产阶级身份被颠覆的危险之中。姚伯的母亲是副牧师的女儿，对门第看得很重，希望姚伯回到巴黎从事珠宝生意。来到荒原的游苔莎选择嫁给姚伯更多的是因为他有带自己去巴黎的可能，因此她无法理解姚伯还乡从事教育、启发爱敦荒原民众的梦想。村民们普遍追求金钱和社会地位，海滨藉口繁荣的景象对他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显得姚伯的理想与爱敦荒原格格不入。然而姚伯没有意识到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在当时无法成功，这种行为客观上却造成了他的母亲和妻子的不幸。此时哈代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只是将游苔莎和她的情人韦狄的落水身亡悲剧归结于他们对道德的背弃。这体现在哈代让姚伯最终成为“道德讲演”的宣道师，但他的讲演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哈代对此是怀疑的，也不清楚如何才能防止这类婚姻悲剧再次出现。

如果说在《还乡》中哈代企图通过教育唤醒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侵蚀的婚恋道德，那么在其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中，哈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聚焦在教育与婚姻的阶级性，以及与更公平、更民主的社会理想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此时哈代与埃玛的婚姻已经难以维继了。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大胆地表达自己对婚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不满。《无名的裘德》也被视为哈代关于婚姻和教育问题的小说。哈代借助教育和婚姻问题，揭示了上层社会为巩固阶级利益，利用文化和法律排斥工人阶级，同时展现了下层阶级提升阶层地位的渴望。

19世纪，英国的教育很长一段时间是分阶级的，

其突出特点之一是“坚持对不同的阶级施以不同的教育，即实行所谓的双轨制教育”^{[7][14]}。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指出，在英国“势利”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20年代，那时牛津和剑桥大学通常会在考试名册上有意识地将普通学生同贵族子弟区分开来，普通学生姓名旁注上“sine nobilitate”(拉丁文，无高贵血统的意思)，简略为“S. nob”(现代英语中的snob，势利者的意思)^{[19][11-12]}。这种情况在19世纪中叶有所改变。19世纪50年代，许多公立学校设立了入学考试，上公立学校的费用有所增加，学生需要负担每年一个课程超过300英镑的费用^{[20][47]}。因为费用的高昂让不少普通家庭难以承受而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上层社会教育政策的阶级偏向也使得中下层阶级进入高等学府更加困难。但此时“一些白手起家的英雄自传，以及各种讲述人性升华、迅速发家并尽享人生乐事的励志书籍充斥了书架”^{[19][52]}。在《无名的裘德》中，这些现象与婚姻问题一起成为裘德失败的原因。裘德有强烈学术理想，他苦读希腊文、拉丁文的大量经典著作，然而却无法进入最高的学府。努力了10年才来到基督寺(指代牛津大学)的裘德，发现当初离开玛丽格伦来基督寺讨文凭的理查·费劳孙老师还是一个小学教员。如若公开竞争奖学金和助学金，裘德需要辛勤工作至少15年。裘德给大学老师写信讲述他的学术理想，结果遭到冷酷的拒绝，“既身为工人，则谨守本分，安于就业”^{[21][149]}。正如表妹淑·布莱德赫所见，基督寺把那些求知却没有钱、没有机会、没有朋友的人“挤到大门以外”^{[21][193]}。裘德的求学经历更像是哈代自身经历的写照。哈代年少时就到建筑事务所做学徒，去牛津大学这样的学校对于哈代来说，遥不可及^{[22][75]}。

裘德的悲剧在于他始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学术梦想，而实现这种梦想的遥遥无期不断摧毁着他的精神。“欲望乃是社会的产物”^{[23][98]}，裘德之所以不放弃学术梦想一方面源自他对学术的热爱，另一方面源于19世纪崛起的中产阶级表现出的强烈教育需求。裘德向往进入基督寺这座“光明的城市”——“人类的导师出现的地方”^{[21][25]}，反映出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和主体意识，但受教育之路却格外艰辛。哈代通过裘德的教育失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为维护上层阶级利益，将中下层阶级排除在高等教育体系之外的真相。哈代将矛头对准基督寺所代表的上层文化和制度，认为传统的上层社会和依靠工业革命而获得财富的工业资产者凭借优势地位获得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基督寺俨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的维护者。通过自我教育，阶级意识觉醒的裘德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排他性。这一点从哈代的个人经历可以证明。1862年，哈

代参加建筑比赛获银质奖，但由于乡下人的身份，评审取消了银质奖章所附发的10英镑奖金^{[24][36-37]}。同年，哈代还参加了建筑师泰德主持的设计比赛，并用所获得的3英镑奖金买了一套希腊剧作家所写的戏剧书籍和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完全投入到自我教育的狂热里。晚年的时候他认为任何事情都可以学习，只要一个人选对了书和不怕困难，英国文学的文体和技巧都可以在教科书里学到，一个人需要做的是找到一些正确的教科书^{[24][37-38]}。哈代对教育制度的批判可见一斑。

与早期小说比起来，《无名的裘德》表现了走向中产阶级的裘德和淑对中产阶级的法律、严苛的婚姻观念的遵从，即作为工人阶级的他们将自己投入到中产阶级的自我建构中，中产阶级则在维多利亚时代常常因为“拘泥于道德律令而显得过于严肃，心事重重，从而导致了神经官能症或精神分裂症”^{[25][185]}。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中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这种中产阶级的道德律令对自私自利的工人阶级女孩艾拉白拉·邓没有效用，她在意识到和裘德在一起没有物质利益后嫁给了澳大利亚商人，并卖掉了和裘德的结婚家具，甚至包括装有裘德相片的相框。丈夫死后，艾拉白拉又强行和裘德复合，婚后却任由生病的裘德自生自灭。对于寄希望于通过教育跨越阶级的裘德来说，艾拉白拉是阻碍他获得社会阶级上升和更丰富的精神世界的阻碍，她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不断摧毁着裘德向上的决心。这恰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描绘的那样：知识和肉欲的冲突。而出身工人阶级的裘德，试图按照中产阶级的方式生活必然会遭遇不幸，但他也难苟同艾拉白拉式的享乐主义。在他看来，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意味着情欲之爱是必须加以抛弃的。裘德的婚姻悲剧显示出工人阶级在追求更高的社会参与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阻碍。

与艾拉白拉肉欲之爱相对照的是裘德与淑志趣相投的爱。裘德和淑的爱情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盟，他们在知识上相互促进，同时又彼此解构。淑读过很多书，又当过教员，拥有才华和敏锐的思想。她虽是圣物制造所里的工艺家，却将异教神像放在房间里。淑认为，尽管裘德近乎痴迷地崇拜基督寺的学者，但这些人在世界的历史中并不一定占据重要的位置，因而不必仰望他们。在婚恋上，淑“没有男女之感”^{[21][191]}，她认为女性在婚姻中不应该服务于男性。她否定现代文明，反抗社会制度和习俗中的暴力，代表着维多利亚时代叛逆的女性已具有了新女性的意识。在淑这样的新女性的启蒙下，裘德最终认识到基督寺的本质是为资产阶级上层服务，他的梦想注定要破产。裘德与艾拉白拉和淑的婚恋经历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教育、神学

和婚姻制度所蕴含的商品拜物教性质。

小说深入探讨了婚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1857 年《婚姻诉讼法》标志着英国离婚制度从教会的控制转向世俗化管理, 在此之前婚姻具有宗教意味, 离婚的程序和费用让很多人对离婚望而却步。裘德和淑各自与自己的配偶分开, 这在保守的人看来, 他们败坏了社会道德。确实, 这部小说发表后便遭大主教公开烧毁、被图书馆禁止借阅。哈代通过裘德、淑、艾拉白拉、费劳孙几个人物之间的婚恋揭示出“自然法与社会和其他环境因素之间的冲突”^{[26][3]}, 并认为这种法律制度乃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哈代将讨论婚姻制度的合理性放置到小说的中心, 认为它是违反人性的, 是资产阶级虚伪道德的体现。

这种对于婚姻制度的批判在哈代其他小说中也可以看到。《林地居民》中格雷丝的丈夫出轨, 但她却不能离婚。《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和克莱因为无法离婚而痛苦。对这种状况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位文学大家查尔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做过很好的描写。煤炭工人斯梯芬·布拉克普儿找雇主庞得贝帮助自己解决不幸婚姻时的一段对话显示了离婚在 1857 年前的艰难:

“我非要摆脱这女人不可, 我想知道究竟该怎么办?”

“没有办法,”庞得贝先生回答说。

“要是我伤害了她, 东家, 有哪条法律来惩治我么?”

“当然有。”

“要是我逃离她, 有哪条法律来惩治我么?”

“当然有。”

“要是我跟另一个亲爱的姑娘结婚, 有哪条法律来惩治我么?”

“当然有。”

……

“人生的婚姻结合是神圣的,”庞得贝说, “而且—而且—非维持不可。”

“我在报上看每次巡回审判、每次开庭的新闻……多么奇怪,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困难不能用什么方法或者条件把两个人之间的锁链打开, 而却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使很多人流血, 使许多结过婚的人争吵, 犯命案, 以及暴死。”^{[27][89]}

尽管《婚姻诉讼法》较之前更为简化, 但仍将离婚的法定理由限定于通奸一种, 并要求原告自身没有过错以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谋行为。因此, 离婚仍然很困难。哈代认为这是违反人性的。通过裘德在教育与婚姻上的双重失败, 哈代质疑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的合理性, 认识到它代表的只是极少数人的利益。

结语

从《绿荫下》到《无名的裘德》, 哈代揭示了资产阶级教育对乡村受教育者婚恋的影响: 他们回到乡村与原有乡村体系相抵触, 无法拥有幸福的婚姻; 他们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又受到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限制。此时威塞克斯人不再仅仅受到上层阶级的压力, 而是被迫服从整个工业文明的制度。这个过程既显示着阶级对立, 也反映着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格奥尔格·卢卡奇所谓的“阶级意识”。卢卡奇认为“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 以及对于其生活的经济基础还是属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许多阶层的行为来说, 它们的阶级意识就其本质而言既不可能具有一种十分清晰的形式, 也不可能有意识地对历史事件发生影响。这首先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中, 阶级利益决不可能以十分清晰的(经济的)形式表现出来”^{[28][109-110]}。当经济的、阶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时, 阶级觉醒的可能性就得到了更大的激发。因此, 威塞克斯人的婚恋问题就成为不同阶级之间斗争的问题。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 这些威塞克斯的乡民即使反抗, 也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相反只有融于资本主义文明才能生存下去, 否则他们会始终被当作异端而被打压。马克思对这个过程做过这样的评价: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 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 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 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 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29][134]} 英国工人阶级在此时开启了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时代, 拉开了经济、政治和婚姻道德等民主化潮流的时代序幕。这种冲突在哈代的时代达到顶峰, 这种阶级问题与民主潮流的冲突最大限度地显现出来, 其小说中的婚恋问题实际上是这两者斗争的结果。

参考文献 :

- [1] HARDY F E. *The Life of Thomas Hardy : 1840–1928* [M]. London : Macmillan, 1962.
- [2] WILLIAMS M. *Thomas Hardy and Rural England* [M]. London :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72.
- [3] 阿诺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政治与社会批评 [M]. 韩敏中,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4] 管南异. 敏感的启蒙: 《林地居民》中的文化对话 [J]. 杭州师

- 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7(5).
- [5] MILLGATE M. *Thomas Hardy: A Biography Revisited* [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6] 奥尔德里奇.简明英国教育史[M].诸惠芳,李洪绪,尹斌苗,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 [7] 戴本博.外国教育史: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 [8] 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9] 哈代.绿荫下[M].陈珍,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9.
- [10] 哈代.远离尘嚣[M].陈亦君,曾胡,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
- [11] 罗影.哈代《还乡》与《远离尘嚣》中的教育主题叙事与时代特征[J].文艺争鸣,2020(7).
- [12] WARD M. "The Woodlander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ealism [J]. SEL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2011, 51(4).
- [13] 哈代.林地居民[M].邹海容,译.林琼,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 [14] 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15] 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6] 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张谷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 [17] 巴迪欧.爱的多重奏[M].邓刚,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18] 陈庆勋.论哈代的乡土精神[J].外国文学评论,1998(3).
- [19] 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 [20] SANDERSON M. *Education, Economic Change and Society in England 1780–1870* [M]. London :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91.
- [21] 哈代.无名的裘德[M].2版.张谷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22] HANDS T. *Thomas Hardy* [M]. London :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 [23]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24] 皮波人物国际名人研究中心.哈代[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3.
- [25]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26] PINION F B. *Hardy the Writer: Surveys and Assessments* [M]. London :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 [27] 狄更斯.艰难时世[M].全增嘏,胡文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28]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9]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Class Conflict and the Awakening of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al and Marital Issues in Thomas Hardy's Novels

WEI Fengdie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s well as courtship and marriage is one of the central themes in the novels of Thomas Hardy, a novelist of the late Victorian era. Hardy suggests that while education facilitates class mobility for the educated in Wessex, it also leads to their gradual alienation from the rural community. This is manifested through the dilemma of choosing between an urban partner and a rural partner. On the other hand, courtship and marriage between educated members of the lower classes in Wessex society and those of higher social status superficially bridge class differences; yet in reality, these class disparities are difficult to overcome. Ultimately, through the dual failures of the characters'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courtship and marriage, Hardy reveals the acute conflict between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19th-century Britain, as well as the awakening of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Thomas Hardy; marriage and love; education; class conflict; the awakening of working-class consciousness

艺术能否定义及如何定义 ——丹托的艺术本体论建构

苑少波

(厦门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福建 厦门,361005)

摘要:受安迪·沃霍尔《布里洛盒子》的启发,也是为了回应 19 世纪以来的艺术史突变,丹托终其一生执著于艺术本体论的探讨,思考焦点为艺术能否定义以及如何定义。丹托最初的艺术本体论思考体现在《艺术世界》这篇论文中,他指出,层出不穷的新作品之所以能进入艺术世界,正赖于自我更新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保驾护航。作为对迪基“艺术惯例论”的反驳,丹托对自己的艺术本体论重新进行了系统思考,《寻常物的嬗变》将艺术的本质归结为双重属性——指涉现实和独特的呈现方式。丹托生平最后的著作《何谓艺术》延续了其一贯的艺术本体论思考,在对《寻常物的嬗变》中的艺术双重属性进行隐喻式整合时,将艺术定义为“白日梦”,并借用康德的美感理念进一步佐证并完善了自己的艺术定义。

关键词:丹托;艺术惯例论;艺术本体论;《寻常物的嬗变》;白日梦

中图分类号: J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5-0088-05

关于阿瑟·C. 丹托“艺术的终结”的探讨一度是国内学界的热点,事实上,丹托在探讨“艺术的终结”这一“表象”时,其思索的基点却是对“艺术本体论”的捍卫。相较于极具话题性的“艺术的终结”,国内学界对丹托“艺术本体论”的关注并不多。丹托终生致力于艺术本体论研究,其思考的焦点为艺术能否定义以及如何定义。1964 年,丹托在纽约参观安迪·沃霍尔在马厩画廊举办的展览时,见到了《布里洛盒子》这一雕塑作品,认为“沃霍尔用一种新方式”向哲学家提出了“本体论问题”。作为对该作品的“哲学反应”,丹托于当年写成《艺术世界》一文,开启了他关于艺术本体论的探讨^{[1][6]}。丹托于 1981 年出版的“第一本讨论艺术哲学的著作”《寻常物的嬗变》,是对艺术本体论探讨的延续,“旨在阐述一种艺术品本体论”^{[2][13]}。直到生命的终结,丹托仍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何谓艺术》中孜孜不倦地探讨艺术本体论。对于一些美学家“艺术不可定义”的观点,丹托认为“艺术肯定有一些普遍的属性,那些属性说明了为什么艺术在某种形式上是普遍的”^{[3][4]}。杜尚《泉》(小便池)、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等艺术品的出现,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定义,艺术界越来越倾向于艺术无法定义。在解构主义盛行的学术思潮中,丹托的艺术本体论探讨具有逆流而上的意味,他对艺术定义本质主义的坚守背后,是对当代艺术多元表达方式的辩护。

一、艺术本体论的思索起点及对迪基的反驳

丹托最初对艺术本体论产生兴趣,源于艺术史自身发生的变化。1964 年,沃霍尔展出《布里洛盒子》,给丹托带来极大的震动。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打破了艺术品和寻常物之间的界限,丹托认为以往艺术定义“所依赖的各种属性”,比如丹托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再探讨的摹仿、美、形式等等,“由于沃霍尔包装盒的出现而丧失了与原定义的关联”^{[1][5]}。那些年丹托见证的艺术史的突变,除了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还有杜尚以梳子、瓶架、自行车轮以及著名的小便池等为材料的现成品艺术,作曲家约翰·凯奇在 1952 年“谱写”的《4 分 33 秒》,劳申伯格和奥登伯格分别以床为材料创作的艺术品,“这些都是真实的例子,发生在美术、音乐、舞蹈和文学的世界之内。它们可被看成是玩笑,或像艺术家希望的那样,被严肃认真地对待,看成是用极端的方式提出了艺术本质的基本问题”^{[2][3]}。艺术界想要重新定义艺术时困难重重,越来越多的艺术理论家认为艺术不可定义,因为艺术没有普遍的特征。然而与当时艺术界的悲观看法不同,丹托没有将这些艺术史变化作为玩笑,而是认真地加以对待,甚至认为艺术下定义反而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丹托最初的尝试,是 1964 年就这些问题写了一篇

收稿日期:2025-02-26

作者简介:苑少波(1988—),男,河南安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西文艺理论研究。

哲学论文《艺术世界》。在这篇论文中，丹托以艺术家的身份对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等当代艺术品进行哲学层面的分析，认为这些乍看起来与寻常物没有任何区别的作品，之所以会被当作艺术品，有赖于“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历史的知识”^[4]所构成的诠释框架。在传统摹仿论的主导下，艺术品的定义长期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随着后印象派等现代绘画流派的兴起，艺术理论进行了自我更新——从强调再现到强调表现。这两种理论作为艺术世界的遗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艺术家创作的“入场券”，使得他们可以在“再现”和“表现”这两个谓项构成的“风格矩阵”中自由变换，如再现表现主义（野兽派）、再现非表现主义（安格尔）、非再现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非再现非表现主义（硬边抽象）。随着艺术世界的个体成员越来越复杂，相应地，在经验上人们对后继者的辨认亦会越来越熟稔。丹托的《艺术世界》直面当时万花筒般的艺术界，力图从哲学角度对当代艺术进行一种本体论层面的初步探讨，希望凭借“艺术世界的理论和历史”，帮助人们“区分艺术和非艺术，也包括使艺术成为可能”^[4]。

如果以回溯的视角审视丹托此时的“艺术本体论”探讨，并与他中后期侧重艺术品本身的理论取向相比，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讨论落脚点在艺术品的外部世界——艺术理论和艺术史。丹托认为赖于艺术理论的自我繁殖和艺术史经验的不断累积，人们才得以将《布里洛盒子》等新生儿纳入艺术世界。受丹托这些分析的启发，乔治·迪基提出了“艺术惯例论”（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亦有人译为“艺术体制论”）。迪基关于艺术体制的探讨，使得原本寂寂无名的《艺术世界》名声大噪。但是丹托本人却认为迪基的探讨与自己的初衷“南辕北辙”，他声称必须要和这些受《艺术世界》启发产生的理论“后代”作斗争。

丹托反駁迪基的“艺术惯例论”时，对自己在《艺术世界》浅尝辄止的艺术本体论探讨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20世纪70年代后期，丹托出版了探讨艺术本体论的专著《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以下简称《寻常物的嬗变》），该书是对《艺术世界》的进一步扩充和展开。该书的副标题为“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宣示了丹托作为哲学家的本体论立场。不同于《艺术世界》偏重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探讨，丹托的思考转向了艺术品本身。

在晚年的《何谓艺术》中，丹托再一次对迪基的误读进行了详细回应。他认为迪基对“艺术世界”的定义与自己的定义不同，迪基的“艺术世界”是一个社会网络，“由策展人、收藏家、艺术批评家、（当然还有）艺

术家以及其他生活跟艺术有某种联系的人组成”，因而在丹托看来，这种观念“就像骑士制度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册封骑士，只有国王或女王才能这样做。被册封的人下跪，然后被授予骑士地位”^{[3]28}。而丹托认为自己的“艺术世界”，是由世界上所有艺术作品组成、随着新成员的不断进入而“变得更加丰富”的艺术世界。丹托认为迪基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了艺术品的外部评价层面，而丹托念兹在兹的是艺术品本身。丹托认为艺术体制地位次于艺术品，“如果艺术的制度理论要被接受，至少还有一些困难需要解决”^{[3]28}。丹托所谓的“一些困难”，是指艺术品自身必须具备某些属性或特质，这些属性或特质不是任何物质性、可直接观察比较的特征，而是即使与现实生活中的物品表面上没什么区别、依然具有的一些看不见的属性，这些属性才是艺术品可以进入艺术世界的通行证，即艺术品本体论层面的规定性。而这亦是丹托在《寻常物的嬗变》中所开启的哲学进路。

二、艺术品的“一阶内容”和“二阶内容”

丹托在《何谓艺术》这本书中对自己《寻常物的嬗变》的写作宗旨进行了回顾，称当时写作此书是“在本体论上下功夫——在何者可成为艺术作品上下功夫”，是要“提供一个艺术的哲学定义”^{[3]108}。而他认为的这一哲学定义，即“艺术作品就是涵义的呈现”^{[3]31}。首先，他认为艺术作品是“关于某物”的，相应地具有涵义，这些涵义需要我们去推断和把握；其次，涵义要“呈现”在这些艺术品之中。丹托这里所谓的“关于某物”和“呈现”，就是他在《寻常物的嬗变》中提到的艺术品的“一阶内容”和“二阶内容”。

一阶内容，即艺术品所表现的内容是对现实的指涉。丹托认为，艺术品并不等于现实，而是和现实对立的（或至少有所区别），这种对立就像词语和实物的对立。艺术和现实的对立及词语和实物的对立在性质上具有共通性，但是这种共通性在语言被用于描述世界时才成立，也即语言与艺术始终与现实保持着“哲学距离”。以柏拉图为为代表的摹仿论在西方艺术史长期占据主流位置，其核心关切是艺术是否符合现实，而后印象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突破了这一藩篱，宣告了摹仿论的破产。丹托认为不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也不论是再现学说还是表现学说，这些理论的分歧都改变不了的一个属性是：艺术对现实的指涉。丹托在这里提出的一阶内容，是从哲学角度为艺术品找到了恰当的本体论位置，或者说建立了第一层地基。

就对现实的指涉属性来说，语言也同样具有这种

属性,但是语言明显不是艺术,这是因为艺术还有下面将要讨论的二阶内容,正是这些二阶内容使得艺术与其他对现实同样具有指涉意味的事物区分开来。二阶内容,即艺术品“呈现内容的方式”,这一规定性一方面将艺术与语言等同样对现实具有指涉意义的其他再现物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是将两件从视觉上来说无法区分的“再现品”(比如商场里的布里洛盒子和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区分开来。丹托认为传统的摹仿论关注的多是艺术品的一阶内容,即把艺术品还原为它表现的现实内容,受这种传统观点影响的艺术界,很难将艺术品与那些具有相同内容的再现品区分开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未能将杜尚的“小便池”、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当做艺术品的原因:它们与原物相比,在内容层面上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在哲学上对当代艺术进行本体论正名的努力中,丹托依托的阿基米德支点是艺术品的二阶内容。

丹托认为二阶内容的提出是自己的首创,“在整个哲学史上,类似的问题还未被人提起过”^{[1]184}。如前所述,二阶内容即“呈现内容的方式”,丹托在《寻常物的嬗变》中将之笼统地称为“表现”“风格”“修辞”“隐喻”等概念,丹托认为这些概念具有仅仅适用于艺术品的“一整套谓词系统”。正是凝结在艺术品中的这些千差万别的呈现方式,造成了艺术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即凝结在世世代代艺术作品中独特的艺术表达,吸引人们像辨认笔迹一样鉴定这些表现手法,并演绎出这些艺术家独特的世界观。丹托认为我们欣赏一件艺术品时,“就仿佛是通过艺术家的感觉去看世界,或不仅仅是去看世界而已”^{[1]199}。因而艺术品的本质不仅仅是其呈现的内容,内容呈现的方式更为关键。

丹托基于这样的哲学基点,对形态各异的当代艺术进行了辩护。当我们面对杜尚“小便池”似的作品时,不应急于妄下定论,认为艺术家无才无能、欺世盗名、哗众取宠,而应该透过二阶内容看到,艺术家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观念对这个世界某个侧面进行了有效的呈现。丹托对这些“扭曲变形”的当代艺术并不是无条件认可的,而是要看这些“扭曲变形”是出于表现的冲动还是艺术家的无能。如果我们从杜尚的“小便池”、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中,能识别出“艺术家意识的外化”,即他们看到的世界以及看世界的方式,并以隐喻的方式完成这种表达,那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们称之为艺术品——杜尚的叛逆来自对诉诸“审美愉悦”的“视网膜艺术”的讨伐,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是波普艺术对高雅艺术的反讽。至此,丹托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艺术本体论的探讨。

三、“白日梦”:艺术定义的隐喻式表达

丹托在生平最后一部著作《何谓艺术》中,再次阐述自己一以贯之的立场——“打算用大部分内容讨论艺术本体论”^{[3]4},他坚持认为艺术必须是个封闭概念。他称自己进行的本体论探讨,是要将“艺术”这个词大写,并将这一定义广泛应用于艺术界所有的艺术成员,“如果有人相信艺术是一个整体,那么他就需要保证艺术成为一个整体的东西,在整个艺术史中都能被发现”^{[3]4}。在《何谓艺术》中,他延续了从《寻常物的嬗变》出版以来,与反本质主义立场的论辩。他认为这些人之所以没有找到艺术的本体论定义,是因为他们停止了寻找,且缺乏开放的头脑。在《寻常物的嬗变》出版后的几十年,尤其是在 20 世纪晚期,当代艺术形态层出不穷的演变给丹托的艺术本体论思考提供了更完备的现实基点。丹托一直坚持艺术的定义必须由艺术品自身去显露其本性、揭示其内在真理,就好像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阐述的——“精神”最终在求索的终点找到了自己,丹托认为艺术也会在“终结”之时显示自身。

丹托再次回到从艺术品自身寻找定义的分析策略,在《何谓艺术》中以大量篇幅对现代艺术史进行了追溯,以期用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找寻到艺术的本质:“在艺术被认为是什么里面找到艺术本身是什么的答案。”^{[3]19-20}这些现代艺术实例本身亦是对丹托在《寻常物的嬗变》中找到的艺术本质属性(“一阶内容”和“二阶内容”)的演练和论证。在《何谓艺术》中,丹托再次对开启现代艺术序幕的功臣杜尚和引起自己哲学本体论思考的沃霍尔给予充分的关注,丹托认为他们对回答“何谓艺术”这一问题作出了最大的贡献。通过对杜尚“小便池”等现成品艺术和沃霍尔《布里洛盒子》的再次思考,丹托重申了自己在《寻常物的嬗变》中提出的艺术定义,即前文提及的“涵义的呈现”。丹托认为,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在看得见的对现实的映射(一阶内容)之外,还有不可见的差异,这惊险的一跃,在于艺术家能否在艺术品中将涵义“呈现”出来,这对艺术品的定义是根本性的。丹托所谓的“呈现”,即《寻常物的嬗变》里提到的二阶内容,在该书中曾被丹托笼统称为“表现”“风格”“修辞”“隐喻”等。

丹托对自己在《寻常物的嬗变》中的艺术定义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自己当时较少分析“呈现”这个问题。丹托决定在《何谓艺术》中对该部分内容予以重点探讨。丹托认为我们并不能分辨超市货架上的布里洛盒子和沃霍尔《布里洛盒子》之间的区别,但是在沃霍尔对现实中的布里洛盒子进行二次创作时(即使近乎一模一样),这一创新行为蕴含了“某种哲学结构”。丹托

要求艺术品观看者跳脱出对艺术品物质(现实)属性的简单评判,而是透过这些物质(现实)属性抵达艺术的核心,即艺术品呈现的涵义(intended meaning)。为了更充分阐明这一哲学逻辑,丹托将艺术品所具有的物质(现实)属性(一阶内容)与呈现的涵义(二阶内容)整合为一个隐喻——白日梦(wakeful dreams)^{[3]40}。

人们无法分辨超市货架上的布里洛盒子和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这与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的困惑如出一辙——梦与知觉的内容是相同的时候,两者并不总是能被区分开。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会做梦,都会对现实进行不同层面的映射,有些甚至是完全类似的复刻,在对现实指涉这一层意义上,梦看起来已经接近艺术的一阶内容了。但是丹托认为梦的这种复刻,虽然与知觉到的世界没有区别,但终究是一种无意识的私密的臆想。而艺术对现实的指涉,是艺术家以独特而清醒的方式观察世界,他们就像做梦一样,在自己的作品里呈现世间万物显像,这些显像以物质为载体在不同的人群中传递共享,这才是艺术得以具有集体梦幻效果的根本原因。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在看得见的物质(现实)属性之外,具有了看不见的差异,这种差异才是它得以跻身艺术殿堂的根本原因。丹托用“白日梦”这一概念再次稳固了自己一直以来的艺术定义:艺术总是指涉现实的,不管这种指涉是传统摹仿论要求的视觉忠实呈现,还是在现代艺术观念影响下的扭曲变形,但这仅仅是看得见的区别;艺术品和寻常物的真正区别是看不见的,这是通过艺术家选择一种“呈现”方式将“涵义”寄寓其中达至的。尽管艺术家在通向这样的路途上困难重重,且难以保证最终可以抵达,但艺术创作本身就是在小心翼翼中步履维艰,丹托看重的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造梦过程。

丹托在《何谓艺术》中对艺术进行定义时,尤其强调艺术家独特的创造力,他以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新发现作为论据,进一步佐证并完善该论述。他发现康德的美感理念与自己的观点颇多暗合之处。丹托认为他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发现的“第二种艺术概念”,即康德提出的“精神的概念”,是康德“艺术概念的核心”^{[3]103}。这种精神概念与“品味”和“自然的美感”没什么联系,更多来自于“心灵的生机原理”,与认知机能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认知机能体现的即是艺术家自由使用自然天赋的示范性和原创性,这是艺术家天赋和创造力的体现,艺术家得以找到相应的“感官序列”,继而理念可以被传递到观看者的心灵^{[3]103}。康德对艺术家艺术作品中独特呈现方式的褒赞,为丹托寻找的艺术品定义找到了坚实的支柱。他认为康德的这种美感理念具有艺术定义上的普适性,能够图解人类艺术史上的所有

艺术品,“能够处理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文化中艺术品的逻辑”^{[3]105}。丹托极力将康德美感理念予以标准化的目的,其实是再一次强化自己的艺术定义。这一定义能够给形色各异的当代艺术一种“形而上”的保障。

康德的美感理念打破了丹托一直以来以为自己对艺术二阶内容的探讨属于首创的迷梦,帮助丹托完善了自己的艺术本体论。丹托特别注意到康德美感理念对艺术家感官和经验的倚重。康德强调,理念不是被抽象把握到的,而是经由并且借助感觉被经验到的。丹托在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表达,“通过感官展示最高实在性”,丹托将其转述为艺术家的工作就是“用一种感官中介来呈现理念”^{[3]103}。这种向现象学美学的靠拢,为他后期的艺术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这或许解释了丹托为什么在《何谓艺术》中开辟专章探讨哲学和艺术中的身体时(一如“呈现”英文字母“embodiment”对“body”的词源学暗示),指出基督教艺术在通过身体呈现神圣理念方面取得过辉煌成就,而对当下的行为艺术过分注重理念而较少诉诸身体持保留态度。

结语

丹托的艺术本体论试图将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统括到一种全新的艺术定义中,以修复二者在19世纪以来出现的种种断裂,其本质主义的坚持为形形色色的当代艺术进行了哲学层面的辩护,是艺术史和哲学史都不可忽视的贡献。丹托对艺术品进行定义的策略是回到艺术品本身,这种坚持使丹托在处理维特根斯坦主义者、莫里斯·韦茨等反本质主义时态度坚决,某种程度上使人感到一种形而上的压迫。丹托在回顾性著作《何谓艺术》中,对此似乎亦有所感,他表示自己的艺术本体论探索最多也只是像康德那样发现一些“必要条件”。坚持从艺术品自身寻找定义的做法,使得他对迪基等人从体制层面探讨艺术定义的努力给予无情批判,让人感觉丹托具有新批评的某种偏执以及某种层面上的现象学转向。事实上,丹托的艺术本体论并非没有诉诸艺术理论、艺术史等外部属性,这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是属于艺术阐释的范畴。丹托认为艺术品本身就具有一种历史的维度,“艺术在本质上是艺术史的”^{[3]112},这对于艺术的定义同样具有不可回避的规定性。这未尝不是丹托对自己过于关注艺术品本身的某种“拨乱反正”,体现了与迪基“艺术惯例论”在精神层面上的某种和解。

参考文献：

- [1] 丹托. 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 [M]. 陈岸瑛，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 [2] 丹托. 美的滥用：美学与艺术的概念 [M]. 王春辰，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3] 丹托. 何谓艺术 [M]. 夏开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4] 丹托. 艺术世界 [J]. 王春辰，译. 外国美学，2012(00): 344-359.

Whether and How Art Can be Defined ——Danto's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Art

YUAN Shaob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spired by Andy Warhol's *Brillo Box*, and in response to the abrupt changes in art history since the 19th century, Danto has devoted his life to exploring the ontology of art, focusing on whether and how art can be defined. Danto's initial ontological thinking of art was reflected in the paper *The Art world*. The reason why an endless stream of new works can enter the art world depends on the escort of self-renewing art theory and art history. As a refutation to Dickey's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 Danto made a systematic new thinking on his own art ontology. *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summed up the essence of art as two attributes: referring to reality and unique presentation. Danto's last work *What Art Is* continued his consistent ontological thinking of art, and defined art as wakeful dreams when metaphorically integrating the dual attributes of art in *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and further proved and improved his own definition of art by using Kant's aesthetic concept.

Key words: Danto;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 the ontology of Art; *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wakeful dreams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北京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超星域出版数据库、哲学社会科学预印本平台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稿酬不再另行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德州学院学报

德州地域文化译介和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以苏禄王博物馆为例

张锦辉¹, 董 雪²

(1. 德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2. 山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地域文化译介是呈现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路径。作为北方对接东盟支点城市,德州致力于提升地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以译介学、跨文化传播理论与拉斯韦尔“5W”模式为框架,对苏禄王博物馆的对外传播系统分析后发现,其面向东盟的地域文化译介与传播实践存在主体协同不足、术语标准不一、传播模态单一、受众适配欠缺等问题,应采取夯实译介基础、创新传播模式、精准对接受众的策略,提升德州地域文化在东盟的传播效能,以助力中国—东盟人文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地域文化;国际传播;对外译介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5-0093-04

文化交流成为连接世界各国的桥梁与推进全球贸易的加速器。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支点区域,东盟不仅是中国的重要经济合作伙伴,更是共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协同者。在这一进程中,人文交流已成为巩固双边关系、增强战略互信的重要支柱。地域文化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其有效译介与传播对促进中国—东盟民心相通,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关键作用。德州作为中国北方对接东盟的支点城市,积极响应国家倡议,构建人文交流平台。苏禄王博物馆作为明代中菲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既是德州独特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面向东盟开展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然而,在当前国际传播实践中,以该馆为代表的德州地域文化译介与传播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如术语翻译标准不一、文化意象失真、传播模态单一、受众适配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文化传播的深度与效能。本研究立足于国际传播视域,以苏禄王博物馆为个案,以译介学、跨文化传播理论与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为内在分析框架,系统分析面向东盟受众的德州地域文化译介与传播现状,拟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系统且高效的地域文化译介和传播策略体系。

一、苏禄王博物馆地域文化译介与传播现状分析

苏禄王博物馆作为德州面向东盟国家进行文化交

流与形象展示的重要窗口,其译介与传播效果直接影响德州乃至中国在东盟民众心中的文化形象构建与认同。当前,苏禄王博物馆面向东盟的文化传播体系已初步建立,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文化译介与传播工作主体形成了以该博物馆为主、地方政府与国内外语专业人员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协作架构;二是其传播内容以明代中菲友好交往史为叙事主线,集中呈现御碑楼、苏禄王墓、丝绸之路、大运河等物质文化遗产,并辅以相关历史典籍文献与艺术藏品等,初步构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叙事体系;三是其传播渠道主要依赖馆内实体展览空间,通过图文展板、文物标签、宣传资料等传统媒介进行文化传达,并借助相关国际学术会议、专题展览及高校东盟文化研究机构等进行有限的对外推介。这些成果为博物馆开展国际文化传播奠定了基本的组织保障、内容体系和物理场域的初步基础。

然而,尽管现有译介内容在语言通顺度和翻译处理上较为精准到位,但当前传播体系在跨文化实践中仍存在系统性问题,制约了其对外传播的时效性与影响力。结合译介学、跨文化传播理论及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即“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1](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产生什么效果),可将其主要问题归纳为以下三大维度。

译介层面译介主体协同不足。译者作为“编码者”的文化背景深度影响信息转换方式,进而影响受众解

收稿日期:2025-05-26

基金项目:德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国际传播视域下面向东盟的德州地域文化译介研究”(2024DZZS012)。

作者简介:张锦辉(1981—),女,山东德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学方面的研究。

码效果^{[2][345-358]}。当前译介以本土人员为主,缺乏东盟专家的实质性参与。单一文化背景的译者易陷入“文化盲区”,使编码过程仅反映本土视角,从而引发系列问题,如,术语翻译标准不一,“御碑楼”译为“the imperial stele pavilion”“memorial stele”;“苏禄王墓”译为“the Sulu King’s Tomb”“Tomb of East Sulu King”“Sulu King Mausoleum”;又如,文化专有项误译,“菲律宾群岛”译为“Sulu Archipelago”,通济渠”译为“Ji Canal;再如,深层次文化意象失真,忽视特定历史概念,“秦汉海丝”中的“海丝”被人名化,误译为“Qin and Han Dynasties Hester”或“Sea Silk”。进一步而言,译介主体结构的单一性以及明显的翻译问题,可能会影响翻译策略的恰当选取,具体表现为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失衡。“译介学”由我国知名学者谢天振教授系统构建,十分注重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3]。当前译介多倾向于简单归化或机械直译,缺乏对文化专有项的灵活处理。例如,“秦汉海丝”“苏禄王墓”等重要文化符号的译名混乱且未能及时补充说明等问题。因此,从“5W”模式的“Who”要素看,传播主体失衡会从源头上制约信息在目标文化语境中的可接受性。

传播层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译介前端译介主体的缺陷,导致传播过程中出现传播内容与形式未能针对东盟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进行分众化、差异化设计,出现同质化严重、内容转译多停留在语言层面等问题。Susan Bassnett 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上的转换,更是文化意义的转换^{[4][23-30]}。从“5W”模式的“Says What”要素看,传播内容需实现从“语言翻译”到“文化翻译”的跨越,以确保深层次文化符号的有效传递^[1]。馆内翻译常存在宗教与民俗内容的适配缺失问题,忽视了宗教文化差异。东盟地区内部宗教多元,博物馆内的传播内容在涉及宗教元素时,比如工艺器物名称以及纹饰翻译,未对不同宗教背景受众的接受习惯进行考量,导致文化意象在传递过程中出现“意义衰减”,甚至因文化各异而传播失效。二是依据“5W”模式中的“in Which Channel”与“What Effect”要素看,馆内传播形式单一,影响传播效果。当前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模式主要依赖静态的图文展板与标签翻译,表达模态单一,缺乏有效的双向互动渠道。需构建双向互动多模态机制,推动传播的深层认知共建,实现由单向输出向跨文化对话的深度转型。

在传播受众层面(to Whom),苏禄王博物馆在译介传播过程中对东盟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以及文化多样性把握不足。跨文化传播中的译介效果高度依赖于受众的认知水平与文化背景。根据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由于编码未考虑受众的文化特征,导致接收端出现理解偏差甚至“对抗式解码”,难以实现意义

的有效再生产^[2]。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指出,不同文化在信息表达上对“语境”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高语境文化(如越南)倾向于依赖隐含语义,而低语境文化(如新加坡)需显性说明逻辑关系^[5]。目前该馆在“字”的翻译以及朝贡制度相关内容的对外介绍中,存在同质化问题,无法满足不同语境受众的解码习惯。因此,对外译介需体现文化框架的适配性并进行信息密度的分级处理,以满足不同类型受众的理解需求。

二、面向东盟的德州地域文化译介与传播策略构建

苏禄王博物馆的对外传播在主体协同、内容编码、渠道模态及受众适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造成了文化信息的失真与传播效果的衰减,更难以胜任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深度文化对话。因此,需破解上述困境,构建一套植根于跨传播理论、兼具系统性与针对性的策略体系。

(一)夯实译介基础:主体协同、术语规范与策略适配

1. 构建“本土—东盟”译介共同体。传播的有效性依赖于编码与解码环节的符号对称性。苏珊·巴斯奈特强调,翻译不只是简单的编码重组过程,更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译者应主动传递文化内涵^[4]。在苏禄王博物馆对外传播实践中,单一文化背景的本土译者虽熟知史料却疏于目标文化接受机制研究;域外译者虽通晓语言却难解历史语境深层符号,二者失衡将导致译介失效。因此,应构建“本土—东盟”双核驱动的译介主体联盟,打破译介壁垒。一是本土学者应还原与阐释历史的真实面貌,如德州本地学者可依据《明实录》等原始档案考订关键术语。如“御碑楼”的译法,可依明代陵寝制度,统一规范为“Imperial Stele Pavilion”,其中“Pavilion”保留楼阁建筑意象,“Imperial Stele”彰显皇权礼制的文化内涵。二是东盟汉学家从文化接受视角精准处理潜在的文化敏感表达,防止语义误读,例如,苏禄王博物馆曾将“菲律宾群岛”误译为“Sulu Archipelago”,菲方学者可依据国际规范,将其纠正为“Philippine Archipelago”。德州地域文化实现有效对外传播,需以本土与东盟的知识互补、语境互参为基础,突破传统“单向输出”的译介范式,构建“双向共建”的协作机制,唯有构建这样的跨文化翻译共同体,才能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深度融合。

2. 建立标准化术语库。德州地域文化的对外译介,首要任务是实现术语表达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确保文化信息的精准传递,避免因译名不统一而导致文化误读。建立标准化术语库是提升译介质量的基础性工程。一是术语不统一极易造成文化认知的混乱。如“通济渠”

曾被误译为“Ji Canal”,此译法既忽略了其历史背景,也忽视了运河专业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应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the Grand Canal 2014”文件中的相关翻译^[6],将其译为“Tongji Canal”,以保持翻译的准确性,守住文化意象。二是在历史人物的翻译中,标准化同样重要。例如“汉武帝”与“隋炀帝”若直译为“Emperor Wudi”或“Emperor Sui-Yang”,易导致文化歧义或误解,应将其规范译作“Emperor Wu of Han”和“Emperor Yang of Sui”,既体现了谥号以及朝代的完整结构,也更贴近翻译界常用的译名方式,充分彰显翻译的文化深度。因此,德州可系统梳理当地地域文化核心术语,如历史人名与地名、官职名、建筑名、工艺名等,以建立系统、标准的术语库。构建国际传播的术语规范体系不仅有助于统一专有术语的译法,也将显著提升苏禄王博物馆等德州地域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3. 适应文化差异的多元化译介。翻译策略的选取应基于文化内容特性与目标受众认知需求,灵活运用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对于文化差异较大、目标受众陌生感强的表达,宜优先采用归化翻译,以降低文化理解门槛,提升传播效果。如苏禄王博物馆将四字成语“才知干练”,直译为“outstanding performance”。对于具有浓厚文化内涵、彰显地域独特性的词汇,则宜选用异化翻译,以保留源语言的文化氛围和历史情感。比如,“九达天衢,神京门户”译为“Where nine imperial roads converge, gateway to the sacred capital”更为通达贴切。为平衡“可理解性”与“文化识别度”,需融合归化与异化策略,为此可通过“音意结合”或“注释补充”实现双重传播目标,如,“苏禄王墓”译为“Sulu King Tomb (a historic monument with deep Sino-Philippine ties)”,既保留音译的地域特色,同时通过注释等方式为受众提供文化背景。地域文化译介在策略选择上不宜固守单一,而应根据不同内容与受众特征灵活调整,综合运用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灵活选取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方能推动德州地域文化元素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有效传播。

(二)创新传播模式:文化适配与多模态传播

1. 文化适配与对比翻译。在地域文化译介过程中,翻译工作不应仅停留在语言的转换,更应实现文化意义的有效迁移与重构。地域文化蕴含大量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隐喻,若机械直译,极易造成文化错位与认知断裂。因此,地域文化译介需注重文化适配与认知共鸣,实现从语言转换到文化对话的跨越。如,“礼部郎中”等官职类术语的翻译,可在译名“Director of the Ministry of Rites”之外加注,说明其职能在某种程度上与越南阮朝时期的“礼部侍郎”、泰国古代宫廷中的“皇家礼仪

官”等职位相类似,以帮助东盟地区受众理解其核心职责。同样,在工艺类文化翻译中实现文化对接与语境建构,可采用国际通用名加文化图解的方式进行译介,如“粉彩红狮格盒”译为“Famille Rose Box with Red Lion”(“Famille Rose”已被西方陶瓷研究界普遍接受^[7]),并配文化对比图解,将红狮图案与泰国“哈努曼面具”(Khon Mask of Hanuman)中的神猴意象进行并置图解,阐释两者在宗教象征、民俗寓意及审美传统方面的异同。此类对比,不仅可明晰器物背后的文化内涵,还可解决译介中的宗教与民俗内容的适配缺失等问题。

2. 多模态沉浸式文化传播路径。判断跨文化传播真正实现的关键在于译介内容是否被“听懂”“接受”,乃至被“再生产”。因此,要提升译介效果必须构建双向互动机制,推动传播由单向输出向跨文化对话深度转型。德州地域文化深厚,既有黄河农耕文化,也有运河商贸文化,及以二者为基础的非遗美食文化,单向度的单一文本难以充分呈现如此多元的文化符号,亟须采用多模态传播手段,打通文化符号的多重表达路径,以增强德州地域文化国际传播效果。Kress与Van Leeuwen强调,跨文化传播需整合语言、图像、声音等多元符号系统,实现意义的协同建构^[8]。冉玉体认为,译者应根据目标受众的文化期待重构文本形式^[9]。面对东盟内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德州地域文化的国际传播可融合AR场景复原、数据叙事、跨境直播等新兴传播方式,充分调动视、听、触等多重感官通道,将“运河桨声”“一带一路”“守陵村落”等文化元素,从静态的历史符号系统打造成为动态的文化体验载体。以德州苏禄王博物馆的译介传播为例,数字技术的融入可大幅提升文化表达的沉浸感与互动性。传播方面,可利用TikTok、YouTube等平台,策划“云游苏禄王墓”“运河非遗文化直播”“苏禄国东王中华之行纪录片”等主题栏目,吸引线上国外受众。因此,德州地域文化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应积极融合数字化与新媒体手段,以图像吸引注意、声音激发情感、互动增强体验,从而实现从“内容输出”到“情感共鸣”的跃升,构建跨文化理解与文明互鉴的新桥梁。

(三)精准对接受众:分层译介与跨文化适配

跨文化传播中的译介效果高度依赖于受众的认知水平与文化背景。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指出,信息传播并非单向传输过程,受众在接收信息时的文化语境与社会经验会对意义的解读产生深刻影响^[2]。译介内容应根据不同受众的文化特征、知识结构与接受期待,实施分层分类的精准设计,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传达。依据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对外译介需体现受众文化框架的适配与信息密度的分级。如,苏禄

王博物馆的译介传播可依据不同受众分为学术层、大众层与青少年层三个维度进行分层融合设计。一是针对具备研究能力的东盟学术受众，应重视术语的精准表达与文化深度的保留。例如“字”在中国古代人名结构中具有特定的社会礼仪功能^[10]。林语堂在翻译《史记》时，将“字仲尼”译成“His courtesy name was Chungni”；杨宪益夫妇在相关翻译中亦使用“courtesy name”。因此，博物馆人物介绍部分的“字”宜统一译为“courtesy name”，以匹配高语境受众的解码方式，确保学术严谨性。二是针对普通大众，应采用通俗化、情景化的传播策略增强理解与代入感，如开发视频短片《苏禄王的宝箱》，通过“玳瑁—珍珠—金册”实物链条具象化朝贡体系，以填补受众古代制度背景的认知空缺。三是针对青少年层，可推出扫码观看的动画、设计 AR 游戏“海丝密匣”，帮助他们在护送粉彩瓷任务中理解相关术语和历史背景。

结语

德州地域文化“走出去”需在译介层面，构建“本土—东盟”双核驱动的译介共同体，建立标准化术语库，并灵活运用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提升文化信息的准确性与可接受性；在传播层面，需推动文化适配与多模态深度融合，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从静态文本向动态体验的转化，增强传播的沉浸感与互动性；在受众层面，应实

施分众化传播策略，实现跨文化认知的有效对接。通过以上系统化的策略协同，不仅能显著提升德州地域文化国际传播效能，更将深化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从而助力中国—东盟人文共同体建设。

参考文献：

- [1] 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 [2] 罗钢, 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345—358.
- [3] 何绍斌. 译介学: 争论·反思·展望 [J]. 上海翻译, 2020(1) : 38—44.
- [4]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M]. 4th Edition. London : Routledge, 2013.
- [5] 霍尔. 超越文化 [M]. 何道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6] The Grand Canal : Documents [EB/OL]. (2014-03-06) [2023-05-17]. <https://whc.unesco.org/en/list/1443/documents/>.
- [7] 杨红英, 马海滢. 博物馆瓷器展品名称英译研究 [J]. 中国科技翻译, 2012, 25(3): 29—32, 54.
- [8] KRESS G,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M]. 3rd Edition. London : Routledge, 1996 : 1.
- [9] 冉玉体.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旅游材料外宣翻译研究: 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译介文本为例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 59.
- [10] 刘士聪. 关于汉语姓、名、字、号的英译 [J]. 中国翻译, 1994(1): 29—30.

On Promotion Int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Dezhou Regional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Sulu King Museum

ZHANG Jinhui¹, DONG Xue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s a crucial pathway for presenting China's national image. As a northern hub linking ASEAN, Dezhou is committed to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its regional culture. With translation studie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Lasswell's "5W" model as the framework, this study selects the Sulu King Museum as a cas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Dezhou's practices. It reveals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on among stakeholders, inconsistent terminology standards, limited communication modalities and inadequate audience adaptation. The study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strategy,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ranslation foundations, innovating communication models, and enhancing audience targeting. These measures aim to enhance the cap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Dezhou's regional culture in ASEAN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a-ASEAN community of shared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核心素养视域下中小学教师关键能力：结构要素与特征

房 敏

(德州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摘要：中小学教师关键能力的培养是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关键支撑，也是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借鉴圈层结构的基本理论，中小学教师的关键能力结构呈现由内而外的圈层特点，包含核心圈层的价值信念，中间圈层的知识和方法以及外圈层的人际和技术等能力要素。各圈层的能力要素松散联结，形成结构化整体，功能发挥呈现渐进性和个体差异性。

关键词：核心素养；教师关键能力；圈层结构

中图分类号：J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5287(2025)05-0097-0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34]高质量教师首先要拥有与人才培养、教育发展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相符合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教师关键能力的培养不仅是新时代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力实践支撑，更是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学生核心素养视域下对中小学教师关键能力的结构要素和特征进行全面分析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核心素养视域下中小学教师关键能力培养的价值逻辑

(一)顺应新时代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的需要

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是实施教育强国战略的需要，也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必要条件。新时代要建设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必须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住主要矛盾，把当前制约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转化为增长点，在扩大教师队伍总量的同时，提升教师专业关键能力，实现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和高质量教师队伍之间的动态平衡。要提升中小学教师的专业能力，首先应结合新时代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明确教师关键能力的结构，为有的放矢地开展培养和培训工作提供依据。可以说，在核心素养的框架下，研究中小学教师专业关键能力的结构及其特征，是教师能力提升的前提和基础。

(二)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力实践

2016年教育部公布《中国学生核心素养》，涉及6大类型18个二级指标，包括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核心素养的凝练和提出是素质教育深化的产物，也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是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和终身学习社会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它的培养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和教育。教师作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和指导者，其专业素质是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关键性因素。没有教师的高素质、强能力，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就没有前提保证和实践依靠。因此，社会各界应积极关注教师专业关键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只有增强了教师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认知和领悟，提高了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关键能力，才能将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实践真正落地。

(三)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全面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推进基础教育关键领域改革，为提高教育质量创造条件。教师作为改革的排头兵、先行者，其思想观念和能力结构必须要与改革的需要相符合，否则任何一项教育改革都很难保证持续有效。当前，伴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和新课标的颁布实施，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课堂减负、作业减负、校外培训减负的情况下，教师需要确保教学质量提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要求提升教师的关键能力。因此，研究核心素养下中小学教师专业关键能力的结构和特征，是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收稿日期：2025-06-11

作者简介：房敏(1981—)，女，山东德州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教师教育。

二、核心素养视域下中小学教师关键能力的圈层结构

能力的圈层结构理论强调能力系统构建的向心性和层级化特征,以核心能力为圆心,按重要性或专业性逐层向外扩散,形成“核心层—专业层—基础层”的圈层结构。核心层能力最具独特性且不可替代,外圈层能力则更具普适性。能力圈需围绕核心能力逐步向外延展,但需明确能力边界,避免超出认知与实践的合理范围。内圈层能力主导系统功能,外圈层提供支撑,各圈层需协同作用以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2]。由于学生核心素养对新时代中小学教师关键能力的要求具有多元性、层次性,因此,能力圈层结构理论的研究结论对本研究具有较大借鉴价值。



图 1 中小学教师关键能力的圈层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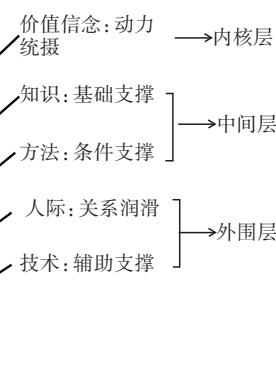
在图 1 中,居于内在核心层的是价值信念,发挥着动力统摄作用,主要体现在教师的教育价值认知能力、教师职业身份的感知能力以及学生发展特性的认知能力三个方面。核心层次的能力要素对其他层次的能力要素和功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辐射作用,也是不同教师间的能力差异最根本的体现。中间层涵盖知识和方法两个层次,发挥着基础支撑和条件保障的作用。其中,知识层次主要体现在教师学科知识的深度教学能力、创新应用能力、交叉整合能力以及教育教学条件性知识的储备能力四个方面。方法层次主要体现在教师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持续的教科研反思能力以及有效教学评价的能力三个方面。中间层次位于内核层和外围层的之间,起到连接、转化的作用。外围层包括人际和技术两个层面,发挥着纽带润滑和辅助保障功能。其中,人际层面主要体现在教师的师生交流关爱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家校协作能力三个方面。技术层面主要体现在教师的智慧教学技术的学习能力以及技术与教学的融通能力两个方面。

整体来看,中小学教师关键能力的 3 个圈层、5

通过对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文本分析和前期访谈的信息整理,对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要素进行类属分析,形成了包括价值信念、知识、方法、人际和技术等在内的 5 个主要类属^[3]。运用归纳逻辑对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展开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能力结构不是几个能力要素的简单平行加总,而是不同的能力要素通过有机构成,形成了明显的能力圈层结构。虽然不同圈层的能力要素发挥的功能不同,但是这些功能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 中小学教师关键能力圈层结构的整体样态

新时代背景下,中小学教师专业关键能力包含价值信念、知识、方法、人际和技术 5 个层次的能力要素。各要素在结构中处于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功能。具体见图 1。



个类属和 15 种能力要素有机构成了一个能力结构的整体,互相依存、相辅相成。

(二) 中小学教师关键能力结构要素的分层

1. 价值信念层次。教师的价值信念是教育场景中应该坚守的基本教育观念、教育理想和教育信仰。它超越方法、技术、知识等工具层面的能力要素,拥有硬核地位,在专业能力结构中具有动力统摄和价值引领的作用,对其他的能力发挥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4]。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 教师的教育价值认知能力。这是教师确认中小学教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并牢记教育初心和使命,积极践行责任和使命的能力。对核心素养和中小学阶段教育价值认知程度的差异,导致教师在教育教学的情感体验和意志行为上存在较大差距。一些中小学教师不能以动态发展联系的眼光深刻地把握义务教育阶段与其他教育阶段的关系,不能充分地领会核心素养的精神实质,站在学生发展需要的角度,面向未来而教,而是表现出明显的教育功利心态。本

研究提到的中小学教师教育价值认知能力反映了教师对其工作与高层次意义系统之间内在关联的认知水平。这种认知在教师持续强化的过程中发展为教师的一种理想信念,进而影响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和行为选择。面对发展中的学生,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教师信守着“为每个孩子未来终身发展奠基”的初衷,“以成就学生才能成就自己,以幸福学生才能幸福自己”为工作信念,始终如一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这种超越功利性的价值认知体现出教师对教育育人价值的遵从,也成为教师教学热情和教学研究孜孜不倦的内在动力。价值信念的影响力在D小学L老师那里得到完美体现。面对同龄或比自己年龄小的同事解决了高级职称,而自己虽然工作30余年,教学成绩优异,但是条件积累不足,尚未解决高级职称问题时,他仍然不后悔地说:“干教育不是为了评职称,是为了培养更多有出息的学生,学生有出息,比自己当教授更让我觉得幸福!”正是这种信念的支撑,才让L老师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30多年,乐此不疲!超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认知能让教师保持持久的工作热情,也能激发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成就感和安全感!

(2)教师身份的价值感知能力。这种能力是指教师在多重角色或身份的扮演中,对教师这一职业身份的深度感知和践行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提高教师综合素养,推动教师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1][5]}。“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①]因此,中小学教师应该摆脱狭隘的思维方式,认识到专业知识和品德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同等价值,并在实践中做到统一。在本研究中,D学校Y老师在多年工作中,坚持在教学和育人上下功夫,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特别是对后进生,不仅从学习上给予关怀,还从品德和习惯的养成上给予积极的引导,成立互助小组,挖掘后进生的闪光点,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上进心。转学过来的“差生”,短短一个学期,从后生成为“先进分子”,不仅积极参加班级工作,还乐于助人,认真好学。整个班级形成了风清气正的良好风气。

(3)学生发展特性的认知能力。这主要体现了教师对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知能力与行为倾向。核心素养导向下的新课标于2022年6月出台,9月正式实施,新课标的落地,关键要求之一就是教师要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发展性特点,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

点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尊重学生发展特点、愿为学生未来发展负责的教师,会自觉、主动地考虑学生未来发展需要什么、素质培养欠缺什么,并自发、积极地通过改革进行弥补和规整。尽管课堂或者课程改革的探索可能有代价且曲折,但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心理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为了实现教师职业的自我价值,大多数教师还在努力地尝试。调研中,入职满三年的Q老师说:“明显感觉到现在每年的学生素质都不一样,学生越来越聪明,懂得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复杂,课堂上越来越活跃,有时真觉得管不了他们,教不了他们。实际上还是自己不够优秀。我坚持看书学习,积极参加课例分享和教研交流,三年的时间,感觉自己在工作中不断在蜕变。学生和家长对我的接受度也高了,我的教学成就感也强了,幸福感也提升了。”

2.知识层次。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专业人员,其知识层次在能力结构中起着基础支撑的作用。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之下,中小学教师围绕知识而产生的能力要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学科知识的深度教学能力是教师课堂教学的着力点和关键点。与传统追求知识掌握为主的师本课堂不同,深度教学的课堂追求的是对学生高阶思维的培养。高阶思维的核心是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它的培养需要教师具有与其相适应的深度教学能力,要求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结合大数据时代、新课标的要求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不断更新教学思想、创新教学形式、丰富教学内容,选择更优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比如问题启发式、情境参与式、合作探究式等,真正促进教学为理解而教、为思想而教、为意义而教。在知识层次的能力要素中,教师的学科深度教学能力越来越重要,这也是优秀教师必备的专业素质。正如D学校主管教学业务的W副校长所说,双减政策的实施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形成了新的要求,也对教师课堂教学改革寄予更高的期望。在新课标指导下,如何引领教师审视课堂教学、培养教师的深度教学能力,不仅是学校的重要课题,也是每位老师的必备素质。

(2)学科知识的创新应用能力,即学科知识与生活世界的连接转化能力。相对学生的主体经验认知,既定的学科知识是研究者们不断归纳积淀下来的、高度浓缩的理论知识,与学生真实的生活世界存在一定的距离。要帮助学生长时记忆、深层理解,并迁移应用这些知识,教师需拥有学科知识的创新应用能力。这不仅是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必然需要,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应有之义。调研中K学校的Z老师是一名常年教授小学高年级数学的教师,他的数学课很受学生欢

^① 来源于 https://www.xinhuanet.com/2022-04/25/c_1128595417.htm

迎。在他的课堂上,学生们不仅能领会到数学建模的魅力,还能将抽象的数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Z 老师让学生记录数学日记,利用身边的材料制作学具辅助学习,开展数学生活化项目研究等。2020—2021 学年,他被选派到一所薄弱的农村小学支教。任教的六年级仅一个教学班,该班各科成绩在同区域同年级中均倒数。但是 Z 老师执教一个学期后,他担任的数学、科学两门课程的平均成绩在同区域同年级中名列前茅,而其他课程未见起色。这充分说明,教师学科知识的创新性应用能力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文化核心素养具有重要价值。

(3) 学科知识的交叉整合能力是核心素养导向下新课标对教师提出的更高要求。传统的课程体系往往是以学科为中心,按照既定的课程内容教学无可厚非。但是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角度看,教师要树立新的知识教学观,认识到:知识教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任务,也不是教学的根本目的。教师应以学生为中心,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教师要具备学科知识的交叉整合能力,突破既定单元知识或者课程体系结构的限制,探索大单元整体教学的实践模式,创新性地统整知识,让学生在习得完整知识的同时,锻炼关键能力,养成必备品格。这不仅是学生培养的必需,更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教育教学条件性知识的储备能力反映了教师在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教学论等方面的知识掌握情况。虽然条件性知识不是教师要传授的本体性知识,但是如果缺乏相关知识的习得和应用,教师在本体性知识和实践性指导方面可能会走弯路、出差错。目前,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并非所有成员都毕业于师范专业、接受过系统的师范教育。非师范毕业的大学生凭借考取的教师资格证进入教师队伍,他们在条件性知识的掌握上相对欠缺,入职后需要补充学习,否则可能影响其工作成效。如 D 小学的 P 老师是一名财务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通过教师编考试,她来到了 D 学校。起初,她在教学设计、家校沟通、班级管理等方面很焦灼、无措,不知道怎么准备教学内容,只是机械传授知识点,导致学生成绩很糟糕。经过学校青蓝工程的结对帮扶及参加学校、区、市等组织的新教师培训,她慢慢对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也逐渐适应了小学教师的工作节奏和身份要求。由此可见,具备必要的条件性知识对于一名专业教师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3. 方法层次。方法层次的能力要素通常通过实践体现,它们在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结构中起条件保障作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1) 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面对不断变化的

教育教学环境和不断发展中的学生,教师不仅要在职业精神和职业信念上坚守,还要在教学方法上不断学习和改进^[5]。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学生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对教育的期望,教师需进行综合性的改革。教学方法的选择与学生的成熟度以及教学内容有直接关系。随着学段的变化,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知识基础的也会变化,因此教师综合运用不同方法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样的课程由不同的教师教授,学生的学习效果差异明显,这固然有学生素质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教师教学方法选择的适切性。K 学校的 Q 老师是一名善长数学教学的“体育老师”。体育专业出身的她,进入学校,并没有因为被安排教数学而抱怨、迷茫,而是积极向师傅或者其他骨干教师学习,她创新性地将体育元素融入到数学教学中,探索小组合作学习,尝试做中学和学中做,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热情。

(2) 持续的教科研反思能力。反思意味着成长,意味着教师对自身专业发展的理性思考。中小学教师围绕课堂教学、课例研讨等核心业务,以及班级管理和家校沟通等工作进行反思,不仅体现出教师较强的问题发现意识,还展示了良好的问题分析和解决能力,以及工作的持续改进能力。这种能力恰恰是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必需。在核心素养结构的自主发展层次中,强调学生要学会学习,包括学习意识的形成、学习方法的选择和学习评估等方面的指导,旨在培养学生乐学善学、勤于反思等素质^[6]。要培养学生的这些素质,教师首先必须具备勤于反思和乐学善学的素质。D 学校的 Y 老师是一名教学成绩优异的语文老师,她善于反思和总结,经常将班级良好成绩的取得归因于良好的师生合作和家校合作。她坚持记录班级工作的点滴,还积极以家校工作为研究对象,申请校本课题和更高级别的课题。通过课题研究,她进一步理性地把握家校合作的关系,明确合作的范围和边界,理清合作的运行机制,关键是通过家校合作,使家长真正成为班主任的同盟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3) 有效的学生评价能力。教师对学生进行有效评价是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手段,也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诊断和改进教学问题的重要环节。它不仅影响到学生现在的发展水平,还影响到学生的潜能激发以及素质的综合培养。从评价的范围来说,教师不仅要通过成绩评估学生的智力,还要通过综合表现评价其德、体、美、劳等方面素质。从评价的过程来说,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科结果评价,还要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通过评价体系的改革,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兴趣爱好,促进其高水平、全面发展。班主任 H 老师说:“我

班学生平时的表现我都会利用班级优化大师记录下来,每学期末结合平时表现和学期末的学业成绩为每个孩子量身定制属于他们的一份荣耀,进行颁奖,而且还在班级圈内宣传,以此激发每个孩子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家长们对班级工作的支持度也越来越高。”

4. 人际关系层次。人际关系能力在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结构中有纽带润滑的作用,不仅维系着良好的教学关系,还促进团队合作。具体包括以下3种。

(1) 师生交流关爱能力直接影响教师的工作效果。教师因学生而存在,其价值因学生发展而彰显。面对不成熟但可爱的学生,教师的关爱能力直接影响到工作的成效。正如俗话所说,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师生交流互动水平越高,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度越高,对教师的影响接受度就越高。正如调研中几位优秀教师集中反映的那样。M老师说:“我喜欢我的学生,不管是后进生,还是优秀生,我都觉得他们各有各的可爱之处。班上的后进生,只是学生成绩稍差,但是情商都很高,他们愿意分担班级工作,班级同学也很喜欢他们。他们的家长也很配合班级工作。”L老师认为:“作为教师,要让学生敬重,首先我们要平等对待每个学生,真正关心他们。”

(2) 团队合作能力,体现出教师间的人际关系。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要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不是单兵作战就能实现的,需要不同学科教师和不同年级的同学科教师之间互相学习、精诚合作。在熟悉学生基本需求和情况的基础上,通过集体备课、统一教研、团队磨课,才能将最好的课程呈现给学生。正如C小学M校长所言:“学校这几年在优质课比赛中,总能有那么多教师脱颖而出,一路杀进市赛、省赛,这得益于我们的教师团队建设。依托几位教学骨干教师,成立专门的磨课小组,从备课、设计、上课、反馈,再到设计、修改、上课,一节课经过十几次的打磨,必然是优质课。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不仅是骨干教师,其他参与磨课的教师也在不断成长。关键是团队建立起来了,大家认识到这样做的优势了,其行为就自觉了。”

(3) 家校协作能力,这是新时代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中的关键。特别是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协作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紧迫。作为中小学教师,认识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实践能力,比如与家长的沟通、协商能力,指导家庭教育的能力等。调研显示,教学成绩优异的教师,家校协作工作都比较扎实。正如L教师所言,“家长就像我们的大后方,大后方只要能支持老师的前线工作,我们就不会分散太多的精力在无谓的问题处理上。比如惩罚学生,要避免家长到学校闹事。惩罚学生不

要盲目,更不要伤了自尊心。要抓住犯错的关键问题,对学生进行合理惩罚,让他心服口服。在学校里,惩罚了孩子,应第一时间与家长沟通,告诉家长原因,征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让家长意识到我们目标的一致性”。

5. 技术层次。技术能力为教师打开了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的快车道,能够帮助教师在数字时代更好地成就每一位学生,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 智慧教学技术的学习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和大数据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要培养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和自主学习等核心素养,首先教师要成为这些智慧教学技术的掌握者和领学者。新时代的中小学教师若固守传统教学模式,不主动学习新技术,不掌握信息技术在现代教学中的应用,将被视为“文盲”。因此,面对信息技术的变化,教师不能保守、排斥,而要有敏锐的信息技术学习意识,积极学习新技术,并在实践中主动应用。例如,Z老师率先研究微课制作和新媒体课件,不仅承担了学校的信息技术推广工作,还在微课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C老师积极研究希沃白板的使用功能,不仅在课堂上娴熟使用,还建立了教师在线学习社区,帮助其他教师学习新技术,大大提高了教师们的课堂教学效率。

(2) 智慧教学技术与教学的融通能力。教师要学会将智慧教学技术与教学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需要教师明白教育目标、学生需求和教学条件之间的关系,系统性地选择技术的应用,使技术与教学形成融通。正如M老师所言,“现在有些年轻教师,信息技术应用得很熟练,但是过于依赖,导致一节课下来,黑板上一个字没有。但是也有的老师做得就很好,比如新冠疫情导致的线上教学期间,钉钉、Classin等软件的使用就比较合理,能把实体课堂和在线教育结合得很好,教师能随时掌握学生的信息,调整教学进度,把控教学效果”。

三、核心素养视域下中小学教师关键能力圈层结构的特征

(一) 能力结构要素相对独立又松散结合

为了研究的需要,笔者所在团队对教师关键能力的圈层结构进行了3个圈层、5个维度、16个能力要素的分解和结构建设,并对每个能力要素进行了单独阐释。然而,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现实中,这些能力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或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根据各自对教师身份所具有的本体功能的差异,有机构成了一个整体。价值信念作为教师能力发展的原动力,在能力结构中发挥了思想引导、动力激发的作用,它直接决定了教

师其他能力层次的存在状态和发展动力。知识和方法作为教师能力发展的基础条件,一直备受重视,是教师培养和培训的重点,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绩效,进而影响教师对价值信念的反思和追问。人际层面的能力要素作为教师发展的关系润滑剂,贯穿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全过程,具有辅助支撑作用,它直接影响教师在工作中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技术技能的强化,与人工智能、网络信息时代的要求以及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需要相适应。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对教师教学的深度影响和挑战,技术能力在教师能力结构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不同圈层的能力要素有机构成整体,为进一步提升教师能力培养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能力结构的功能具有渐进性

以往对教师专业能力的研究,要么集中在某一能力层次上,要么集中在某一能力要素上,缺乏建构立体化能力结构的研究。本研究基于不同能力要素在学生核心素养培养中的作用,构建了3个层次、5个类型、16个指标的圈层结构,呈现出教师专业能力的价值序列和逻辑关系。从价值信念到知识、方法、人际,再到技术的能力分层,在整体的能力结构中其作用从内核决定性作用逐渐递减到边缘的保障作用^[2]。这里的递减更多地是从作用的性质来看,并不是指作用的强度。也就是说能力的内核层因为处于中心位置,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直接决定着教师的教学态度和行为效果。其他层次由内而外虽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会影响能力发挥的程度和行为的效果,对能力发挥产生制约作用。各圈层没有轻重之分,只是功能价值不同。

(三)能力结构倾向性存在个体差异

我们虽然把教师关键能力结构进行了分解,总结出共性的结构要素,但是这些结构要素在不同教师之间,以及在同一个教师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可能存在个体差异。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得教师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和产生的能力效果存在明显的不同。因此,学校管理者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定教师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实施教师能力培训时,应正视教师能力结构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管理策略和培训手段,以保证教师培养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论教育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2] 刘刚, 丁三青. 大学卓越教师教学学术核心能力的圈层结构及其特征 [J]. 教育科学, 2020(6): 53–60.
- [3] 张善超, 李冰.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教学关键能力的内涵、构成与提升之道 [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51–58.
- [4] 何杰. 卓越教师核心能力的实然框架与培养举措 [J]. 教学与管理, 2022(9): 47–49.
- [5] 杨静. 核心素养背景下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现状与对策建议: 基于 G 市中小学教师的问卷调查 [J]. 现代教育管理, 2021(12): 61–69.
- [6] 吴宏. 教师专业核心能力模型建构 [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2(1): 76–81.

Competenc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from the Core Literacies: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FANG Min

(Teacher Education School of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China)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key competencies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serves as crucial support for develop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constitute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advancing basic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Drawing upon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layered structure, the key competency framework of school teachers also manifests concentric-circle characteristics, encompassing value beliefs in the core layer, knowledge and methods in the intermediate layer, along with interpersonal and technical competencies in the outer layer. The competency elements across layers form a structured whole through loose coupling, with their functioning exhibiting gradual progression and individual variability.

Key words: core competencies; key competencies of teachers; concentric circle structure

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可能、可为与可行

王戈弋

(齐鲁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济南 250200)

摘要：教育数字化转型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与现实支撑。教育数字化在理念契合、技术赋能与机制创新等方面与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高度耦合,展现出显著的理论共鸣与实践潜能。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促进思政课跨学段教学目标的有序衔接、教学内容的科学递进、教学资源的高效配置与教学质量的精准评估,确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思政教育全链条中的系统落实,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保障。

关键词：思政课一体化;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 : G641 ; G43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2097-5287 (2025) 05-0103-08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1]。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为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程一体化(以下简称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核心目标是构建目标衔接、内容贯通、资源共享的系统化育人体系,以克服传统教育阶段目标割裂、内容衔接不畅等问题,推动思政教育的科学化与体系化发展。近年来,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教育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重塑教育生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2]。这一战略布局为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依托人工智能(AI)、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以优化教学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教育公平,并最终实现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在此背景下,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不仅是技术赋能的过程,更是教育理念重构与育人模式创新的体现。其核心在于依托数字技术突破传统教学的时空与资源壁垒,实现教学目标的跨学段衔接,增强思政教育的覆盖广度、影响深度与实践效度,最终构建大中小学贯通的课程体系与协同育人机制。目前,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尚存在目标不衔接、

内容重复或脱节、资源分散等问题,制约了思政教育的整体效果。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东风”赋能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立德树人目标的高质量实现,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对教育实践改革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从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探讨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可能、可为与可行路径,为全面构建大中小学贯通的思政教育体系提供参考。

一、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可能性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向,能够在理念贯彻、多主体协同、课程内容、教学技术等方面对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进行有效赋能,为思政教育改革创新提供重要驱动。

(一) 理念契合性: 数字化转型与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理念高度一致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立足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强调在课程内容上根据大中小学不同学段的特点进行合理布局,实现跨学段思政教育的有效衔接^[3]。教育数字化转型意在通过数字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推动育人模式创新,提高育人成效,实现因材施教与教育公平^[4]。两者在理念发展、资源共享共建和方法技术革新等方面高度契合。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现需要突破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通过搭建数字化思政教育平

收稿日期: 2025-06-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字化转型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路径研究”(23YJCZH205)。

作者简介: 王戈弋(1987—),女,山东菏泽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发展、思想政治方面的研究。

台、建立思政教育轨迹等方式,实现思政教育递进式发展和全过程育人。而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恰恰可以突破思政课一体化发展的这一限制,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打造大中小学思政教学资源共享、贯穿思政学习始终的数字化平台,推动思政课一体化教育理念的贯彻落实^[5]。同时,数字化教学平台通过分析每个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认知特点,建立个性化教育策略,通过精准优化课程内容推送,不仅能够提升思政课教学的适配性,也进一步夯实数字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的理念融合基础。

(二)协同生态性:数字化转型与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多主体协同参与

教育数字化转型依托多主体协同育人,能够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组织支持与体系保障。政府通过政策导向,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创新;学校承担课程设计与教学职责,确保各学段教学内容的统筹规划与衔接;企业负责技术研发与平台搭建,助力数字技术与教学模式融合;社会实践基地提供情境化资源与现实体验途径,推动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融合。同时,思政课一体化需要突破传统思政教育以学校为中心的单一格局,通过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实践基地的多主体协同^[6],构建涵盖课程研发、资源整合、平台建设、评价反馈的全链条思政教育体系,形成多主体联动、全域协同的育人新范式,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系统性支撑和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三)建设连贯性:数字化转型推动思政课一体化跨学段目标与内容的衔接

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思政课一体化跨学段目标与内容有效衔接提供技术支撑。在传统教育中,大中小各学段思政课程存在育人目标分散、内容脱节、衔接不充分等问题,导致不同成长阶段学生的思政教育呈离散化和碎片化^[7]。合理使用数字化监测和数据分析机制,分析不同学段思政教材的核心概念,挖掘不同学段的知识关联度,优化课程内容的编排,将小学阶段的基础知识融入初高中阶段的知识体系,并与大学阶段的理论探究、实践拓展和综合应用形成有效衔接,持续优化大中小各学段思政课程教学内容,确保育人目标的层次性递进和系统性实现,构建更加科学、系统的思政课一体化培养体系。

(四)技术适配性:数字化转型满足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技术的差异化需求

数字化技术具备智能适配与灵活调节的特征,能够精准匹配各学段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和差异化教学需求^[8]。一是数字化教学系统能基于多模态数据分析,动态调整课程内容与教学策略,满足不同学段学生的学

习需求。二是数字平台通过知识推送和学习反馈等功能,进一步提高思政教育内容的精准度,满足差异化需求。在小学阶段,数字化技术能够提供情境模拟和游戏化的教学手段,创设生动的沉浸式学习体验,激发学生的思政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初步构建思想道德认知;中学阶段,教师依托案例教学、智能互动问答和深度学习模型等数字化技术,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进一步提升思政理论学习效果;大学阶段,学生可通过虚拟实验和大数据分析等方式,增强理论实践结合和学术研究能力。可见,数字化技术的适配性是实现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必要支撑。通过合理运用数字化教学技术,满足思政课一体化各学段的差异化需求,是提升思政课教学质量的关键。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可为性

(一)助推“数字思政”理念深入思政课一体化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首先要明确课程的目标导向,即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9]。这一目标不仅是党和国家对思政课育人目标的总体要求,更是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核心导向。在新时代背景下,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应打破一体化建设的瓶颈,探索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推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内涵式发展。“数字思政”理念是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石,其本质在于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拓展育人路径等^[10]。然而,部分教育管理者和一线教师在实践层面仍存在认知偏差,普遍将数字化视为传统教学的辅助工具,而非育人范式重塑的重要驱动因素。尤其在中小学阶段,思政教育仍然较为依赖传统灌输式教学,忽视了数字技术赋能教学的互动性与创新性,这使得思政课在内容呈现、学生参与、教学效果等方面仍存在优化空间。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能够有效推动“数字思政”理念的落地实施,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符合时代特征和学生需求。借助智能教学系统、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AI等新兴技术^[11],构建情境化、交互式、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增强学生的获得感和思政认同感,打通理论教学与实践育人的联动环节,推动“数字思政”理念的深入有效贯彻。

(二)推动思政课一体化教材资源建设

教材是思政课程落实育人目标的重要载体,是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核心支撑。思政教材的编写、使用和推广,直接关系到课程内容的一致性、逻辑性与规范

性，教材内容应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紧密衔接、合理进阶^[11]。当前，思政课一体化教材资源建设仍面临体系化建设的现实挑战。一是编写体例、内容深度与逻辑结构上缺乏统一标准，导致各学段内容存在衔接不畅、逻辑割裂、知识重复等问题^[12]。二是教材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整体规划不足，内容碎片化、资源分散化问题突出，难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教材体系优化的支撑作用。三是教师对数字化教材的应用能力有待提升。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指导，数字化教材在实际教学中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思政教材的一体化建设，推动教材体系的标准化和层级化发展^[13]。一方面，集大数据分析和智能推荐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教育平台，能够实现教材资源的精准高效匹配，确保不同学段教材内容的层级递进与有机衔接。另一方面，与常规教材相比，数字化教材能够结合多媒体技术、交互式教学等创新形式，使教材内容更直观生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接受度。同时，依托云端资源共享与智能检索技术，数字教材能够打破区域壁垒，实现优质教材资源共建共享，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

（三）促进思政课一体化教学内容融合

思政课程的内容直接影响课程目标的落地成效。在当前教学体系下，大中小学不同学段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没有形成系统有效的衔接，导致思政教育在逻辑递进与整体协同方面存在不足^[14]。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借助数字技术优化思政课程内容、推动课程内容与各学段学生的学习需求精准契合，是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核心议题。教育数字化主要在促进思政课程的内容融合与动态优化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数字化课程管理系统能够基于各学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实时动态调整教学内容，确保不同学段的教学内容在价值观塑造、理论深化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形成逻辑递进。另一方面，AI与大数据分析能够准确识别学生个体需求，实现教学内容的精准适配，避免教学内容的低级重复和针对性不足等问题。此外，数字化技术构建的虚拟仿真课堂和深度学习模型等方法，能够优化课程内容的实践导向，使学生在沉浸式情境中深刻理解课程的理论内涵，进一步提高思政教学内容的丰富度和适配性。

（四）提升思政课一体化教师队伍建设水平

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是推动思政课一体化的重要支撑，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学理念、技术能力直接决定思政教育的质量与实效^[14]。当前，思政教师队伍建设面临多重困境。一是教师在数字化教学工具的应用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部分教师缺乏系统的数字素养培

训，导致教学方式滞后于技术变革；二是农村及偏远地区教师受限于硬件设施、网络环境及培训资源的不均衡，难以享受同等的教学条件；三是现有教师教研体系仍以单一学段为主，跨学段教学协同不足，影响了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整体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智能化教师培训平台、虚拟教研室、跨学段协作机制等手段，促进教师专业能力提升与教学创新。一方面，借助大数据分析与智能评估技术，可为教师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能力提升方案，增强其数字教学工具的掌握能力，提升思政教育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水平。另一方面，依托跨学段研讨、在线课程开发、虚拟实训等方式，强化教师教学理念、课程体系、育人方法的跨学段协同，促进思政课教师队伍的系统化和创新发展。

（五）支撑构建思政课一体化评价体系

大中小学思政课评价一体化是提高思政教育连贯性和有效性的重要途径，是衡量教育质量、调整教学策略、优化教学内容的关键依据^[15]。现有思政课评价体系仍以知识检测为主，缺乏对学生思维能力、价值认同、社会实践能力的综合测评，难以全面反映思政课育人实效，且在跨学段衔接方面存在较大缺口，导致不同学段的评价标准不统一、数据无法互通，影响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系统性推进。数字化技术的介入为思政课评价体系的优化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思路。借助大数据分析、智能测评、过程性评价等技术，可以从单一的知识检测拓展为涵盖学生认知发展、价值观塑造、实践能力提升的综合评估。同时，AI辅助分析技术可为教师提供精准化教学反馈，优化教学策略，动态调整课程内容。另外，跨学段评价系统可借助云端数据共享、学情分析和成长轨迹追踪，确保不同学段思政课程的目标一致性、内容衔接性与评价科学性，最终形成闭环式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可行路径

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在教学模式、资源共享、师资培养与评价体系优化等方面创造了变革契机。如何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的赋能效应，使思政课程体系更具整体性、连贯性和实效性，是推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本部分则重点探讨数字化转型在助推思政课一体化的技术基础、教学模式、平台搭建、师资培训及数字评价等方面的可行路径，为统筹推进思政课一体化提供实践支撑。

(一)完善数字化教学设施,夯实思政课一体化基础保障

数字化教学设施是推进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优质的数字教学环境不仅能提升教学质量,还能促进教育公平,缩小不同区域、不同学段之间的资源差距^[16]。因此,应在课程教学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投入,依托新兴技术优化教学环境,为推动思政课一体化提供坚实保障。

1. 推进智慧教室建设,提升沉浸式教学体验。智慧教室作为新型数字教学场景,为思政课教学提供了更高效、互动性更强的学习环境。教师可借助智慧教室中的智能触控屏、互动白板、AR/VR 设备等先进教学工具,结合智能讲解系统、在线讨论模块和课堂实时数据分析,提高课堂互动性和精准度。不同学段的思政教师可借助在线课堂、同步教学、远程互动等模式,通过智慧教室开展联合教学,共同研讨跨学段教学目标衔接与课程内容递进策略。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可通过数字化技术身临其境地“进入”历史场景,感受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与影响,增强思政课的真实感和感染力,从而促进学生在不同学段形成连贯、深刻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观体系。

2. 强化数字支撑体系,提升思政课堂数字化精准度。5G、AI 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思政课堂的智能化提供了技术支撑^[17]。5G 技术可实现高带宽、低延迟的数据传输,优化智慧教室的运行环境,确保远程教学的实时互动和高清稳定的课堂直播,为跨区域、跨学段思政课堂协作,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思政课同屏教学提供稳定支持。AI 技术可借助智能分析、语音识别、自动批改等功能,辅助教师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实时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助力精准化教学。通过学习分析和数据挖掘等技术,分析学生在不同学段的学习轨迹,避免课程内容重复或断层,提升知识体系的完整性。

3. 促进区域间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协同共建,缩小教育资源差距。教育资源的不均衡是制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因素^[18]。针对当前农村及偏远地区数字化教学设施相对滞后、优质思政资源获取受限等问题,应构建协同共建机制,推动教育公平化进程。一是地方政府要协同教育主管部门建立跨区域数字化资源统筹平台,通过云端教育系统与远程教学网络的深度融合,实现教学资源的均衡配置。二是创新“互联网+思政教育”共享模式,以优势学校与薄弱院校结对帮扶为切入点,采用同步课堂、双师教学、远程互动等多种形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流动与共享。三是构建基于云端的跨校教研共同体,定期开展线上教

学研讨活动,既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素养,又深化各地区、各学段的协同育人效应。

(二)运用数字化教学技术,创新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模式

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优化了教学基础设施,也为思政课教学模式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传统思政课堂以讲授式教学为主,学生的学习方式较为被动,难以有效调动其思维活跃度和学习参与感。而数字化教学模式则通过互动技术、个性化学习、跨学段衔接等方式,突破传统教学的局限,实现思政课教学的深度变革^[19]。

1. 构建个性化学习路径,满足不同学段学生的发展需求。不同学段的学生在思政教育中,其认知能力、学习需求和接受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20]。传统的思政课程教学模式单一,难以满足个体差异,数字化教学模式能够借助大数据分析和自适应推送技术,为不同学段的学生量身打造个性化学习路径。一是依托 AI 和大数据构建智能学习推荐系统。数字化学习平台可依据学生自身的知识掌握程度和兴趣倾向,提供个性化推荐。如小学阶段的学生在学习“爱国主义”时,可以推送动画视频、故事讲解等生动化资源;中学阶段则侧重案例分析和热点解读,帮助中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大学阶段则可推送政策分析和学术论文,引导其开展自主探究和深度学习。二是运用数字化测评系统实现精准教学。系统可实时分析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生成个性化学习报告,为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提供重要支撑。同时,该系统还能基于各学段学习目标,精准推送和延伸学习资源,如红色经典影片、时政解读文章和社会案例等,进一步提升学习的针对性。三是探索智能导学模式,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结合知识图谱、智能推荐等学习模式,为学生提供适应性学习任务。例如, AI 导师可基于学生的学习进度,推送个性化的思政案例分析任务,鼓励学生结合实际案例进行深度思考,实现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深度结合。

2. 开展多模态教学设计,提升思政课堂的表现与感染力。思政课程内容涉及历史发展进程、价值观塑造和社会现象分析等多个方面,单一的文字讲授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共鸣与认知认同。基于数字化的多模态教学设计能够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互动任务等多种媒介有机结合,提升课堂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一是构建跨学科融合的多媒体资源库。在思政教学中,将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整合,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例如,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可通过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对比,采用短视频和案例分析等多模态、生动形象的教学形式,使学生在全球视野下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二是利用智能视频技术加强课

堂互动。借助AI视频剪辑与字幕自动生成技术，教师可快速制作教学微视频，运用弹幕讨论和实时互动等功能，让学生在观看过程中主动思考，提高课堂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例如，在讲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可通过视频数据统计学生关注的热点，利用热点引导课堂讨论，形成良好的学习生态。

3. 强化跨学段智慧协同，打造全链条育人体系。数字化教学模式在优化单一课堂教学的同时，还能构建跨学段智慧协同机制，使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更加连贯系统。一是建设跨学段共享课程体系。借助数字化课程平台，开发大中小学贯通式的思政课程体系，实现跨学段教学内容的有序衔接。例如，构建涵盖“爱国主义教育”的系列课程，让小学阶段侧重故事讲解和情感体验，中学阶段强化理论分析与案例解读，大学阶段聚焦政策研究与实践探索，保障思政育人的层级递进性。二是开发跨学段智慧教研平台。通过云端智能教研系统，实现不同学段思政教师的教学经验与资源共享。教师在平台上可分享教学策略与优秀案例，利用大数据分析教学效果，推动教学模式的持续优化。三是建立跨学段学生互动学习机制。如通过建立智慧学习社区，让不同学段的学生能够围绕相同的思政主题进行讨论与协作学习，增强思政教育的时代感和参与度。

（三）搭建数字化教育平台，实现思政课一体化跨区域共建共享

构建思政教育数字化平台是推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关键举措，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区域间与跨学段间信息交流的重要保障^[21]。鉴于思政教育资源在跨区域和学段间存在较大差异、教学资源共享有限，通过构建覆盖大中小学全学段的数字化思政教育平台，能够有效整合优质教学资源，促进思政教育转型升级，提升育人成效，推动教育公平。数字化教育平台需从跨学段资源库构建、数字化资源匹配、推进区域共建共享、教学资源动态优化等方面着手。

1. 构建跨学段一体化思政教育资源库，推进标准化建设。当前，思政教学资源呈碎片化、区域分割和学段割裂的现状，各学段教材编写和教学资源使用等缺乏规范性标准，导致思政教育跨学段衔接不畅，教学资源重复、利用率低，亟需构建跨学段一体化思政教育资源库，促进思政教育内容的统筹规划与系统设计。一是构建国家级思政教育资源标准体系，从各学段教学目标、核心要素、课程内容及考核评价等方面进行统一规范，确保资源库的内容体系与大中小学思政课程深度契合，确保内容的标准话、层级化与结构化，保障课程资源在不同学段之间的循序渐进与高效衔接。二是因地制宜合理构建“国家级+区域级”双层思政教育资源库体系。国家级资源库侧重于提供权威的教材配套

资源，如政策解读、教学案例、历史文献等，确保思政基础教育资源的权威性与统一性；区域级资源库则结合地方特色，提供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社会实践活动和区域思政教育成果等，构建“统一框架+地方特色”的资源共享模式。

2. 构建数字化资源匹配体系，提升资源精准推送能力。在传统思政教育模式下，教学资源的获取主要依靠教师自我经验与网络资源筛选等，存在查找难度大、资源匹配度低和权威性差的问题，难以形成高效的教学支持体系。利用AI与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数字化资源匹配体系，可以实现教学资源的精准适配。一方面，基于AI算法的智能系统可精准分析不同学段学生的学习需求，结合区域教育资源特点，实现资源的智能匹配。例如，系统可根据学生日常学习轨迹，精准推送符合课堂要求的学习资源，包括教学案例、视频素材、政策文件等，提升学习效率。另一方面，建立“教师+学生”个性化资源库，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资源配置。针对教师，系统可支持教师自主上传，实现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结合平台资源高质量推送，实现个人资源库的智能拓展。对于学生，可构建覆盖各学段的一贯式学习资源库，根据学习轨迹推送符合不同认知水平的学习资源，小学阶段侧重故事化与情境化学习，中学阶段侧重案例分析与理论讲解，大学阶段突出政策分析与社会实践，确保教学资源与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契合。

3. 推进区域共建共享，缩小教育资源差距。我国思政教育资源在不同区域间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不均衡问题，优质教育资源难以全面覆盖。构建区域共建共享机制，能够推动优质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与共享。一方面，建设“区域共建+远程共享”思政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依托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形成优质资源的互联互通机制。例如，可依托东部地区师范院校与西部中小学的合作模式，建立远程共享优质课程、专题讲座、红色文化实践等，实现资源跨区域辐射。此外，可实施“城乡结对帮扶”计划，依托优质学校定期向薄弱地区学校推送精品课程、数字教材、教学案例等，弥补资源短缺，提升思政课程的整体教学质量。另一方面，加强跨校合作，构建思政教育“协同发展联盟”。依托国家级思政教育改革试点，探索建立“思政教育数字资源共建联盟”，鼓励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学校的资源共享与协同。通过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地方党史教育研究中心、社会实践基地等平台，推动思政教育的跨学科、跨学段合作，实现资源的多元化整合。

4. 建立教学资源动态优化机制，提升资源利用效能。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更新是一个持续动态调整的过程，需要建立资源质量动态优化机制，确保资源库的高质量、适应性与前沿性。一是构建资源使用反馈系统，

形成双向互动的资源优化机制。教师端可对平台推荐的资源进行评价,标注优质资源,并提供改进建议,形成资源优化闭环;学生端可结合学习数据分析、知识掌握度测试等,对资源适用性进行反馈,系统据此自动调整资源推送策略,提高资源匹配度。二是建立智能优化与淘汰机制。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使用频率高、评价优良的资源持续优化升级,增强教学适配性;对于使用率低、质量较差的资源,实施自动淘汰或更新机制,确保资源库始终保持高质量、高适用度。

(四)构建数字化培训体系,提升思政课一体化教师数字素养

教师是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核心主体,其数字素养和教学创新能力直接决定着数字化思政教育的教学效果。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思政课教师不仅具备跨学段教学能力,更要有跨学科的教学视野,从而契合学生对于不同学科的兴趣点^[22]。然而,思政教师队伍在数字技术应用、智能化教学策略掌握、跨学段协同教学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构建智能化师资培训体系、提升思政教师的数字素养与教学能力,是推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路径。

1. 构建数字化师资培训平台,实现精准化、智能化赋能。长期以来,教师的培训以线下讲座和集中研修为主,培训内容单一、技术滞后,难以针对性地提升教师的数字教学能力。依托数字化等技术,构建智能化师资培训平台,对于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和现代化教学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一是构建个性化数字培训系统,精准匹配教师培训需求。数字培训平台应基于大数据分析构建教师个人发展数字档案,收集教师的教学数据、专业背景、数字素养水平等信息,利用 AI 技术进行分析评估,为每位教师精准推送适合其发展阶段的培训课程。针对初级教师,可提供基础的数字化教学工具培训,如智能课件制作、在线课堂管理、互动教学设计等;针对中级教师,则强化大数据分析、智能测评、跨学段课程整合等方面的能力;而高级教师则需重点培养其在 AI 辅助教学、智能课堂管理等领域的领导力,以适应新时代思政课教学的变革需求。二是打造“AI 智能导师”系统,提升培训的互动性与实效性。依托 AI 技术建立“AI 智能导师”系统,实现教师在线学习、互动问答和智能推荐等功能,全面提升教师培训效果。系统可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教师的学习进度、教学反馈和考核评价进行智能分析,自动推荐适用于不同学段教师的培训资源,促进教师的个性化学习。此外,可借助 VR 技术打造沉浸式教学模拟环境,让教师在真实情境下体验智能化学习及教学的先进方式,进一步提升应用能力,实现教学相长。

2. 强化跨学段协同培养机制,促进师资一体化发展。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核心在于不同学段课程目标、教学内容的有机衔接,教师作为教学体系的执行者,需具备跨学段协同教学的能力。然而,目前大中小学思政教师之间的交流较为有限,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实现有效衔接。应构建跨学段协同培养机制,推动不同学段教师的交流、合作与资源共享,促进师资队伍的系统化建设。一是构建跨学段“思政教师共同体”,推动协同育人。建立大中小学思政教师联合培养机制,依托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培训机构、虚拟教研室等平台,定期组织跨学段教学研讨会、案例分析、示范课交流等活动。通过搭建“思政教师共同体”,促进不同学段教师在课程设计、教学策略、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实现教学理念与方法的统一。二是建立“大学—中学—小学”导师制,推动优质师资下沉。借鉴“双导师制”培养模式,建立高校思政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导师—学员”合作关系,鼓励高校教师指导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课程设计、教学研究,推动教学理念的跨学段衔接与传承,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则可为高校教师提供针对性反馈。同时,可通过线上导师制模式,实现远程指导与实时互动,提高教师的跨学段教学适应能力。

3. 推动教师数字素养持续提升,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教师数字素养的培养不是通过一次或几次的培训而完成的,而是需要建立长效的学习机制。为此,应借助数字化技术构建教师终身学习体系,促进教师教学技能和水平的持续更新与发展。一是搭建“思政教师数字成长档案”,实现个性化职业发展规划。利用区块链技术与云存储技术,建立思政教师的数字成长档案,通过全面记录教师的数字教学能力发展轨迹、参与的培训课程和教学成果等,为教师提供符合个性化发展的前瞻性职业规划。同时,该数字档案可作为教师评优、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激发教师主动提升数字素养的积极性。二是建立“数字研修教师社群”,促进持续学习与成长。借助在线互动交流平台,建立教师数字研修社群,鼓励各学段教师分享自身的优秀教学经验及做法,为他人提供借鉴。针对教学中存在的困惑及难题,借助互动交流、集思广益的形式进行破解,使研修社群成为自身成长的智囊。同时,开展“微课挑战赛”“数字教学案例研讨”等丰富的线上活动,推动教师在实际应用中潜移默化地提升数字教学能力,实现知识共享与协同成长。

(五)建立数字化评价体系,提高思政课一体化育人成效

评价体系是保障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质量和推动教

育模式创新的重要环节^[23]。当前思政课教学评价仍以传统考核为主,过度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而忽视对学生价值观塑造和能力提升等育人目标的评估。由于跨学段评价衔接机制尚未完善,导致不同学段教学目标延续性难以有效保障。构建数字化评价体系不仅能够提升思政育人的成效,还能为教育管理决策、教师教学改进及学生全过程成长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1. 构建数字化综合评价体系,强化思政课育人效果监测。传统思政课考核模式多以知识测评为主,忽略了学生在价值认同、情感态度及行为实践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导致育人效果评价难以做到精准、高效。数字化评价体系可借助大数据分析、AI测评、学习行为追踪等技术,对学生的思政课学习效果进行多维动态监测,精准识别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思想价值取向及社会责任意识,实现对思政课育人目标的全面评估。在认知层面,建立跨学段的知识概念网络,实现知识关联的智能化识别,利用知识图谱技术对思政理论、政策背景、历史发展脉络的理解深度进行考察,精准评价学生知识掌握情况。针对薄弱环节,构建科学的反馈机制,为跨学段教学内容的有机衔接与渐进深化提供依据。在情感层面,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学生的课堂讨论、学习互动、思政作业等表现特点进行智能分析,关注其情感投射、认同倾向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深度。在行为层面,借助区块链技术构建学生数字成长档案,通过分布式账本技术记录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课堂讨论等各类思政教育活动的行为数据,为跨学段的学习衔接和个性化评价提供数据支撑。基于跨学段的持续性数据积累,实现“认知—情感—行为”一体化评价,促进分学段的思政教学在目标、方法和成效上实现有效衔接。

2. 应用数据分析工具,优化教师教学评价与改进路径。传统教师教学评价多以学生满意度调查、课堂观察等方式进行^[24],数据采集较片面,难以全面反映教师的教学质量。数字化评价体系可借助AI工具,对教学行为、课堂互动、教学内容等进行分析,形成科学的教师教学评价机制。首先,建立课堂行为识别模型,实时追踪教师的课堂组织与师生互动等教学行为,结合学生学习行为数据与教学反馈,构建多维度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为教师提供精准的能力诊断与改进建议;其次,运用语音识别技术对课堂语言进行文本转换与语义分析,采用情感计算算法评估教师语言的情感表达效果,优化课堂教学语言的组织逻辑与情感传递策略;最后,建立教学资源使用追踪机制,通过量化分析教师对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应用程度,评估其在资源创新整合与应用方面的能力水平,进而提供数字化教

学资源开发与应用的优化建议,促进教学方法的创新。

3. 建立数字化评价体系,提升思政课教育质量的公信力。数字化评价体系的构建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教育理念从静态考核向动态成长、从单一检测向多维评估、从传统评价向精准教学的质性跃迁。学校、教育管理部门应积极推动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建设,通过制度规范和政策引导,使各利益相关方认同并理解数字评价体系,切实保障评价体系的科学、公正。首先,建立数字化评价制度标准,明确数字化评价的实施细则、数据保护机制及结果的应用边界,确保评价过程的透明与公平。其次,系统推动教师数字化评价素养培训,通过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帮助教师熟练掌握数字化评价工具,科学解读评价结果,并优化教学策略。最后,构建全方位的评价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借助区块链的分布式加密存储与隐私计算等前沿技术,保障教师和学生的个性化数据合法合规使用,规避数据泄露风险。

结语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背景下,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正逐步走向系统化、智能化和高效化。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入不仅优化了教学资源的配置,提升了教学内容科学性与针对性,还推动了教学方式的创新变革,拓展了思政教育的实践边界。今后,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仍需持续探索数字技术与育人体系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跨学段教学内容的精准衔接,确保数字化改革的公平、适应与可持续发展。思政课程必将进一步发挥“立德树人”的核心作用,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EB/OL]. (2019-03-18) [2024-07-03].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3/18/content_5374831.htm.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35.
- [3] 卢黎歌, 耶旭妍, 王世娟. 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1): 9-25.
- [4] 孙先民, 李裕琢. 数字社会、数字公民与数字公民教育:数字时代社会参与主体的培育 [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 119-128.
- [5] 任艳妮. 以“融合式教学”推进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价值

- 意蕴和实践理路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5, 43(1): 104–111.
- [6] 李爱琴, 师海娟. 大中小学思政课区域一体化的价值意蕴、驱动要素与推进策略 [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1): 10–18.
- [7] 窦桂梅. 贯通、衔接、协同, 夯实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根基 [EB/OL]. (2024-05-21)[2024-05-30].<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4/0521/c40531-40240015.html>.
- [8] 李社亮, 王晨. 数字化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价值旨趣、现实审视与实现路径 [J]. 课程·教材·教法, 2023, 43(10): 66–73.
- [9] 高苑. 以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EB/OL]. (2024-11-21)[2024-11-30].<http://www.nopss.gov.cn/n1/2024/1121/c219544-40366561.html>.
- [10] 蔡三发, 高霞, 姚昊. 数字化赋能研究生教育: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4(11): 3–9, 67.
- [11] 何理, 罗燕.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课程标准研制: 价值意蕴、问题呈现与实践进路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5(2): 66–71.
- [12] 沈壮海, 刘灿. 多重视野中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及其突破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2): 121–130.
- [13] 赵丙勋, 袁华莉. 教育数字化转型视域下新形态数字教材的应用场景及建设路径 [J]. 出版科学, 2025, 33(1): 55–65.
- [14] 徐蓉. 关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的若干思考 [J]. 思想理论教育, 2019(12): 80–85.
- [15] 李尚明, 周锦涛. 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进展的研究综述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 24(6): 41–53.
- [16] 李彦垒. 数字包容理念下乡村教育数字化转型: 挑战与应对: 基于 H 大学在 X 县的数字支教探索 [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65(1): 121–125, 156.
- [17] 杨增崇, 金灿洋, 藏雪.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背景下优质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探赜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1): 54–60.
- [18]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EB/OL]. (2024-07-21) [2024-07-3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7/content_6963770.htm.
- [19] 彭庆红. 数字化推动“大思政课”建设的依据、原则与路径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11): 96–104.
- [20] 梁建新, 王文静.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协同育人的五维进路 [J]. 江苏高教, 2023(8): 114–120.
- [21] 于祥成, 刘成.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价值意蕴及实践进路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128–136.
- [22] 王景云, 杨晨光. 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的有序推进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5(1): 112–121.
- [23] 李忠军. 大中小学思政课考核评价一体化理论探究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4(7): 28–32.
- [24] 吴薇, 姚蕊, 谢作栩. 高校教师在线教学经历对自我教学评价的影响: 基于全国 334 所高校在线教学的调查分析 [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 41(8): 63–72.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abling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 Possibilities, Actions, and Feasibility

WANG Geyi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Qilu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200,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provides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cross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aligns closely with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erms of conceptual coherence,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demonstrating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resonance and practical potential. The deep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orderly alignment of cross-stage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systematic progression of instructional content,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ecis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This ensures the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chai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vid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a new generation of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capable of shouldering the great task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integr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征稿启事

《德州学院学报》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山东省教育厅主管，德州学院主办的综合类学术期刊，双月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第1, 3, 5期刊登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章，开设的栏目有地域文化研究，鲁北发展研究，哲学·政治学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文学·艺术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和高校教学研究，其中“地域文化研究”为全国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分为“区域国别研究”“董仲舒研究”“黄河运河文化研究”“德州世家名人研究”“德州风物研究”等专题。第2, 4, 6期刊登自然科学类文章，开设的栏目有基础理论，材料与化工，生物与医药，资源与环境，电子信息，能源与机械，经济与管理，体育与运动科学，农业工程与食品科学，服装与服饰设计，高校教育研究。

欢迎校内外学者赐稿，来稿请发至邮箱。

人文社会科学类文章投稿邮箱: xb8985646@126.com;

自然科学类文章投稿邮箱: dzxyxbzrb@163.com。

德州学院学报

双月刊 1985年创刊
第41卷 第5期 总第203期 2025

主管单位 山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德州学院

主编 刘印房

编辑出版 德州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 山东省德州市大学西路566号

邮政编码 253023

电 话 0534-8985646 8985652

电子信箱 xb8985646@126.com

dzxyxbzrb@163.com

国外发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782信箱)

印 刷 德州联英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DEZHOU XUEYUAN XUEBAO

Bimonthly, Started in 1985
Vol. 41 No. 5 Sum No. 203 2025

Managed by Shandong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Dezhou University

Address No. 566, Daxuexi Road, Dezhou Shandong, China

Postcode 253023

Telephone 0534-8985646 8985652

E-mail xb8985646@126.com

dzxyxbzrb@163.com

Distributed by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Trading Corporation
(P. O. Box782, Beijing, China)

中国标准出版物号: ISSN 2097-5287
CN37-1372/Z

ISSN 2097-5287



9 772097 528255

定价: 20.00元